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四 2022.12

小鸟文学 2022 年度文章

王宇《天真的人口学家》 | 小鸟专题

伊丽莎白·鲍恩《安·李帽店》 | 故事群岛

黄菊《此里卓玛：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 | 生活亲历者





小 说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3 甲虫与鱼 西小麦
故事群岛 | P9 安·李帽店 伊丽莎白·鲍恩
P13 烧毁的最后一座桥 罗恩·拉什

非虚构

生活亲历者 | P17 天真的人口学家 王宇
P31 此里卓玛：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③～⑤ 黄菊
P47 牧区兽医的一个春和秋 在場
小鸟文摘 | P61 洋葱纸 盖尔·贝克尔曼
发现经典 | P67 若有人兮山之阿 /
P75 沧海明月珠有泪 /
P81 圣殿在静穆中屹立 /
P87 辅成先生 赵越胜

档 案

发现经典 | P113 纪念沈从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汪曾祺
Newsletter | P117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曾梦龙
P123 打开视野，看看“榜单中的榜单” 黄璐
P133 防疫工具退役了，没有人怀念它 张依依
P137 “这项刑法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通过” Snufkin

专 栏

接力访问 | P141 001 何雨珈：“我确实不振奋” /
P143 002 杨潇：“我希望更决绝地对准当下” /
P145 003 丁韦：生活是实验性的，质疑是真的 /
P147 004 Chris St.Cavish：理解中国食物的时候，我也在理解中国人和社会 /
P149 005 戴浩然：苏轼在这“意义完全被消解”的一年拉了我一把 杨樱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1565) "The Hunters in the Snow"

小鸟问答 Vol.24

小鸟 | 小鸟问答

所有时代里都会有人对自由精神充满向往，
哪怕空间小到接近于无。

i

“走不走？”

我们遇到很多人，都这样问。

还有我们认识的很多人，他们现在在国外。他们觉得自己这样安全，当然也优越，像过去几十年里他们一直以来领风气之先一样。

每一次有人问起，都会很认真地思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折磨，难免要盘算消耗于此所付出的巨大精神和时间成本，现状会持续多久，未来究竟有无可期……走与不走各有人生成本。

终于一天，反问：为什么是我走？

这国家肉眼可见的所有进步都是我们劳动我们付出的结果，为什么要走的是我们？

ii

所有时代里都会有人对自由精神充满向往，哪怕空间小到接近于无。

iii

年轻人也一样。不同可能有两点，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相对宽松空间，所以少了一点哀嚎与绝望；因为空间更小，他们需要调动更多的勇气。

iv

自由精神包括勇气，包括创造力，对权威的反叛与嘲弄，证明人的尊严，未来的光。它是人乃万物灵长的唯一原因。

v

小鸟计划为此再多做一些事。

我们从十二月开始会尝试一个接力采访计划。从一个有趣的人，ta 在做有趣的事，到另一个人，更多有趣的人，做更多有趣的事。

他们不逃避，爱自由。

vi

我们就计划这么延伸开去，我们去找到这些人。如果你愿意加入这个接力，也请告诉我们。

vii

未来这个栏目将出现在免费文章部分。

我们同时也会启用新的发布通道，以把这些未来的光传递到更多的空间。

viii

一年接近尾声。这是我们打算送给明年的礼物。

ix

受预算与精力所限，对于付费用户来说，近来小鸟文学付费内容相对来说没有增加。不过我们有在筹备更多的付费内容，希望在 2023 年年初有新的好消息告诉读者。

x

本卷有什么

黄菊撰写的《此里卓玛：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会继续后三期连载。关于这份口述，想额外说几句它的特别之处。最初收到这份口述的时候，作为第一读者，很为其中丰富的生活细节所惊讶。一个人对生活有怎样的感知力，本人的回忆可以还原到什么程度，这份回忆又能经历多少时间考验，描述出来的时候又会使用怎样的措辞，这四个元素叠加在一起，决定了一份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诱人的。此里卓玛是德钦人，如她口述所言，她不像哥哥姐姐，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时候就只有汉文了，而教材里的内容和她本人的生活毫无接近性，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卓玛自己写文章，和她本人的口语描述，几乎完全不像来自同一个人。卓玛的语言是有魅力的，这份口述里还收录了她本人写的《一千零一夜》小故事，读起来有安吉拉·卡特搜集的《精怪故事集》那样的质感。

在 2022 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打算发一份关于人口的小专题。其实之前也预告过，但因为各种原因一推再推。11 月 15 日，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达到 80 亿。“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这个说法不可避免又再次被提出。然而这个模糊的说法背后到底是怎样的现状，中国执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何在近年一再修正（却从未消失），我们有一份难得的《天真的人口学家》，可以让大家一捋多年的脉络。

除此之外，岁末将至，我们照例会发布一系列年度文章。其中包括：

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访谈

小鸟年度书单

小鸟年度访谈

小鸟 Newsletter 年度盘点

小鸟年度文化笔记

非虚构图书馆可能需要延期到下一卷，因为本期作者还在为小区解封努力。

xi

道阻且长，但我们终将得到应有的生活。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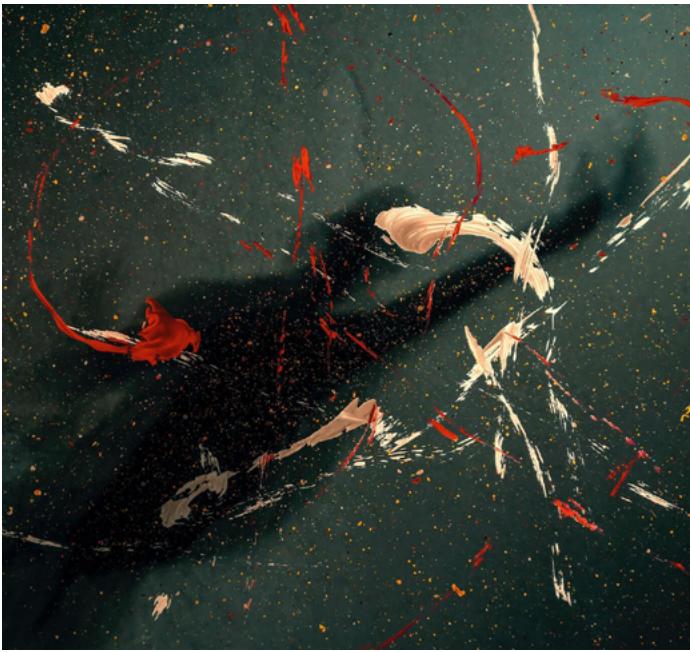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甲虫与鱼

西小麦 | 24 小时文学聚会

那人若隐若现，在背后叮嘱着他的命运，
绝不揭露他的苦短，
陪他沉溺在每一寸前进的步履里

01

倒数第二排中间位置坐着一人，透过舞台斜射灯光的罅隙，王国剩看不出他的性别，就一漆黑的人头，还会向前撺掇。他在舞台中央长方桌后的四方椅子上蜷着，正对台下，台下像是列队，站一排人，轮番指挥着他身边的张红丽、徐宝来、王婷，四人正好围一桌，角度与正常吃饭不同，闪出一大块留给观众，是一场饭戏。王国剩不需要被指挥，他的内容极其简单，穿戴着墨绿色的甲虫服，表面还有做旧磨损的油光，面部只挖俩孔露出眼睛，其他五官都被遮挡，头顶是长而软塌塌的触角，颇为滑稽。他目光集中在不远处的那人，还是想努力分辨他的身份，总觉得他跟自己有关，近来多次出现，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有一道背后袭来的目光灼烧着他的后脑勺，现在他怀疑他就在前面，以一种几乎平直的角度大胆地注视着他。

汗从脖颈处开始渗出，手团在胸前，王国剩不自在，但又极其安全。张红丽是一家之主，坐在他的左侧，将蓝色瓷碗端起来，筷子捣着米饭往嘴里送。王国剩小声说，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个人。张红丽还是默默吃着米饭，连头也不转，米粒粗大，冒着香气，她像是真的饿了一般，吧唧吧唧，演得入神。王国剩身子往左侧了侧，又说，红丽，你看见那人没有。

灯光全部亮起，舞台像是从洞里被拔出来，光头导演喊停，在台下一排人的中间，举起手中卷起的台本，指着王国剩说，你是个甲虫，你说什么话，我在这都听见了，你说什么话。王国剩被吓了一跳，双手一抖，肩肘用力，从胸前钻破薄皮，漏了出来，像两双长在胸面的带趾头的翅膀。饭桌上的三个人都笑了，张红丽碗里的米粒撒了过半，徐宝来和王婷都站了起来，这戏就只能到这了。王国剩说，这衣服质量太差了。光头导演骂出了一句，说，要演你就演，不能演咱就都散伙。张红丽抢着说，他能演，衣服我晚上回去缝缝，不碍事，我弄结实点。徐宝来说，我的老父亲，变成甲虫了还这么有劲。王婷搂住徐的胳膊说，得了得了，你就别贫嘴了，大家都好好的，县城这剧场能不能留得住，还不是得靠大家。张红丽绕到王国剩身后，帮他拉开拉链，像扯一条连衣裙。王国剩白色背心已经汗透，从衣服里费劲地钻出来，说，导演，我发现个问题。光头已经来到舞台，一屁股坐在张红丽起来的椅子上，说，你说说。王国剩说，我知道卡夫卡的变形记，他们也许吃的是米饭，但是绝对是不用筷子的。光头说，滚蛋。大家又笑了起来，张红丽把王国剩拉到自己身后，不停地拽他的衣角，让他少说话。王国剩把目光放远，小剧院后排座椅上的人已经不见了，灯光昏暗，但极为均匀，一切无处可藏，他环视一圈，除了破布修复的灰色座椅和半掩的暗红色后门，没有任何多余的物件。

王国剩确实不专业，他是被张红丽临时拉过来的，县里进行改造，旧剧院占用商用土地，需要根据实用价值决定去留。这个他很明白，三里埠小学推倒了，但实用价值高，趁着炎热的暑假正在重建，预计往东挪八百米，到时候升旗，太阳更早地照到眼窝，生活的长度也会比以往多八百米。小学生年年都有，看剧的人大多已经跑到南方去了，留下的老头老太太只喜欢坐在楼下马扎上互相看，焦点在谁家死了老伴，哪个老头身上的瘤子有没有按部就班生长，寡妇是否有机会趁虚而入。张红丽是剧院一线，女承父业，父亲去世时百般叮嘱，要跟光头好好合作，把剧院留下来。张红丽紧握父亲的手，病房都是止不住的咳嗽声，一屋三个病号，王国剩站在窗口，看外面嘟嘟的挖掘机不停地工作，把原先三里埠小学操场的沙土地掀翻，轮轴毫无规律，完全随机。父亲把王国剩叫到床边，话没蹦出一个字，咽了气，但王国剩从老头眼里看出了一种不甘，势必积极配合老人意愿。张红丽把剧院最后压轴的一次演出说出来的时候，讲得异常详细，光头联系市里领导，邀请相关人员，知名剧评，改编卡夫卡知名小说，变形记，但是演员李德龙最近不见了，剧本张红丽带了两本回来。王国剩知道有一本是他的，他当即答应，临时替代李德龙，连夜啃剧本，张红丽知道他为了她，在被窝里默默地哭，王国剩拍着被子像哄一条小狗，看了几页，发现他的戏份不多，就是一只甲虫。原来甲虫的扮演者李德龙，也去了南方，听说是中了彩票，夜里就收拾东西走了，三室一厅也没打理利索，留下一片狼藉，门都开着，不知道是急是怕。张红丽说她看过彩票底版，前几个数字都对的上，后面几个记不住，头奖两千万。王国剩在心里嘀咕，说，这钱肯定不是李德龙的，他没那命。

张红丽让王国剩把衣柜最里面那个红盒子掏出来，王国剩照做，又单手打开，从里面捏出一根针，递给张红丽。张红丽走近后，从盒子里挑了一团绿线，穿针，打结，要把甲虫服前面的两个破洞缝住。这是光头从市里带回来的两件甲虫服的其中一件，另一件质量好，抻不烂，让李德龙一并带走了。王国剩教英语，暑假偷着干个辅导班，刚回来，一只手里还拎着一个装水的塑料袋，袋子里是一条鲤鱼。他走进卫生间，拿出一蓝色水盆，放在茶几上，扬起塑料袋，把鲤鱼和水一并滑进盆里。鲤鱼打挺，几下就恢复了平稳的姿势，摆尾，绕了几个圈，来回碰壁。王国剩说，有孩子带了条鱼。张红丽说，给你的？王国剩说，不是，说是偷出来的，怕他妈把鱼杀了吃，也不知道怎么办，带课上了。张红丽说，那你怎么给带回来了。王国剩说，小孩善良，我给孩子说，我帮他放了，就放路上那条四水河里，从桥上扔下去就行。但是走路上，老觉得有人跟着我，不敢轻举妄动。张红丽把椅子从衣柜挪到茶几前，盯着盆里的鱼看，说，这鱼看着不小，鳞片和瓦似的，要不咱吃了。王国剩说，你那天看见那人没有，就在后排坐着，老瞪着我，最近常见这么个人，也认不出是谁。张红丽肘了肘他，说，我没看见，光吃米饭了。王国剩点点头，说，鱼我过几天放了，不吃，留个活口。

02

这黑影不是一天两天了，像是在王国剩眼底藏着，冷不丁就往外冒一冒，闪那么几回，看也看不清样貌，哪怕是在白天，也会感觉就在某个角落里阴着。他起初不跟张红丽说这事，后来回数多了，总感觉别扭，想找个人说说。暑假已过大半，眼看就要结束了，操场的假草在岳父咽气那天晚上已经全部翻了肚皮，土坯搭着土坯，坑都不深。等着挖掘机下班，王国剩拿着剧本在操场外圈踱步，连续两天夜里都是一个姿势，背着手，剧本卷起来放在屁股上，也不看，时不时扭头瞅瞅废墟般印象里的圆环。

下次排练还是周末，光头说再请几个市里的人来指点指点，势必把变形记拍成悬疑剧。王国剩还是头一次听这么个词，有点发怵，剧本后半部分还没内容，张红丽说光头还没有改出来，原本是一场温情戏，在李德龙扮演的甲虫被上锅蒸煮后，分食给老婆孩子而结束，体现人民群众的疾苦，象征资本主义的剥夺。但是因为要出彩，决定改一下剧本，承诺这个周末之前发到大家手里。对于张红丽来说，什么剧本都行，只要有的演，日子还能混下去，老父亲的颜面就能留住。王国剩明白。

张红丽把衣服缝好，王国剩赶忙穿起来，在床沿走了走，模仿着甲虫的姿势，自己都被逗笑了，一旁坐着的张红丽穿着白色吊带，捂着嘴，也笑个不停。王国剩从两只挖孔的眼洞里看到了张红丽腋下的红斑，止住了笑。勒痕在腋下靠近左胸的位置，应该是掐的，王国剩没法准确判断，把眼神瞟走，在床上打起滚来，甲虫触角拱着张红丽的身子，像她养的一只宠物。

狗吠起来的时候，黑夜铺展在回迁楼的房顶，住户不多，对面的窗灯像相隔甚远的星，零零散散。王国剩把灯熄了，拉开窗帘，推大窗子，夏日夜晚的风裹挟着些许凉气，透过纱窗拂过来。张红丽已经躲进了被子里，王国剩爬上床，知道这是一种信号，他们从来都是默契的，几乎要折腾到后半夜。两人没有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从不戴套，但就是怀不上，医院也没去过，张红丽内心敏感，但嘴上说不出来，按王国剩的说法，有没有都行，有，反而影响你的星途。这一句就够了，张红丽的内疚都卸下了，随即说，我就是个三流剧场演员。王国剩接，你就是我眼里的范冰冰。

王国剩钻进被窝，把张红丽从深处拽出来，双臂环着她的腰。张红丽的头从被边露出，王国剩向上一蹬，也钻出来，头对头，侧躺着。他把嘴唇凑过去，张红丽迎上来，接住。这一瞬间，王国剩恍惚了，摇了摇头。张红丽说，你咋了。王国剩说，没事，打了个屁仗。他用手掌在她身上游了一圈，特别轻抚了她腋下的勒痕，张红丽没有反应，他又把手从她的两腿之间伸进去，手腕钩住屁股，她轻轻地叫。王国剩停下，眼里湿乎乎的，下床，去了卫生间。

王国剩洗了把脸，往眼睛里扑了几捧水，掀开马桶盖，撒了泡尿。他盯着自己的生殖器看了许久，第一次觉得这玩意长得极丑，咽了口水，等尿液滴完，把裤子提上，又拿淋浴头冲了冲马桶，心里就想着一个字，脏。等把马桶冲完水，四周清洗干净，他出了卫生间，重新爬上床时，张红丽斜卧着，头枕在小臂上，已经睡着了。他冲张红丽小声嘀咕，你为啥做那事。随即把被角往上提拉，搂住张红丽。狗狂吠了几声，像是在楼下打架，撕咬声阵阵，近来城里大变迁，野狗都争着地盘，失了心性。

梦里也有狗吠，从剧场外响起来，天黑压压的，云卷曲成各种奇怪的形状把王国剩往剧场里逼。他踩着狗叫，推开剧场的大门，没人发现他，舞台正在忙碌，看不清几个人，桌子还在。王国剩坐到倒数第二排，调整好座位后开始往舞台上看。李德龙穿着甲虫

服坐在中间，他能确定那就是李德龙，空间的距离感早已丧失，色彩也不是准确的，甲虫服的绿色看上去是血红的，像暗下去将要消失的落日。

那人是谁？

李德龙？他不是中彩票去南方了吗，深圳，广州，一共两千万。

你信吗？我反正不信，我知道你也不信。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李德龙在甲虫服里蜷着，他在台上。

李德龙在哪你最清楚。

王国剩眼睛眯起来，舞台上只有一只甲虫，蹲坐在桌子上，两只手从胸前掏出，他知道那就是李德龙，千真万确。但是他又清楚那绝对不是李德龙。他被噩梦席卷了，有人在他耳边吹气，他转过头，看到了他自己，坐在倒数第二排他的旁边。座椅摇晃起来，砰地一声，王国剩被惊醒，鲤鱼从客厅茶几的盆里扑腾到地上，还在啪嗒啪嗒拍着瓷砖。张红丽仍然在睡，王国剩不知道几点，爬起来，去了厨房，找来大塑料袋，透明的，装满水，拎到客厅，单手把鲤鱼掏起来，鱼身太滑，鱼两次摔倒在地才被放进塑料袋。鲤鱼伸了下身子，安静下来，嘴巴一张一合，盯着王国剩。他回头看了眼卧室，漆黑中有模糊的影子，张红丽睡得熟，还有轻微的呼声，是什么也没发生，像是什么也没发生在她身上，他一时有些错愕，不知道自己做的究竟对不对。他把塑料袋抬高，鱼眼不会闭，睁得极大，他也把眼睛贴上去，水平，四目相对，他问鱼，张红丽爱李德龙？接着摇摇头，又说，暴力不会成就爱情。

03

王国剩下楼后，鱼就死了。

可能是饿死的，也可能是刚才扑腾那几下摔死的。他记忆里有过母亲摔鱼的场景，鲤鱼硕大，从厨房水池蹦下来，跳到蓝红色星形瓷砖上，母亲捏起鱼尾，猛地将鱼举过头顶，用力挥向地面，一下一下，又在鱼奄奄一息之际，抄起案板上的刀，用刀背用力击打鱼头。一只鱼迅速丧失生命，但还会在油锅里起跳几下，类似诈尸。王国剩周身发冷，倒不是因为鲤鱼，他觉得并不可惜，只是哪里对不起谁，想说，也说不明白。他等了一会，鱼肚朝上，没有回光也没有反照，只是静止，像一张泡发的手纸。王国剩想到哭着的小孩，还是决定把它放生。回迁楼的野狗似乎都已睡着，势力范围早先划出，不再纠结于占有。他溜着边走，出了小区拐进两排高大的梧桐，再往前，是四水河桥和三里埠小学旧址。上了桥后，还是感觉有人在身后随着，他扭回头，月光把自己的影子拉的很长，再无其他。王国剩独自嘀咕，难道是少了什么环节。他看着塑料袋里的鲤鱼，决定先带它走走。过了桥，他又拐进小学。

小学是一片石转瓦砾，已经不能称之为小学，东面八百米的建筑才是，正在等待封顶浇筑水泥，能在假期结束前竣工。王国剩现在所处的地方，不会再向下挖掘，会重新将土压平，改成城中广场。当然这都是王国剩打听到的，不过假草皮和塑胶跑道挖完后，挖掘机确实开走了，压土机也停在大院门口待命。无人管理，出入随意。王国剩拎着鲤鱼踩在泥块上绕圈，说，你命不好，算是活该。说完好像等着鱼开口回应，原地站定，愣了几秒才继续走。又说，如果她没错，你没错，那是什么错了呢。蛐蛐在泥土地里上蹿下跳，几只跳到皮鞋上，他才贴耳听到如琴鸣的叫声，高低起伏，像是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王国剩又说，就到这儿吧。

操场他走了一圈，也无法判断具体方位，四周平中带凹，看着一样，细节又有所不同。他从一处石头上跳下来，往四水桥走。走到桥中央，把塑料袋一只耳朵挂在桥柱上，右手把鲤鱼捞出，丢进河里。听着噗通一声，就当它顺着河道游走了，王国剩想。

想起那个梦，觉得心里不踏实。王国剩没有回家，沿着桥下的小路继续向南，往剧院去。剧院也尽显破败，到处都是颓气，房顶是平的，一侧挂满爬山虎，在月光之下像穿了半截裤子。远点看，似个大平房，像住着一户人家。他从侧门进去，和上次一样，尽量不发出声音，总感觉里面还是有人。

进去后，黑暗深了一个色块，几乎不见五指，跟梦里差别挺大。上次什么样，他想不起来，也不想去想。摸着座椅向前走，也就是往舞台去，没什么目的，他这会心里大胆起来，眼睛适应了黑暗，物件开始萌生灰边。走到一半，就听到舞台有咯吱声，不像老鼠，是桌子腿的磕碰，有节奏和规律。一下又恍惚起来，他摇摇头，把目光定住，射到舞台上去。两个身影重叠，躺在长方的桌子上，一沓衣物堆在地上。他额头起了细密的汗珠，黑幕里看到张红丽被钳住了脖子，胸部被死死掐住，听不见女人的呼喊，但能看到挣扎的躯体，不知道是不是口中被塞了棉布。他又甩了甩头，恢复了平静。两人身体结合紧密，互相撞击，上下共同用力，分不清主次，也没有强制与被强制之分。王国剩抹黑过去，在舞台下沿蹲下，头不过边，谁也看不见。他听。

你慢点。弄疼我了。

你别说话。

说话怎么了，剧场都快完了，说话怎么了。

完了怕什么，我们去别的地方。

我不想别的地方。

你真倔。

我喜欢这里。

我喜欢你。

你真讨厌，哎呀，轻点。

王国剩摸着自己的喉结，硬块上下涌动，声音他听不出来到底是谁，但想起了另一个版本。你别碰我。碰你怎么了，我待了这么久，还就没碰过你。我可真喊了。你喊，你觉得会来人吗。你别这样。我说了你别这样。疼。去你妈的。我喘不过气了。我要报警。你试试，我放火烧了剧院。

王国剩浑身抖起来，咳出了声。桌子停止了晃动。谁？谁在那。王国剩俯身往外跑，从侧门箭似地飞出。他一路跑向小学废墟，四水河桥，回迁楼。头顶开始发热，汗气蒸腾，脑门锃亮，像塑料袋里的鱼肚，他大口喘气，上到五楼，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

看到张红丽换了个姿势，睡得正香，打着小呼。

04

王国剩重新穿上甲虫服，张红丽说这次没问题了，不会撑破衣服。光头导演眯起眼睛，把后半部分的剧本递到每个人手里，徐宝来和王婷眉来眼去，窃窃私语，坐得近，还有一些小动作，王国剩都看在眼里，回忆起声音，仔细进行比对。光头导演说，剧本写完了，关键是甲虫杀人。大家都愣住了，卡夫卡变悬疑作家。光头导演接着说，国剩，你看看剧本，接下来你的戏份就多了，本来是想让你坐着不动，但你坐着不动，太保守，我们可能就都没地可坐了。这样，大家先看看剧本，我们讨论一下。光头又看着头戴触角的甲虫服，说，这个服装可以先脱了。

来剧院之前，午后的太阳还很毒，王国剩骑电动车把张红丽带到剧院前，经过四水河桥，他停下来，跟张红丽说，鲤鱼我从这放生了。张红丽扒住桥柱往下看，桥高三米多，她说，鱼摔不死吗。王国剩说，游得可欢，水花可大，都溅我身上了。张红丽说，你净瞎扯。王国剩踢下电动车的脚蹬，电动车停稳，他拉张红丽靠近，她贴在他身上，又突然弹开。王国剩用食指抬起她的下巴，脖颈两道不太明显的红印，他说，卡夫卡写了变形记，李德龙是甲虫，剧院里都是流氓，我说的对吗？张红丽说，你在说什么？王国剩说，你先别说话，听我说完。你父亲去世之前，你有一天晚上不在，我陪着老爷子，他老是看见窗台上的一只鸟，和它说话，他说让鸟离李德龙远点。话是这么说的。翅膀底下受了伤，你也能看见，但是你别管，你也管不了，龙爪子太长了，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直勾勾擒住鸟脖子，看得我心肝疼。我就干点头，窗台上没其他东西，就一株仙人掌，浑身是刺，盆里是裂干的土。后面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老爷子干抽抽，指着那只鸟，说要飞走了，又像是说，那龙又要来了。你知道他去哪了吗？那个李德龙。张红丽没有回答。王国剩继续说，他中了两千万，在广州买了一套房，取了个老婆，老婆不漂亮，心里不痛快，又从别人那讨了个女人，那女人有老公，我不确定女人爱不爱他，这一点我始终想不明白。于是有一天我就去了，房子很大，中间有个大桌子，本来黑灯瞎火的，两个人一个叠一个，在桌子上千，灯光突然从天上来，照在俩人脸上，多像一台戏剧，俩人脸色煞白，活像两个死人。男的喘着碗口大的粗气，女人妆都花了，在他们眼里，这光和没有一样，说不定还刺激着抽动的节奏。女人如果反抗，单手就能拧断李德龙的鸡巴，那东西脆得很，我始终想不明白。张红丽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李德龙可能掐住了女人的脉子，他真不是个东西。她转回身子，坐到电动车的后座上。王国剩又从桥上往下瞥了一眼河面，说，那鱼早就游远了，不用担心。四个人看着剧本，剧本里写道。和谐的一幕从甲虫男的双手撑破服装开始掉头，甲虫男看着终日陪伴左右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他知道他们已经在盘算着分食他，尤其是他的老婆，在饭间敲打碗筷，饥饿使人变态，两个孩子只剩大嘴，牙齿露在唇外，他的恐惧骤然升起，资本主义的嘴脸在桌面显露无疑，共产主义的臂膀这时就从甲虫服里钻出来，抗争，反逆，怒吼，甲虫之声，这令他痛苦的，身上背负着的极大的苦难着的命运，都被撑破了。屈辱，指责，爆发，恐吓，威慑，甲虫男站上了桌子，众人藏于桌底，一声狼吼，是从剧场中位的棚顶迸出来的，如雷贯耳，如山崩雪裂。灯光暗下，甲虫男破茧成蝶，向着共产主义翱翔。

有没有问题？光头导演问。是需要吊威亚吗？王国剩问。那是一种美的表达，不是让你真飞，大概意思能不能懂，光头导演说完暗示一切就绪，彩排正式开始。王国剩重新穿上甲虫服，张红丽手艺好，缝得结实，就是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撑破了。几人就位，徐宝来顺势摸了王婷的大腿，张红丽把碗筷归置整齐，桌面整洁无尘，留出王国剩可以踩踏的一小片空当。光头导演说，action。灯光渐暗，气氛渐浓，场外话开始响起，介绍了卡夫卡的背景和此场剧集之前的梗概。王国剩在独白中小声说，他刚才摸你大腿了，你看见了吗？王婷把头转过来，看着王国剩，嘴唇蠕动着。张红丽摩挲着手里的筷子说，你说什么？王国剩说，他俩，按理说是咱儿子和女子对吧。张红丽点点头。王国剩说，按理说，你是我老婆。张红丽小声说，不用按理，我也是你老婆。王国剩说，儿子刚才摸女儿大腿，这叫什么？他激动起来，已经准备站立。独白念完，他猛地窜起来，记住了刚才剧本的情绪，扭曲，恶心，愤恨，不可理喻，他双臂用力，指尖刺透针线咬合的缝隙，露出五指，然后手掌，整个胳膊，将左腿抬起在方桌上，绿色的皮革反射着扎眼的光。老婆，儿子，女儿全部趴进桌子底下，王国剩双手交叉，撕破胸前的绿色死皮，他想说点什么，但是不知道从何说起，顶灯像团炙热滚烫的火，烤着他，白色的背心又一次汗透，破烂的布条搭在不太明显的胸肌两侧，他感觉远处挨近门口的座椅上还是有一个人，死死地盯着他。那人穿着甲虫服，不曾穿透和撕破，他这次看清楚了，正如梦里一样，那人正襟危坐，从不肯踏越雷池半步，眼神不曾飘渺，格外坚毅，始终相信一切美好正如三里埠小学，绝不会为了商业用途挪移，事实终是残酷，那人若隐若现，在背后叮嘱着他的命运，绝不揭露他的苦短，陪他沉溺在每一寸前进的步履里，白日，黑夜，那仿佛不是他自己所为，他之于他而逃脱，破茧成蝶，飞往更高处。最终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搞了我的女儿，那就是乱伦，如果有人搞了我的老婆，我会杀了他，我不会飞，但可以撕破如此愚蠢的壳，在共产主义的马路上，按上炸毁资本主义的雷，翱翔，爆破，我不在乎剧院的一切，正如我不在乎谁在黑暗里发出的呻吟，这张桌子底下的人和上面的人一样多，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一样多。狼吼声响起，王国剩打住了，没再说下去，在场的人愣住了，剧本上到底是怎么写的不重要了，他肆意发挥，但甲虫服就这一套，完全撕毁了，谁也没想起来，这只是彩排而已。

05

光头导演和市里来的领导喝了一个晚上，还安排剧评人拐弯看了场电影，最新的，知名导演，男女爱情故事，挑不出毛病，真挑，就是男女主演得实在青涩，跟编排也没关系。那天就这么过了，剧评人没剧可评，和领导连夜回去了，后半夜下了大雨，光头导演继续喝到天亮，在走回剧院的路上被石头绊到后跌进原三里埠小学的操场，雨水积洼，泥沙俱下，一个个坑又露出来，坑不大，但能容一人。光头从此和导演分开了，就只是个光头，仰面躺在坑里，泥巴有点像沼泽，紧紧吸拽着他，也许是他根本不想起来。剧院也会推倒，盖上什么玩意也说不准，光头不想想，雨水顺着光头滑溜溜地滚落，

他平生从没这么顺畅，开怀大笑，手在泥坑里扑腾。几回，他都将要碰到那坚硬而腐败溃烂的尸骨，命运擦边而过，他觉得坑里过于凉了，酒精让皮肤皱缩，他爬起来，跌跌撞撞继续往剧院走。

徐宝来带着王婷去了广州，在大桥人行道上卖衣服，珠江的水是浑的，泛上来阵阵酸味。王婷把圆形灯罩打开，脸瞬间煞白，透过屏幕竟充满血色。凭借着剧院的功底，他们更像是一场场大桥的表演，徐宝来找出衣服，王婷镜头前穿上，脱下，无需闪躲，身体就跟桥柱没什么两样，那里挂着几件网红款，江风鼓胀了胸口，有时候风大，还会飞走一件，让他们恍惚想起方桌上的王国剩。

张红丽一周没有回来了，虽然就住在两个街区外的巷口，女人刚刚生产，婴儿她成天抱着，晚上也不敢睡，想升金牌月嫂，需要再有三家少妇的好评认可。她喜欢孩子，每个出生的婴儿她都会趁着主家不在偷偷叫他别的名字，男孩就叫王国国，女孩就叫王果果，不仔细发音也分辨不出来，但毕竟以前是个演员，对语音格外敏感。她说，也不知道这是在满足自己的什么欲望，自从剧院倒了，哪儿都觉得奇怪。王国剩说，断子绝孙了，我对不起你。

暑假过后，三里埠小学迎来了开学第一次升旗，五星红旗东移八百米后格外红，阳光刺眼，王国剩站在学生队伍最后头，回首张望，向西八百米的城中广场刚铺好瓷砖，留了几个横槽，有石柱立于一旁，待嵌，十二生肖，龙虎狗兔，气势恢弘。英语课上完，太阳移到正头顶，王国剩往校外走，四水河距离学校更近了，他站在桥上，河水有些干枯，露着墨绿色的水草，几个垂钓的老人把马扎插在泥滩上，带着草帽，不像在钓鱼，像是找了个地儿打发时间。一切正好，王国剩没什么不满意的，时间一点波澜也没有，正像烘干的阳光，固体似得落在四周，安全，稳定。

老师。

王国剩回头。

王老师，鱼你帮我放了吗？

什么？

是在这放的吗？是我，老师。

你是？

李鑫彪。我给你的鱼，你帮我放了吗？

啊，王国剩随口说，放了，就从这，游走了。

老师你说，它能游到哪去？我妈说，我爸也是这么游走的，我也不想找他，就想知道他去了哪。

你爸？

我爸。

李鑫彪踩上桥墩，双手扒着桥柱往下看。王国剩后退了一步，如果他现在冲上前去，用右臂裹住他的双腿，向上翻起，李鑫彪必定在三秒之内跌入浑水，水浅，水花激不起来，他不需要挖一个大坑，就可以把他轻松地埋掉。王国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眼前这个小家伙背对着自己，踮起脚来也就勉强够到胸膛，根本是什么也做不了。王国剩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矮小的背影突然变大接着又缩回去，大概是阳光刺了眼，他仿佛看到李德龙扒住桥柱，一个回身跳入四水河中，背上还驮着彩票得来的现金，满满一麻袋，紧紧地封着口，缠着几层厚实的胶布。当然，他早说过李德龙没那个命，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这里的人很容易丢，光头、徐宝来、王婷，他没再问过，妻子也没再说起过，就好像一顿饭吃完了，连盘子也不见了。李鑫彪是谁，他问问就知道了，你爸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去哪了，包括那只鱼，我来给你猜一猜，相信老师。这些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他不想要答案，什么都不想要了。

大卡车从桥上呼啸而过，李鑫彪的衬衫被风抖起来，王国剩上前抓住他的衣领，生怕他真的掉下去。

老师，它游走的时候回头了吗？

王国剩蹲下身子，扶着李鑫彪的双肩，他的眼睛眯起来，像是哭肿的，也像是向来就这样，两个眼泡耷在眼睑。

我抓不住它，它从我手里跳下去，水花很高，它奋力地往前游，没有回头，一直游，就那么往前。

真的吗？

真的，谁也抓不住它，你，我，还是你爸，我们谁也抓不住它。



李浩然

一个写字的，19 年开始创作，有 60 多万字
野生作品有待燃烧。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Onur Bahçivancılar on Unsplash

小说

安·李帽店

伊丽莎白·鲍恩 | 故事群岛

他，或者这样的事件，
时不时地突然发生在任何小有事业的
年轻女性前进的道路上

安·李帽店坐落在伦敦西南一个较为幽暗僻静的街道，只有一间临街门面房。橱窗四周包着木头框架，油漆成灰色，上面用间距很开的黑色字母书写着她的传奇：“安·李——帽店”。橱窗里永远只陈列着两顶帽子：帽架上一顶，垫子上一顶。其后悬挂着一幅镶有紫罗兰滚边的黑色幕布，充当这些帽子的背景。楼上两层或许就是安·李的神秘居所，但关于这一点，任何顾客都未曾开口询问过。那道黑色的纱帘从外面看起来是不可逾越的。

迪克·洛根夫人和她的朋友埃姆斯小姐朝帽店走来。埃姆斯小姐两年前曾经来过一次，买的帽子至今仍在使用并且经常被朋友们夸赞。正是她把迪克·洛根夫人带来的。她在街角处的路牌下稍作犹豫，皱了皱眉头，说她不记得安·李帽店离斯隆广场站有这么远。她们两个都还年轻，有着相似的粉面桃腮；她们骂人的话、认识的男人也都是一样的。迪克·洛根夫人决定要放弃克拉丽斯帽店。她丈夫看到账单就会好一通发作，她因此得出结论，考虑到自己不得不在每个季度结账日遭的罪，她应该买些更为物有所值的帽子。埃姆斯小姐，尽管她从未在克拉丽斯帽店买过帽子，也同样认为这个店太贵了：哦，有一家店她以前去过一次，安·李帽店，就在斯隆街不远处……

“贵吗？”迪克夫人谨慎地问道。

“嗯，不便宜。不过，绝对物超所值。你知道的，我那个绿色帽子就是在那儿买的——”

“哦——，”迪克·洛根夫人惊叫道，“那个特有表现力的帽子么！”

于是她们就来找安·李了。

时值一月下午。她们推开挂有帘布的门，第一感受是愉快，店里温暖的风吹拂过她们的脸颊。电火炉在光泽柔亮的黑色地毯上投射出一片绯红光斑。目力所及有两把椅子、两面镜子、一个长沙发和一个门帘，其后是一道颇令人遐想的拱道。没有帽子。

“装修得不错！”洛根夫人小声说道。

“典型的风格，”埃姆斯小姐答道。她们俩都惬意地解开皮毛大衣的扣子，各据一面镜子，侧头向其中打量自己。她们感觉自己仿佛是得到准许才得以四处走动，随着她们在空无一人的店铺里等待的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延长，洛根夫人心中的这种感觉也逐渐加深。克拉丽斯一向是顾客来了就冲上去招呼，洛根夫人倒是倾向于喜欢安·李对顾客的这种持重的冷淡。莱蒂·埃姆斯说过她算得上大家闺秀；一个奇怪的生物，莱蒂没法准确定位她。

“我好奇她知不知道咱来了”，莱蒂轻声说道，她的眉再次轻轻皱了起来，操心这其中涉及的礼仪问题。“我们可以试试咳嗽——不是那种愤怒的咳嗽，自然点。最好你来，露露，因为你最近有些咳嗽。”

洛根夫人的确稍有些黏液，咳嗽声爆炸开来。她们听见有扇门轻轻地打开又关闭，脚步

踏上两三级铺了地毯的台阶而来。沉默又延长了一瞬，随后在紧挨着帘布的后面，一个纸盒子被摞在了另一个上面，薄纸发出轻轻的摩擦声，持续了很长时间。她们简直要以为安·李会从盒子里走出来。随即，帘布抖动了，颤巍巍地摆到一边。有人站在拱道里严肃地打量了她们一阵。“下午好，”她沉静地招呼，“下午好。”

她的手指拂过开关，店里适度地明亮起来，长长的光线沿着设定的方向照射着。

“我又来了。”埃姆斯小姐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戏剧化的色彩。安·李点点头，“是的，我注意到了。我很高兴，埃姆斯小姐。我期待着你的光临。”她微笑起来，洛根夫人感受到了冷落，心里凉凉的。“我还带了朋友来：迪克·洛根夫人。”

安·李转过身来微笑，眉毛雅致地向上挑起。

她个子高挑，身材纤细。低调的裙装在她身上完全妥帖，竟令迪克·洛根夫人显得过于俗艳。她的手修长精致，伸展开的手指在衣服的衬托下莹然有光——右手戴着一枚纤细的戒指，并不在无名指上。她的脸端庄沉稳，嘴唇有丝严厉，头发用光滑明亮的发带紧紧裹在头上。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女祭司的味道，用一种仪式般的优雅来面对她们的闯入。和克拉丽斯和所有别的女店主比起来，她太不一样了，洛根夫人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因而当埃姆斯小姐说话时她很高兴，尽管模糊感觉有些失礼。埃姆斯小姐说，“我朋友非常想看看帽子。她甚至需要两三顶”。

安·李的眼光不动声色地落在洛根夫人的脸上。她打量过眉毛，又探索过嘴角，随即问道，“来个素静的？”语气里带着确信，几乎不在意顾客的想法。

素静的帽子远非洛根夫人所愿。她想要漂亮张扬的，能在戛纳戴的，但她并不好就说出口。她腼腆地提出，“嗯，别太素——是去法国里维埃拉买的”。

“是吗？”安·李颇为遗憾——“你要去旅行了，多棒啊。我不知道我是否——哦，等等，我或许有个小帽子挺合适。”

“我倒想要个头巾帽——金色的，如何？”

“哦，头巾帽——？那你还不如先去那里，在那儿也许更有可能买到想要的？戛纳肯定——”这话撩起了洛根夫人的怒气。一个人只要开店做生意，哪怕她看着像圣母什么的，她的职责也是把帽子卖出去。自己跟着莱蒂串街走巷，经过一条又一条似乎永无尽头的街道来到这里，可不是要被这么轻蔑地打发出门，让她去法国买帽子。她可不想在里维埃拉街头购物，除非她在赌场赢了钱。那些商店都不会赊账太久，迪克看到以法郎为计价单位的账单只会发作得更厉害。她满怀怨嗔地问道：

“是的，不过你就没有类似的帽子吗？任何金色的，类似头巾帽的？”

“我的帽子从来不多，”安·李说道，“我让你看看我有什么样的帽子”。

露露深呼了一口气，对这个妥协颇感欣慰，她望向莱蒂。趁着安·李短暂消失在帘后，莱蒂轻声说道，“哦，她一向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过的，很古怪。不过，那些帽子，亲爱的！你就等着吧！”

安·李带着两顶帽子回来，洛根夫人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确值得等待。它们正是梦想中的帽子——不，即使在梦中，也从未有人见过这样的帽子；说它们在梦的边缘闪闪发亮才更准确。她的手颤抖着伸向安·李去接帽子。安·李不以为然地冲她和帽子笑了笑，又转身进去拿别的帽子。

露露·洛根一把拽下她正戴的那顶帽子，把它扔到椅子上，任由它从织锦椅垫上滑落，在地板上翻滚。莱蒂完全理解她，也拽下了自己的帽子。她们俩各占一面镜子，从各种角度试戴安·李拿来的帽子。每次与对方交换帽子时，她们在递出帽子的同时心里充满了崇敬和不舍，就仿佛她们递出的是王冠一样。情形十分肃穆。安·李靠着拱道的帘子站着，看着她们，狭长的浅色眼睛里满是温柔怜悯之意。她的手垂放在身侧；她并不像有的人那样，需要揉着帘布的褶皱、抓住椅子的靠背或者把玩颈中的项链。但凡洛根夫人和她的朋友埃姆斯小姐有那个眼光、头脑或者品味来比较的话，她们会说她简直像一支百合花一样，浑然天成地长在地板上。她们的脸激动得发红；店里的热气推波助澜，很快她们就着了火。“哦，瞧我的脸！”埃姆斯小姐冲着镜子呻吟，双手紧紧按着自己的脸颊，在颤抖的鱼鹰状阴影下她的皮肤一片红彤。

露露怎么会想象自己戴着金色的头巾帽呢？世上有这样的帽子，她居然想要金色的头巾帽？不过，她以前从不知道世上有这样的帽子，尽管全伦敦城她觉得能称得上帽店的地方她都曾去试戴过。生活证明真是一种启示，甚至对迪克·洛根夫人这样的人亦是如此。她用颤抖的声音说自己肯定要买这顶，她说她就是必须要买这顶。“再把那顶蓝色的给我试试，亲爱的！”她向莱蒂喊道。

突然，一阵冷风之剑刺入商店。露露和莱蒂吓了一跳，惊叫着颤抖不已。店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站在门槛上，大咧咧地站在光亮中，被身后的黄昏雾气衬得格外显眼。他的脸庞冻得通红，脖子上的围巾十分显眼，折叠得妥帖无比。他站在那里，显得既羞怯又挑衅；羞怯是因为有想要逃走的冲动，又因为决心抵制这个冲动而显得气势汹汹。两位女士站在那里盯着他，摆出的是神话中仙子被发现后义愤填膺的经典姿态。然后她俩转而望向安·李，感觉有比贞洁更严重的事情被冒犯了。那个男人不是谁的丈夫，他不属于她们任何人。闯入者也望向安·李；他抻着脖子，向上方和侧面摆动脑袋，努力使自己的视线绕过两位女士。他张开嘴，似乎准备呼喊；随即她们几乎被那嘴里发出来的细不可闻的声音吓了一跳，“晚上好”。

安·李正用指尖托着一顶无沿女帽，这是一顶缀有柚黄色羽毛的精巧之物，仿佛就连她的轻巧手指也几乎不敢碰触。没有一根羽毛颤动，也没有一丝阴影掠过她的椭圆脸蛋，她回道“晚上好”，声音和她的唇、眼一样毫无笑意。

“我恐怕来得时间不巧。”

“是的，”她平静地说，“恐怕是的。我没办法现在见你；抱歉——我相信那顶帽子适合你，洛根夫人。我很遗憾你不喜欢黑色。”

“哦，我喜欢黑色，”洛根夫人不太开心地答道，欣赏着镜中的自己。“但我的黑帽子太多了。当然了它们确实衬脸，不过我非常想买些更阳光的——嗯，这个小蓝帽很完美，多少……？”“八畿尼，”安·李说，心不在焉地看着她。

洛根夫人打了个颤，愤恨地望向门口。安·李正躬身将那个柚黄羽毛帽放在长沙发上；她背着身，睫毛向上微微地抬了一下，温和说道，“我们有点冷，你要不介意的话。”

“对不起，”那个男人说道，狂乱地扫视着店内。接着他直接一大步迈进店里，并在身后

带上了门。“假如可以的话，我就等着。”他看起来格外庞大，双排扣的蓝布外套棱角分明地紧紧裹着他的胸膛。当他把灰色软帽取下来，遮遮掩掩地夹在胳膊下面，她们立即就发现他的头发有问题。他的头发卷成那样，他也没办法，不过他完全可以把它剪短点。他那大脚上的鞋太亮眼了。想想这样一个男人……露露忍不住在声音里流露出一丝伤人的语调，她说“对不住”，伸出手绕过他去接莱蒂递来的帽子。突然之间，店里变得格外拥挤。而且真的，就这样直接进来了……他压根不知道她们正在试什么；现在很少有店里只卖帽子的。他根本就不看她自己或者莱蒂，只把她们当作他的目光规避的对象——障碍物。他看着安·李的样子令人作呕。一顶简单的小帽，像那顶小蓝帽，她就要八个畿尼，那她就不该让她的顾客暴露在这样的情况下。

莱蒂站在那里，头发因为试戴而怪异地毛糙着，她的两手各拿一顶帽子，嘴巴半开着，盯着那个男人看的样子不是那么机敏。简直要让人以为她以前见过他。事实上，她正在渐渐认出他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事件。他，或者这样的事件，时不时地突然发生在任何小有事业的年轻女性前进的道路上，可是安·李——真是的。莱蒂对古罗马维斯塔女神的祭司贞女了解不多，但她就是模糊地将她们与安联系起来。唉，你永远也不知道……并且这还是家帽子店，是地球上最不适合发生这种事件的地方。或许是因为安的那种女祭司气质才令她们感觉此事颇有亵渎之处。

安·李将蓝帽子举至露露眼前，期间那个大块头男人穿过商店走到壁炉旁，挨着那顶羽毛帽坐在了长沙发上，她是唯一一位没有看见这一幕并为之颤抖的。男人真是巨大。他把脚缩在一起，很明显意识到自己冒犯了别人，用大衣的下摆裹住膝盖，尽最大可能不弄脏它。他凝视的目光悄悄地投向安。“我等会儿，你要不介意的话，”他重复道。

“恐怕不合适，”她泛泛说道，越过他看向那顶无沿帽。“我现在很忙，你也看见了，这之后我还要处理订单。对不起，你是不是最好——？”

“四点了，”他说。

“四点了！”露露尖叫起来，“天啊，我应该去科廷汉姆家！”

“哦，别走！”莱蒂哀叫，她的下午正变得支离破碎。安·李不偏不倚地笑了笑，说她觉得犹豫不决怪遗憾的。

“是啊，但是八个畿尼呢。”这可需要点时间来决断。

“这个小帽子很可爱，”莱蒂恳求，满怀崇敬地轻抚帽沿。

“是的，很美，”安·李也不得不承认，她低垂着眼睑望向帽子，唇角极细微地软了软。她们聚在一起，被某种紧张感捆绑在一起：炉火前的那个男人被遗忘了。

“哦，我不知道，”心烦意乱的洛根夫人哀叫起来。“我必须买那顶小黑帽，而且我还应该再买顶正餐帽——你知道的，在那个地方多常用！”她强烈要求埃姆斯小姐关注，语气里多有责备之意。两个人都企盼地望向安·李。不知为何，她并不是那种可以要求降价的人。一片沉默。“已经四点了！”那个男人用一种既霸道又紧张不安的语调说道。她们吓了一跳。“你以前说好的就是四点，”他重复道。

安·李令另外两位深感不安；她对待他是那么的温柔，同时又是那么轻蔑、毫不在意。“我恐怕你弄错了。周四的时候我一直很忙。晚上好，理查德先生；咱就别再浪费您的时间了。现在，洛根夫人，我们能定下这顶蓝帽子吗？我感觉你会喜欢它的，尽管我仍然觉得黑色更衬你一些。但我敢说你并不打算两个都买。”

“我会等的，”他说，声音古怪。他解开外套的扣子，用一种夸张的、挑逗的姿态将衣服掀开，同时倾身向炉火边靠得更近了些。“哦，帽子！”她们尖叫起来；安·李闪电般冲向前方，将那脆弱的东西从男人外套的坚硬褶皱下面抢救出来。她离开时又把它放在指尖上，凝视着它皱起的羽毛；现在她看起来不那么像女祭司了，更像位母亲——希腊神话里的尼俄伯，或者《圣经》里的拉结。她走到拱道前转过身来，脸上带着可怕的温柔表情，用刻意的客气语调说，“那么您可否行行好在外面等？”

“天很冷，”他恳求，伸着两只手烤火。这只是个姿态：他看起来并没有感觉到火的温暖。“那不等了岂不是更好？”安·李轻声建议。

“我今天要等，”他说，语气虽有困惑但带着毫不动摇的坚决。“我今天不走。”

她消失在帘后，在那堆薄绵纸的世界里簌簌作响。那个男人从火旁扭过头来打量店里的一切。他带着一种谄媚的胜利感左顾右盼，就仿佛是一个亵渎闯入最为神圣之地的人，马上就要被降下惩罚，却在祭司的剑横扫下来的时候仍带着那种神气左顾右盼。他注意到了椅子、亮泽的地毯、洛根夫人的帽子、两位女士、面对面放置的两面镜子以及其中折射出的每位女士的四重身影，但却没有表达任何评论或者流露出任何情绪。唯一的解释就是把他埃姆斯小姐和洛根夫人当作店里配件的一部分——就像每家商店都会在镜子或椅子处放置一两个“顾客”，恰到好处地摆放着，起着象征作用，就好比玩偶之家的客厅沙发上永远都会斜倚着两个玩偶一样。他盯着埃姆斯小姐陷入沉思，以前从未有人这么盯过她，就仿佛他在思考为什么安·李会选择在她店里放置这么一款类型的顾客一样。埃姆斯小姐似乎对他而言意味着某样事情的关键点，他盯着她，满脸疑惑，眉毛紧皱。

“我们俩或许还是走吧？”埃姆斯小姐对洛根夫人说。在他头顶的上方，她的话语突然来了个冰冷的转折。“这地方这么挤，还这么吵，我恐怕你很难做选择。”

洛根夫人站起来，把那顶蓝帽子在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盯着它看的眼神里有着迷惑和贪婪。“8——16——24，”她嘴里喃喃着。“我觉得她会把那个无沿帽降价。但愿她能让我用22畿尼把三顶都买到。”

“她才不会，”莱蒂十分确定。

那个男人突然认可了她们的人类身份。“我估计这些帽子挺贵的吧？”他问道，抬头看向洛根夫人。

“很贵，”她说。

“就屋里目前摆的这些，我敢说好几百买不下来吧？”

“估计是，”洛根夫人同意，感觉十分无趣。“——莱蒂，她什么时候才回来？她总这么就突然离开店铺么？因为我觉得这……而且，我去科廷汉姆家也太晚了。我立即就得走，可是我真是舍不得这顶小蓝帽。我们在哪儿能打到的士？”

“第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说，急切地抬起头，“你左手边拐过去。”

“哦，谢谢，”她们冷淡道谢。他受到这个鼓舞，接着问她们是不是也觉得今天很冷。事实上，不是那种适合遛狗的天气。“要是我进来给你们造成了什么不便，我很抱歉，不过我跟李

小姐约好了四点钟见面，专门约过的，你能想象在外面等好冷——薄绵纸的窸窣声停止了，她们觉得帘布颤了颤。男人转过身来，几乎用他那可怕的眼睛把拱道生吞活剥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那造型优美的厚重帘布仍然悬垂到地板上，纹丝不动。“我约过的，”他重复道，满意地听到自己的回声，信心也在增强。“但是我不介意等——我都等过那么多次了。”

“是吗？”埃姆斯小姐问道，音调很高，颇为冷淡。她下了决心决不买任何帽子，正无奈地将自己的帽子重新带上。“她肯定马上就回来了，”她扔给露露这句话以示安慰。露露坐在一个镜子旁边，头上没戴帽子，像座雕像一样正在沉思，她的眼睛因为算计而眯了起来。“我估计，您两位这辈子在这样的商店里试衣服的时间加起来都没有我在这家店外面等的时间长。假如再有其他女士进来，她们会自然接受我的存在，因为我打算一直坐在这里等到关门时间。”埃姆斯小姐站在镜前将侧面的头发整理蓬松，又说了句“是吗？”，完全无动于衷。“我有权利在这里，”他说，带着满意的神情低头看着自己深陷在地毯中的双脚，“因为你看，我预约过。”“没有预约，理查德先生，”安·李颇为遗憾地说，她出现在拱道里。

迪克·洛根夫人屏住呼吸慢慢站了起来，说她想买三顶帽子，问安·李能否立即送货。这一刻意义重大。埃姆斯小姐十分了解迪克，因而在听见她用清晰坚决的声音报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时觉得她很了不起。想想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一个季度结账日，又一个季度结账日……同为女人，埃姆斯小姐看着她的朋友又拿起一顶新帽子试戴起来，心里不禁升腾起一股热意，就仿佛她自己想要的话也能拥有的似的，一顶又一顶。安·李慵懒地在一本定货簿上写起来，接受了洛根夫人的决定，没做任何评论。莱蒂·埃姆斯忍不住想，要是安·李愿意的话，露露是不是还会买那顶新试的帽子，以及后来的一顶又一顶。

洛根夫人俯下身去从地板上捡起自己的帽子。安·李关切地俯视着，却没有做出举动来帮忙。她看似自言自语似地说她很高兴洛根夫人买了那顶小黑帽。它太衬她了，要是不买可真遗憾。安·李忍不住这么想。

两位女士穿起毛皮大衣，戴上手套，合起手提袋，把下巴埋进毛皮领子里。这个过程中，她们扫视那个坐在长沙发上的男人，就像扫视战场一样。他现在又向着炉火倾斜过去，宽阔的背对着她们。现在呢？她们突然渴望，啊她们是多么地渴望，再在店里多待一会儿。“下午好，”安·李说，一锤定音地结束了这一切。

“下午好，”她们说，仍然在门廊处流连了一秒。她们不情不愿地向街上走去，看见安·李隐约给她们鞠了最后一躬后就回到了拱道里，她的动作如此轻柔，几乎没有触动帘布。炉火旁的男人跳了起来，阴沉沉地穿过店面，追着她去了，宽阔的背上写满了决心。

在那个男人允诺她们可以找到出租车的地方并没有出租车，两人沿着斯隆街的方向继续前行，雾气在渐渐加重。迪克·洛根夫人说她觉得她现在不敢在科廷汉姆家露面了，但那些帽子真得很值。她走的很快，说话更快，埃姆斯小姐明白她是决心不去想起丈夫。她们走到第三个拐角时又再次犹豫不决，再次哀叹出租车怎么还不见踪影。在目力所及的前面两条街上，一个个小小的商店橱窗在雾气里投射出方方正正的亮光。在这些窗户里面是不是有某个人正等着别人进来，又像磁铁一样地漠然处之？

“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洛根夫人第三次感慨，回想刚才的事情她怎么能卖掉那些东西的……”“但她的确卖掉了。”

“是的。”她的确卖掉了，洛根夫人深有体会。

她们站在路缘石上，对不友好的天气颇有怨言和畏惧。这时，她们听见有极快的脚步声在接近她们，敲击在人行道上发出金属似的声音，时不时速度还会突然加快。在几乎令人半盲的浓雾中，有人正在逃离别人。她们没有交谈，但都屏住了呼吸，因为共同的期待而沉默了。

一个宽阔的男人，头脸深深地埋在外套中，飞奔进入她们目力可及的路段。似乎她们伸出手就能触摸到他。他目不视物地从她们身旁经过，呼吸急促，带着呜咽。正是从他的呼吸声里她们知道了刚才有多可怕——可怕。

他宛如盲了一样经过她们，刺入了浓雾中。

伊丽莎白·鲍恩

(1899—1973)，英国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洞察入微，主要关注英格兰和爱尔兰中上阶层人们的情感和彼此之间的微妙关系。

译者：陈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爱尔兰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爱尔兰文艺复兴与民族身份塑造》《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20世纪爱尔兰大房子小说》，译有《图绘：女性主义和文化地理的相遇》。



《安·李帽店》选自于伊丽莎白·鲍恩同名短篇小说集《安·李帽店及其他故事》(Ann Lee's and Other Stories, 1926)。Copyright © Elizabeth Bowen, 1926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Zoya Loonohod](#) on Unsplash

小说

烧毁的最后一座桥

罗恩·拉什 | 故事群岛

一个陌生人的友善 / 为我指出一条前行之路

那时那名女子在子夜刚过去几分钟时敲响紧锁的玻璃门，害得卡莱尔吃了一惊。他把扫帚搁到一旁，但没有走向店门。相反地，他绕到柜台后面，从收银机下面的架子上拿出点三八口径的手枪。他调低收音机的音量，望向窗户外面。女子赤着脚，左边眉毛上有一处擦伤，左前臂上也有擦伤，依然在流血。尽管时值十月，她却仅仅穿了一条磨边做旧的牛仔裤和一件大码的黑色T恤衫。她的头发像是几天没洗过。她再度敲门时，他看见她戴的一枚戒指有骷髅头装饰。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麻烦会轻易地找上门来，根本不用邀请。”卡莱尔十六岁时，他的父亲在盛怒下告诉他这句话。等到卡莱尔终于听从父亲的忠告时，他已经三次失业，两次离婚。他望向出口匝道附近的阴影，寻找女子可能的同伙。就在上周，前面一个出口处的一家商店遭到抢劫。女子又一次敲门，卡莱尔绕过柜台，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塞在牛仔裤后腰内。他站到店门前，指了指“打烊”的牌子。女子没有挪步，他用口型说了“打烊”后，便转身走开。

外面的电灯和加油泵都关上了，收银机里空无一文。他依旧把手枪塞在裤子内，拿起扫帚，没有抬头，开始围着货架扫地。剩下的事就是关收音机和店内的电灯了。接着，等到女子放弃并离开后，卡莱尔就能做他几乎每晚回家之前必做的事，就是在店后面黑漆漆的门廊上静坐一会儿。他会抽上一根烟，望着下面州际公路上经过的汽车大灯。一天和人打交道下来，柔和的黄色灯光、车辆本身的声音使得他内心平静，后者很像渐渐逼近的雨声。

如今，在两年之后，收音机里的歌声使他回想到那个深夜，店门外的那名女子那时并未离开。

纳什维尔以东的一个深夜
我的最后一座桥被烧毁，我的钱不见了
一个陌生人的友善
为我指出一条前行之路。

等到他扫完地，女子不再透过玻璃窥视店内。她低着下巴，两条胳膊抓着胸口，像是遭到遗弃一般，酷似那些被厌倦照料宠物的城里人放下车的狗。被人弃养的猫总是能找到一个生存的办法，但那些狗始终待在出口匝道近旁，等待着主人。

“你想要些什么？”他在解开门锁后问道。

“我不知道。”女人过了好久才回答。

她的蓬乱长发缠结成一缕缕的，眼睛里有血丝，而且呆滞无神。卡莱尔知道，她是喝醉了或者嗑了药。她浑身散发出香烟味和一元商店卖的廉价香水味。她也比他预想的更

年轻，顶多三十岁，但却是艰辛生活过来的三十岁。她整个人在瑟瑟发抖。

“你不知道？”他问道。

“我和几个人一起去纳什维尔，他们逼我下了车。”

“他们为何那么做？”

“我记不起来。”她一边说一边望向出口匝道，“我现在哪个州？”

卡莱尔心里想着“一个很让人遗憾的州”，接着告诉她是在北卡罗来纳。

“我本希望是田纳西州。”

“那还有四十多英里的路程。”卡莱尔答道，“之前和你一起的那些人，你预计他们会回来找你吗？”

“不会，我会说，那座桥被烧毁了，回不去了。”

卡莱尔的手臂因为一直拉开门而逐渐疲累。

“你想，你可以进来待一会儿。”

“我什么都买不了。我身上半毛钱都没有。”

“我不是非要你进来，”他答道，“但我不会一直扶住这扇门，顶多再坚持几秒钟。”

店内唯一的光亮来自头顶上方的一只灯泡，但这点亮光就足以在前边通道里找到双氧水。卡莱尔旋开塑料瓶盖，将瓶子递给她。

“处理下擦伤的地方。”他告诉她，又指向卫生间，“里面有纸巾和香皂。”

女子走向卫生间。很快，他听见水流声，香皂盒被打开的吱嘎声。几分钟后，响起马桶冲水声，更多水流进洗手盆。她走出卫生间，将双氧水瓶递回给卡莱尔。在他来得及阻止之前，她已经自在地坐到地板上，脑袋和后背靠着墙壁，合上双眼。她的呼吸渐渐平稳。他跟她说话，说是时候离开了，又摇晃她的肩膀。“嗨，醒一醒。”卡莱尔告诉女子，然而她依然紧闭双眼。卡莱尔寻思着，他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把她硬拽出去，把她锁在店里过一晚，还是带她回家，把她安置在他房子里唯一的床上？

但是那样她会会错意，或者根本不认为那个想法是错的。虽然她看起来外表凌乱，但她还是有漂亮的地方，T恤衫和牛仔裤里藏着姣好的身材。有那么一刻，卡莱尔想起他和她上床的情景。之后会怎样？她会在醒来后发现一个快满六十岁的男人睡在她身旁。她也许会在离开前索要金钱。或者发生更糟糕的事，她留下不走了，把他拖回到他终于逃离的那种生活。他能想象到那种生活完全展开，空的威士忌酒瓶，深夜的毒品交易，她在消失几天之前需要借些钱。不，那种事不会再度发生。

卡莱尔走到外面的门廊上，把门敞开，那样如果她醒来，他会听见动静。一只萤火虫闪着光，仿佛是进行答复一般，他轻弹打火机，点了根香烟。一只猫从野草中走出来，期待他夜里会在门廊台阶上放置的一罐打开的沙丁鱼罐头。发现什么都没有后，猫消失不见了。连续三个小时，卡莱尔望着州际公路上的车灯光亮，希望有一对大灯转向出口匝道那边，寻找之前被落下的同伴。然而，从始至终都没有车灯转向。

“你有一颗浑浊的内心。”他的第二任妻子特蕾莎在她离开的那天这么告诉他。后来，卡莱尔揣想她是不是实际上说的是“情绪多变的内心”，但浑浊一词似乎更加恰当，过去六年就是一次沉淀的尝试。生活又一次被搅浑了。卡莱尔决定把女子留在这儿，他回家去至少睡上几小时。他会给她写张留言条，说后门未锁。假如她拿走一些东西，带走咖啡壶或收音机去典当，拎走一袋杂货，也没啥关系。她不可能拖走一只固定在地上、足足有三百磅重的保险箱。然而，当卡莱尔回到店铺里，女子的眼睛睁开了。她的眼睛不再呆滞无神，而且她不用他帮忙就站立起身。

“能给我一些喝的东西吗？”

“冰柜里有水和软饮料，”卡莱尔答道，“也有咖啡。”

“我考虑的是一些稍微更带劲的东西。”

“我不卖酒。”

“连啤酒都不卖？”

卡莱尔摇摇头。

“为啥不卖？”女子问道，“我觉得这样会让你少做生意。”

“这儿有酒的话，我的损失会更大。”

“所以没有偷偷塞在柜台后面的占边威士忌？”

“没有。”

“那么咖啡吧。”

卡莱尔将一把藤编椅背的椅子推向她，她坐了下来。他走到柜台后面，把壶里剩下的今早上煮的咖啡倒掉，开始新煮一壶咖啡。懊悔的香味。许许多多个早上，他就是这样想到了咖啡。

卡莱尔望着窗外，看见一辆汽车离开匝道。他等待那辆车减速后拐进来，但它继续往前行驶。

“他们不会回来了。”她说。

“你能打电话给某人，让对方过来接你吗？”卡莱尔问道，“我的意思是说那伙人之外的其他人。”

她考虑起这个问题，随后摇摇头。

“没人会开这么远的路过来。”

“连家人都不会？”

“是的。”

咖啡煮好后，卡莱尔用泡沫塑料杯装了一杯，递给女子。他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谢谢你。”女子喝完咖啡时说道。

她把空杯子放到椅子旁边，再度合上眼，困倦地蜷缩在椅子上。收音机依然开着，音量很小，但听得清楚。新闻播报开始，紧接着是帕特·克莱恩唱的《疯狂》。女子的眼睛依然紧闭，但她轻声跟着旋律唱起来。她有一个动听的好嗓子。

“这是我的拿手曲目。”在歌曲结束时，她睁开眼，这么说道。

她似乎想要卡莱尔给出反应。

“我想我需要离开了。”她边说边站起身。

“去哪儿？”卡莱尔问道。

“纳什维尔。上周我被驱逐出我住的地方，但那座城市就像跷跷板。如果你在向下沉，

总有人在向上升，所以我会找处地方借住下。”

“你打算怎么去那边？”

“走到州际公路上，伸出大拇指搭顺风车。”

“赤脚走过去？”

“我赤脚走到了这儿。”

卡莱尔看着前门，仿佛它可能会打开，像一部倒带的电影那般，女子会倒着走出店门，一路倒行到汽车那边，再继续前行。然而，人生可倒退不了。

“阿什维尔有一家长途汽车站，”卡莱尔说，“我会送你到那儿。”

“我没有钱买车票。”

“我会买票。”

她第一次狐疑地看着他。

“你期望用什么作为回报？”

“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用？”

“你瞧，”卡莱尔答道，“你可以搭车、步行或者坐巴士。这不关我的事，但假如你选择坐巴士，咱们现在就出发。”

“好吧，”她说道。

卡莱尔走进最靠近店门的货架过道。在一只挂满棒球帽和太阳镜的货架中，他翻出一双绿色的夹趾拖鞋。

“给。”他说道，然后从保险箱里拿出几张钞票。

他们沿着 40 号州际公路往东行驶。女子合上眼，头靠着车窗。安静和黑暗有助于他假装她不在驾驶室内。这甚至不是因为她这个人，而是因为他紧挨着一个女人，他的手可以触碰到她的头发，她的面庞，她的身体。有些女人到商店里来和他调情。因为其中一个女人，他发生了四年里唯一一次故态复萌。那个女人远远没有他身旁的女子这么年轻，是快到五十岁的年纪。她是个酗酒者，但卡莱尔那时错误地以为他能够应付。

当他们的汽车驶入阿什维尔时，太阳正冉冉升起。长途汽车站位于城镇里游客不会造访的地段。有一名身着大衣和运动裤的女人睡在木质的长椅上。在下一个街区，一个男子在皮卡车驶近时颌首示意，见卡莱尔没有减速，男子从路缘向后退步。汽车站雨篷下的地方空着，于是卡莱尔在靠近站门的位置停下车。他把皮卡车的排挡置于空挡位置，让女子去打听车票价钱。她从汽车站出来后，告诉他票价是四十八美元。他拿出三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递出车窗。

“我猜，你想要我许诺，我不会转而用这笔钱来买毒品和烈酒。”她边说边接过钞票。

“现在这是你的钱了，所以由你来决定用它做什么。我累了，我要回家。”

但她没有离去。

“我不会给你更多钱。”

“不是这个意思。”她说。

“那么是要什么？”

“除了戒酒。”她问道，“还有什么建议？”

“一个从来不接受建议的人，就不应该给出建议，”卡莱尔说，“你要自个儿决定，是继续酗酒还是做个了断。”

“有道理。”她说，“我由头到尾都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名叫萨布丽娜。”

“你最好赶紧进站。”卡莱尔说道。

“好吧，”她说道，“谢谢你。”

卡莱尔驱车离开，没有朝后视镜瞥一眼。当他开回到家时，他焦躁不安地睡不着觉。他煮了些咖啡，在前厅里坐下，盯着墙上曾经挂着照片的地方留下的钉子孔。然后，他开车去了店铺。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卡莱尔直到从广播里听到名字和歌词，才将它和往事关联上。他在图书馆的电脑上进行谷歌搜索，证实了猜想。是同一张面孔，不过脸上多了些肉，显得更为健康。卡莱尔读了两篇关于她的文章，写她如何戒酒和再次热爱生活，还有司空见惯的匿名戒酒会宣传，写人生跌到谷底时需要更高的力量。现在她和她的歌曲肯定会获得乡村音乐协会奖的提名，或者甚至能得到格莱美奖提名。人生的跷跷板已经翘起来。但那是她的人生，不是他的人生，那天晚上，卡莱尔将打开的沙丁鱼罐头放到门廊台阶上时这么提醒自己。他的内心尘埃落定。不上，也不下。要为此而感恩，他告诉自己。猫从门廊底下钻出来，开始吃起罐头，卡莱尔则望着由汽车大灯组成的一条通向夜色中的隧道。



罗恩·拉什

美国诗人、小说家，目前在西卡罗来纳大学担任“阿巴拉契亚文化研究”杰出教授。他被视为当代美国南方代表性作家，作品曾获舍伍德·安德森奖，两次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并凭借短篇小说集《化学》和长篇小说《萨琳娜》两度入围福克纳奖决选。2010 年，短篇小说集《炽焰燃烧》荣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译者：姚人杰

非专业译者，翻译过的内容杂七杂八，从童书到科幻，从侦探小说到科普，但最喜欢的还是构思精巧的短篇小说。个人认为，翻译是一场永远只有更好，而没有最好的探求。

《我的父亲像一条河》“My Father Like a River”，Copyright © 2013 by Ron Rash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电影《地久天长》(2019)剧照

非虚构

天真的人口学家

王宇 | 生活亲历者

“我们不是斗士，
这也不是一个找英雄的故事。”

最早向公众提示异常的，是《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

2021年4月8日下午1点，国新办网站上还没有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承诺“七普”结果要在4月上旬公布。易富贤不太敢相信：难道发布真的要推迟？

“这本身就是超大新闻！”微博上，他罕见地使用了感叹号。

研究人口，易富贤是“野生”的。关注中国生育政策近20年，热忱和执着从未消减，看到哪里的人口形势乐观，短胖的手指就戳上去，眯眼呲牙地介绍给别人看，脸上的快乐毫无遮拦。

“七普”结果会在哪天公布？基于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乐趣，3月下旬他就开始猜。蹲守微博从一天发一次变成一天发四次。

事实上，他不关心具体的数字。国内主流的声音认为，人口普查数据因存在“瞒报、漏报”而长期低估中国的生育率。但这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妇产科高级科学家坚信：数据被人为调高了。为此，他日复一日地指控主管部门，愤怒而狂悖。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描述易富贤过去“在外围孤军奋战”的状态：“他得罪了很多人，他几乎把国内人口学界骂了个遍。”谨言慎行的人口学者对他敬而远之，被他误伤的人口学者厌恶他到极点，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坚持自己的判断。

他关心的是态度。他相信数字就是态度。对于“七普”，他只想看看，这一次公布的数据，到底能不能使他信服？

对中国的生育率，易富贤早有比喻：“从山上慢慢滚下石头。”

这位小个子的湘西人曾疯狂地想要阻止石头继续滚落，为此不惜实施针对个人的无差别“攻击”——我见识过——5年前的一次访谈，他用浓重的湘西口音，直截了当地询问我的婚育计划，得到真实反馈后，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和焦躁：“怎么能不生呢？要生！生两个！你们都不生，我们民族以后怎么办？”

如今，他敢肯定，石头已经滚到山脚下。要说疑问，也有：生育率是不是已经跌破了1.0？

易富贤对情势的敏锐只在小小的范围内卷起浪花，真正的风暴一周后才抵达。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公众号突然推送了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这篇由大白话写就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指出：政府部门制定的人口规划长期将生育率高估至1.8，而基于生育率高估的事实，中国将要面对的包括老龄化、少子化在内的人口转型挑战，可能比所预见的还要大。

危机好像突然降临。人群凑热闹似地跟着恐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央行都要来谈论人口？

两天后，统计局发言人刘爱华终于再次出现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对数据迟到做出解释：“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料，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发布更多更细的信息。”结果能在4月公布吗？没有消息。

4月27日，北京卫健委发布了2020年的户籍人口出生数——100368人，仅比当年死亡人口数多2719人——创十年新低。

3月中旬就开始兴奋的股市在这一天变得狂热。本就拾级而上的概念和行业板块从午后开始沸腾。医药制造、养老和养老金概念大涨，辅助生殖和婴童概念大涨，就连莫名其妙的长寿药概念也跟着涨。

第二天上午，开盘不久，股民讶异地发现，不光业绩差强人意，连季报、年报都未能及时公告的仟源医药，竟然神奇地涨停了。

没有人提及一小时前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重磅消息：“中国将报告50年以来首次人口下降。”事实上，4月28日当天，仅辅助生殖概念板块，就有5支股票涨停。

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史无前例地通过官方网站出面澄清：“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整个4月过去了，“七普”结果仍不见踪影，打破了人口普查数据在4月公布的惯例，也打乱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要求在4月“发布主要数据公报”的安排。

人们开始搜集已经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的十数省市的数据，无一例外，全是下降，降幅最大的河南信阳，出生人口下降了53.2%。

李建新开始频繁收到易富贤的消息。“他老在那儿问我，是不是知道什么，想得点儿内幕消息。”李建新苦笑，“我说我也没有。”

“雪藏”

“你们对‘中国人口’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多！”

对，答案都是“多”，100%是“多”。李建新觉得烦透了，可同样的场景照旧年复一年地在课堂上重演。

学生一茬茬地进来，他能耐得住性子一遍遍地引导和解释：“我说当你脱口而出说‘多’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再品味一下，再追问一下，背后的价值判断存在不存在？你们脱口而出，说中国人口多；是把它作为一个自豪的表达，还是作为一个负担的表达？”大家仔细一想，“——哦！”

“我们一代一代被洗脑了。小学课本就开始灌输，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有限，是吧？什么压力，什么经济，什么阻碍，我们就是这么从小宣传下来。”

总和生育率1.3。

迟到一个月后，“七普”结果惊醒了所有人。质疑普查数据“瞒报、漏报”的声音突然就消失了。国家统计局在发布会上自证和强调——这一次，他们动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得到了高质量的结果——事后却显得多此一举。局长宁吉喆称，中国生育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他说得不对，我们已经进入超低生育阶段了。”人口预测专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王广州向我纠正。

十年前，另一位人口预测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郭志刚打过比方——“（中国人口）就像一辆高速行驶而又在下陡坡的汽车”——“高速行驶”是指人口快速老化，而“下陡坡”则指生育率快速持续的下跌。

王广州比国家统计局更早确定了这辆汽车的方位。2020年10月，他根据国家卫健委提供的住院分娩基础数据做出测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在1180万到1240万之间，生育率在1.21左右。也就是说，自2016年“全面二孩”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数已经“四连降”。

这两年，鼓吹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人总是嚷嚷：出生人口数的下降不过是随机波动。王广州知道：“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不是。”预测结果告诉他，生育水平已经恢复到政策放开以前了。

问题出在一孩生育：生育成本居高不下；初婚人口规模6年下降了41.38%；育龄妇女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相应地，生育预期则持续下降。

人口预测是科学，只接受严密的计算和精确的结果。但现在，王广州可以平静地承认：计较具体数字是徒劳的，因为低生育率陷阱机制已经形成。

他不是那种主动站得更高的人，抗拒超越本职做出价值判断。2000万人口就是多，1000万人口就是少？这谁能说得准？看起来总是双眼迷蒙的“技术直男”乐于坦诚：“我没有这种自信。也没有觉得这是天大的事情。”

但他有说出实情的本能。

2月8日，离牛年春节还有3天，他接到《瞭望》一位陌生编辑的邀约——春节过后就是“两会”，这本新华社主办刊物为“十四五时期的人口战略”策划了一个专题，想请他来分析未来生育政策的导向目标。那位编辑特别强调：“要交代一下十四五时期生育政策的紧迫性。”

应该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紧迫性”，王广州没有纠正她。他把已经提交给主管部门的预判写进了这篇4500字的文章里。郭志刚说得没错，高速行驶的汽车要下陡坡。他们一直都知道，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放松甚至取消生育限制，就像在陡坡前方踩下刹车。

但如今，汽车已经开到陡坡下了。王广州要强调的是，低生育陷阱机制已经形成，只调整生育政策，作用实在有限，要从社会的方方面面着手，全面鼓励生育。

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王广州就交了稿，比约定的截稿期早了3天。但原本“期待大作”的编辑自此就没了音信。王广州留意过，这组专题真实存在，别人的文章陆续都发了，他那篇迟迟不见。差不多在易富贤开始蹲守“七普”的那个时间点，他没忍住，委婉地催促过，编辑搪塞了他：“领导说专题结构需要调整，所以还要等一等。”

王广州也说不清他为什么心急。经历多了，他管这种遭遇叫“雪藏”，他早该习惯。或许是因为可惜？“这么重要的判断，提前几个月，可能可以更早地采取各种相关的宣传策略。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做呢？”

还有一点儿失落。“他们可能是不敢相信我写的是对的，怕惹麻烦。对我写的东西，他并没有特别地放心。”

战士们无话可说

事实清楚之前，风向就已经变了。

三年前，一直呼吁改变生育政策的学者们提议，在中国人口学会的年会上设置一个“人口负增长”专题。顾宝昌记得对方的反应：“（他们）坚决不同意，就好像灾难到了，说这个题目太敏感，你们不要办了。”坚持设置的学者们只能“拼命找人”：“应该让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嘛。”

年会过去不到一年，形势逐渐明朗，最敏感的那批人就先转了向。“各种大人物，都趋之若鹜，大家都来写人口负增长。”顾宝昌难掩鄙夷：“有多少人真正去下功夫研究人口负增长作为一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2020年底，学者们惊讶地发现，就连他们的“老朋友”——顽固的保守派、政策的路线图——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也承认：“现在人口形势没有那么紧张了，就没必要限制生育数量了。”

“七普”新闻发布会上，河南省开始特别强调本省人口仍然“过亿”。顾宝昌感受复杂：“你听这里面的调门，现在生怕自己人少。过去就谈计划生育成就，我们少生了多少多少。”以人口学者的身份与官员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对暗处发生的事情，顾宝昌了然于心。但愤怒难以自抑：“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早日达到负增长吗？那么到底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啊？”

从2000年起，顾宝昌作为牵头人，曾三度联合人口学者向中央上书，建议取消独生子女政策。

“七普”出来了，都来发表高见。「七普」没有什么新东西。”顾宝昌那种原本使人放松的随和态度，被一种冷漠和孤愤混杂的情绪取代。“人口这个东西，当你感觉到（危机）的时候，已经没什么讨论价值了。”

作为较早推动生育政策调整的学者之一，十多年前，为了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顾宝昌曾与几位人口学者一同拜访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媒体负责人。顾宝昌记得他们的反应，有的人不明所以，“人口有什么问题？计划生育抓得挺紧，这不挺好吗？”有的客客气气，“老顾，我也是搞这个的，你要多帮帮我。”可一到外面公开发言，口风就变了。那种对人口问题共同的漠然态度，顾宝昌记忆尤新。

如今，情况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有位教授，见到顾宝昌就说：“顾老师，你说怎么办？现在年轻人都不生孩子，将来怎么办？啊？”顾宝昌用他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重现当时的对话，“啊，怎么怎么的，他操心得不得了。”也有人特地给他打电话，一打打一个小时，从道德的角度批判下一代人有多么不像话。

一些毫无新意的粗陋见解，是一种长久存在的危险倾向的影子。王广州到深圳开会，听到同行居然也持类似的论调：“中国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这哪有解决不了的？生孩子少了，那让他多生不就完了？”

“乱讲，人又不是机器，对不对？回想起那一幕，常常露出开朗笑意的王广州脸色一沉。“你犯一次错误大家可以理解，两次也行，每次你都是错的，就无法理解。你是专业上没有水平？还是道德上没有水准？还是背后有利益关系？哪个都不能接受。”

都是在行当里工作了二三十年的人，他当场反驳：“你对事实的判断不正确。这种想法也非常危险，没有人口学客观规律在里头。”

总之，危机显影，“各方面”仍像40年前那样，认为人口是个“可捏的馒头”。

对众人姗姗来迟的紧迫感，顾宝昌烦得要命——一种比利·林恩似的疏离——外面的讨论有多热烈，他本人就有多冷淡。

李建新也差不多，找来的记者，他一概不搭理。更可笑的是，人文学者们的饭桌上，有位人类学教授还突然向他发难：“你们人口学的人都干嘛去了？”那位教授觉得生育限制至今不取消，问题出在所有人口学者身上：生育限制取消了，人口学者的饭碗就保不住了。

李建新气坏了。这是无知的指控还是恶意的羞辱？不管哪一种，都称得上离奇。

从1995年的博士论文开始，他就呼吁改变独生子女政策，书都出了好几本，论战也打了好几轮，20多年，喊着喊着，头发都白了。委屈也没少受——文章发不了，开会被排斥在外——这些事情哪能在饭桌上说得清？人口学界有蝇营狗苟的事，“变色狼”也不少，他绝不在其列。他没奢求过什么赞誉，但也没想到，到头来还要遭受非议。饭桌上他呛了三句：第一，你不要跨界评判；第二，我们人口学不都是吃饭的；第三，至少，我保证自己对得起学术。

宣布“全面三孩”的那个下午，两个小时，顾宝昌的电话响了六次。刚一接通，记者们就要他解读政策。顾宝昌知道，他们只是抓起一堆专家的联系方式逐一碰运气，根本就不了解30多年来，他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和调整做出的诸般努力。他感受不到被尊重，简直被视为政策的注释工具。更何况，对这个结果，他也真的无话可说。只得用“在开会”、“不方便”来推脱。

“对这个政策，我们还挺吃惊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一位掌握了电话采访技巧的记者快速抛出感受。顾宝昌没忍住，反问对方：“你为什么觉得它快？”记者被问懵了，不知道哪里冒犯了他。顾宝昌气到直接挂掉电话：“一上来就是‘怎么那么快’，什么叫快？早就该废除了！”

“丢脸”、“窝囊”，这是顾宝昌得知三孩政策后的全部感受。作为第一个从国外取得人口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努力了21年，“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取消对公民的生育限制”的政策建议，至今仍只实现了前半句。

站在鸡蛋一边

1978年11月的一天，为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山西省委党校的年轻教员梁中堂到了北京。

在党校，梁中堂本来是教授《资本论》。但文革结束，领导人承认：“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中央提出，“要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抓纲治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见大成效”，希望在1980年“五五”计划结束时，能有大变化。

一时间，消耗粮食的人口被视为绝对的负担。1978年6月，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了会，要落实华国锋提的目标——3年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

下。也是那次会议最先提出：“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人口学成了显学。参加这场由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国盛会时，距离梁中堂受指派讲人口理论课，不过短短几个月。

梁中堂没学过人口学，也没机会读大学。1966年，他刚填好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志愿，准备参加高考。可“文革”爆发了，他接到消息，让等半年。他等了四个半年，走投无路，只好去当了兵。连队里没什么学习资料，能够得着的只有马克思。好吧，他开始读马克思，意外发现马克思讲的道理很深刻，才入了迷。

知识先是被弃若敝屣，群氓们恨不能再踩上一万只脚，尔后又变成人人渴慕的稀缺品。百废待兴，蒙尘的知识复现能量，又把幸运赐予那些勤奋且乐于思考的人。从部队复员后，梁中堂做过公社主任，因为研读马克思，他被山西省委党校看中，进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做了教研员。

那次大会，梁中堂能想到的所有重要系统——中央党校、社科院、全国高校、各省市、军区——都派了理论宣传代表。大概没人留意到这位两手空空的年轻教员。他没写文章，故意的。

“老百姓生孩子，有什么可研究的？”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他不知翻过多少遍。他想不通。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决定论”，但现在，显然认为是人口拖了经济的后腿，“和马克思的理论截然相反。”

第二年，还是11月，还是人口理论讨论会，到成都参会时，梁中堂带上了自己的论文。他就“一胎化”生育政策做了测算，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采取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然迅速导致我国人口老化，造成劳动力供应紧张、兵源不足、家庭结构四二一等等。”

农村出身的梁中堂感到恐惧。测算几乎是他的本能反应：“如果‘一胎化’实现了，农民的地没法种了，也没法生活了，到老年该怎么办？两个老年家庭，无论中年劳动者的两口子到哪个家庭生活，另一个家庭都会没有年轻人。”

但那次会议的明星是七机部的年轻人李广元。去年他就参会了，他是看到北京火车站张贴的路标，一路找到会场。但由于专业不对口，主持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教授刘铮仅允许研究控制论的航天专家们会听，没有把他们列为会议正式代表。

但这一年情况大为不同。李广元说，只要将人口数据和相关参数代入编制的模型，一百年或者任何长时期的预测结果，不出1个小时就被电子计算机打印出来了。

梁中堂至今记得，当时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栗秀珍，“是如何用一种欣喜的表情倾听和关注。”看到栗秀珍的反应时，梁中堂就知道，生育政策将与李广元他们连接在一起。在那样的情形下，梁中堂的担忧，只称得上是一点小小的杂音。

情势没有出乎梁中堂的预料。1980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公开信》：“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被遗忘的翼城实验

“事实证明，我们的人民是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既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也能够为子孙后代着想。”来自决策层的那封公开信并不避讳这一点——独生子女政策是要民众为了国家利益，主动让出个人利益。

梁中堂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有了传奇色彩。1984年，梁中堂开始给中央写信，信中附上了他的研究报告，《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梁中堂提出，如果在全国推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允许人们生育二孩，到了2000年，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

梁中堂那时不怀疑“人民顾全大局”的必要性。城镇居民无妨，但他了解农民的承受力，只求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力度轻柔一些，以免把农民弹到半空中，然后任其自由落体。

后来我在梁中堂连卫生间墙壁也摆满了书的家里问了一个蠢问题：“你怎么知道怎么给中央写信？”

我第一次见人家里用图书馆那种方式安置书架。70平左右的屋子，人的活动空间大约只有10平。除了餐厅和两个卧室，梁中堂那间客厅也被几个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占去了四分之三。剩下的一个狭窄的长条，摆着他的台式电脑和两只沙发。

我坐的这只，在我之前，接待过无数对梁中堂和计划生育政策历史好奇的人。进门不用换鞋，也不必客套，一只玻璃杯泡杯绿茶，就放在一个木制的小旧马扎上。梁中堂知无不言，诚实得让人直冒冷汗。只要聊得投机，谈话好像可以顺着时间，绵延不尽，无止无息。

73岁的梁中堂显然看出了我真正的困惑。但他也愣住了。梁中堂那件红格子衬衫就挂在沙发旁的书架上，垂到我的头顶。那个短暂僵住的片刻，房间里散发着衬衫的洗衣液香气。

我忘记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大约也没有真的回答。后来这个僵住的问答时刻总在我的头脑中闪现。我想了很久才弄明白，我们之间那种不时“咯噔”一下的东西叫作时代的温差，那种温差将在这个漫长的故事里反复出现。总之，那时的“中央”和今天一样充满威严，但并非一个密不透风的禁地。那就是一个年轻人敢往中南海写信的年代。

梁中堂的报告被中央批转至国家计生委，此后没了下文。我看很多类似的回忆，“没了下文”常常意味着不必再努力。但梁中堂这份报告不一样，它被国家计生委政策研究处研究员（另一个身份是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儿子）张晓彤看到。张晓彤重新捞起这份报告，与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合作，按照梁中堂的方法重新计算，并把结果写成报告，重新提交中央。

报告同时获批：“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梁中堂目力所及处，获取支持的过程似乎利落干脆。他满怀信心，觉得高层都已经

主张的事情，只要计算确认没问题，应该就能实行。

但事情迟迟没有音信。“没看见他们测算，也没看见他们准备要怎么做。”37年过去，对当年的情境，梁中堂轻轻感叹一句：“年轻人。”

年轻人盲目地猜想：“是不是国家计生委担心前面是很强硬的‘一胎化’，现在要实行普遍二孩可能会引起混乱？”

他又给中央写信，要求试试。不是试控制人口的效果，因为那只有到20世纪末以后才能看得出来。他要试试看，会不会出现混乱，能不能借此打消有关部门的思想障碍？在张晓彤的周旋下，国家计生委终于下了批文，同意梁中堂在山西省选择一两个县做试点。1985年，翼城试点推行了三个月，梁中堂就请新华社对试点做了报道，在媒体数量极为有限的年代，一时间，“翼城实验”的消息传遍全国。梁中堂发现，有些地方甚至在不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便开始效仿翼城。

反对的声音当然有，但“保护翼城试点”的声音也在，时任计生委主任王伟把全国现场会放在翼城召开。梁中堂明白，“这等于国家计生委认可我了。”以前他不理睬计生委，“直接给中央写东西”。后来王伟的秘书给他写条子，“梁老师你给中央写的东西，也给王伟书记一份。”梁中堂心里纳罕：“都到这个程度了，人家对你很友好。”

1989年，情势大变。见到梁中堂，先前允诺“一定会去”翼城的干部，再也不提去翼城的事了。再往后，国家计生委的干部到山西考察，由副省长陪同，“转了一圈，从翼城的县城边上经过，也没停一下。”

当年效仿翼城做法的地方试点大都退了回去，而“翼城实验”像是一个被遗忘的存在。不论是作为政策的参照点，还是出于对翼城的承诺，梁中堂都想保住“翼城实验”。

只要有人口调查，他总要用调查结果作为依据，论证“翼城实验”的效果，以伸张它的合法性。

“我那时候的认识是，我披着人口学家这张皮，说的话总是比一个农民说的话要起作用，所以我必须顶在这里，我不能离开。”梁中堂说。

不是12亿，而是13亿

1989年，顾宝昌推自己那一把的时候，已经没人提翼城了。

那是从美国拿到人口学博士学位的第三年，他44岁，人在盛年，已经在北大社会学系做了两年副主任，觉得不成，“得到实践里去。他想知道，计划生育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到底怎么干的？”

这一推，就把自己推进了两难。

到国家计生委人口情报中心不久，当时的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就找到顾宝昌：“老顾，你说‘七五规划’，31个省，大多数都没有完成人口计划，是不是这个计划就有问题？”他“不敢吭声”。到任后，他接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草拟“八五”人口规划。严控人口到12亿的目标曾放宽到了“12亿左右”，但这被指为“人口学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再大的罪名也抵不住坚硬的现实：人口已经接近12亿了。正值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彭珮云着急：“这后面10年怎么办？”

他们收集了国内外20多个人口预测方案，有联合国的，有宋健团队的，有人民大学的，还有世界银行的。所有预测结果都列在黑板上，一张写不下就再换另一张。但不论是只有几个变量的预测，还是有几百个变量的预测，全都指向一个结果——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不是12亿，而是接近13亿。

王广州在30年后捕捉到的那种微妙的危险倾向，在那时鼓胀张扬。有人当即就提出了质疑：“老顾，你们为什么不用一对父母只生一个孩子来预测？假设每个家庭都合格，都只生一个孩子，生育率不就是1.0吗？人口不就下来了吗？”

顾宝昌把话藏在心里：“你要这么做，领导一看，（12亿）可以达到嘛，那就照这个做嘛！那不就血流成河了吗？”

到清华开研讨会，会开到一半，来了一位大人物，“蹬蹬蹬”就上了主席台。“东北能做到的，其他地方为什么做不到？控制人口就要快刀斩乱麻。”他们在台下不敢吭声——如果坚持让人口停在12亿，就意味着接下来没人能生孩子了，会出现无婴儿、无婴儿——指标已经用完了，所有胎儿统统都要流掉。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控仍在回荡，彭珮云还是决定向中央汇报实情，必须争取把人口目标从12亿改为13亿。她独自去了中南海。

“我们谁都帮不了她，”顾宝昌说。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低垂着眼，交叉的双手搁在腿上，一动不动。时隔32年，他像是跟着彭珮云一起，又陷入那个刀斧加身的时刻。直到彭珮云回来，“接受了！”顾宝昌突然扬起左手，才终于松了口气。

除此之外，彭珮云还保下了“女儿户”政策（一胎是女儿的农村家庭，可以生育二胎）。梁中堂的评价是：“一下子解放了一半农民。”

计划生育在彭珮云的争取下，走到了“既要严格控制，又要实事求是”的狭路上。“13亿”成了军令状。彭珮云动员大家：“跳一跳，够得着。”顾宝昌理解言外之意：“跳一跳，也就是尽力为之，够得着，意思是实事求是。”

每年“两会”，政治局都要用周末一个上午的时间，给省委书记们开会，按统计局发布的出生率给各省排名。头一年，广西的出生率最高，书记坐在那儿，脸上挂不住，回去就把计生委主任撤了职。

“广西、贵州的计生委就是晚上不睡觉，它的出生率也下不来。上海的计生委主任就是不上班，它也上不去。”如今不言自明的事，当年的人看不真切。

不合理的出生率考核很快被推翻，全国又开始推行指标治理。明年可以生1000万个孩子，盘子就那么大，分指标大会，各省要千方百计找到规划统计司的领导，“你看明天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

但执行时总会层层加码。国家说出生率要保持在18‰，到省里就变成16‰，到县里又变成12‰，再往下就完不成了。为完成任务，“强迫命令”时有发生。

事实上，自“一胎化”政策从1970年代末推行以来，“强迫命令”就屡禁不止。1983年，钱信忠担任国家计生委主任时，全国上下“大结扎”。当年“男扎”超过1606.4万，“女扎”超过4662.6万，人工流产数为1437万。

彭珮云考察回来后很痛苦：“我也是女性，我也是个母亲。怎么能够这么对待妇女？”

顾宝昌去调查，也一样糟糕。有一次，碰到计生服务站给妇女上环，远远看见人，他就站住了。陪同的人说：“那没关系的，你过去好了。”顾宝昌感到不可理喻：“妇女躺在床上，我怎么能过去呢？”

如今顾宝昌的头发全白了，变得稀疏。当他抱起双臂，模仿因上环、结扎瑟瑟发抖的年轻妇女时，当年的情境就变得格外真实。女孩子从结婚到生孩子，连续经历巨大的生活变化，刚当妈妈，就要结扎。“大夫、护士在一旁嬉笑，没人关心她的感受。以前她还是父母的小乖乖啊。”顾宝昌很难过：“假如有人安慰她一下，她马上就会感觉好得多，但是没人做啊。”

1986年，顾宝昌回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政策万能论”。但他推自己的那一把，使他终于深陷其中，成了政策铁板上的一颗螺丝钉。

螺丝钉的周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能理解顾宝昌。螺丝钉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行动，似乎要到2004年了，螺丝钉开始自行其是。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总要强调之前那10年，言过其实，这不只是我的看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那种看上去就隔靴搔痒的小动作不仅毫无意义，甚至还缺乏触及根本问题的道德勇气。

直到我意识到时代与时代的温差，才想到螺丝钉与铁板的比喻。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何能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在铁板上撕一道口子？

“还权于民。”再说这四个字，顾宝昌还是会神秘地压低声音：“懂我的意思哇？不要老是想着去管群众。”

25年后，顾宝昌和梁中堂之间，藏着一些隐晦却确凿的分歧。简单地说，他们互不认同。但作为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闯入者，我看到他们早期分明在做同一件事——站到跷跷板高高悬起的那一头去，尝试完成不可能的平衡。不同的只是方式：一个暗度陈仓，一个大张旗鼓。

以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名义还权，这不是顾宝昌一个人的想法。非要找的话，拿主意的是彭珮云。1995年，国家计生委提出计划生育工作要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时隔20年，下属和伙伴还记得她那套“三步走”的方略：第一步是把人口控制住；第二步是改变基层做事的方式；第三步是完善或修改政策。方略不是凭空而来。做事的人知道，非改不可了。

“不使用超常措施，人们强烈的超生愿望遏制不住。”江苏省盐都县的计生委主任刘高英清楚：扪心自问，计生之所以难，是因为它关乎每个家庭的生计利益，还交织着传统习俗。

上海市计生委副主任刘永良记得，那时他经常遇到“身经百战”的计生老干部，绘声绘色地讲计生干部和民众的冲突。听完他只有一个感受：“怕人（上海话，吓人）。”那些运动式、突击型的工作被计生干部们称为“强行入轨”。而那些超生处罚，就相当于又凭空加了一次重税。他们厌恶“围着大肚子转”，还形成共识：“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事。”

国际环境也变了。

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70年代末，当中国开始实施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时，全世界都在担心“人口爆炸”。

那是马尔萨斯继承者的时代。1958年横空出世的“印度研究”使人们相信：“人口增长放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1960年代，国际社会达成共识：要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此后，《人口爆炸》预言数亿人会因人口过快增长而饿死，《增长的极限》则预言自然资源将因此枯竭。世界范围内，主要依靠避孕节育的人口控制巨浪，由此推向高潮。

但到了1994年，第三次世界人口大会彻底掉转了方向，从会议名称就看得出来——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国际社会不再提倡人口控制，转而关注人的发展，特别是妇女的生殖权利和生殖健康。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和印度还在实行生育指标配额。指标分解到人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美国政府对印度的援助开始附上前提：取消人口控制指标。印度最终放弃了。

但中国不是印度，计划生育是不容置喙的国策。

事情只能一步一步来做，计划生育改革也模仿经济改革，从试点开始。

先是推行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允许妇女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方法。当时全国都是“一孩上环、二孩结扎”，顾宝昌在东北遇到一个妇女，上环以后一直腰疼，换了各种各样的节育环，仍是痛苦难耐。等允许自行选择避孕方式，她改成吃药，“一下子不疼了”。顾宝昌受到鼓励，“她感谢得不得了，‘唉呀，你们优质服务一定不能停。’”

还想再进一步，取消准生证。各地都要防止计划外生育，关系到乌纱帽的事，为了严丝合缝、滴水不漏，才有了准生证和准孕证。那意味着，如果没有得到批准，就算怀孕了，也要先做人流。

“既然有政策，一对夫妇可以生一个孩子，那按政策来不就行了，能不能不要准生证？”想要变革的人问。

“不行。不能动，动就乱了。我们不能保证完成计划。”地方政府态度坚决。

只能先给准生证改个名字，叫服务证，里面还是一样。从改名字开始。

想起当初那些见缝插针的尝试，顾宝昌还是难得摇头。用这种方法，一批省份逐步取消了生育二孩必须遵从的时间间隔。

“我们不是在喊保护人权。”顾宝昌说，“实际上要让基层一线的人能接受，他要考核，要能实行。你要去做，慢慢地，普通人的权利就还给他了。当年参与试点的人后来聚在一起，都说那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一段经历。”顾宝昌说。

我曾觉得这种表达过于堂皇。后来我尝试想象，先还生育时间的选择权，再还避孕方法的选择权，尽可能地把强制扭转为服务。散落的螺丝钉们用合力，在坚硬的铁板上，一个一个地抠出小坑。光是抠这些小坑，就花去了他们10年。

按照国家计生委在1992年组织的“38万人调查”估算，中国的生育率当时就已降到2.13左右。也是从1992年起，上海和北京城区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出现了负数。

但没人相信这个结果。人口学界普遍认为，低生育率是由大规模的出生漏报和统计数据严重失实所致。

郭志刚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为此特意写一篇文章，严厉批评对计划生育成绩的盲目乐观，强调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人口数量仍是中国人口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李建新是当时学界的异数。李建新的导师曾毅，从1987年回国起，就主张将生育政策放宽至二孩生育。他不直接批评独生子女政策，但赞同梁中堂“两孩加间隔”的方案。1994年，博士研究生李建新在导师的介绍下，前往翼城实地调查，主题是“生育政策该如何平稳过渡”。在博士论文里，李建新提出：应该在2000年放开二孩生育。“任何干预人口行为的政策，它的底线是遵循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李建新说。

李建新的声音那时还不成气候，可一线的人知道实情。参与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上海计生委副主任刘永良记得，1990年，上海就有7个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第二年全市就成了负增长。

他不是人口学家，只能现查文献，发现人口增长率并不是越低越好。他当即就组织专家，做了“人口负增长对策研究”，并请求由上海先行生育政策调整试点。刘永良最终碰了壁，“我的一些想法，在全国严峻的计划生育形势下，是不合时宜的。”

直到2000年，国家计生委与福特基金会开始第二期合作。经过5年的“还权”实践，顾宝昌觉得，铺垫到位了，可以把归还生育数量选择权提上日程了。他负责制定二期合作的方案，四个项目中，有一项就是生育政策研究。

国家计生委领导放行了项目，但前提是，生育政策研究只能由学者出面。事情最后还是落在顾宝昌头上。

2001年5月，顾宝昌以个人名义邀请了19位学者，组成“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课题周期定为3年。第一次生育政策座谈会由复旦大学承办，为了不惹人注意，人口所所长彭希哲把地点定在上海远郊的朱家角。

课题组的研究目标最终归纳为三点：现行的生育政策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生育水平？生育政策是不是该调整了？有没有调整的可能性？

这是顾宝昌事后对外的复盘。事实上，最核心的研究从1998年就由张二力、顾宝昌、郭志刚和王丰动手了。

多年的宣传使得许多人认为，独生子女是全国通行的政策。事实上，各地政策并不统一，各种政策对应的人口比例也不同，没有人知道如果都按政策要求做，政策最终所要求的总体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

张二力是原国家计生委规划统计司司长，在任时，控制人口、下达指标的事就由他来负责。他总觉得亏欠妇女，退休后，他就加入了政策研究课题组，借助过往的特殊影响力，请各省计生委统计处上报数据。

先找条例，再根据上报数据量化计算，先算专区，再汇总计算到省级，再计算全国，还绘制了政策生育率地图。2001年，他们已经得出结论——1.47，意味着全国平均生育水平是一对夫妇终身生育不到一个半孩子。

他们第一时间将结果汇报到国家计生委。“计生委的人说，哎呀，我们执行了那么多年政策，我们还从来没有这么算过，不知道政策到底想实现一个什么目标。”顾宝昌回忆。

做完这次测算，郭志刚才明白，要达到这个指标，意味着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

过去视而不见的东西，现在变得清晰。郭志刚第一次留意到，1990年代前期生育率的下降，正是在向政策生育率的目标趋近。他的头脑里第一次浮现出一个巨大的怀疑：调查数据所反映的很低的生育率，会不会就是真的？

郭志刚他们的研究，直到2003年才经由国家计生委一名副主任的指示公开发表。但报告的标题被定为“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意在表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包括多种类型，而不是被国内外的一些人所指责的“一胎化”。

吾辈不必世故太深

2001年，开完朱家角会议，顾宝昌立即向国家计生委的领导汇报。一位副主任嘱咐他：“这个很重要的，是历史性的，老顾，你们要抓紧了，但是只做不说，不要声张。”

2004年，课题组14个报告全部结了项，学者们要向中央提出建议：

——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不会造成失控，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点探索。

——如果担心造成出生堆积，可以“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照此方案，中国总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为14.7亿，远低于原来预测的16亿的峰值人口，也能缓解现行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弊端。

观点已然明了，最难把握的是措辞。“我们学者写东西，态度是‘我就是这样，我跟你们说了，听不听是你的事情’。”但常年与政府打交道，张二力与顾宝昌都明白，“（改革）是让他拿着乌纱帽，冒顶撞领导的风险，你要考虑到他的处境，说白了，要让他觉得会带来政绩，而不是风险。”

建议书提交以后，有个主任打电话给他：

——“顾宝昌啊，你们建议书我收到了，上面有好多人啊。”

——“对。”

——“他们都同意吗？”

“哦呦，我想这个话里有话，好像意思是借了那些人的名义。”

顾宝昌“马上采取措施”：所有人都要亲自签名。那是扫描技术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学者们散落全国，那张A4纸也就全国跑了一遍，到一个地方签上名，再寄给另一个人，几周后，最终再回到北京来。建议书最终征集到18个签名。

课题启动的时候，顾宝昌还心态轻松。他觉得只要学者们研究清楚，把道理讲清楚，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是他们的事。”所以一切都在暗中进行，外界无人知晓。

但顾宝昌没有想到，所有的事情做完，那些曾催着他交建议书的人不吭声了。“一个顾左右而言他。他们默默地收了，看看上面是什么意思，上面不说话，那我们

也不说话了。”

只有时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的彭珮云组织了一次讨论。2004年6月，为了不引人注意，会议安排在河北保定，还用“人口技术研讨会”打掩护。

“许多没有参加课题研究的人闻风而来。”参会的有五六十人，除了人口学界的老专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和几位副主任也到了场。

1990年代，生育政策是几乎不能讨论的问题。而保定会议使它变成一个公开的议题。“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可能会造成人口失控。”这是保定会议上，顾宝昌和课题组受到的主要质疑。学者们不太走运。2004年春天，由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主导的“国家人口战略研究”已经启动。人人都看得出来，两个课题组的立场针锋相对。顾宝昌决定，组织学者调查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情况，证明那种“人口可能失控”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

2005年，顾宝昌已经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退休，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顾宝昌发现，当时大人的学者连每人5万元的研究经费都没有。

两年后，这项覆盖840万人口的调查结果显示：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二孩政策地区的生育率已经持续20多年，生育率低于2.0，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2007年9月，报告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发布。彭珮云说：“这是800万人的实践，能够说明问题。说明放开生育不会出大事情。”

仅有研究还不够。他们要做“放开二孩”的试点，人口政策的“特区”。

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曾表示要开展试点。“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动。”顾宝昌和张二力不甘心。“我说我们来动，但是我们没权，也没钱。试点毕竟不是博士论文。”

他们利用调研机会找愿意试点的省份。先走到上海，“你们愿不愿意？”又走到浙江，“你们愿不愿意？”

浙江省的计生委主任已经决定动了。顾宝昌帮浙江做的方案，比他们04年的建议书还要周全。谁知北京一个电话，国家计生委叫停了。“后来国家计生委领导到浙江考察，浙江那位主任还想争取，得到的回应是：‘这个事情你不要谈了。’”

“他气得很，他说我在这干什么？浙江生育率已经那么低了，政策也不愿意动，我在这里有什么意义？”类似的事例有好几个，顾宝昌都记在心里。

找试点的过程无比漫长。“后来，走走走，走到了江苏，江苏计生委说，你们不要走了，就在江苏调研吧。”

江苏计生委了解省内生育率低的现实。2000年，知道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一定会变，省计生委的老主任赶在退休前就动了手，改建各地的计生服务站为“世代服务”，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充分的准备。

江苏也是天然的“二孩试验田”。江苏的农村地区与其他省份不同，在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孩。1980年代初，政策制定时，江苏的农村少有独生子女。但20年过去，农村的独生子女比例高了，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

江苏和学者都想知道，当政策允许生育二孩时，人们到底会不会生？

所有人大吃一惊

顾宝昌和张二力找来时，郑真真有点儿懵，“我说这个事儿太重大了。”他们希望郑真真负责江苏的生育意愿调查。

接受采访，郑真真已经退休，但还记得当初郭志刚说服她的理由：“如果你能把这个调查清楚，整个的人口预测就会不一样。”

过去，人口预测都建立在对生育意愿的假设上，假设政策放开，90%的人都会生第二个孩子。郭志刚已经看明白了，这样预测出的生育率会显著提高，但完全不准确。没有真实的生育意愿为依据，预测错误带来的政策风险也会高到难以承受。

“如果预测错了，政策一动，多生200万或50万，会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导致这事又缩回去了，这事干不成了，这才麻烦。历史上是有过这种情况，一票否决了，反正挺严。”王广州说。

课题组的学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帮郑真真。王丰和蔡泳帮她收集国外的生育意愿调查研究框架。光是调查问卷就修改了6次。要做访谈，李建新他们都带着学生来帮忙。他们按照统计学的标准，选了3个地市级的6个县做抽样调查。要保证调查质量，每个县至少需要1000对已经生育一孩的“单独”夫妇作为样本。

南通市计生委的领导问他们：“1000个怎么够？我们希望每个县都有代表性。”

郑真真他们犯难。调查员的人工最费钱。你也不知道工作会持续多长时间。没人能估算最后得花多少钱。“这么大的样本量，我们（经费）抽不起。”王丰回答。

“谁要你们出钱？”

“我们当时都傻了！天上掉了个大馅饼！”郑真真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讲起往事，她亢奋得涨红了脸。还是机灵的蔡泳替乐傻了的学者们接了话茬：“那当然好！”

江苏省主动拨款，承担了当地调查的全部费用。课题结项的时候，有学者问郑真真调查花了多少钱。郑真真当场说了数字，15万。对方不信，“不可能。”

“是不可能。”可事实上，当时郑真真手里真的只有从中国社科院申请到的15万国情调研经费。课题组的学者们不要劳务费，郑真真的经费只用于参与现场调研的差旅。比过程更令郑真真意外的是调研结果。

郑真真拿起《江苏的现实》，将印在封底的一幅照片指给我看，那是蔡泳访谈一个年轻女性的场景。当时她已经生了一个孩子，明确表示，因为存款不够，不想再生第二个孩子。蔡泳问她：“给你多少钱你才会愿意要第二个孩子？”

——“10万？”女孩摇摇头。

——“20万？”“也太少了。”

——“30万？50万？”女孩始终没有松口。

每到晚间，学者们凑在一起交换当天的见闻，大家都意识到：情况早已变化，并且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调查显示，56.6%的调查对象认为生育一个孩子最理想，45.1%的人认为生育两个

孩子最理想，只有极少数人想要生育三孩或四孩。

但那只是开始。3年后，课题组又到江苏，这一次，郑真真要做回访，看看当时参与了生育意愿调查的年轻夫妇真实的生育行为。

结果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农村符合“单独”政策、且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真正生育二孩的比例，只有6.5%。

中国的人口学者借由江苏调查第一次确认：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逐层递减的。

走不出的怪圈

郭志刚的担忧始于2004年。那年春天，他作为生育率测算专家，加入“国家人口战略研究”。

从1997年开始，遵照导师邬沧萍教授的建议，郭志刚查文献找方法，学高级编程语言，花了3年时间，终于掌握生育率的预测方法。2000年，能够熟练使用预测模型的郭志刚意识到，中国的低生育率并不能完全用出生漏报来解释。

2003年，在澳大利亚参与关于中国人口的学术研讨时，郭志刚第一次公开提出：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处于1.5以下。他本以为自己的观点会引起激烈争议，毕竟，国内仍在想方设法控制人口增长，“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但郭志刚没想到，持此观点的不止他一人，还有很多学者从其他角度获得了相似的结论。

加入“国家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组后，课题办公室要求郭志刚使用注定会导致高生育率结果的预测参数做测算。郭志刚不同意，接连申诉，接连碰壁。

无奈之下，他给课题办公室领导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越来越不相信现在的生育水平还在1.8……我认为此次战略研究，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水落石出了……5月时，在中国‘五普’国际研究会上，见到美国东西方人口中心的金敏子（韩），她说韩国90年代TFR（生育率）也是一路下降，一开始她们全都不相信，但是也找不出原因，甚至找不出漏报的原因（韩国没有生育指标）。但TFR一直持续下降，到1990年代后半期时，韩国人和外国学者已经开始相信这是事实。并且，由于生育水平太低，韩国政府也开始着急了。”

郭志刚的努力没能改变什么，报告的预测还是按照指定的生育率参数完成了。

这次预测研究，使郭志刚明白：“生育率估计上的争论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术争论，政府部门已经深深参与其中，在导向和评判等方面施加了巨大影响。由于我对生育率持另类看法，以后的研究就不会再是象牙塔里的雕琢，坚持己见就少不了要得罪人了。”

2006年的一件怪事使郭志刚面临更大的阻力。

一年前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4。然而，2006年9月进行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显示，生育率在2004年到2006年间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大幅反弹，总和生育率突然升到1.87的水平。

“在尚未开展深入的数据分析之前，这个调查结果就被作为证据，大造人口形势严峻、生育率严重反弹的舆论。”郭志刚回忆。

次年春，国家计生委组织学者研究调查的原始数据。郭志刚和另外两位学者发现，调查数据样本分布异常。这表明，生育率的异常升高是调查中的抽样偏差所致，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

但令郭志刚费解的是，这次调查没有按常规出版研究报告集，而且要求各课题组将发下的原始数据、分析表格及研究报告全部销毁。

“2007年底我曾非常郑重地给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写信反映这个问题。然而，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从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并且，我注意到，社会上和人口学界所有关于此次调查的舆论宣传在照旧继续。”郭志刚回忆。

感到自己有责任对社会公众和学界说明真相，郭志刚在2009年4月发表了《近年生育率显著“回升”的由来》一文。

郭志刚意识到，从1990年代初，生育率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起，中国的人口统计就陷入了一个怪圈：见到低生育率调查结果→归因于出生漏报并调高生育率→继续严格控制→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结果→再调高生育率→再继续严格控制。

在学者们看来，坚称生育率一直是1.8，“是个笑话”，因为一个人口的生育率不可能稳定在某个数字。

但另一方面，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为首的学者认为，偏低的总和生育率是因为过度依赖人口普查数据。他采信户籍登记数据，以此证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至少在1.6以上，但他的研究始终无法回答为何户籍登记数据就是确凿可靠的。

由于坚持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的观点，郭志刚曾被前国家计生委领导称为“乐观派”。“其实我不仅一点也不乐观，反而忧心忡忡，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郭志刚说。不是怕自己的观点被证伪，承认学术研究有误，只是丢面子而已，“我真正担心的是，如果实际情况真被我这个乌鸦嘴不幸言中，就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对人口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和时机误。”

如果中国未来长期维持1.8的生育率，意味着再过117年，中国人口就会减半，变成7亿到8亿的规模。这个数字成了郭志刚的心病。因为他意识到，现实中的确存在一种倾向和力量，要将中国的人口发展向那个目标或方向推进，而且还想较快地推进。

政策又没有动

生育政策研究刚启动，课题组讨论时，王广州就在隔壁办公室，知道那是计生委想要探索变革，但他一直是旁观者。

直到2007年，他用小普查数据测算，发现“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的数量正以每年10万户的速度增加。“意识到不对了，这是挺大的事儿。”王广州开始警惕。

他的研究使他有机会直接面对失独家庭。听得多了，他就觉得没办法面对。有人通知他到大连做访谈，他不敢参加。“我还是逃避了。我还是逃避了。”像是自言自语，他将同样的话向我重复了两遍。问题的根子在政策上。

王广州没办法不紧迫：“我们行内的人都知道，不符合政策，怀了孕就可能要做人工流产，如果今天说不符合，明天又符合了，人家又生不出来了，你怎么交代啊？她的（生育）窗口期并不是随时都有。”

汶川地震发生后，失独家庭数量骤增，学者们突破课题的界限，达成共识：不能再等了。与2004年谨小慎微地措辞不同，以5年调研成果为基础的第二次建议书，处处透着焦躁迫切。顾宝昌的PPT上，仅是建议书的要点就列了28项。

——“到本世纪中叶，一半人口在45岁以上。”

——“年轻劳动力将持久性大幅下降一半多。”

——“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调最严重也最久。”

——“本世纪中叶20—29岁妇女减少5千万。”

2009年1月，由26名学者签名的《调整生育政策再建议书》由多种渠道向上递交。九年前第一次递交政策调整建议书时，顾宝昌还是满头黑发。第二次再交建议书，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但建议书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了，学者们决定走出人口学界。

“我们发现，领导的决策跟社会影响力有关。事情在社会上的影响足够大了，领导也就决策了。我们要改变整个社会的认识，要找同盟军，否则我们孤掌难鸣。”顾宝昌说。时机的确到了。1980年，中央《公开信》曾写明：“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学者们将这句话视为适时调整生育政策的承诺。现在，30年的期限就在眼前。

学者们开始找媒体，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顾宝昌和王丰找林毅夫、胡鞍钢和樊纲，找胡舒立，还把《南方周末》的记者邓瑾请到上海讨论。

“我们盯住了这些媒体。”王丰形容媒体呼吁调整生育政策的报道开始“像暴风雨一样”。有越来越多的“两会”代表找到他们要材料，或者直接用公开信息写成提案。

当时王丰在北京，开始有国家部委找他讲课，“因为领导叫各个部委都提意见，他们被推到不做不行。”

2011年年初，“六普”数据公布前，国家计生委为政策调整，专门组织了春节茶话会，还让顾宝昌第一个发言。主要领导都在场，顾宝昌很激动，“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他特意背下自己的发言内容，回家以后存进电脑里。

听到消息的省份闻风而动。有人找到顾宝昌，希望能参与试点。“南方一个省份的计生委主任最有意思，他也不找我们，就直接在媒体上说要带头调整政策。一个省计生委主任在媒体上公开说要调整，此前没有过的。”顾宝昌回忆。

“六普”报告的总人口数为13.4亿。数据公布后，4月26日，政治局立即开了迄今唯一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学习会，讲解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和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研究员于学军。

“也许学习会上发生了something，举行完以后，政策调整的事就戛然而止。”顾宝昌说，“4月份以后，那位南方省份的计生委主任又说了，我们坚决坚持国策长期不变，坚定不移。”

总之，事情又给耽误下来。2011年，政策又没有动。

君子之所争者国事

看到同行对“全面二孩”的生育率预测，李建新“吓了一跳”。

那是2012年11月，李建新收到刚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2011/2012》。这个历时两年才完成的报告，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第五份报告，也是基金会首次涉足人口问题。研究的初衷显而易见：“六普”已经证明，中国的人口形势变了，生育政策该调整了。

研究阶段，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请李建新参与过一次座谈，他的态度一以贯之：仅从人口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就该尽快放开二孩生育。但发表意见的机会只有那一次，报告共有17位作者，李建新不在其中。

收到报告后，李建新立即找到他最关注的“生育政策调整”部分。第55页：“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在放开后的头几年，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超过4.4。这意味着，2021年人口将从2010年的13.4亿增长到超过15亿。”

“我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对的。”主报告的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和南开大学人口所教授李建民。李建新把电话打给李建民，“我说你们这个预测是咋做出来的？”李建民告诉他，预测是人民大学的陈卫做的。李建新又打电话给陈卫。“陈卫说他只负责算数，意思是听老瞿（翟振武）的。”

“四点几？天大的笑话。”这是左学金对预测的全部评价。报告发布后，左学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卫，他问：“印度现在总和生育率是多少？”陈卫回答：“印度2.7。”左学金反问：“印度2.7，我们能弄到四点几不啦？”“他就不响了，笑一笑。”左学金回忆。

“我觉得，为了不让生育政策放开，已经到了一个语无伦次的地步。”顾宝昌极力保持克制：“你做梦也不可能想象中国出现一个四点几的生育率。”

同样感到“离谱”的还有王广州。他刚刚完成中国社科院关于生育政策的重大课题，同样是预测“全面二孩”的政策影响，王广州计算的堆积期生育率只有2.1左右，“打破天了也就这样，所以我坚信他们肯定不对。”

11月28日，李建新发微博公开批评这个用于支持政策不变的人口预测方案是“脱离实际的书斋研究”。第二天，他又发布一条措辞严厉的批评微博：“但凡有人口学知识和正视我国人口现实的学者，都会对放开二孩生育率反弹超过4.4的预测心生质疑。但是《中国发展报告2011/2012》居然就用了这背离中国现实的预测方案作为预警选项，这是严重的误导。也许决策者正下决心一举废止独生子女政策呢，看到这结果后却又裹足不前了，再一次延误了纠错的良机。”

李建新的微博发出一年后，2013年11月15日，中央宣布实施单独二孩。11月17日，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为什么不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提问时，时任国家卫计委

副主任王培安回答说：卫计委组织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论证，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在放开后的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超过 4.4。

看到这条消息，李建新气愤又无奈：所谓“全面二孩”后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超过 4.4 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从假设到预测完全错误的结果，却成为卫计委回答当前不宜实施普遍二孩的理由。“政府如此之大的决策却建立在荒谬的论据上，这是人口学界最大的悲哀。”李建新说。

他咽不下这口气，转发卢迈的微博时公开发起挑战：“我希望卢迈老师能够重新组织一次论证，证明那所谓放开二孩生育率就会反弹到 4.4 水平的结论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完全不能成为计生不放开的理由。”

易富贤评论李建新的挑战：“卢迈老师上了‘20 多位顶级人口学家’的当了。卫计委用这份报告当‘不能停止计划生育、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的挡箭牌。”

王广州也支持重新论证。“原来那是私下里讨论，仅限于学术圈以里。但对外发布就相当于一个学术研究的成果，如果在学术圈内部有争论，怎么能直接面向公众？你做研究，不能把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到处宣传。”

卢迈转发易富贤的评论，答应了李建新的请求：“谢谢。我们照办。”

12 月底，李建新和王广州一起，参加了卢迈组织的争议内容论证会。蔡昉和李建民都到了，回应质疑的主讲人却是同样不在作者之列的翟振武。

在人口学界，参加完会议，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是常有的事。但学者们有默契，饭桌上避谈学术，以免伤了和气。李建新是新疆人，热情豪爽，公认的与人为善，常把“都是朋友”挂在嘴边。

他和翟振武的关系尤其亲近。打从初入这行起，他们的学术观点就有对立，翟振武强调：中国的人口问题，数量是第一位，而李建新则主张：数量和结构应当并重。争论持续了 20 多年，不妨碍他们至今一起聚会玩笑。

但那次对峙，李建新感觉到，“关系有点僵了。”

“老翟一边讲一边问：老李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就一直冲着我。我还纳闷，怎么冲着我？后来我才知道，卢迈是因为我的意见反馈才组织了会议，他想让我们对话。”李建新说。

王广州没打算争辩，他只想讲清楚自己的测算，他觉得那就是最好的反驳。“李建新气得直踢我脚，那意思是怪我怎么不去跟他争。”王广州回忆，当时有人试图给李建新难堪：“那意思是人家拿出数据来了，你的数据呢？”

李建新的研究更侧重理论，一直使用联合国人口预测的数据，无法像王广州一样，用自己的预测去硬碰硬。事后回想起来，他也并不觉得难堪：“我们（在江苏）做过生育意愿调查，王广州也做了预测，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已经进入婚育期的 80 后。我自己的研究也使我看到了大的变化。你怎么能脱离实际，继续使用以前的假设呢？”

那次讨论仍然没能改变什么。2014 年 3 月，翟振武公开发表了《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除了坚持“全面二孩”会带来 4.5 的生育率外，还进一步写明出生人口峰值会达到 4995 万。

对于这个结论，学界几乎是群起而攻。

那年复旦大学举办研讨会，会前李建新特意找主办方沟通，希望把自己的发言放在翟振武之后，他要继续反驳，而且要坦坦荡荡地当面驳。

翟振武是那个讨论单元的主持人，李建新发言结束，他又继续反驳。坐在台下，梁中堂愈发愤怒，“他还在辩解他的东西怎么成立。”

梁中堂要求批驳，主持会议的是王丰，按照议程设定，只给梁中堂 3 分钟。梁中堂气得当场摔了话筒：“他借用这个主持人身份讲了那么长时间他的东西！这不公平！怎么到了我你就最多只给两三分钟？”

最终的事实证明，2016 年实施“全面二孩”后，中国出生人口数在当年增长到 1786 万人即已触顶，此后便一路下跌，至今也没有回升迹象。

认识的转变是困难的

2013 年下半年，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如何的讨论越来越多，中央党校的经济学者周天勇听着听着，待不住了，“我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对。”

他找出韩国、台湾地区的数据做横向比较。韩国和台湾结束高增长、完成城市化时，人均 GDP 分别为 12000 美元和 14000 美元，而中国大陆 2011 年只有 5500 美元。此外，中国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国、台湾短了 9 到 14 年。

“我就在那儿猜，是不是人口出了问题？周天勇开始查文献，查到凯恩斯。”凯恩斯认为，长周期的经济波动，除了固定资产更新因素以外，就是人口增长变动的影响。”但凯恩斯的理论能解释中国的问题吗？他和同在中央党校的爱人一起做研究，画出 1949 年到 2014 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和经济增长曲线。

讲到这里，周天勇随手捡起半张 A4 纸，画了两段曲线。“你会发现这两个曲线形状一样，但经济增长这条要比人口增长这条错后 20 年，也就是说，1973 年到 1993 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和 1993 年到 2013 年的经济增长曲线形状一样。”

他找学生做回归分析，先是用中国大陆的数据做，相关系数为 0.81。后又陆续加入韩国、日本和台湾的数据，同样获得很高的相关性。“我看，哦哟，按照这个模型的话，（经济增速）起不来了。”周天勇说。

1984 年，“走向未来丛书”第一次把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译介到国内。“四川的出版社出的，小小的一本，看了觉得很有道理。”此后，周天勇又第一次读到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的《家庭论》。

“大量的英文文献翻译不过来，国际上又希望中国减少人口。”周天勇第一次看到人口领域的对立观点已是 1989 年，那是在当时没有激起任何波澜的作品，至今还保存在他的书架上，但他很难完整说出书名。

在常人看来，经济学家本应是对人口与经济关系最为敏感的一群人。可直到 2011 年，出版《中国梦与中国道路》时，周天勇还习惯性地写下“我们资源有限、土地有限、人口要适度发展”。后来他开始研究国际战略，意识到人口的增减关系到一个民族的

兴衰，过往坚固的认知才逐渐变成一个问号。

“我发现我错了，那就是错了呀！错了就错了，我再写本书把它翻过来。”从 2014 年开始，他写内参，写文章，呼吁放开二孩。最近他忙着纠正自己的另一个错误。过去他和大家一样，相信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出路，但如今，他找来欧美日韩的数据，让学生们计算，看到结果，他确信创新的力量被严重高估了。

“神话破灭了。”周天勇说。

一生襟抱未曾开

每个人都能搬出一大堆材料，都是他们珍惜的心血和成果。时间太长了，许多研究一时都说不清楚，这种时候，李建新就“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他的书架前，翻出当时写的文章。顾宝昌的记忆衰退得厉害，有些文章、书名、人名到了嘴边，怎么也说不出来，谈话往往需要长久的停顿。

更多努力，都在时间的长河里湮灭了。能描述它们的，大概只有时间的跨度，40 年、30 年、20 年、10 年。还有郭志刚那些没有获得回音的信件，和写信人近乎恳求的语气——那也是更多人口学者数十年来的状态。

如果没有持续追问，学者们大都不会主动谈论个人的得失。他们也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就被排斥到人口学界的“主流”之外。

顾宝昌在人民大学 14 年，但很少参与学校主办的人口研讨会，“他们不让我知道。”他尽量不提这些事情，他要做事，不能生气。上海人的解释：“假如为这个事情影响我做事，不合算的。”

不是没有伤心的时刻。前几年，顾宝昌到国外开会，外国的老朋友拉住他：“我马上要到北京，去参加你们学校的研讨会。”顾宝昌全不知情，“什么什么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的朋友、同学都来了，但不让我参加。这种事情很多。”

发现“单独二孩”遇冷，情势变得愈加焦灼，顾宝昌没办法，把总书记的发言打印出来，人口学会开会时，这位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口学家，就站在门口给参会者一张一张地散发。

王广州则发现，自己在闭门会议上公布的研究成果，总被他人借用了去，成为修正那些漏洞百出的研究的参考答案。他被逼无奈，参加学术研讨会除了做文字记录外，还开始带上录音笔。录了音他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想就干什么，“过若干年之后，这些人都不在了，兴许可以公开，还原历史，对中国人大有个交代。”

梁中堂很久没参加过人口学会的研讨了。他独立于任何机构、组织，自己做研究，成果自印成册，遇上开大会，他就央人帮他把册子带到会上去，放在门口，由人自取。但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毕竟是得罪人的事情，也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帮你带。”

多年以后，他对逆势而行的“翼城实验”有了新的认识：一枚僵局下的闲棋，本以为它能成为改变政策的一个支点，没想到它在国家的大棋盘上一待就是 30 年。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愿意把梁中堂称为“英雄”，但他从不领情。“全面二孩”推行后，中外媒体蜂拥而至，他直言不讳：“我没有功劳。”

“他们让我别谦虚，我不是谦虚，如果翼城真的有作用，决策前会去调研，做说明时会提及。没有这些，你怎么能说你的东西在这里面起作用了？”

他总觉得自己早已因为受挫而清醒，相信“学术是心灵上的事”，总对顾宝昌说：“你们这样根本没用。”顾宝昌不高兴：“都像你这样也不行，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吧？”在那些放不下的时刻，梁中堂才会意识到，原来自己也看不清自己。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感到自己被浪费了。无论是时间、才华还是人生，都在回答那些没有道理的质疑中被浪费了。

“当时计生委说，你们不要老说要调整政策，人家提出了很多意见，你们要回答。后来我说了。他有 10 条，你回答了 10 条，接下来还有 10 条。”20 年来，非要总结，顾宝昌只有一个感受：很累，心累。

“一会儿说金融危机，这个事情不合适。一会儿又说新的出生高峰要来了，要把这个人群过掉才行。又说现在是什么猴年，就老是有理由老是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顾宝昌说。

李建新觉得“丢人”。以前他总跟学生说，人口学的研究对象是集合，它很容易表现出规律性，所以人口学擅长的就是描述和预测。但“4995 万”的预测结论一出，“啪啪打自己脸了，你知道吗？”

经验和教训要传给下一代。顾宝昌总叮嘱学生，为自己署名的文字负责：“搞不好就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尾声

没人觉得自己是英雄，没人能感到畅快。“人口学界要反思。每个人都这么说，但现实是，过去他们不能参加的研讨会，如今还是不能参加。碰见王广州，李建新还问他：“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人与时代的局限太大了，改变认识太难了。至今仍有院士与左学金争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理由无非是人口众多、环境容量有限、资源紧张。

“很多人没有研究过人口问题，但是他们的看法根深蒂固，毫不动摇地坚持人口要控制住，经济才能上去。”左学金只能退避：“你不在这个专业里，不要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接受采访时，王丰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嘱咐：“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习惯，要不然就是上书，希望得到重用，要不然就站在外头当斗士。我们不是斗士，这也不是一个找英雄的故事。”

这也是他们走到今天的共识：不要夸大，学者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朝同一个方向努力并不意味着学者们彼此认同，而尖刻的批评、激烈的主张和迥异的实践路径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但在过去的一些艰难时刻，他们确实认为自己有责任挺住，并以此相互鼓励：“形势比人强”、“历史是公平的”。

“我觉得人类可能也是不断地在犯错误，本性的东西，你说历史可以借鉴，但其实一到具体的情境之下，会不断地重复，这也是人类的悲哀，最后走向悲剧，也是一个必然。”这是李建新的答案。

梁中堂至今还在思考，不能避免这种错误，原因究竟是什么？

采访结束，李建新抱一箱樱桃出门，我坦诚相告：“我也不知道这会是一篇怎样的报道。”

“那是你们的事。”长长的走廊没有开灯，他往更暗处走去，没有回头。

2021年10月8日



王宇

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先后供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周末》等媒体。正在承担自己的选择。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JuniperPhoton](#) on Unsplash

非虚构 此里卓玛： 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③

黄菊 | 生活亲历者

乡村影像，以及男女平等。

白马雪山，青海与清迈

两手空空地回到香格里拉，导游证也没了，不能再去当导游。新知图书城正好在招销售业务员，那就去卖书吧。

前面三个月，一本书都没卖出去，因为不认识人，卖书要认识很多人，要发很多名片。当时工资很低，是按提成拿钱，基本没收入。

有一天，郭老师给了我两千块钱，让我选一批书捐赠给汤堆小学和尼西完小。我挑选了一些孩子们感兴趣的书送过去，学校老师说，“啊，太好了，我们正需要订购辅导孩子们的书。”他们成为我第一批正式顾客。

后来，我去旅游局推荐导游培训书，见到了以前的领导，旅游局局长，他也是德钦人，当年我要辞职的时候还劝过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导游，现在看到我卖书，就跟办公室主任说，跟我买书。旅游局跟我买了六万块钱的书。

再后来，扎西尼玛大哥把我介绍给组织部部长，部长以前是报社编辑，我写过的那篇转山日记在《人与自然》杂志发表后，扎西尼玛大哥也帮我投到迪庆日报发表了，部长当编辑时，审过这篇稿子，他还记得，说：“挺好的，德钦人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出来做事。”那时正好副科级职位以上的人必须读十五本书，一套下来，每人的预算是一千五百元。部长很快和我签了协议，总共是二十多本的书款。

当时和公司签了一年的协议，任务是卖出三十万本，但我在八个月里卖了四十多万。到第八个月时，哥哥肖林跟我说，卖书有什么意思，和我去白马雪山吧。哥哥肖林在白马雪山做了三十多年护林员，保护滇金丝猴，也保护那片他心中的净土。前几年，他把护林员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守山》，他在书里说：“如果有一个地方，我愿把心魂交付，那将会是——曲宗贡。曲宗贡意为两条河流汇合的坝子，白马雪山主峰扎拉雀尼峰冰川融水淌下了两条河流：金妞和金妮，两条溪流绕过山的阻隔终于再次欢聚，而常年冲积的力量在这里化出一捧温柔广阔的草甸，这就是曲宗贡……”

曲宗贡是白马雪山的核心保护区，那时，他刚把曲宗贡所在的U型谷冰川整理出来，希望我去设计线路。

但新知图书城不放我走，刚好经理要换，想让我做经理。以前觉得去图书城太好了，有那么多书可以看，但事实上，大家都在勾心斗角。我刚做出业绩时，底下两个营业员小姑娘不服，觉得我连书的分类都不懂。我只负责卖书，找书是她们的事，她们就不太配合，让我自己去找。我很生气，揪出一个小女生说：“你过来，跟我一起扫大街去，你一个扫把我一个扫把，你也扫不过我，信不信？你扫不过我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只管扫我的地，而你永远在想，你要扫得比我好，永远在跟我做比较。当你在和我比较时，你永远赶不上我，因为你做不到百分之百投入。”

图书城的人事结构是：经理下面两个主管，再下面两个销售业务员，下面是财务、会计、出纳，再底下才是营业员。大家都是从营业员做起，我是突然间闯出来，她们很愤怒，看我不顺眼。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大环境，就去了白马雪山。

那时白马雪山管理处的房子刚开始修建，我负责考察几条线路：一是从管理处走到冰川脚下，一是从U型谷翻过白马雪山，下到澜沧江边的红坡村。

和郭老师做项目期间，我快速学会了写项目报告，也学会了摄影。很快，线路设计好了，宣传画册也做出来了。但我们总共只带过三批客人进去，都是基金会和环保机构。大家觉得这样开发做旅游也帮不到太多，有人就捐了一笔钱做野生动物急救站。现在的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就是以这个急救站的方式先做起来的。

旅游局发现有线路后，就打算在澜沧江边的伏龙桥卖门票，一次性套票，想放游客进来。但哥哥肖林说，因为是核心保护区，一天只能放三十个人进来，一旦旅游局来管，就完全控制不了，这不行，就直接关了，我的工作也结束了。

当时青海师范大学正在招藏英班，学习藏语和英语，就趁机去读个书吧。藏英班本来要读三年，但第二年就遇到2008年的事，很多外教被遣送回国，我们要么提前毕业，要么去国外继续念书，我去了泰国清迈。

《我们佳碧村》

和郭老师在香格里拉做社区教育项目时，他还和几个人联合做了个培训，教村民怎么使用摄像机，怎么做后期剪辑，怎么跟人沟通，来做一部属于村庄的纪录片。纪录片不只体现导演的意见，而是和你的拍摄对象一起，共同表达。

我也申请了项目，和我姐夫一起，在他老家佳碧村拍一部《我们佳碧村》。拍摄前大家一起商量要拍什么，拍出来以后大家一起看素材，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

刚开始没有特别的想法，只是希望跟拍摄者共同创作一个作品。做着做着，发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大家不断讨论、回顾，一起筛选，整个影片的顺序都是一起讨论出来的。

第一年拍出来的素材不断放给村民看，我们原本没有想做环境问题，但在不断讨论的过程中，老百姓说，村子以前靠山吃山，他们砍树，卖栎树枝，好多人都以这个为经济收入。本来有很多原始森林，但现在林线已经退到很高的地方去了。他们开始担忧，虽然有了一点收入，但是越砍越多，万一泥石流下来怎么办？商量以后，就开始订村规民约，从此不再卖栎树枝，不再砍树。

我们平时在社区里要引发大家讨论，不是那么容易进入正题，也不容易让他们发言，但是当你把他们的生活拍下来，重新再看的时候，大家的讨论很激烈。每次讨论都在姐夫家，我们的房子都很大，全村人过来都坐得下。

开始大家集体看，哪一段觉得需要讨论就停下来，讨论完又放。不是很严肃，大家有时候也笑，因为所有人他们认识，所有事情他们都清楚。但有一次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本来所有人都在看，突然间，几个老人家站起来就走了。后来知道，因为片子里有几个女人跟我们的男摄像师讲了点黄色笑话，有点像调戏他。我们分得很清楚，比如我是小辈，叫你叔叔，我们之间是要害羞的，在这种有老有少的场合，显然不适合播放这样的片段。

后来我们就按性别做了分工，有一些男性的场景我没办法进去拍，比如男人射箭的时候，如果女人去参加，他们会觉得不好，这部分就姐夫拍。女性在一起的时候就我去拍。后来讨论也是分开的。

有时在拍摄内容上也有争论，最大的争论是关于斗牛。那时德钦刚开始流行斗牛，男人们觉得很有意思，两头牛斗，他们能看好久。女人就不是很感兴趣，而且比较讨厌。男人说斗牛必须要放进去，女人说不用放。第一，斗的不是我们村子的牛，活动也不在我们村子举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是你们自己跑到县城里去看。第二，斗牛比较残忍。男人们就说，斗牛不放的话，这个影片我们就不看。然后他们就走了。女人就开始抱怨，说斗牛的时候他们两星期没回家，到德钦去花了好多钱，只有我们在那里干活，他们倒是看着过瘾。

最后的决定是，因为男人们觉得不可缺少，也真实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我就取了一小段不太血腥的放进来，大家还算满意。相当于这个影片是全村人一起剪辑出来的，我们称为“纸上剪辑”。回看素材时，我们把具有代表性的每一帧影片先打印在纸上，再给大家看。这样大家有一个初步印象，觉得哪一部分想要，顺序怎么排，哪里缺什么东西，明年再补一点放进去，他们就清楚了。

最后剪出来的片子，可以保证至少是村民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愿意分享给外面人的。但所有素材我们都编了好几类，对内的、对外的。对内又分个人的、集体的。跟自家有关系的法事活动、婚礼或者新房乔迁，我们会给到个人自己留着。给外人看的，我们就按一年四季的顺序来剪：春天劳作、耕种；夏天捡松茸，全村人都会去，捡松茸时也有一部分人放牧；十月份开始丰收；之后结婚、乔迁，然后过年、欢聚、射箭。

做这个片子对我震撼很大，之前纯粹是郭老师的意愿。一开始我没觉得有多重要，后来觉得太有意思了。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被拍进去，再看时，会觉得有趣，你想象自己平时说话的样子、走路的样子，和你在影像里看到的有很大差别。一个老人家看了片子跟我说：“以前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对人都很和蔼，但别人没有这样对我？看影片才发现，我的表情不是我想象中那样，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笑着的，其实很严肃。”

影片里一部分拍的是八月份，风景特别好，村庄里有鸟叫声，大家在山上捡松茸。有个村民说：“看影片的人肯定会觉得生活在里面好幸福，他们不知道，我们要日夜担心会不会有泥石流下来。但外人知道了也没办法帮到我们，不如我们自己想办法。”原来拍纪录片还能引发这么多讨论。纪录片在村子里像一面镜子，大家可以看到自己，可以反省，也可以互相交流，还可以去想：什么东西是我要分享给大家的，什么东西是我需要自己内化的。

当时我们影像交流坊里有两个老师，一个负责技术，一个负责社区沟通。负责沟通的老师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她说这里本来是一杯纯净水，不同的颜料就代表不

同人最初的想法，大家带着各自的颜色，一点一点加到这杯纯净水里，最后，我们共同创造出一个新东西。所以这部片子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我搭档的，是大家的。后来参加吴文光老师的培训，拍了部片子叫《神山》，算是我第二部作品，主要讲当地老百姓怎么看待神山，如何村民自治，利用当地资源。

去泰国读书时，中间有一个田野调查的机会，我就申请拍一部纪录片，《朝圣者》。那个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我拍的时候就知道要给一些做公益、环境保护和社区工作的人看。做公益也好，社区工作也好，我觉得大家都都有一个强烈的主观意识：要去帮社区做这个做那个。我就想，能不能以一个朝圣者的心态去跟别人工作？就是不要太认为自己是一个救世主，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学会学习，而不是以佛的角色去普度众生，那种想法挺恐怖的。当时我带着父亲去了一趟拉萨，我想把藏族人怎么看待自然和生态的状态表现出来。父亲身体不好，他喝酒后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伤到腰椎，走路不方便，手也不怎么动得了。在朝圣的路上，别人看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可怜，但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

乡村影像，以及男女平等

自己拍摄纪录片外，也培训村民拍摄。2011年，我和“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行动计划创始人吕宾一起培训村民拍纪录片。第一期有十二个学员参加，这些村民大多没有用过摄像机，他们没有特别的想法，我们之前也不做任何内容限制，只是要求你拿着摄像机回去拍东西，然后想办法快速给周围的老百姓看，有点像我当初那个过程。但后来我们到社区里去看他们的素材，真是有意外收获。

印象最深的是李卫红大姐，她那时四十多岁，教她的时候我很担心，第一她是女性，第二她拿摄像机的手一直发抖，很紧张，而且她也没什么头绪。后来她拍的内容是家里人种葡萄，真的是把摄像机当作身体的一部分，拿着摄像机跟她老公对话。好多人拍摄的时候可能会把自己的存在隐藏掉，但她不一样，她不停地讲，讲过去、讲未来。后来我们帮她剪了一个片子叫《葡萄》，参加过很多影展，很受欢迎。

那个影片特别好玩，她老公的弟妹去世后，弟弟就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那儿有两兄弟娶一个老婆的习俗。平时都是他们夫妻俩在田里干活，她在拍的时候肯定是我老公干活，中间休息的时候她说：“你又开始抽烟，赶紧干活！”她老公说：“你从早上开始拿着机器在那里拍，我抽一根烟你都要说。”有时他们两个也吵架，大家看的时候就会笑。

最后她拍了一个上摇的镜头，把全村二十多户人家的房子都拍了一遍，镜头摇得不好，但她要求放进去。一般拍房子，按正常剪辑的话，放两个已经很了不起，不会放二十个，但她说那个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希望把这个放进去。当时正谣传这个村子未来有可能会被淹掉，因为附近有可能修建水坝，正在勘测，所以每家人都希望把自家的样子拍下来。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将来被淹没，至少有影像留存在那里，可以告诉子孙后代，我们曾经生活在这里。去年，这个村庄真的确定要搬迁了。

她也采访了很多老人，有个老人家在片子里讲：“我们这个村子，山上有积雪，雪线下有虫草，山中间有茂密的森林，有堆肥用的栎树，有各种野生菌，山下有肥沃的土地。这些都是我们一代一代人辛勤耕耘的结果。现在的日子过得特别好，不希望离开这片土地。”

她影片的前半部分拍得很欢乐，最后却在这样的对话中收尾，让观众们很意外，但也是正常的。人生并不都是欢乐的，也不都是悲伤的。当你对一切都做好准备时，其实没什么事是特别难的，即便这个村庄不被淹没，所有东西也会改变。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有没有考虑到变化的可能性，如何应对，那个是最重要的。就像一朵花，从生长到开花、衰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只不过我们常常希望它开的时间长一点，不想走前面的过程，也不想看见最后的样子。

片子里，有个老百姓说，我们非常舍不得这片土地，这么肥沃，是几代人耕耘过来的，但是如果要走，我们也不会抗议。其实不是田本身多重要，而是在上面耕耘的人最重要，让我们搬到其他地方，只要花足够的时间精力，两三年就变成肥沃的土地，很快就会有收成了。

好多人看这部片子都会掉眼泪，觉得结局有点伤心，但我觉得挺好的，大家能够看到这一点，愿意去讨论，而且去想应对的办法。

我们对村民的培训做了两届，总共培训了二十多个学员，现在继续拍的还有十一人。几年下来，我感觉学员们已经有一种使命感，他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开始我们是往一个方向走，尽量要求大家都交一部作品出来。后来我们想，拍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做少数民族影像志，即便是拍同样一条路，今年是这样，明年是这样，一年一年堆起来，是很庞大的数据，为自己的村子做一个影像资料库也是挺好的。有一天大家想看哪一年的哪件事，还能翻出来，也很好。

村子里有一家人，我一直很想拍他们的故事。那户人家有一个老人家，她生孩子的时候，医疗条件不好，也有很多迷信和性别歧视，女人生孩子被看作是很脏的事，让我们在牛圈里生，而且男人不能在场。

当时她在家里疼了两三天，一直没生出来，老公不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办，又没有医生。我们有个迷信的说法，把丈夫的衣服倒过来盖在女人身上，就能够快速生下来。她妈妈没办法了，就照这样做了。不知道是因为衣服还是什么，反正孩子就正常生出来了，也很健康。但是她丈夫的姐姐觉得她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这个男的就会倒霉，所以姐姐不让她老公去看她，他们整整一个月没见面。

她跟丈夫之前感情非常好，但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丈夫不在旁边，而且还受到指责，她非常痛苦，非常生气，觉得不能原谅。后来这个男人去当兵，女人不再理他，也不让他看孩子。孩子慢慢长大，问爸爸是谁，她说对面那座山就是你爸爸。男人后来找了村子里另一个女人结婚，有了孩子，过得也挺幸福。这个女人一直不理他，直到男人去世。

很多人会感觉藏族的男女很不平等，看上去，男人回到家里就坐在那里，女人会去伺候他们。像我自己家里，做饭、扫地、浇水这三件事，我父亲一生都没做过。而我母亲，就算只是杀一只鸡，如果家里的男性都不在家，就会去请隔壁邻居大叔帮忙，

不会自己杀。

在我们的传统里，简单来说，分红事和白事两类。红事指的是见血的部分，比如拉木料、砍树，会用到机器、刀具一类工具，就算红事，因为受伤的概率很高，不会让女人去做。挤牛奶、做酥油、做饭、烧水，这些属于白事，是女人适合做的。

其实在藏族家庭里，母亲的权力是最大的，再厉害的男人，在他心目中，母亲也是最重要的。母亲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人，但她对孩子的爱，对整个家庭的奉献，是不求回报，也是最能够把大家聚拢在一起的人。

我们最重要的房间，就是有火炉和神龛的房间，除了神龛的方向，围着火炉的还有三个方向，正对着神龛，男人坐左手边，女人坐右手边。为什么要这么排？因为干家务活需要用的所有东西都在右边，如果右边坐女性，就方便她们随时起身煮茶、加水。平时如果已经有女儿在干活，妈妈也可以坐在左边。但如果是婚礼，一些红白大事的正式场合，左右一定分清楚。

我们在一个社区里专门找了女性来讨论男女是否平等的问题，讨论了两个多小时，村里的女人是这么说的：“我上山捡肥料，看起来挺辛苦，可是我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我是自由的，想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坐下来休息，可是我的男人不一样，是个男人，就得有一个男人的标准，你要达到那个标准。女人不高兴了、难过了，可以大哭，男人不可以。”

在藏区，我们很少直接批评人，会用说笑话的方式解决矛盾，比如有男人喝酒后打女人，大家会在大型聚会的时候，以笑话的形式去说他。很多事情都是在集体聚会的场合下，说出来，得到解决。

藏族人处理男女之间关系的时候，和汉族不一样，比如社区里今天晚上有一堆外来的客人，男性占的比例比较大，女人们就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会和他们跳舞。本村男人一般不去的，他们会把自己的女人去参加活动，给你足够自由，跳舞跳到通宵也没问题。如果来的客人里女性比例高，我们就会把自己的男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他们去和那些女人唱歌跳舞，他们唱歌的时候可能会唱到情歌。

藏族人对待婚姻的态度，不是觉得你这一生跟我结婚，你就是我的了。也不会觉得你跟别人多说几句话就会怎样，哪怕你们说话时会有一些调情的部分。这跟男人、女人没关系，是按照人数多少来决定的。如果女人多，会调戏男人，男人多的时候，就会调戏女人。我们自己知道这种情况，男人比较多的时候，他们会说一些黄色笑话，就要想好有没有能力承受，不行的话就绕开走。女人多的时候，男人也不敢经过，她们有时候会把他抓住，有人抓手，有人抓脚，摇来摇去，还往地上敲。我拍过纪录片，一群女生把一个男的抓起来，头朝澜沧江方向吊着……我看着觉得很恐怖，不小心手一松，真的会掉进滚滚江水中去的，可是对她们来说很正常。

澜沧江畔的葡萄酒

从清迈毕业回来，我以正式员工的身份，真正加入到卡瓦格博文化社。

我在汉文化的教育背景下成长，二十岁中专毕业才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一回来就遇到文化社，是因为跟他们一起，才重新认识这片土地，了解自己的文化。原来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那我们要怎么做？

早期，文化社做藏文扫盲班，做弦子培训，以村民们喜欢的磁带和VCD形式，将他们自己的声音和影像放进去，“原来我们的声音也可以从磁带里出来，我们的影像也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我们还做了近一百场弦子擂台赛，不停刺激他们。之后，我们和各种国际公益机构合作，系统调查过神山，做过飞来寺的环境教育，香柏林的保护，办过锅庄比赛，创办老年协会等等。

2013年，文化社在香格里拉创办“来者公司”。“来者”的藏文是“ཇླྷ རྩྷ”，“因果”的意思。当时的看法是，我们要让相信因果，遵守传统规则底线的人有更好的收入，也希望以商业的方式实现自给自足。既然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这么多好东西，应该把最有价值的部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那时我是主要负责人，毕竟是女性，会有不同兴趣点，文化固然重要，但我更喜欢做一些落地的事情，我会更关注到女性、社区、农业、垃圾，这些是文化社以前不感兴趣的，但因为我想做，他们也同意了。

来者公司也卖一些产品，其中一款产品是我们自己做的葡萄酒。澜沧江边的葡萄酒，最早是一百多年前由法国传教士带来的，但只在燕燕门乡的茨中教堂，而且葡萄品种是小颗粒的玫瑰蜜，一直没有推广开来。

真正大规模种植是从2003年开始，当时政府鼓励我们种大颗粒的赤霞珠和美乐，种完以后统一找公司来收购，没有后顾之忧。葡萄前两年不结果，第三年结果，但第三年的葡萄不要，第四年才开始收。所以当时的政策是：前三年，地里产多少粮食，政府就给我们补多少。就这样，葡萄一下子在德钦全县范围内推广开来。

第一、二年补给我们的粮食都是长了虫的陈米，质量很差，实在吃不下去，只能喂猪。第三年就改成给现金，一亩地给一千多块钱。第四年开始卖葡萄，就没补助了。

葡萄最初一公斤三块六，两年后涨到三块八，后来这个价格就一直没变过。种葡萄后，生物办让大家统一用农药，大家都是第一次种，完全不懂，反正发的时候说是药。在藏语里，“ཇླྷ”就是药，也是“好”的意思，既然是好的东西，那就用嘛。打药时，村民没有任何防护，用了几年，就出现有人在用药过程中晕倒，或者身上起皮疹的现象。

用农药，一是影响我们自己健康，一是危害地里其他生命。如果挣这个钱需要杀害那么多其他生命，村民就不愿意干，想把葡萄挖掉。农作物是这样，如果今年种了收成不好，明年不想种了，是很容易换掉的。但葡萄不一样，扎根很深，挖出来很费劲。当时也签了合同，前三年免费拿人家粮食，不是说放弃就可以放弃的，只能继续种下去。但一直不顺利，葡萄常常生病，锈病、白粉病一类，加上心理的反感情绪，各种矛盾日益加深。

我们原本做传统文化工作，不涉及农业，但社区里出现了这样关乎生计的问题，就不得不先去处理，不处理好，他们也没心思拉弦子跳锅庄谈文化。

当时想，能不能用生态种植的方式把葡萄种好？从国内外找过很多生态专家来看，

也不行。后来发现，葡萄生病，主要是因为产量太高，通风不够，一下雨就容易发霉，只有降低产量，才能让通风顺畅。可是这样，收入就会下降，葡萄已经二十年没涨过价，老百姓只能靠产量增收。即使你因为通风好而把葡萄品质提升了，酒厂收购时也不会加价。

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做酒。我不是做酒的专家，对酒也没兴趣，但因为农田里种上了葡萄，就要想办法把它变得可以储存。你的土地上种了一个你不能掌控的东西，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你看着像土地的主人，其实不是，因为你完全受控于这个市场。我们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学习怎么做酒。

我回到村子里，问谁愿意来参加实验：主动减产，自己做酒，不再只是卖葡萄。我不能保证绝对能做好，来参加实验的老百姓比较少，就是我大姐、二姐家，还有跟我们做了很多年项目的李卫红大姐家。大家拿出一部分土地来，不用农药化肥，并且减产。

酒做出来了，来者公司帮着卖。推广酒时，我们在很多场合讲过让人声泪俱下的故事，很多人听了就会买，但一喝，人家都不知道要怎么演下去！最尴尬的一次是，在昆明一个餐厅，导演万玛才旦老师也在，我们的故事一个比一个讲得好，但导演旁边的两位女士一喝就吐了！我们的葡萄没有用农药化肥，为什么我们的酒不行？



黄菊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先后就职于《新旅行》杂志社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2014 年创办微信公众号“行李”，以人物采访的形式，探讨人地关系，希望借此书写一种有活生生的人参与其中的当代地方志。已出版行李访谈书系《天堂，是因为有足够的地方闲浪》《寻隐记》《荒野志》《仿佛若有光》。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Raimond Klavins](#) on Unsplash

非虚构

此里卓玛： 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④

黄菊 | 生活亲历者

爱人离世，和过去道别。

逝去的爱人

清迈回来，我已经二十九岁，该结婚的年纪了，妈妈也一直催。在青海读书时，经朋友介绍，已经认识了后来的老公。但在泰国期间，我们一整年没见面，没有在一起相处过。本来我有点犹豫，但这时，他突然生病，非常严重。那时我和他都没正式见过双方的家人，但病情要紧，先陪他去成都治疗。医生说，很严重，必须马上给家里人打电话。他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来了。我在那里，就是女朋友的身份嘛，不能中途逃走。我妈妈对我的婚姻有很多设定，不是藏族不准嫁，做佛像生意的不能嫁，出家还俗的不能嫁，各种标准。我老公是四川得荣藏族，会说德钦藏话，不抽烟，不喝酒，公务员，是妈妈理想中的女婿样子。既然不能逃走，我就问妈妈要不要结婚，她说好啊，于是结婚。我们2011年结婚，老公2017年去世，孩子2016年出生，那时才一岁多。好多人都挺难过的，他们大多数是担心我。我知道老公有可能要离开的时候，也非常难过，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死亡，没有见过尸体。大多数藏族社区里，人去世的时候都不让女人去看，都是男人处理后事。我没面对过死亡，很害怕，悄悄哭了好多次。我给上师打电话，他说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很多时候我们担心难过的，并不是当下这个状态，而是自己想象很多还没到来的困难，比如我的孩子要没有父亲了，我要成为寡妇了，我未来该怎么过等等。而这些，都还没到来，真到来的时候，肯定有解决办法的。我终于想通了，与其这样难受，不如好好利用最后这段时间，好好和他在一起。

因为结婚前并没有真正一起生活过，我们有点像先结婚后恋爱，那几年感情一直很好，我妈对他也很满意，直到老公去世前，妈妈都不知道他之前生重病的事，所以对他从始至终都很满意，有时我和老公吵架，还没说两句，她就过来帮他忙了。我生孩子的时候，我妈跟我老公说，你不能过来。他是大学生，说这些都是迷信，一直陪在我旁边，他觉得那时候才是我最需要照顾的。还帮我洗内裤，帮我做各种事，传统的藏族男人不会做这些的。所以我很理解村子里那位老人，她一直不原谅丈夫，也是因为，虽然世俗里有很多东西，但他在有能力冲破的情况下没冲破，这让她不能释怀。

回想起来，我和我老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虽然我们同为藏族人，但我们的人生经历、生活习惯、脾气性格，都非常不一样。结婚的时候，我希望他给我买一枚戒指，他非常诧异：“我们藏族人又没有送戒指的习俗，那是西方人的习俗，被汉族人学过来，现在你也要跟着学吗？亏你还是个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者呢！”妈妈和大姐马上抢着说：“没事没事，戒指和耳环妈妈和姐姐给你买。”我气愤地说：“不用了！”有妈妈和姐

姐在，碍于面子，他很不情愿地给我买了一枚金戒指，妈妈和姐姐还跟他抢着买单。最后妈妈给我买了一对大金耳环，盛装的时候可以戴。大姐给我买了一对镶着红珊瑚、能日常戴的小金耳环。老公买了一枚金戒指。原本想象中最神圣庄严的一刻，就这样被他们摧毁了。我对金银珠宝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希望有一个男人能亲自为我戴上戒指，告诉我，此生，我就是茫茫人海中他的女人了。

结婚后没多久，我把他卖给我的戒指捐给了藏医院，听说藏医做饭需要用到金银珠宝，他也同意。三年后，我生日那天，他特意从得荣赶到香格里拉，带我去买了一枚藏式的金戒指。他向我道歉，说结婚时太年轻，太固执，没明白我的期待，欠我一枚戒指和一个仪式。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戴着这枚戒指，想到这是他真心实意买的，让我觉得踏实。

孩子出生一年后，他开始生病，病情越来越重，我们在医院度过了最后的四十天。病情一天天加重，而他一天比一天安静沉稳，到现在我都记得他那时的样子，每天盘腿坐在病床上，微闭着眼睛，深呼吸，我们一起诵经。

他在病床上计算，如果他去世，我和女儿能得到多少遗属补贴。他说孩子太小，应该不会记得他的存在，只是苦了我。他希望我能再找一个好男人，也坚信我能把孩子抚养成人。他并不担心孩子，只是担心我。他做好了一切准备，没有恐惧与焦虑，也没有想象中的垂死挣扎。他对所有来看望他的人说谢谢，拜托侄子侄女们未来和我一起照顾女儿。

老公说，如果昏迷过去，请不要让医生急救，他不想在最后的时刻被残忍地按压，他希望我能带他回家，他不愿意死在医院。死后，他希望骨灰能撒到江河里，这样他可以顺水去到还没去过的地方。

在医院期间，他不愿意躺着上厕所，每次都要坚持起床，最后那天早上，他说我起不来了，今天就在床上尿吧。那天中午，他就昏迷了。我没让医生做最后的急救，叫了救护车，把他带回老家。深夜十点，我们回到得荣，全村人都在路边等着。那时看不到村庄的样子，但能闻到泥土和玉米的味道，他心里是知道的，他很喜欢自己的老家。我告诉他已经顺利回家，他昏迷不醒，但眼角流出一滴眼泪，这是我们最后的道别。两小时后，他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梦

我很少做梦，就算做了，醒来就忘记了。现在唯一记得的两个梦，都跟我老公有关。藏传佛教里说，人去世后的四十九天内，会在中阴状态，他的灵魂还在，每七天会有一次机会选择投胎。如果让他安静、祥和，也保持周围环境的安静，不让他在恐惧中度过，他就可以安心地找到自己的路，下一辈子也能投胎到很好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宣泄情绪，可是对他来说非常不好，因为他会不断看见，就会舍不得离开。所以在藏族的葬礼上，有很多人专门讲笑话，不停逗大家笑。

我是他生前挚爱的妻子，和他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不舍。所以料理完他的后事，我便出发去了拉萨，想让他在中阴状态时，带着他的灵魂去朝拜。

他去世第三周那天，我和朋友去大昭寺磕长头，一直到深夜十一点，才艰难地磕完一圈，中途几次累得直接仰面睡在石板路面上，转经的人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没人在意躺在地上的我们。那种感觉真好，你可以任意地匍匐在地，也可以仰面睡在人来人往的地面上，没有人会来踩踏我们，也不会被人嘲笑或夸赞。

那天实在太累太累，回到酒店简单洗漱之后便倒头就睡。睡梦中，我惊慌地寻找他，怎么不见他呢？我大喊：“我到处朝拜就是希望你跟在我身边，你跑哪里去了？”“我在这儿呢，就在你后面，别着急嘛，慢慢走，我要认认真真看清每一尊佛的样子。”我回头，看见他穿着平时爱穿的黑色外套，双手背在身后，认真地盯着佛像看，不像在朝拜，更像做科学考察。他一直是认真的人，对什么事都喜欢较真，非常有耐心，动作也比较慢，而我是个急性子，平时总是不停地催他，常常恨不得跑上去踢他一脚。但不管我怎么发飙，他永远保持着自己的速度。看见他在身后，终于松了一口气。第二天醒来，我把这个梦讲给朋友，她也开心，说我们的努力没白费。之后再没梦见他，也许，那一周他与我相见之后便去投胎了。

第二个梦是去年九月做的。九月一号是他去世四周年忌日，八月底我生病住院，身体的疼痛加上心灵的创伤，整个人糟糕得一塌糊涂，都忘记了九月一号是他忌日，没为他点灯诵经。晚上梦见他，他变得很瘦，正忙着应酬。周围坐着他的同事们，他举起酒杯说：“我没有别的事，就是想请你们帮我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我把他拉过来，轻声说：“身体这么差怎么能喝酒？”他说：“我都已经是个病人，再喝一些酒也没关系，你千万不要生病了，我的同事们会照顾你的。”我从没见他喝这么多酒，更没见他求过别人，我感到愧疚，从梦中哭醒，难过了一整天。这些年没有梦见他，这一次，一定是我太难过，被他看见了吧？怎么可能这么脆弱，比起他来，至少我还活着，还能做很多事情。

我去寺院为他点了灯，对着他家乡的方向挂了白色的经幡，请他放心，不必为我担心。重新审视这一年里发生的各种事，突然有种释怀，我自认为的痛苦，不过如此。他离开后，我一直戴着他的戒指。三年后，戒指不小心断了，我收起来，想着哪天去重新做好。后来想起来去找的时候，再也没有找到，他和他的戒指都离开了我。我想，是时候和过去道别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很多时候，当人们知道我老公已经去世，常常会投来怜悯的眼神，生怕触碰我的伤痛。我没有那么多的悲伤，也没有那么多眼泪要流，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过着像女王一样的日子，他容忍我的过错，当我是个宝一样捧在手心。他对身边所有人炫耀有一个好妻子，虽然我自认为谈不上有多爱他，对他有多好。有时候我真羡慕他，他用强大的内心化解了我所有的负面情绪，我也开始学着他的样子去面对身边人的不同情绪，希望未来我去世的时候也能坦然地面对死亡。

惭愧的是，我虽然做纪录片，自己家里反倒没有特意拍过。我老公倒是随时拿出手机来拍，我跟女儿怎么样他都拍。我说你烦不烦，他说很重要的，女儿长大要给她看，你胖的时候要拍下来，你骂我的时候也要拍下来，怕你以后不认账。后来他突然不

在了，我去看他手机，里面有很多影像资料。等孩子长大后看到，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但这是事实，爸爸去世了，我必须要教她去面对。

葡萄酒终于做成了

2016年，郭老师写了介绍信，推荐我去参选银杏公益基金会的“银杏伙伴”。银杏伙伴参选的条件是：做了很多年公益活动；拥有社会创变的精神；目前遇到瓶颈，需要支持。

当时孩子刚出生，老公病情加重，特别需要钱。郭老师发给我资料时，都没怎么看条件，只知道有十万块钱，而且那个钱可以直接用在生活上。可以说，最初是奔着这个钱去的。

因为有钱，也知道竞争比较大，没想过会被选上。当时的想法就是，把我们有的问题先说一下，他们能解决一个算一个。

我们葡萄酒的品质一直上不去，我想做些改变，比如再请老师，或者提升设备。和来者公司谈过，但受到了拒绝。公司说，我们只负责卖，如果葡萄酒不合格，可以卖青裸酒。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不合格才去帮他们。如果只想挣个差价，去卖虫草、松茸，容易得多，还不用过得这么穷酸。如果成为银杏伙伴，能有一点资金支持，就不用等别人，可以自己拿这个费用去做改变。

当银杏基金来调研的时候，我没有聊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只聊了在葡萄种植和红酒酿造中的问题，请他们去社区看的时候，也是看这部分。

银杏伙伴的参选很严格，程序也很长：先是推荐，筛选一遍；然后实地考察，筛选一遍；最后还要去北京和专家面对面对话，才能最终选定。但在最终选上银杏伙伴前，基金会在调研时已经知道我们的问题，当时就帮我们找了很好的酿酒老师。我是十一月份选上银杏伙伴，但红酒九、十月就采摘，老师那期间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老师问我看过哪几本酿葡萄的书，我说一本都没有，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去测葡萄的糖度，他都惊呆了！在老师的远程指导下才知道，我们所有工艺都是错的，还在制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甲醛，但我们不知道。

后来成功入选银杏伙伴，就有了十万元资金。我用这笔钱买了设备，老师又各方面帮忙，天时地利，2016年，终于做成功了，很开心。虽然前面废了五千公斤酒，那些酒原本可以一二十块钱一斤卖掉，本地酒吧会买，游客也会买，便宜，但既然知道了不好，我们就不想拿出来卖，用来喂牛喂猪了。

从此，我们每年都挑选最好的葡萄来做酒，剩下的继续卖给酒厂。以前一亩地产四千斤葡萄，现在做酒，一亩地只让它产一千二百斤，收入却比过去翻了好几倍。葡萄出酒率很高的，一百斤葡萄可以酿出五十斤葡萄酒。葡萄酒刚酿好时，像蜂蜜水一样甜，过段时间会发苦，但两年后就稳定了，所以2016年的酒，我们2018年才卖。

根据每年气候，葡萄酒的品质也会不同。2018年九月，我去日本参加银杏伙伴的海外考察，正好赶上葡萄采摘，酒庄来村子收购，村民联系不上我，很着急，就把大部分葡萄卖掉了。葡萄是这样，如果大量葡萄都收走了，你家葡萄不摘，鸟就会来攻击那块地，很快就吃光了。但如果整个村都有的时候，鸟只吃一点，不会整块吃掉。有点可惜，那年的葡萄特别好，目前为止，我们的红酒做得都挺正常的，但2018年的酒卖得最好。

如今，整个澜沧江河谷，只要海拔合适的地方，都种了葡萄，比起种粮食，种葡萄的收入高很多。之前我们还留块地种麦子，现在都不种了。过去，我们挣钱主要靠采集松茸，但采松茸时正好是雨季，要整日淋着雨。加上离山比较远，早上出去晚上才能回来，中午只能在山上吃冷饭，容易生病。种葡萄以后，七八月松茸比较好的时候，也是葡萄最需要关心的时候，如果不关心葡萄地，一旦得病，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得病，导致颗粒无收。权衡一下，觉得捡松茸这件事可以稍微放一放。

现在整个葡萄酒行业都在往好的、健康的方向走，过去是垄断式，只有香格里拉酒业公司一家采购，后来慢慢地，有了我们自己的实验，也有外面的酒庄进来。轩尼诗也在佛山乡阿东村有酒庄，前几年做了一款敖云酒，卖到四千元一瓶，国内还不卖，让整个河谷的葡萄酒价格一下子上来了。我们和阿东村有着同样的阳光、土质、温度，也种着同样的赤霞珠品种，对比之下，我们卖几百块钱一瓶，大家就觉得很便宜。

大家也开始关心种植方式，不像过去只关心产量。以前为了增加产量，我们不用化肥，用农家肥，葡萄颗粒就很大，水分也饱满，但农家肥里带着虫和虫卵，现在全都不用了，正好用这些肥料来种菜。我们也不怎么去山上砍栎树枝了，以前一到冬天，每家至少砍一东风卡车。那时是先把栎树枝砍回来，剁碎，再铺到牛圈和猪圈里，牛负责踩踏、拉尿，猪负责翻拱，鸡负责把上面的虫子捉掉，我们再加一些青蒿在里面发酵，这样一年，然后变成肥料，用到葡萄地里。现在只需就近砍一点，铺在牛圈猪圈里，保证不要太潮湿就可以了。

大工厂出来的葡萄酒，味道都一样，但我们会按照八十斤左右一桶来发酵，每一桶味道略有不同，最后将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和大批量的整个压在一起不一样。但我们的酒没有生产许可证，很多外国人开的酒庄也没有，像著名的水乳大地、宵岭酒庄，酒的品质非常好，但没有许可证。因为政府颁发生产许可证不是看酒，而是你要有酒厂，要有规定的生产设备。有了许可证，可以在超市卖，没有许可证不可以进超市，但自己送去检测，合格了就可以在其他地方销售，像宵岭酒庄在松赞酒店有卖，水乳大地是卖到国外，我们是在梅里既下山、阿若康巴这样比较好的精品酒店，以及一些弦子吧和餐厅里卖，客人喝完以后想去看看我们的小酒坊，也很近。

以前郭老师鼓励我拍摄，但我其实没那么喜欢，很难不干涉地去观察，可能看着看着就直接上手了。记得最早拿着DV回去拍妈妈干活儿时，她一直在做事，我很难过。拍完两盘带子，我就想应该帮妈妈做点什么，没办法再这样拿着相机站在她身边冷眼旁观。我喜欢干一些实际的事，像葡萄酒，从完全不合格，到慢慢被人接受，最后很多人都来夸奖，这个过程很鼓励人。

葡萄酒做成后一年，老公去世，我离开来者公司，回玖农顶办了一个合作社，想要全身心投入这些实际的事情里。因为我的离开，没人干活，来者公司也在不久后关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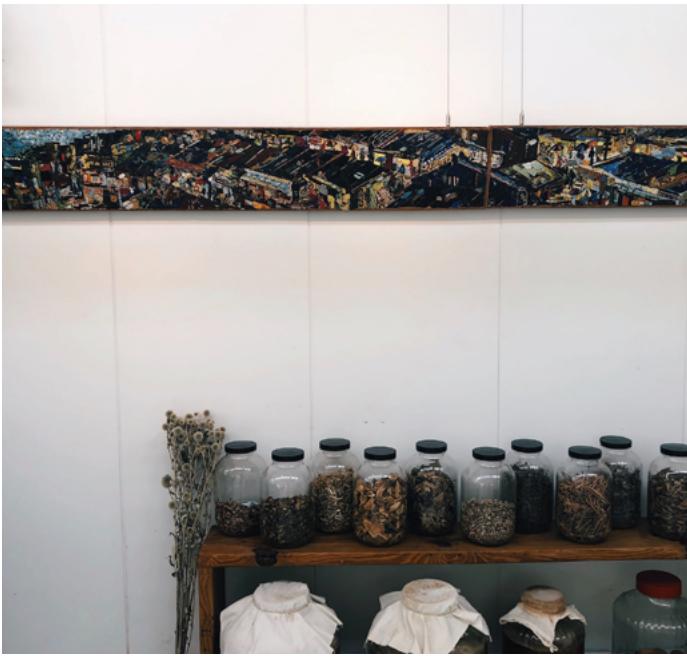


黄菊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先后就职于《新旅行》杂志社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行李”，以人物采访的形式，探讨人地关系，希望借此书写一种有活生生的人参与其中的当代地方志。已出版行李访谈书系《天堂，是因为有足够的地方闲浪》《寻隐记》《荒野志》《仿佛若有光》。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Jasmine Huang](#) on Unsplash

非虚构 此里卓玛： 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⑤ 黄菊 | 生活亲历者

“在这个社会的洪流中，我们应该站出来，
推崇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2020 年，疫情与手作坊

开合作社，原本是为了做红酒，但合作社注册才一个月不到，德钦县妇联就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做乡村妇女的培训。具体培训什么，他们没有特别的想法，说我以前在文化社做得挺好，不管培训什么，反正就培训对她们有用的。我想了想，对政府来说，有用的意思是能让她经济上有收入。

恰好那时，阿若康巴酒店创始人扎巴老爷找到我。扎巴老爷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印度出生、长大，成年后才以非常传奇的方式回到家乡香格里拉，在香格里拉古城里开了一家阿若康巴精品酒店，以这种方式延续他父亲曾经在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因为一些特殊的缘分，他在酒店之外接手了一家手作坊。手作坊曾经是在国外基金会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闻名于藏区，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做不下去，于是转让给懂商业又有情怀的扎巴老爷。他们刚接手时，知道我在做合作社，找到了我。

其实我那时不是那么有心情，老公九月份去世，做培训是十月，只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不太容易投入到工作中，但手作坊的负责人扎西仁青说，“卓玛，你出面把培训项目拿到就行，具体的事我来做。”于是，我就把手作坊和妇联的培训连接了起来。第一次培训在德钦县城周边，第二次在佛山乡溜筒江。手作坊的负责人之前就一直想做培训，但组织不起村民来，大家觉得那是骗人的。没想到我一去，村民就很积极地来了，尤其是溜筒江，在文化社时，我起码在那里开过上百次会，村民都认识我。两期培训效果都很好，村民很愿意来学习，妇联也高兴。

刚做了两期培训，手作坊的负责人就说，“好像这个店你来做更合适一点。”我不不会手工，也不认识具体的手艺人，原来只想挣点培训费，但仁青要去英国读书，连机票都买好了。我很为难，如果不接受，就意味着手作坊要关门，为了对手艺人负责，只有接着。

2018 年，我以合伙人的形式，正式接手阿若康巴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在古城有个门店，叫阿若康巴手作坊。那时才发现，公司账上没钱，仓库里没东西，手工艺人也没有。2018—2019 年，我没拿任何工资，相当于创业。

现在，我们是公司加合作社，合作社有好几个，云岭乡、佛山乡、奔子栏尼顶村，都有。目前手作坊的产品有一百多个品种，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想好了卖给游客，让本地村民挣钱，但设计什么东西，是村民集体决定的。大家默认一定要有藏族特色，比如这里是茶马古道，马在生活里也和我们很亲近，所以一定要有马；羊也很重要，淳朴，温顺，不伤害人，只吃草，卡瓦格博神山也属羊，所以要有羊……产品都以系列方式存在，羊的系列，马的系列，猴子的系列，每个系列都有布偶、手偶、指偶、

包包等。

为了标准化管理，所有材料是公司负责进货，村民必须从我们手里买材料过去做东西。比如布、拉链一些小东西，五十三块五的布料，可以做一千块钱的东西出来，还不算我的卖价，我给她们的价格是三十五元一米，材料成本很低。2020 年，终于有一点营收时，疫情来了。整个一到五月都不能开店，那时银杏的资助也结束了，好害怕，忽然一下子没有任何收入。老公在的时候，虽然工资不高，但会有一份固定收入，至少饿不死。那时女儿在私立幼儿园上学，我妈说，为什么不去公立学校？女儿太小，最开始跟别人相处时，我希望她有个好一点的环境，老师同学都客客气气的，未来小学就不担心了，但学费就贵一点。

五月，我决定去跑滴滴。每天要早起，很晚才回来。我女儿是我一醒她就醒，晚上不愿意跟我妈妈睡，就等我到很晚。过了一个月，挣了两千块多一点，但女儿病了，可能睡眠不够导致免疫力低下，得了过敏性紫癜，送去医院，花了一万八千多。那时学校也不能回去，只能在家里。

紫癜在香格里拉没治好，带去大理，勉强治好了，回到香格里拉，又复发。后来大家建议不要吃西药，就吃中药调理。女儿很配合，她现在都说，“我那个时候是把它想象成巧克力喝下去的。”一个月后，紫癜算是好完全了，但我不敢再去开滴滴了，有点得不偿失。还好，到六月，疫情稍微恢复一点，门店终于可以开了。

一直到去年，我们才算恢复正常，在公司没有负债，并且支付完手工艺人费用、员工工资的情况下，还有一些盈余。我和扎巴老爷说，建议今年就先不分红，把这部分盈余用在产品的继续推进上。去年我们的用货量大幅提升，之前没那么多钱，就不敢给老百姓下太多单，村民的款不能欠着，年底就必须把钱给人家。目前除了我们的手作坊商店，松赞集团旗下好几家酒店也在代售我们的产品，他们要的货比较多，今年疫情政策放开后，他们一要就是五十个、一百个，拿货以后马上又进货。但我不想太依赖一个大公司，这样风险也大，也在拓展不同渠道，包括找一两个网红来帮我们做宣传。

尼顶，香格里拉的香格里拉

离开来者公司，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坎农顶做合作社，经营红酒和手工艺品。第二件事，就是找到一个社区，做亲子营一类线路。比起红酒和手工艺品，线路相对来说投资少，而且当时就能拿到钱。来者公司之前的重心都在佛山乡，这个社区最好是我自己研发出来的。几乎想都不用想，我就直接去了尼顶村。

尼顶村属于奔子栏镇，在白马雪山东坡。奔子栏镇在金沙江边，海拔 2100 米，而尼顶村在海拔 3100 米处。奔子栏在交通要道上，闻名于整个藏区，而尼顶村，养在深闺人未识。我和尼顶村认识的机缘也很奇妙。

2011 年，我去印度参加法会，也看看我哥哥，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回来时，一起去的人都提前回来了。哥哥不放心，就把我托付给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又把我托付给另一群要从印度回来的人。那群人就是尼顶村的，一共十一位，有僧人，也有村民。我们需要先从印度坐车到尼泊尔，再从尼泊尔飞昆明。当我们走到印尼边境时，发生了战乱，所有陆路交通都停了，只能坐直升机。尼顶村很多老人，他们很紧张，一是因为战乱，二是因为直升机真的好小，只能坐十几人，相当于我们包机，晃动很大，他们恶心、呕吐。我比较淡定，既然他们敢飞，就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就一路照顾他们。后来在尼泊尔坐飞机也遇到很多麻烦，机场想要敲诈我们，其中一项是，说我们行李超重，要罚一千美金。出发前一个晚上，因为害怕超重，我们专门花钱请人来称过，不可能超的，我们也拿不出那个钱。最后没办法，我就跳到他们秤上，称出来五十八公斤，平时我最重只有五十一公斤，一路上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饥一顿饱一顿，只会瘦不会胖。最后以这个为标准，每个人的行李减掉七公斤，就在规定范围内，没交罚单。后来还遇到很多很多麻烦，包括在昆明机场，我好歹会讲汉语和英语，就帮助他们和机场双方协调，总算顺利回到家。

因为这些磨难，我们双方产生了很强的连接感。那时我还在文化社，他们都觉得很好，其中几位僧人，说未来如果需要上藏文课，很愿意来支持我的工作。后期我们就真的一起在整个奔子栏片区做起了藏文扫盲班，还一起出了藏文版的扫盲教材。我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的尼顶村。

后来去到尼顶村，那里干净，美丽，只有十二户人家，真的像世外桃源。我是第一个带人进去和村民一起吃住的，因为是第一个去，所以也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精力去培训，从怎么做饭，怎么接待客人，用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开始。他们有任何问题都会快速解决，而且很容易接受你的观点，这次有问题，下次就改了。

比如早上喝的粥，他们习惯放酥油和盐，外面去的客人，大人还能忍住，小孩子直接就吐出来了。村民很难过，哭了，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好了。我说，加糖还是加盐，或者什么都不加，你可以让他们选择，但不能替他们选择。这只是我们的习惯而已，客人不一定习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就全改过来了。

关于藏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尼顶村就是一个活的标本。一月二月，全村人都在过年过节。二月底开始闭关修行，不说话，不吃饭，六道轮回里还有一些众生，像动物，它们不能说话，要饿肚子，我们想象自己是它们，去体验它们的感受。闭关结束就到了三月，学生上学，大人投入农田工作。四月、五月、六月……一直到十月，一直在为生活忙碌，该种地种地，该打工打工，那时没时间吃喝玩乐，就是努力工作。十一月会有大法会，寺院有格冬节，也叫跳神节，那是我们全年的一个时间节点，秋收结束，寺院会给我们一整套死亡教育，告诉你人会死亡，死亡时会见到什么。法会的最后一关，是从阎王爷的唐卡底下钻过。法会结束，来到十二月，我们就相互串门、结婚、乔迁。也有很多人去世，因为开始入秋，有老人家熬不过那个时候……生活很有秩序、节奏，不像现在很多人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在忙碌，完全不知道活着的真正意义。

2017 年开始，我正式带队进去，到现在五年，每一年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我也带社长去见一些高端旅行社，希望他们走小而美的线路。村子小，确实不适合走大众线路，没有那么多时间空间来接待，我们也不想把自己逼到像明永村、雨崩村那样，

因为游客太多，忙到连自己过节的时间都没有，连正常生活都被打扰。成为银杏伙伴后，我也和另外两名银杏伙伴——裘水妙、朴河一起申请了一笔四万元的小额资金做尼顶村社区调研。水妙一直致力于乡村助学与教育，我邀请她在尼顶村做一套适合夏令营的课程研发，后来我们做出了一套适合各个年龄段的阅读课程。朴河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专门学过做芳疗油、酵素等，我请她教村民做酵素、手工皂。还邀请了另一个好朋友缪芸，她做社区人类学研究，和我认识多年，熟悉当地，也了解我们，但她不是银杏伙伴，就请她来做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也做一点记录，观察外来者和我作为藏族人的身份，如何和本村发生联系。

走进社区里，村民觉得我们做的事特别重要，是在帮助他们，不想收我们费用。我们有资金，简单的衣食住行能支付，但最后他们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于是有了剩余费用。我们用那部分费用出版了一份计划外的尼顶村农事历，用这份农事历呈现他们有秩序、有节奏的生活。

农事历

尼顶村，位于山顶的藏区小村子。村里有十二户人家，九十三人，其中七位党员，十五位僧人，僧人中有七位是格西。

一月，山林的礼物

“给了我们木材盖房子，给了我们烧火的木柴，给了我们肥料，给我们放牧牛羊需要的草，给了我们药材，给了我们野生菌。”

“最喜欢松树。美观。还可盖房子，实用。”

松树分为两种，结籽的和不结籽的，藏语里分别称为朵木和诺木。松枝有煨桑、堆肥等各种用途。“上到上山煨桑敬奉神灵，下到烧火堆肥垫牛圈满足人畜日常所需，都能用到”。

一起做酵素，村民采来的松针不是特别新鲜。朴河说：“要健康的、精神的。”下午，村民背来了新的松针，捧着松针笑着说：“老师，这是开心的松针！”

二月，公房

公房原来是集体晒粮食的地方，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建成了公房。建公房有政府挂钩扶贫单位给的补助，有大家积攒下来的木料，也有两年中每户两个劳力的投工投劳。村里有好木工，测量好，给出方案。村里的其他男人对木工也不生疏，有了图便能照着做。没有手艺的，家里没有男性的，就做地板打磨等工序。公房里的五十套桌椅都是村里人自己做的。公房大，大家喜欢。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在公房里做。“以前家里需要有能容纳很多人大的房间，现在不用准备大房间，家里可以有更多的小房间。”

公房里举办的第一个活动是婚礼。主人在婚礼结束后，把新购置的锅碗瓢盆都留在了公房。之后，但凡在这里举行过婚礼的，都会在公房里留下一些东西。

几口大锅，是另一户人家捐赠的。

价值七千元的垫子，是另一户人家捐赠的。

主人说“你们去采购，钱我来出。”

旅游接待是每家轮流承担的，挣得的钱，一部分也用于集体事物，于是，公房有了Wi-Fi，去年添置了洗碗机。

三月，田地

村里的老人常说：“珠巴洛河谷的粮食伴着尼顶村的水”，说的是尼顶村也就只有水，粮食常常需要靠珠巴洛河谷地区的接济。尼顶村种有小麦，过去，没有水渠，完全靠天吃饭，产量很小，水磨坊也离得很远。“夏天水大的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可拿去磨，秋收后终于有一点粮食可以背去磨的时候，水面开始结冰。”要凿开冰，烧着火守在磨坊通宵磨面。有时就睡着了。“有一次烧木炭，睡着了，火把鞋烧了个洞”。

十五年前，政府修建了水渠，有了灌溉水源，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粮食产量大增，不过偶尔还会有些虫灾。虫好像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这几年的虫灾越来越频繁，去年就有一次。面对虫灾，村民会做法事活动。念经，把甘露水撒到农田里，虫就会自然离开，村民觉得效果很好。

种地，村民有自己的智慧。蔓茎种得离家近，因为要经常割了喂牛。小麦不用经常拿，种得远一点。青稞离家近一些，因为要经常浇水，黄豆离家远一些，因为不需要经常浇水。

四月，清闲

捡松针的活，可以今天去，也可以今天不去。可以多捡，也可以少捡。

喜欢每天做一点活，而不是把事情快速做完，这样很舒服。比如堆肥，每天堆一点。早上干活，下午有点时间洗衣服、做手工、聊天。

五月，蔓茎与苹果树

蔓茎是尼顶村很重要的作物。首先是人吃。处在高海拔地区，村里的蔓茎味道好，有甜度。冬季最后收割的蔓茎会做成腌菜，在冷天里储存一段时间。蔓茎除了人吃，牛也吃，牛吃了产奶多，在冬季吃可帮助牛保暖。人的脚冻伤，也可以煮蔓茎的叶子来泡脚。

村里适合种苹果，最老的苹果树有三十年了。以前苹果少，现在种得多了，很多家都有五十棵以上的苹果树。苹果两元一斤，卖得便宜，但大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卖，不知怎么卖，基本都是送给其他地方的亲戚朋友。今年有车来收，在村里呆三天，让村民多摘。可那三天村民还是没有因为钱而忙碌，三天之后，村里还剩下很多苹果。

六月，房子

过去村里都是木头房子。山上就地取材，木头最便宜。后来山林砍伐有了指标管控，

砍木头不容易，石头成了最好的选择。水泥等材料要从山下运上来，运费贵，石头可以就近取材。而且那些大块的红色石头坚固、美观、有特色。以前建房子大家互相帮助，除了自己村，邻近村的人也来帮忙，不仅不要工钱，来干活的人还得自带午饭。后来条件好一些了，建房的人家可以为来帮忙的人准备午饭。

现在建房，互相帮忙的情况不多了。一是有时工程承包给了外来人，所有的事都由外面的人来负责。二是用了挖机等机器，需要专业技术。三是现在出外打工，每户人家手少，大多数又是老人，想帮忙也帮不上。但大家说，“现在和过去一样，大家愿意互相帮忙，需要帮忙的时候，还是会来的。”

七月，好生活与好村子

“谷仓里有粮食，冰箱里有酥油，圈里有鸡和猪。”

“可以和家里人呆在一起”

“幸福有两种，物质的和内心的，外在的无法主宰内心。物质再多，内心不平和，也是不会幸福的。尼顶村现在不是特别的富有也没有特别的贫穷，恰到好处的幸福。”

“财富再多，关系不好，见面不说话，也不开心。”

“再好的山水，人不好，意义也不大。”

“在城市里帮女儿带娃。邻居见面都不说话，笑一下就走了。”

“你戴着佛珠，你念经，可你出门遇到的是和你关系不好的人，心里有憎怒，你念再多的经也没有意义。”

“大家越团结，就会有更好的福报。”

八月，水源地

村里有三个水源地。

因为有了灌溉用的水源和饮水用的水源，最初的水源只用作展示了。这个水源的水，最甘甜，最好喝。据说，水源的主人是一只青蛙。青蛙顺着水槽出来的时候，意味着水要涨了。青蛙进去的时候，意味着水要变少了。大家不会把水弄脏，也不让小孩弄脏它。村里曾经建过一个水泥的水池，大家觉得不好看，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水槽比以前小很多，但仍然有三层。最上面的一层是给佛菩萨享用的，每天早上供圣水就取最上面一层的水，中间一层是供人日常喝水用的，下面一层做得最低，供来来往往的牲畜们喝。

九月，松茸

尼顶村就长在松茸窝里。出门就可以捡，村上村下，村的周围都可以捡，连苹果园的地边都有松茸。过去大家吃菌多，不稀罕。菌子多的季节，天天吃。有时遇到菌，一脚就踢开了。现在松茸是每家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请大家排列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作物，村民的排序依次是：小麦（产量稳定，关乎人的生存），蔓茎（对牛重要），松茸。。

大家也并不喜欢八、九月份捡松茸的季节。捡松茸需要一整天，早上去远一点的地方，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去近一点的地方。有了雨，才有菌，松茸季节也是雨季。在山上经常会淋雨，容易生病，又要跪在地上捡松茸，时间长了容易得风湿病。每日早出晚归，又要忙田里的活、又要忙山上的活，家里有人生病也没人照顾，还要担心会遇到熊。

尼顶村在山顶，松茸多，邻近的村子没有松茸。村里的僧人鼓励大家允许附近的村民免费来捡松茸：“松茸不会因为你们的分享而变少，你们的福报却会因为分享而变得更多。”刚好松茸刚出来的时候，尼顶村在忙着收小麦，而下面的村子收完了玉米，有空闲。作为感谢，邻近村的村民也给尼顶村的村民带来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好了。而尼顶村的村民也发现，松茸并没有因为更多的人来捡而减少，自己的福报却因为分享而增加了很多。

十月，僧人

“以前的扫盲班，不仅是学藏文，僧人、格西也来，更重要的是在教我们做人做事的方法。”

“僧人在社区很重要。讲众生平等，告诉大家要团结和睦、有戒律，是持戒者；生老病死，都问他们的意见，遇到问题有个去处。”

“佛学院和学校，都是学习智慧的地方。佛学院学习的是修心，成为更好的人，学校里学习的是竞争，成为更强的人。回到社区，僧人会更受到尊重。”

十一月，集体的事与个人的事

妇女小组经常在一起做事。

用植物做酵素，大家一起做，这样比较安心，不仅可以分工协作，而且不容易出错。各成分的比例，你记得的我記得。

做一些布艺玩偶的定制品，本来是可以各自在家做的，可大家把缝纫机都搬到了公房。除了大家一起做热闹，大家擅长的各有不同，有的使用缝纫机厉害，有的做手工是强项，可以互相帮忙。

“农田里干活，个人可以随时去做的事，属于个人的事。”

“集体事务和个人是联系在一起的。盖房子、修路这样的事，既是大家的事，也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便利，为自己积累福报。”

“为众生，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个。”

十二月，跳舞

在外来的印象中，藏族人能歌善舞。有游客来时，很多村子便会组织活动和客人一起跳舞。有些村子的人喜欢跳舞，不是为了客人，是自己喜欢，跳到满头大汗也停不下来。尼顶村的人不太爱表现，喜欢静。

在藏族村子，发生不好的事情，就不适合跳舞。在人多的村子，如果有人家里发生

了不好的事，需要跳舞的人家就会拿着茶叶和哈达去请求，跳舞还是能正常进行。尼顶村人少，只有十二户人家，一有事情发生，大家就不跳了。有人生病、有人去世，拒绝跳。过去有更严格的做法，邻居死一头牛，全村守丧三天。做生态旅游的卓玛说，把村民擅长的事放在这里做，歌舞晚会可以放在另一个村子做，这个村子更适合坐下来聊天讨论。

这是缪芸在尼顶村观察完我们的工作后，为尼顶村的农事整理的文字。

在银杏，看到各种可能性

最初因为每年十万元的奖金而想要入选银杏伙伴，后来真的进到银杏才知道，那十万元都不算，银杏真正的帮助，是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银杏每年会在全国精选出十多个银杏伙伴，他们做着各行各业的事业，做教育的、健康的、性少数群体的，伙伴里有消防员、医生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在一起，本身就是学习。

我们每年会有一次春天聚会，一次秋天聚会，还有一些小项目，像尼顶村的社区调查，大家可以合伙申请，叫合作基金。每年还有两次海外参访的机会，去哪里，学什么，自己来定，可以自己联系，基金会也能提供帮助。我后来去日本、英国，都是借助银杏海外参访的机会。本来还计划去澳大利亚看看真正的酒庄，因为我要去，整个团队的行程中选了好几家酒庄，但那一年我老公去世，没去成，伙伴们走到每个酒庄都拿详细的资料给我。今年因为疫情，去不了海外，八月我们去了一趟上海，我们这种小型机构也需要去大城市学习，去看看国内的趋势，也看看大公司在环保、可持续方面怎么做。

我原本觉得自己只是在做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和银杏走了很多地方后发现，这些东西对整个世界都有意义。很多发达国家正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而他们正在寻找的，正是我们现在做的，我们过着一种非常可持续的生活。出现疫情以后才发现，我们藏族的饮食习惯是非常干净的，大家从来就是分餐制，每个人都有一终身制的专属的碗，在家里也是，母亲的碗，父亲的碗，都是分开的，这个碗会一直用到他去世为止。只是后来学外面的世界，慢慢变化了。

去日本的时候，去拜访了盐见直纪老师，还去了他的社区，看到他写的《半农半X的生活》，他说，“一定有一种生活，是不需要被时间和金钱所逼迫的。”我也相信。每次做项目，我们都有一个小目标，但更大的目标是，找到一种小而美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尼顶村就是我找到的案例。

跟着大家去了那么多地方，我也想邀请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社区。2021年的春季聚会在是香格里拉举办的，那几天，我带大家体验了很传统的藏族生活，也去了尼顶村，很开心的一次旅行。

基金会对银杏伙伴的资助持续三年，我2016年入选，2019年就毕业了，但之后基金会的活动，我们想参加也是可以的，来回机票自己出，在地的费用由基金会出。因为银杏基金会的支持，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比如红酒，比如社区的往前发展。刚开始进入银杏时，我就像井底的青蛙，只为了够着那个果子，后来看到了很多可能性。进了银杏，就像进入到一个很大的资料库，如果我们遇到问题，比如垃圾问题，就会调用做零废弃的伙伴帮忙；遇到村民有健康问题，就会问其他相关伙伴；后来想做苹果干，不知道如何处理，有个伙伴做了很多年苹果干，卖得也好，就快速在网上订购了一批做苹果干的机器捐赠给我们，还教我们怎么做，我们也快速地卖起了苹果干；我老公生病时，有个伙伴的机构是做病友的协助工作，后期我们去昆明治疗，从德钦下去前，他们已经提前联系好医生和医院……大家在一起也很放松，从小母亲管得严，加上我的文化带给我的影响，还是会比较隐忍和将就，但在银杏，我不喜欢的事情就会直接拒绝，那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任何姿态都是允许的。

有了这些经历，再回看在文化社的那些年，也有了不一样的眼光。当初教村民摄像的时候，我们从没想过这些东西要拿给谁看、被多少人知道，而是让大家用摄像机的那双眼睛，聚焦在一个点上，重新回观自己的社区，看到自己的生活，然后来做选择：我希望这样活还是那样活；我希望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还是淘汰掉。

我们找到了一些东西，知道了哪些东西一定要留在我们生命中，而不是放在电脑上。我不懂研究，不太看重这些资料本身，更看重这些东西有没有在村民身上继续延续：弦子有没有再跳，年轻人懂不懂锅庄这些歌词……包括我现在社区里做的手工，比起外出打工，他们挣不到太多钱，为什么乐在其中？他会自己评估，什么是想要的，最后做一个选择。有些事情会快速带来钱，但也会带来相应的果子，就像我当导游，挣很多钱，我的童年很贫穷，有钱了，理论上应该很开心，但我开心不起来。

文化社那些年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留下很多资料，现在存在两个大的磁盘阵列里。那个时段已经过去，现在应该考虑：这些事能提炼出什么，给未来的人带去什么？我向郭老师咨询，他说这些资料能留到政府部门（档案馆、图书馆等）是最好的，他过去在德钦做调研时，很多资料也是在档案局找到的。资料在我手里，如果我不在了，就没发挥出该有的作用，应该让它们“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四十岁，忽然很放松

有时候有点担心、焦虑，想着女儿会不会因为没有父亲而受影响。在我们那边，家里总会有一个孩子留下来当家。我哥哥出家当了僧人，大姐嫁去别的村子，我一直在香格里拉，我二姐就留在家里当家，姐夫是上门女婿。我老公一去世，我就跟得荣家里人说，我不想让孩子很小就没有父亲，我想让她叫我姐夫“爸爸”，你们有没有意见？他们说没意见。我女儿一直叫我姐夫“爸爸”，叫我二姐“妈妈”，但她很清楚地知道我是她妈妈。老公生病时，女儿才一岁半，中间没办法陪她，她就在老家，由姐姐、姐夫带着。姐姐的孩子叫爸爸妈妈，她也跟着叫。我们一般也这么叫，妈妈的姐姐，我也是叫“妈妈”。

幼儿园里也是很烦的，什么父亲节、母亲节，今天写爸爸，明天写妈妈。姐夫有时来香格里拉，我会让他开车去接她。但她总会长大，总会知道。她有时候看我们的

结婚照，会说，爸爸为什么长得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她对爸爸已经没有很深的记忆，我老公走的时候也说，女儿应该不太会记得我。

现在一个人，没有特意想过一定要找伴侣或者一定不找，看周围的朋友，她们也过得挺辛苦，很多男的不太照顾家里，一年四季不回家，好像有和没有也没太大差别，只是在人家面前，你有老公。也有人追我，都不是太有兴趣，也没有多余的精力。现在女儿六岁，刚上小学，我只想着手作坊有正常的销售、制作，有固定的销售员上班，我也不用太紧张，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白天就出去工作，晚上五点半女儿回家前我就先回家，晚上也不约人见面，见面都约中午。

回望过去，二十岁到三十岁那十年，一方面巩固自身，一方面更关注自己的民族和文化，但又掉进另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坑里，至少是以我们民族为中心，不太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三十岁以后，大多数项目都是我自己决定、完成，才又从原本的文化、社区和固有思维里抽离出来，有了第三者眼光。

前十年在村子里做事，我个人的定位是：我们是被调查，被研究，被问问题的人，没有觉得我们是主导方。后来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输出，在这个社会的洪流中，我们应该站出来，推崇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还要和别人共生，不是带团挣点钱，或者当导游而已，我们希望被看见，希望相互影响。

如今四十岁，忽然很放松。过去看起来开朗，但不愿意敞开心扉，特别是和其他民族，防御心很强，会有偏见，觉得别人也有偏见。现在我从最底层接受了自己不完美的部分，接受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放下了许多防备。以前一直在公益机构，对商业有偏见，后来从公益机构出来做商业，认识商圈里的人，对商业的偏见破除了。以前对公务员有偏见，找了公务员做老公，发现公务员也廉洁、勤劳……比起角色、身份，人性、品行更重要。

这就是我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希望自己被那么多人知道，但如果用，我还是愿意分享的。退一步，其实也只是茫茫人海中某一个人的故事而已。对于读者而言，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人这么活过。



黄菊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先后就职于《新旅行》杂志社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行李”，以人物采访的形式，探讨人地关系，希望借此书写一种有活生生的人参与其中的当代地方志。已出版行李访谈书系《天堂，是因为有足够的地方闲逛》《寻隐记》《荒野志》《仿佛若有光》。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wudan3551](#) on Unsplash



裸沙丘与半裸沙丘

我坐在看似毫无杂质的沙丘上等待救援。烈日逐渐升高，炙烤着大地，但周围没有任何可以遮荫的地方，只有星星点点的柳蒿、沙蒿丛，新的嫩绿色的枝桠包裹着它们发黄的根茎。

将近一个小时后，吉日穆图赶来了。重新上路后在距离目的地不到 8 公里的时间里，我们一共上下车 14 次，为了打开和关闭铁丝网大门。



被铁丝网分割的牧区和正在被维修的铁丝网

畜牧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兽医的工作也随之改变。
这是一份对草原生活的原生态记录。

本文为“在場·非虛构写作奖学金”第二季获奖作品，作者：鸟日汉，小鸟文学授权转载。
“在場”由 [Matters Lab](#) 与 [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
可关注[官网](#)与 [Facebook](#) 获得征文、讲座与其他活动的最新资讯。

01

草库伦和铁丝网

2021 年 7 月初期，我驾着那辆租来的、已有 13 岁车龄的“千里马”上路，奔着吉日穆图家驶去。吉日穆图所在的 A 嘎查（村）属于鄂尔多斯 S 旗 K 苏木（镇）。K 苏木的东边和南边有两座大型煤矿和一个日夜不停歇的煤化工厂。正是托了这些矿厂的福，网状的公路切开了 K 苏木周围的牧场，四通八达。去 A 嘎查时便要经过其中的一条，上路后直到看到了一个被称为“希拉吉德盖”的、种满草玉米的滩地后，便可以拐进 A 嘎查了。但在快到吉日穆图家时，那辆动力不足的旧车陷进沙子里无法挪动了。



陷进沙堆里的旧车

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延伸到了 S 旗牧场的东南部分，在牧民们种了十几年的一块块杨树小林间仍可以看到白茫茫的“裸沙丘”。到了春天，沙土随着风到处流动，沿着固定沙丘的背风处聚起沙堆，使得经验稀少的新手司机束手无措。我只好给吉日穆图打电话求救。后来，牧民教会了我冲破沙土堆的驾驶技巧：握紧方向盘、从远处加速通过。

1983 年，内蒙古党委召开了一次全区旗委书记会议，会议议定，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将畜群“作价归户，分期偿还，私有私养”的责任制。在“包畜到户”责任制实行一段时间后，修改和颁布了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对草原所有制进行了改革，“把草原的使用权和管理、保护、利用和建设，用责任制的形式承包给基层生产单位或个体经营，使草原责任制同牲畜的饲养管理责任制结合起来。”在草原管理条例的基础上，划定草场边界，把草牧场使用权落实到户或组，确定适宜的载畜量，以草定畜，这便是“草产双承包”。[1]

铁丝网随着草畜双承包逐渐地“覆盖”了牧场。铁丝网由细铁丝和矮短的柱子组合而成，每隔一段距离，五根或六根铁丝依次并排地被绑定于柱子上。间隔的长短、并排铁丝的数量、柱子的材质（粗短的木头或者是水泥柱子）等皆取决于牧户的财力。因此，草场承包后的初期，铁丝网也意味着牧户之间的贫富差距。

如今，铁丝网成为了草场边界线，而乡村道路上需要不断开关的大门，则是唯一可通行于不同牧户草场间的方式。我在鄂尔多斯草原期间常常生出一种“逼仄局促”之感，沙丘间难得一见的平坦滩地被密集地网围栏和一扇又一扇的大门分割成块。这种“局促”引得当地一位牧民诗人作了一首“四十四满”：

草库伦 [2] 装满了原野，雾霭遮蔽了城市，
欠款压垮了牧民，金银装满了口袋，
水井铺满了滩地，道路覆盖了牧场，
鬼魂住满了楼房，铁丝围满了草场，
大门布满了道路，羊毛挂满了柠条；
.....

中午时分，终于到了吉日穆图家。

午饭期间，我向吉日穆图询问了他的邻居兼表亲达赖的畜群近况。

春天风沙飞扬的一天，达赖给 K 苏木动物检疫站德站长打了通电话。达赖的一只羊病蔫蔫地、不吃不喝已有一天了。当时正值繁忙的春季防疫期，德站长抽空与

他的同事兼兽医青格勒一同前往达赖家出诊。到了达赖家，德站长和青格勒直奔病羊所在的圈舍。这是一个传统样式的羊圈，用粗壮榆树枝和柳条枝尽量贴紧、并排插入地下，再横向插进几行软柳条枝，顶是敞开的。德站长从公家配给他们的长城牌皮卡车后座上拿出了金属探测器。德站长手里这把探测器与火车站、机场与地铁站用于扫描乘客的一摸一样。兽医们一般用它来探查牛、羊身体里面的金属物质。但如果吃进去的金属通过消化系统流到了更深处的内脏里，探测器也会失效。德站长从头到尾将病羊扫了两遍，探测器毫无反应。这是只腿比较短的两岁母羊，它耷拉着脑袋躺在混合了畜群粪便的褐黑色沙地上。在简单排除了误吞金属的可能后，兽医们怀疑病情是否由误吞塑胶引起。误吞塑胶无法完全排除，也无法完全确定，德站长便建议达赖给病羊灌一瓶蓖麻油，达赖拿起了插在羊圈缝隙里的绿色啤酒瓶，便往板升[3]的方向去取油了。蓖麻子油通常用来给牲畜灌肠，作用于泻火、通便。德站长是想利用蓖麻油使误吞的塑胶排出羊体外。灌完蓖麻子油，一行人在圈外等待了半个小时左右，病羊没有要排便的意思，但却站起来、似乎要找吃食了。这令所有人凝重的脸色放松了下来。能吃了病就好一大半了。达赖招呼我们进屋喝茶。喝完茶，达赖坐上德站长的车，与我们一道回苏木，到兽药店买点消炎的内服药。



传统样式的羊圈

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动检站与德站长会合。德站长接到达赖的电话后便眉头锁紧。我们一行人稍做准备后便直奔达赖家。昨天已经站起来能够自主饮食的羊变得更加虚弱了。短腿病羊旁边躺着另外一只羊，出现了同样的病症。德站长上前翻开病羊眼皮、摸了摸羊肚、听了听心跳，眉头始终没有舒展开。前天做出的诊断——误吞塑胶，可能是错了。德站长将质疑重新转移到了“误吞铁丝”上。很可能被吞食的铁丝已经顺着消化系统和肠胃的蠕动滑到了更深处，简易的金属探测器无法感知到。这次，德站长建议达赖解剖其中一只羊，确定病因。达赖犹豫不决。这两只病羊是正当育龄的年轻母羊。达赖决定再等一天，用点消炎“泻”火[4]的药，寄希望于这些兽药的治愈效果。问诊结束后我们没有进屋喝茶，直接乘车离开了。

第三天，我到动检站一位防疫员兼兽医达央和妻子经营的药店里找德站长。我到药店的时候，发现达赖也在那里等德站长。

这一天我没有随德站长出诊。当天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动检站时，我听德站长说，达赖终于同意解剖其中一只羊。解剖的结果印证了德站长的第二次判断，病羊们吞食了铁丝。

牛羊作为反刍动物，有四个不同功能的胃：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羊误吞了铁丝后，经过反刍的过程，铁丝随着消化道的蠕动游到了网胃里。在兽医学上，这种过程被称为“创伤性网胃腹膜炎”(traumatic reticuloperitonitis)。铁丝在不同的胃部游动期间，会擦伤、甚至是穿透胃膜，并由于胃部蜂巢状的皱襞而容易滞留其中，造成腹膜炎，以及其它器官的病变和衰弱。此类病羊常常会有食欲不振、四肢绵软、反刍缓慢、粪便减少等症状。

这种症状从初始的两只羊逐渐扩散到了整群羊身上。其中大部分是怀了孕的母羊。

显然，铁丝在如今的草原随处可见。每年的夏末、秋初，翻修、重建铁丝围栏成为了牧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劳动。经历了春天的风沙、夏天的烈日，以及秋冬的雨雪后，直径不到几毫米的细铁丝非常容易风化、折断。被换下的和旧了的铁丝段便随风飘到了不同的角落。

至少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以及在其后的人民公社时期，S 旗牧民一直在游动畜牧。春季劳作烦重，天气虽然大体朝着温暖的方向，但仍有反复的寒冷。而且经过了寒冬，畜群正处于塔日固[5]十分薄弱的时期。畜群的塔日固关系到他们的泰米尔[6]。泰米尔关系到它们的生命力、免疫力。而此时，正值植被的青黄不接。冬天的青贮即将要食用完毕，而春天的草场还要在温暖日子里的及时雨后才能返青。鄂尔多斯牧民会在离冬季牧场不远的地方，留出一块未放牧的、有遮荫处的草场作为春季牧场。如果是长满了发芽较早的柳蒿、白蒿、芨芨草、城草、羊草的草场，则更佳。此时，牧民们开始使用春牧场上的圈舍，以便离开窝了一个冬季的棚舍及其希伊格[7]。另外，这种选择也方便牧民从定居点汲水运到春季草场。

铁丝网围栏竖起后，轮牧半径缩小，而游动畜牧也逐渐被“定而不牧”的策略替代。每家牧户承包所得的草场面积不能够支持他们划分不同的季节牧场。好一点的草场要留着夏季、秋季给畜群抓膘[8]时使用。定居点并不只在冬季使用，而变成了四季居住的房屋。顺着定居化的趋向，牧民建起了越来越温暖、越来越能够遮风挡雨的棚舍。畜群只能在主人的草库伦里转，吃不到更远处的、种类不同的植被。连年的干旱和逐年密集的风沙天气里，畜群沿着网围栏留下了一条又一条的蹄印牧道。它们没吃饱的肚子，便由现代合成饲料、草料、耕种的饲草“填满”或“补充”。在每日固定时间倒满合成饲料和干草料的坚固的铁制食槽，是随风飘动的铁丝段理想的

隐匿处。

一位年轻兽医同我讲，“每年不管牛还是羊，铁丝胃穿孔的病例非常的多，尤其在春天。”胃穿孔的牛患病例，在大多数时候可以通过手术治愈，也可以通过在瘤胃放置吸铁石的方法预防铁丝和其它金属在体内的“游动”。但对于体积更小的羊来说，开腹取铁丝的创伤大于疾病本身。

达赖家畜群中的大部分只表现出了较轻的创伤性病症。因此，在努力治愈几只重症羊以外，只好放任其它羊依靠自身的泰米尔维持了。所幸，据吉日穆图讲，达赖家死了几只羊，除此之外境况并没有变得更严峻，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春天。

02

接羔与剖宫产

春天的惊险并不只因其变幻莫测的天气，还因它是孕育新生命的关键时节。经过一百天的孕期后，羊群的接羔工作陆续开始。有时接羔从鄂尔多斯历冬眠月[9]就开始，最迟会一直延续到鄂尔多斯历六月[10]底。接羔的日期、持续时长与秋季的畜群配种工作相关。能干的牧民总是要考虑更远的那一步。种公羊的护理、喂养、开放配种等工作在秋季的有序进行可以保障羔羊的存活、接羔工作的顺利完成。

蒙古牧民的畜群被称为“五畜”，由牛、羊、山羊、骆驼和马组成。其中羊、山羊被称为勃格玛拉 (bog mal) ——小畜，牛、骆驼、马被称为勃特玛拉 (bota mal) ——大畜。鄂尔多斯牧民又将勃格玛拉称为“gar mal”，意为“在手能够到的地方放牧的畜群”，这是由于放牧小畜需要牧民经常性的关注和照护，其牧场也不会像牛、马、骆驼一样的遥远。

S 旗牧民一般将绵羊群与山羊群混合放牧。绵羊品性安静、胆小，容易受到惊吓，其畜群不易分散，如若遇到狼害或其它危险不能够及时通过声音向主人传达信号。而山羊则性情好动、好奇，注意力容易分散，喜好随着风向采食从而容易远离放牧地，在遇到危险时叫声足够大，混合放牧则可以使互相取长补短。

吉日穆图 80 多岁的母亲年轻时放牧的畜群以山羊为主。自从网围栏竖起后，山羊群经常从铁丝下钻出去、越界到他人的牧场上。因此也造成了邻里之间频繁的矛盾和口角。正是由于山羊的本性，它逐渐被当地牧民放弃。

1953 年，中央与内蒙古党委决定对本地畜群品种进行优化和改良，以提高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11] S 旗的绵羊品种改良始于 1957 年，直到 1971 年时，引进的新疆种公细毛羊已从几个试点公社（即如今的苏木、镇）推广到了全旗范围内。S 旗本地母绵羊与新疆细毛种公羊的后代被命名为“鄂尔多斯细毛羊”。鄂尔多斯细毛羊比起本土绵羊拥有更细腻的羊毛，其收购价格最高达到过每斤 40 元左右，一只成年母羊平均可产 10–15 斤羊毛，种公羊——20 到 25 斤左右。



成年母羊、成年公羊、正在剪毛的羊、剪完毛的羊

S 旗还未改良绵羊品种之前，牧户的小畜群由本地绵羊和山羊构成。当时，牧户的春季接羔主要针对山羊，而春天还未到来时便会完成绵羊的接羔。S 旗本土绵羊属脂尾型蒙古羊品种，体质结实，耐寒抗冻，羊羔体积大，存活率高。因此即使牧业基础设施不够完备的前提下，冬天接羔也完全不会影响仔畜存活率。然而，为了提高混血二代的存活率，细毛羊的接羔工作从冬季转移到了春季。



本土黑头绵羊

接羔季节的 A 嘎查牧民日夜颠倒。此时到任何一家牧户，出来接待的主人几乎都是睡眼惺忪、发丝凌乱的。他们或许刚刚渡过了一个一眼未合的夜晚。白天的睡眠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继续盯紧随时分娩的母羊，还要关注新出生的羊羔是否已经站立了、是否可以自主喝奶了、是否需要更换到更温暖的地方。即将分娩的母羊躺在圈舍的地面上，随着宫缩有规律地喘着粗气。一般情况下，母羊可以自主分娩。羊羔一降生，牧民将手指伸进其嘴巴里，抠出褐黄色污物，并保证听到一声清脆而尖锐的咩叫声才能确定羊羔的健康。天气异常寒冷时，牧民用破棉衣绕绑羊羔的背部和腹部。在分娩途中，如果母羊有了难产的迹象，家里的小孩子就会被喊来助产。他们用手探查胎位和羊羔的状态，并在大人指示下转正胎位或直接将羊羔拉出来。绵羊的产道小而窄，大人的手伸进后便没有可移动的空间。但如今，接羔季节时小孩在上学，且大部分寄宿在学校，无法参与家庭劳动。

接羔季节给母畜做剖宫产手术，是兽医们最为繁重的工作。同在 S 旗的 L 苏木老兽医却那木讲，最近几年，每年春天的接羔季节，他和其它几位兽医平均每一天都要做大概 40~50 例的剖宫产手术，其中以绵羊为主。德站长和兽医青格勒、达央每天都要出诊到凌晨两三点。当我离开 W 苏木后，听说达央在一次出诊的路上驱车时睡着了，车翻到了路旁的沟里。

三月初的一天，达央接到了斯日吉的电话，情况有些紧急。斯日吉的一只母羊从前一天就宫缩了。但 24 小时后没有顺利生产，而母羊体力耗尽，食欲不振。

到斯日吉家后，达央一边请斯日吉的爱人乌达巴拉准备一盆温水、毛巾和洗洁精，一边与斯日吉合力将病羊从羊圈里抬到了房屋前的砖地，使其平躺在了一块干净的纸盒上。达央首先将后腹部表面的羊毛剃掉，再用兑了洗洁精的温水擦洗了肚皮，并用毛巾擦干。之后拿出手术刀，沿着子宫大概的位置划开了一道弯月形的口子。肚皮慢慢打开。达央将带着蓝色胶皮手套的手向前伸进去探查，原来子宫外部有了扭结，导致了难产。由于耽搁得久，腹中的羊羔没有呼吸了。达央从划开的子宫里拽出了羊羔的尸体。尸体外面包裹着一层被血染成粉红色的透明薄膜。斯日吉将尸体和胎盘一同放进了提前备好的白色面粉袋子里，打算过一会儿埋在沙蒿丛下。在将羊羔尸体拖拽出子宫的过程中，子宫壁又被划伤了一处。达央用纱布将聚集在腹部的血吸收完后，慢慢移开夹在开口处的止血钳，缝合伤口。剖宫产手术后的母畜，需要经过三道缝合过程——子宫壁、腹膜、外皮。所幸，缝合过程没有出现意外，母羊也少了明显的挣扎。



埋在沙蒿丛下的羊羔枯骨

鄂尔多斯细毛羊十分恬静，即使经过如此复杂的手术，也无需使用任何镇定剂，只需有两人按住羊头和后腿，它们只在感到极痛的时候才会发出几声低沉而短促的咩叫。即使刚刚“丢”了一只羊羔，此时斯日吉和乌达巴拉的脸上有了些许放松的神情。达央又从车里拿出一瓶营养液，输给躺在地上的母羊，为其补充体力。

经过了近两个小时的忙碌后，我们被请进屋内喝茶。当我倒上第二碗茶的时候，听到乌达巴拉在屋外高声呼叫达央。斯日吉跪下来，将羊头放在膝盖上，拨开母羊的眼皮——眼白里不见任何红血丝。一瓶营养液还没有输完，母羊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直到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此后，我们再次被请到屋内喝茶。

[正在进行的牛剖宫产手术（失败的羊剖宫产手术照片可能造成观者不适，需通过超链接查看）](#)

斯日吉后悔没有早一点叫达央上门。在出门时，斯日吉和乌达巴拉拿出两百块钱放在茶几上，请达央收下。“母羊没有救活，就不收了”，听到达央这一句，斯日吉没再客气，送我们出门了。

达央为没能救活母羊而有些自责。斯日吉和乌达巴拉没有表达责怪，但很多时候牧民会当即表达疑惑、有时甚至是愤怒。有些牧民会将母羊的死亡归因于兽医的无能。我在 A 嘎查熟知的牧民格力勒家一只母羊没能挺过剖宫产手术，她向我抱怨请来的兽医“收费高，但医术却不行”。兽医做手术一方面以救活每一头牲畜为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他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手段。而从牧民的角度来看，为一场“失败的手术”付费，

是双重的损失。

A 嘎查牧民如今都在从事至少一项副业。即使在上世纪的牧业集体化时期，牧民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收入来源于非牧业生产实践，比如贩卖猎获等。在 A 嘎查，除了依傍周围的煤矿聚集了巨额财富的少数牧民外，大部分牧民通过季节性的务工、售卖畜产品、开煤矿运输卡车等方式作为收入补充。但无论如何，夏末初秋批量出栏同年的春羔仍然是最主要的家庭收入。因此，春天母羊的生产状况、羊羔的健康成长都关系到秋季收入的多寡。而畜群每一年的活畜交易价格也会受到畜肉市场波动的影响。



将手指当作奶嘴吮吸的小羊羔们

斯日吉如果在第一天出现难产状况时就请兽医上门，或许羊羔和母羊都能过活。达央对此也有抱怨。在何时请兽医上门，对于牧民来说是需要衡量的微妙选择。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传统的药方、治疗术，甚至是牲畜本身来缓解病情，另一方面也一直在观望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做“付费”的干预。但如果牲畜没有了任何可被救治的希望，牧民也会直接放弃。因此，对于兽医们来说，出诊时往往比合适的时机迟了一步。

03 防疫与难产

春天里，牧民们在圈舍忙碌。而防疫员和兽医们忙着完成防疫任务。动物防疫检疫站属于 S 旗农牧局辖属的基层单位。但主要的防疫工作由防疫员完成。防疫员并不属于动检站的正式员工，是从当地牧民中招募并培训的、专事防疫的“志愿者”，每月有一千元的补助。兽医可以兼任防疫员，但他们并不是国家机构的在编人员，其出诊时的所有相关责任均由兽医个体承担。

2017 年后，根据国家农业部档《农业部关于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兽医社会化服务推进工作的通知》，S 旗政府在各个苏木（镇）提供场地、设备及其它基础设施，建立了“兽医服务队”。服务队由苏木的兽医、“志愿”防疫员以及动物检疫站的在编工作人员组成。他们负责对动物常见疾病和寄生虫病的诊治，以及免疫接种、动物疫病防治、畜禽配种改良等方面日常工作。

我在 S 旗的春天随着青荷尔完成了 A 嘎查的畜群防疫。春天给小畜接种的是小反刍兽疫疫苗。小反刍兽疫俗称“羊瘟”，主要症状是支气管炎、腹泻等，具有较高的传染性和致死率。



春季防疫期间

青荷尔早上从动检站出发时拿到了所负责牧户的名单。每年春秋进入防疫期后，动检站便会请嘎查支部书记和主任协助通知各个牧户。收到通知的牧户需要提前将散落在草场上的畜群合并到一处。出发前，防疫员还会再次通知牧户当天的具体行程。

青荷尔自己是 W 苏木另外一个嘎查的牧民，完成了一天的防疫工作后他还要继续自家的春季劳动。他已经做了近五年的接种工作，所辖片区的牧户都与他相识。

“阿莫尔 [12]，阿莫尔，干啥走着呢？”——很多牧民虽然熟知青荷尔的工作，但仍然会带有些许疑虑地问上一句。

“畜群都圈进来了吗？”——青荷尔直奔主题。

很多时候，防疫员并不能在确切的时间点到达牧户。因此，防疫员上门后牧民才会开始收群。所幸，春天的畜群并没有从定居点走远。青荷尔和我们会帮牧民合拢畜群，赶到圈舍里。还未下雨的季节，圈舍里干燥的沙土随着羊群的脚步扬起来，进到眼睛里、嘴巴里、耳朵里。

我们与主人协力将羊群赶到圈舍一个角落里，尽量使羊没有缝隙地一个挨着一个，并用一扇铁制的活动大门拦住，预留一个只能通过一只羊的通道。紧挨着的羊无处可动，青荷尔走进羊群里，一只手抱住羊脖子，另一只手拿着连发注射器将疫苗推进羊体内。一百多只羊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便可接种完成。



被挤到角落里等待接种的羊群



兽医随身携带的药箱和接种药物（秋季）

之后，青荷尔会请主人拿出“疫苗本”记录并签字。疫苗本由牧户保存，上面记录了具体的接种日期、药物、防疫员、牲畜品种与头数等详尽的资讯。从早上大约八点钟忙碌到下午的 5、6 点，青荷尔和我们一天只能接种三到四户的畜群。



疫苗本与其内页

国际妇女节的上午，我们接种完了一户品种多样的小畜群后，往牧民敖敦家赶。敖敦大概有 5、60 只羊，除了少数几个留著作冬季储肉的羯羊 [13] 以外都是母畜。我们将车停在房屋外，拿下药箱和登记，但还未走到门口时敖敦便迎了出来。

“我们家不打疫苗”——她不容置疑且带着些许的愤怒说道。

生硬的面容着实让我们有些惊异，青荷尔尴尬地笑着走近敖敦解释道：“我们是得到了你们嘎查主任的许可才会到各个牧户上门接种。哪些牧户不打算接种，我们会提前收到通知。”

“如果你们能够保证接种完疫苗百分之百不会出现意外，那我就让你们打！”敖敦的声音逐渐变大。

当然，青荷尔无法做出如此绝对的保障，但仍然继续劝说敖敦接种疫苗。

“我们家畜群最近在接羔，打了疫苗肯定会出现问题。你不用劝我了，实在不行把领导叫过来吧，你们领导能保障防疫一点都不会影响接羔，那就打。而且说是上午就来，结果你们午后才来，先看看你们自己的做事风格。”

青荷尔一边听一边拿出手机，与德站长通了电话。

不一会儿，一辆长城牌皮卡和两辆越野车卷起飞扬的尘土朝我们驶过来。皮卡车上是德站长和青格勒，两辆越野车上分别是嘎查主任和嘎查党支部书记。待一行人下车后，青荷尔带着我们悄悄地离开了敖敦家。

德站长和嘎查领导的劝说并没能改变敖敦的决定。他们离开敖敦家后又去了她大哥毕力格家。毕力格也坚定地拒绝接种。毕力格向德站长一行人展示了所积攒的满柜子兽药。毕力格拒绝由政府强制接种的免费疫苗，自己购买并储存了价格上千元的药物。毕力格觉得任何传染病、流行病都可以通过这些兽药治愈和解决，而同时不会有任何后果。大多数牧民即使按时接种疫苗，仍然会对此持有疑虑。德站长在三月份的防疫季节里，每天会收到少则两三通、多则十几通来自接种牧户的质疑电话。

达央没能救活斯日吉家母羊的两天后，接到 A 嘎查牧民布日图的电话。布日图家的畜群在一天前刚接种完疫苗。达央带着我们赶到布日图家时，待产的母畜站在羊圈角落里挣扎着。达央将听诊器放在母羊腹部下方听了一会儿后诊断出羊羔被脐带绕颈。达央请一个瘦小一点的实习生将手伸进产道探查羊羔头部的具体位置。只要将羊羔头摆正，就能够顺产。达央请实习生将打了活结的细麻绳套在羊羔头上，在产道外通过细麻绳调整其位置。这是在尝试免做手术的解决方案。一旦母羊被剖腹，愈合的子宫便很难在下一个发情期间受孕成功。但将近一个小时的尝试失败了，达央最终还是做了剖宫产手术。或许是因为避免手术的尝试时间过长，打开腹部后发现刚刚还在努力随着阵痛挣扎着脱离母体的羊羔已经没有呼吸了。缝合完伤口后，达央请布日图用旧衣服将母羊的开刀处包住，避免着凉、感染。

离开布日图家后不到半小时，达央接到了他的电话：刚刚被开过刀的母羊死了。布日图抱怨道，“防疫前的母畜都顺利生产，只有这一只在防疫过后就难产了”。动物检疫站最终赔偿了布日图一家 500 元。按照同一年的活畜交易价格，经过牧民饲料喂养后的母畜售卖价格大概在千元左右。

同在 A 嘎查的牧民赛因去年也有只母羊在接种疫苗后难产而死。事后，盛怒之下的赛因抓起来解释的德站长衣领，朝他挥了一拳。死羊尸体被解剖后，并不能确立其死亡与疫苗接种之间的直接联系。此后，赛因才稍微释怀。

与布日图、赛因和大多数牧民不同，兽医们认为母畜难产与疫苗接种无关，而是有更为复杂的因素。母羊难产的案例几乎都是由于“子宫扭结”。

如今的 S 旗牧户畜群品种多样。为了紧跟市场化的售卖规则、出栏尽可能多的羊羔，牧民纷纷引入那些更适应舍饲，能够快速长膘、一年可怀胎两次、二胎双胞率更高的品种，如萨福克、杜泊、寒羊以及不同品种的“混二代”。A 嘎查牧民引入新品种时，通常会到旗外、市外购买种公羊，而受孕的母畜仍然是鄂尔多斯细毛羊。这些品种种公羊个子高、骨架大，与鄂尔多斯细毛母羊体型相差悬殊，因此容易由于胎儿过大而导致难产。

S 旗连续三年旱情严重。少雨的夏季和秋季后，冬、春两季草场植被更加稀疏。旱情使得牧民的冬天和春天过得十分艰难，他们或是通过草料地作物补充天然饲草，或是大量购买干草、饲料、草料来维持饲养的供给。每年 A 嘎查几乎所有牧户花费年收入的 50%–80% 购买草、饲料。到了接羔季节，为了给母畜加强泰米尔、障羊羔的健康，牧民们用合成饲料喂养它们。

如今，S 旗所有牧户都有宽敞而保暖的畜棚。即使最为简陋的畜棚也有彩钢瓦顶、水泥和砖砌成的墙。羊圈一般与草舍连在一起。每当牧民拿着装满饲料的塑胶桶走进羊圈时，所有的母畜便会争着抢着赶到食槽旁。母畜一个挨着一个，奋力将头伸进食槽时不免会相互踩踏、拥挤。兽医们认为，在争食时的拥挤和奔跑很可能是产生“子宫扭结”的重要原因。

对于畜群的密集型照护策略，德站长颇有批评。他认为现在的 S 旗牧民“过的既不是真正的农业饲养生活，也不是纯粹的牧业生活，夹在中间，反而哪一边都不太擅长”。过去有经验的牧民在五九寒天太阳还未升起前便要把牲畜赶到高处的草场使其受冻，训练畜群的耐寒能力。对于妊娠期母畜的喂养也十分讲究，尽量将其放牧到植被丰富的春季牧场上。牧业生活中，畜群并不是完全地依赖牧民，牧民也要根据畜群的自主性和其特性调整放牧方式。德站长认为，畜群在温暖的棚舍里、填满的食槽旁度过冬天和春天，并没有机会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泰米尔”。

04

传染病与畜群流动

春季防疫结束后，直到秋初，德站长们忙于畜群采血，布病检测。布病，指的是由感染布鲁氏菌而导致的人畜共患疾病（由动物传染给人，多数会由于人食用了病畜的乳制品而感染）。感染布病的牲畜会出现发热、食欲不振、疲倦等症状。在检测手段还未普及时，牧民将其称为“懒病”。

旗农牧局将布病检测任务承包给了各苏木的兽医服务队，布病检测需要采血，每采一只羊，兽医获得补助 2 元，每一头牛——5 元。

采血，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劳动。兽医们到了牧民家，待准备工作完成后，便戴着手套、头套和鞋套进入圈舍中。采羊血，需要在其脖颈上找到一条静脉，将采血器插进去抽血。熟练而力气大的兽医可以一边将羊定位，一边单手采血。运气不好时，需要反复插入采血针。与兽医们一同站在圈里的主人，常常会对此表示不满。有时为了

逃过采血检验，牧民在兽医上门那一天将一部分畜群赶到远处的巴拉尔[14]里，再以收不回群为由搪塞过去。采牛血时需要在牛尾巴顶部十厘米左右的地方插入采血器。相比绵羊，牛很难控制。但那些看似体形瘦小的牧民 - 防疫员，身手却很敏捷、力量也很大。他们将手中套牛的麻绳一扔便能套住目标，再用力一拉就能制住一头调皮的蛮牛。



正被采血的羊群

采血以及布病检测并不强制。但 S 旗目前还未引入布病疫苗。感染布病的牲畜，只能被“无害化处理”。一次，我随德站长、青格勒出诊前一天晚上，他们埋、烧了一夜的病羊，德站长开玩笑称自己“吃了一晚上羊肉”，与我见面时，他们身上仍散发着一股“烤羊肉”的味道。

今年秋日的一天我与却那木到敖自尔家采牛血。采好后，血样被拿回苏木的实验室检测。敖自尔家有五管血样的血清在粉色布氏杆菌检测试纸上产生了反应，变成了絮状的紫色粉末。这意味着有五头牛已经患上了布病。

去年，敖自尔家畜群感染过布氏杆菌。疫病是从外地购入的十几只羊带来的。他们本打算改良畜群品种，将细毛羊换成快速出栏、迅速长膘的寒羊。

在牧区，这是一种新型的畜群流动。在还能够转场的时代，S 旗畜群中鲜少有“外来”羊。畜群的流动只在不同季节的草场间。商品化的流动稀少，且是单向的。如今，S 旗畜群的商品化流动有了双向的特质。相比于那些个头大、长膘快的外来品种，鄂尔多斯细毛羊更难以适应圈养舍饲。因此，在草场越来越窄化、越来越倚重草饲料进行舍饲的情况下，牧民们希望通过品种改良而能够更主动地参与到畜肉市场的商品化流动中。相比于基于流动的“封闭”，这是一种基于“封闭”的流动。

如今，农牧局要求基层动物检疫站与其它机构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对从外购入本地的牲畜要做好“流调工作”，要求畜主及时“报备”。

敖自尔家的院落里矗立着一个正在建设的毛坯房。如果建设完成（包括室内装修），将会是一个十分“豪华”的牧区新型“别墅”式房屋，其总花费大概会有七十到八十万。敖自尔和爱人目前住在毛坯别墅旁边一个坐西朝东的简易彩钢房里。

采样检测结果出来后，却那木和防疫员胡斯勒给敖自尔打电话，通知了他这一消息。如果严格按照旗农牧局的要求，这五头牛应该全部被“消杀”。但却那木和胡斯勒告诉敖自尔，他们不打算上报了，并建议敖自尔近期迅速“处理”掉病牛。如果按照农牧局要求扑杀病牛，敖自尔会收到大概一头五百元左右的补贴。今年活畜市场上的成年牛交易价格在一万元五千元到两万元之间。



在建的“毛坯别墅”

布病检测工作结束后，接着便要进入秋季的防疫期了。秋季主要预防大小畜群染上结核病、五号病、羊痘、牛痘等。此时，也是羊群的配种期。

S 旗牧民会在畜群中养一到两只种公羊，并在每三年换一次“血”——即引入新的种公羊。为了控制交配期，从而可以集中接羔，牧民们平时在种公羊的腰间系上膀胱。到了交配期后，牧民将种公羊膀胱取下。交配期与防疫期相遇，牧民通常都会拒绝或推迟秋季的防疫。免疫工作开始后，却那木与胡斯勒挨户挨户到所辖片区内的牧户，其中只有三户畜群接种了疫苗。有一家牧户拒绝得十分坚决——去年秋季打完五号病疫苗不久，圈里所有怀了孕的母牛都流产了。大部分牧户要求将秋季免疫推迟到交配期后的一个月。然而，那时已经是初冬，不到四个月之后又要进入新一轮的春季免疫了。

难怪，春季防疫期时牧民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前几个月才刚打过疫苗的吗？”

接羔、防疫过后，S 旗的畜群要进入下一个颇具挑战的阶段——与寄生虫共存。未

到春末夏初的剪毛期时，羊群深受蜱虫之苦。蜱虫是寄生于牲畜毛发里靠吸血为生的螨类。在春天里，牧民、防疫员身上总是能够找到蜱虫的虫卵。蜱虫虫卵十分微小，体积犹如跳蚤一样，没有牧区生活经验的人则完全不会注意到它们。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微小的虫卵会吸饱牲畜的血液，成长为比大拇指指甲盖稍大一点的虫子。蜱虫等毛发寄生虫病在传统蒙古兽医中被囊括在疥癣病病症范围内，统称为哈木病[15]。此类寄生虫病通常具有传染性。如果没有适当的干预，过多的蜱虫很有可能会成为处于抵抗力减弱、膘情损耗中的牲畜之杀手。同时，蜱虫也很有可能成为令牧民和动检站防疫员之间产生不信任感的诱因。

在传统牧业生活中，针对哈木病，牧民有一套“土方法”。从 17 岁起便在小队里充当兽医的却那木老汉，到今年已经行医半个世纪了。据他讲，在他年轻时，每年的春天和秋天会进行集中的“熏香治疗”。

熏香疗法以针对性地杀灭蜱虫和其他类型的疥虫为目的。每年春天牧业大队的兽医们会选择一处高低错落的遮荫处，朝里挖出比人还要高一头的半封闭窑洞。在窑洞开口处用毯子、被单、被子严密地遮蔽起来，并在上方留出一个烟囱大小的洞口。窑洞中央盖一个简易的灶台，将其与烟囱式洞口连接。畜群被赶进窑洞，使其在灶台上的干粉燃烧而产生的烟雾中呆上半个小时左右。燃烧的干粉用几种草药混合而成，其中艾蒿草[16]是主料。

但如果熏香治疗时操作不当，赶进窑洞的牲畜很可能在烟雾中窒息而亡。S 旗在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对于疥癣病的防治从熏香转移到了药浴。合成药“六六六”粉成为药浴的主料。“六六六”粉是六氯环己烷的俗称，一种有机化合物，是药性极强的杀虫剂，也广泛用于清除果树、蔬菜和粮食作物上附着的寄生虫。六六六及与其同时使用的“敌百虫”逐渐被停用。经过每年一到两次的六六六粉药浴后的畜肉味道的变化使牧民有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兽药市场化后，适用于畜群的驱虫药品牌变得十分丰富。兽药市场的发展以及兽药广告在牧民当中的广泛传播，令德站长颇为不满。虽然驱虫药物看似种类繁多，但事实上其趋同性强，因此本地牲畜身体都逐渐发展出了耐药性。

S 旗针对畜群的强制接种从 1999、2000 年开始。在最初的几年，防疫政策并没有被认真履行。防疫员上门后，只是在防疫手册上签字了事。对此，牧民也乐意配合。在认真履行接种工作的近五、六年里，牲畜暴毙的案例反而变多了。

接种后突然暴毙的牲畜主人将动物的死亡归因于疫苗。很多时候，牲畜死因无法明确。德站长认为，春季防疫过后的暴毙或许与羊体寄生虫，尤其是蜱虫有关。与人体对疫苗的反应类似，牲畜在接种后的几个小时内会出现发热症状。而发热状态下，寄生虫产生应激反应而吸更多的血，从而导致牲畜衰弱而突然死亡。

除寄生于牲畜皮毛中的蜱虫以外，春季多发的还有肠胃寄生虫病。在跟随德站长出诊期间，除了母畜难产手术以外，诊疗最多的便是刚出生羊羔与牛犊的痢疾病。

牛犊、羊羔痢疾症状轻微时频繁拉稀，严重时则体力衰竭。羊羔、牛犊的痢疾除了与圈舍卫生有关，也可能与通过母乳进入仔畜体内的寄生虫有关。痢疾是由感染线虫而引起。细颈线虫[17]成熟孕卵节片随着粪便被排出后，很有可能混合着干草和饲料被牛羊吃进，之后附着于肠道，从而致病。因此，每年春末夏初需要给哺乳期的羊羔和牛犊喂上两次针对肠胃寄生虫的驱虫药。

六月后，气温逐渐变热。

此时，附着于食槽里的干草料上、藏匿于夏初嫩草根部潮湿环境中的绦虫也是一个严重的生存威胁。绦虫，同属于肠道寄生虫，由头节、颈节和体节组成，成熟孕卵节片从人或畜体排出后，被地螨吞食，虫卵在地螨体内化为有侵害能力的幼虫。绦虫会使得病畜粪便恶臭，使其喜卧，伴有慢性瘤胃膨气，体质消瘦，严重的情况下病畜会出现昏迷状态。



寄生虫病严重的羊
(眼白无红血丝、下巴肿大)

吉日穆图的母亲、八十六岁的高娃婆婆讲到，她年轻时过夏的主要内容是走“敖特尔”。走“敖特尔”在不同的牧区具有不同的意义。可四季轮牧的情况下，走“敖特尔”意味着在突发灾害如旱灾、雪灾时期、或是年景不好时不得不离开夏牧场和冬牧场到受灾较轻的远处草原暂时性地转场。而在鄂尔多斯牧区社会语境中，走“敖特尔”则专指在夏季到远离定居点的滩地、梁地等水多的牧场上轮牧。

夏天走“敖特尔”时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即给小畜群“喂韭”。“韭”指的是两种葱属植物：沙葱[18]和野韭菜[19]。沙葱与野韭菜不仅是夏季畜群抓膘时的天然饲草，同时也具有杀死肠胃细菌的疗效。如果夏季的敖特尔场没有沙葱和野韭菜，牧民会选择到长有这两类植物的草场上短暂转场一至两天。

高娃婆婆在走敖特尔时，还需“照护”夏牧场的水源。雨水均匀的年代里，夏牧场滩地草场上有多处丰盈的“水泡子”，即天然水源聚积而成的季节性小湖。小湖——水泡子，是牧民与畜群重要的水源。每隔一段时日，牧民将浮游着各种小生物的表层水撇掉，保证水泡子的清洁，也即保证小湖水的“活”。

水泡子被分为“死水”与“活水”。夏季供牲畜饮用的水泡子如果有流动的来源——地下浅层水、雨水、湖泊、河流等，则水是“活”的。如若不然，水泡子很可能成为“死水”。在旱年尤其如此，畜群口渴时遇水便喝，“死”水中的虫卵便有机会进入其体内而成为寄生虫。此类寄生虫中有肠胃寄生虫——绦虫、线虫和肺部寄生虫——柳叶虫（肝片吸虫）等。

如今，A 嘎查只有 10 户左右的牧民在租赁夏季草场，用于走“敖特尔”。A 嘎查牧民所承包到的草场亩数最多的有一万亩左右（但其中有六千亩都是沙地），最少的只有两百亩。很多牧民将所承包到的草场中较为优良的那一块保留到夏天和秋天。

今年秋天的一天中午，我与德站长、青格勒和达央出诊到斯日吉家。斯日吉有头病牛和一只病羊需要诊断、治疗。问诊后得知，病畜们有同样的症状：食欲不振、粪便不通、浑身无力。

诊治完病牛后，德站长从牛棚走到后面的一处小水泡子边上，凑近去闻了闻。绿色的水泡子中间发黑，边缘的泥潭上都是牛蹄和羊蹄印迹。这是斯日吉于今年春天挖掘的一处开口井 [20]。开口井处于斯日吉家最优良的滩地草场上，他们将其用作夏牧场，其余季节用铁丝网围住。这一狭小的夏牧场上本已有一口深水井，但需要等到从房屋附近的高压杆连接电线后才能启用。

秋天时牧民们要喝“新汤”。秋天宰杀并食用的第一只羊肉，便是一年内的“新肉汤”。斯日吉请青格勒将病羊宰了，喝“新汤”，顺便解剖，找找病因。斯日吉抬起躺在圈舍树荫下的病羊后腿，从后推着它赶到了准备好的宰杀点，使其站定后摸着羊头轻声念了几句“haluun hot doon harin iree（请定要回到温热的浩特 [21]）”。但羊是青格勒宰的。在 A 嘎查，屠宰正在成为一门专业，畜群主人亲手宰杀得越来越少，而是将这份活计外包给其它牧民：宰一只羊五十元，一头牛一三百元。

剥皮、肢解过后，德站长过来清理肠胃和内脏。在从肠胃里洗出来的一盆食物残渣和粪便里，德站长捞出了一把“面条”。当我以为这是羊误食了什么食物后的形状时，德站长告诉我，“这些是绦虫和线虫”。这一把“面条”堵住了病羊的小肠。翻开胃部褶皱后，我们发现还有密密麻麻的、十分细小的红色虫子在蠕动。斯日吉在一个月前才喂过的综合驱虫药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疗效。



斯日吉家的开口井和清理出来的“线虫”

06

禁牧与疫病的闭环

接羔、防疫结束后，S 旗牧民便进入“休牧”期。

第二次草场确权，即从 1998 年后，自治区政府决定施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限牧、禁牧、围封转移。相比于游动畜牧的生产实践，生态保护政策更倾向于“舍饲”。限牧、禁牧的时间限制由各地旗县根据草场类型、放牧方式等做出不同的规定。这项政策的意义在于“给草原提供修养生息的机会”。

草畜平衡政策制定者们认为牧区生态退化的首要原因是“过度放牧”，即在特定面积草场上放牧的畜群规模超过了其载畜量 [22]。我到 A 嘎查的前一年夏季大旱期间，市政府派了一组人马来调研草场状况。调研组在 A 嘎查的最后一天与牧民代表进行了座谈，排除掉干旱的因素，调研结果将草场植被稀疏的状况归因于“过度放牧”。牧民们纳闷，“我们从父辈、祖辈那里继承了相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到我们这一辈就是在过度放牧呢？”；“牛羊都成了有罪的啦。”

草场承包到户后，畜群的游动半径缩小。禁牧的三个月期间，畜群则处于完全的舍饲状态。因此，一种“被动”的“过牧”现象就发生了。

春季的禁牧政策使牧民更依赖草料。圈养在棚舍、与草场“隔离”开的畜群完全依靠牧民投放在食槽里的干草料和合成饲料。

S 旗在集体化时期，以“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为号召，大面积开垦滩地和沙丘。人民公社解散后，原来的集体开垦地逐渐被弃耕转而恢复为草场。然而，A 嘎查平坦的滩地草场上仍然能依稀看到一处处微微突起的田埂旧痕。草畜承包到户后，一些牧民在所承包的草场上开垦小块耕地。直到十年前实施禁牧后，开垦草料地成为了普遍的做法。如今，A 嘎查三百多户牧民平均每户拥有 20 亩或以上的耕地，牧民选择种植玉米草，少部分牧民会在此基础上开辟苜蓿草地。



春季草料耕地、夏季苜蓿草地、购入的一车干草料

清明节后，牧民们开始耕种草料地。经过了一个冬季以及接踵而至的禁牧期，圈舍地面上经过畜群的反复踩踏后形成了坚固的粪便沙土层。这在耕种时节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肥料。拉肥成为了春天仅次于接羔的重要劳动。

在德站长小的时候（大概是 70 年代末期），家里的长辈每天都会让他们打扫羊圈。傍晚收群前如果圈内没有清理干净，小孩子会受到严厉的斥责。小时候的德站长觉得这是大人“讲卫生，讲到牲畜头上”。但经过十几年的兽医实践后，他发觉这是一种净化过程。病菌、寄生虫会通过牲畜粪便排到体外。牧民把每日清理的粪便堆积在一处，通过其产生的类腐殖酸消杀一部分的寄生虫、病菌。如果不及时清理粪便，排出体外的虫卵就有可能重新进入牲畜体内。

禁牧期伊始，牧民们已陆续结束了接羔。德站长和防疫员也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疫苗接种。但德站长更加忙碌了。有一天德站长将手机忘在了车上，过了两三个小时取回来时荧幕上显示有三百多个未接来电。

四月初，禁牧期开始不久后的一天，德站长、达央一行人来到 W 苏木北部一个嘎查的牧民家。德站长清晨刚到工作单位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虽然已经在电话上给出了建议，他还是决定上门瞧一瞧。到了牧民家，迎出来的是一位干练的、穿着长筒水靴的女主人。他们的院落十分宽敞，房屋院落旁边是一个新近建设的草料棚，草棚前面有分出了许多格间的牛棚。草棚和牛棚大概占据了 300 平米的空间，看得出是一个养牛大户。女主人带我们走进一个专门用来圈母牛和牛犊的棚舍。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牛圈无处落脚，最后只能踏着粪便走进里面。在混合着沙土和粪便的黑绿色的圈舍地上躺着一个刚出生三天的小牛犊。牛犊在出生当天晚上就一直拉稀、发低烧。头一天，主人从达央的药店买来治疗痢疾的药物，但仍未见好转。德站长和达央建议主人立即给牛犊输液，如果挺过这一晚或许还能活命。

在牛圈里做完初步诊断后，德站长让主人带我们到草棚里看一看喂牛群的饲料。德站长从一个敞开的黄色麻袋里拿出饲料来碾碎了放在手掌心，看了一眼，又凑近鼻子闻了一闻。我也从麻袋里捏一点出来闻了一下，一股刺鼻的霉味顺着鼻腔蔓延开来。这一袋压灌草是牧民专门从旗里买来的，每吨八百元左右。主人每天给牛群喂两次这种混合饲料。德站长建议他们立即停喂。压灌草由大豆和麦子秸秆、玉米粉、麸皮等压制而成，放置时间过长会霉烂、发臭。黄曲霉素，是发霉物里的主要成份。吃进黄曲霉素的牲畜会出现痢疾病症，并且难以治愈。

圈舍地上堆积的底肥和饲料里的霉菌，是禁牧期间令兽医们忙碌、牧民们烦恼的主要缘由。

S 旗牧民将每年 4 到 7 月间的禁牧期（鄂尔多斯细毛羊禁牧到 5 月 31 日，针对其它畜种的禁牧直到 6 月 30 号才结束）称为“让畜群坐牢的日子”。几乎所有 A 嘎查的牧民都会选择与政策做“猫鼠游戏”——偷牧。白天，是农牧局突击检查“偷牧”的主要时间。到了夜晚，牧民便将畜群赶到圈外，让他们自行觅食，早上再收回圈内。严重旱情下的春牧场也没有太丰富的食草，但聊胜于无，牧民们需要想办法节约储存的草料。

春天“牢狱期”的白天，牧民圈舍里的畜群哈欠连天，瘫软在地上昏睡。到了傍晚，精力十足的畜群便朝着圈舍大门方向咩叫不断。吃完晚饭的牧民会急忙帮畜群“越狱”。到了禁牧后期，六月将至时气温转暖。晨间刚返青的嫩草上开始聚集水汽，形成露珠。德站长和却那木老兽医都讲到，有经验的牧民到了春末、夏天时，会等到早上的太阳升到高处时才将畜群赶到草场上。有些虫卵在夜里附着在植草枝叶上，清晨时分又与露珠结伴而行，而等到太阳升高、露珠蒸发那些虫卵又会重新回到地表下湿润的环境中。此类寄生虫中以绦虫为最。日夜颠倒地“偷牧”的畜群，随着天气转暖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染上绦虫病。

寄生虫在牲畜身体、圈舍、食槽、饲料间形成的闭环，可以通过畜群的游动而打破。但连年的干旱和禁牧政策，使牧民对畜群的“照护”变得更加密集——给羯羊、母畜、仔畜分别投喂不同的草、饲料；加固、加厚棚舍的墙壁和顶部；开垦更大的草料地。此般“照护”又与牧民秋季出栏的利益追求相关联。然而，密集的“照护”或许也打造了令畜群致病的菌、虫繁衍环境。为此，牧民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兽药，也频繁地与疫苗接种、兽医诊疗产生冲突。牧民陷入了“照护”——“治愈”——“照护”的回圈中。而兽医们只能参与“治愈”的环节，却无法打破这一链条。德站长的抱怨、焦虑也大多来源于对如今畜牧业“定而不动”的无奈。



建设中的畜棚、与圈舍连接的草棚

尾声

三月防疫季节的一天早上，我来到 W 镇动检站，打算跟随兽医们到牧区为畜群看病。即将出发时，院子里驶进来一辆车长城牌的老款越野车，看上去已用了很多年，车漆在风日晒中失去了光泽。待车停下后司机走了下来，他是一个晒得黝黑的牧民，鼻子两侧脸颊上的褶皱一根一根竖着，中间部分被两道半弧状的笑脸皱纹给弄弯了。牧民站在院子里的德站长和达央兽医点了根儿烟之后打开后备箱，里面有只被刘海似的绒毛挡住半边脸的羊神色不安地打着趔趄。越野车的后备箱不是独立的，打开后备箱就是放倒的后排座位。牧民把羊抱下来，用提前准备好的绳子将其拴在车轮上。德站长和达央将抽完的烟屁股弹掉之后就把羊四肢朝上放倒在地，检查尿道。牧民早上来之前给德站长打过电话，说他们家有只羊没有排尿已经两天了，在家的时候一直躺在羊圈里，虽然吃喝正常但牧民还是有些担忧。德站长和达央摸了一下尿道，发现尿道里有结石。羊的尿道非常的细，现在牧民喂给羊群的合成饲料大多是由几种营养物质压缩而成的，因此有时候羊无法消化，而那些没有消化好的高蛋白饲料就容易变成结石堵住尿道。达央手上没带手套，蹲在地上将尿道翻了几下，从里面翻出了两颗米粒大小的白色结石。这期间羊没有发出任何叫声，只是抽搐了几下。拿出结石之后，羊站起来了，两个兽医和它的主人就在旁等着羊排出尿来。但是等了半个多钟头，羊仍然没有排尿的迹象，主人也着急回家，就把羊抱上车，并在羊身下底铺了一层塑胶布。人们寒暄完，主人要开车回去的时候发现那只病羊尿在车里了。两个兽医开玩笑，“这家羊跟主人一样懂事啊，不在别人家院子里尿”。达央趴在车窗上看了一眼，发现羊尿已经流到车里到处都是了。但羊主人似乎并不在乎，他说，“这辆车也都是用它们换来的，车的主人其实是它们，我这个车经常驮着羊到处跑，羊在里面拉屎撒尿一点都不心疼”。

牧民边说边从外套内兜里掏钱，准备付给德站长和达央。他们二人正在抽牧民递上来的第二根烟，果断地摆手拒绝了诊疗费。牧民笑着地与他们道别后便匆匆地开着驮羊的车离开了动检站。

[1]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97-403 页。

[2] 即由网围栏围成的草场。

[3] 蒙古语“baixing”，当地人普遍用来指称所住的房屋，而最为准确的所指应该是由木梁作顶的旧式房屋。

[4] 蒙古兽医所讲的“火”与“上火”不同，是一种发热症状，也指发炎后的体热症，蒙古兽医称其为“热希拉病”，需要“败”火消炎。

[5] 蒙古语，意为“肥膘、肥满度、膘情”。现代蒙古语中“泰味尔”也有体育训练、身体锻炼等意义，如跑步、到健身房运动都可以被涵括在“做泰味尔”的语境中。

[6] 蒙古语，意为“力、气力、气脉”。

[7] 蒙古语，意为畜圈里长期被牲畜踩实了的混合着粪便的沙土。

[8] 抓膘，即增强畜群的塔日固。

[9] 蒙古语：俄布勒金萨日，即阴历腊月。

[10] 蒙古语：珠日嘎萨日，即阴历三月。

[11] 《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10：第 103 页。

[12] 蒙古语，amur；是鄂尔多斯市和一部分内蒙古西部旗县牧民相互打招呼时的常用语，原意为：平安、太平。

[13] 阖割过的公羊，牧民出栏售卖过后留下几只羯羊，作为冬季储肉以及秋季“喝新汤”（蒙古语：xine shulu）时要宰杀的羊。

[14] 沙丘脊和坡处茂密的灌木丛被牧民称为巴拉尔。巴拉尔（balar）意为蒙昧、洪荒、混沌，一般用来形容不具有明确形式的时间和空间。而对于早期 A 嘎查牧民来说，沙丘缓坡处的巴拉尔是上好的冬季牧场，茂密的巴拉尔不仅可以为畜群提供充足的食物，而且可以充当天然的“保暖棚圈”。

[15] 蒙古语：hamagv ebedcin。

[16] 艾蒿是一种菊科植物，喜好潮湿的土壤，一般生长在山脚、缓坡或者是平坦的草地上，它的根茎和叶子有一股特殊的香气。

[17] 蒙古语：hilgasun hvrhai。

[18] 蒙古语：utagana、khuimeli。

[19] 蒙古语：narin utagana。

[20] 干旱年份里，由人工挖掘使浅层地下水渗出而形成的水泡子。

[21] 鄂尔多斯蒙古语口语中，浩特指畜群及其所休憩的棚圈、栏舍，当说“你们家的浩特”时，是在指代“你们家的畜群”。而在内蒙古中部牧区，浩特指由两到四户组成的基本畜牧（游牧）组织，是用于指代共同居住于某处草场的牧户。

[22] 草地载畜量的测定、计算方法很多。中国常用牧草产量计算法，即用草地净面积、牧草产量、草地利用率、家畜日食量和放牧时间进行计算。将某一地域范围内的暖季草地、冷季草地、春秋季草地的载畜量相加，即为该地域内草地的总载畜量。来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网站。

文内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在場

在場奖学金由 Matters 写作平台及文艺复兴基金会共同出资设立，目标是资助非虚构写作者完成有潜力的短期计划，题材包括但不限于观察纪实、调查报导、田野研究，唯需书写记录内容 100% 真实，文中事实引述或描述，需注明来源。“在場”奖学金每个季度开展一次，一年共四次，致力于持续培育、支持华文世界的非虚构写作。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Pavel Neznanov](#) on Unsplash

非虚构 洋葱纸 盖尔·贝克尔曼 | 小鸟文摘

1922 年 12 月 30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斯大林 1953 年去世后的那几年，苏联舒了一口气。这段所谓的“解冻期”，在长年无处不在的恐惧和谋杀之后，带来些许开放。这些许的开放塑造了一位有志青年、诗人纳塔莉亚·戈尔波涅夫斯卡娅（Natalya Gorbanevskaya）。1956 年，新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发表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压迫统治的“秘密报告”。新的思想、新的形状和色彩顺势而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展出毕加索的画作，戈尔波涅夫斯卡娅（人人都叫她“娜塔莎”）也和大学的朋友跑去看展。

但对知识界来说，这个令人眩晕的时刻也带来一系列新的并发症。就在立体主义进入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前几个月，苏联的坦克野蛮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试探自由的极限意味着可能被送进西伯利亚的古拉格，或被拖到监狱地下室枪毙。可现在，你能试探到什么程度？政权的逆鳞在哪里？你能批判到什么程度，确切来说，你能批判什么？什么艺术是允许的？哪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是可以大声说的？

地下出版物（Samizdat, самиздат）就是这些问题的试验场。这个词由“自己”（сам）和“出版”（издательство）缩合而成，通常是打字稿形式。从各方面来看，地下出版物都是解冻时期的独特产物。政权严格控制所有出版方式，甚至要求每一台打字机都要登记，确保每一个打印出来的字都可溯源。地下出版物是知识界的应对方式。在洋葱纸上创作（有时会同时打出 10 到 15 张），然后手手相传，异议人士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立和维持对极权主义政权的反对。他们写下自己见证的一切，汇编政权侵犯人权与公民权行为的清单。他们写关于应该做什么，反驳观点的文章。来自西方的著作，也以这样的形式被翻译过来，传播出去。

围绕这种写作形成一个日渐紧密的网络。搞地下出版是危险的（通常，被抓到的人会被送到遥远的东方），但这只会让异议人士更加投入。在 1960 年代初之前，只有通过地下出版物，才能读到无法通过苏联官方审查的小说、诗歌、政论和回忆录。地下写作很快成为最有趣的写作，从一个人手里非法地传到另一个人手里，颇有几分禁果的味道。（当时的一个著名笑话是这么说的，一位母亲说，她女儿不想读《战争与和平》，于是她把书重新打印成地下出版物再给她女儿，后者一把抢过去，仔细读完每个字。）

对从小写诗的娜塔莎来说，解冻时期让她觉得可以更加公开表达自己，但让人们读到自己作品的方式依然有限。她最早的诗作发表在大学的墙报（校园里张贴的、供人们站着阅读的大字报）上，当时是 1950 年代末，她在莫斯科大学读语言学。其他学生因为她忧郁、失恋的伤感，攻击她是“颓废的悲观主义者”。她也因此得知，在苏联，诗可以多危险。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娜塔莎的一些朋友因为自己的诗被逮捕，她本人也被拘留，在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不久之前，这里的囚犯还会被拖到地下室枪毙）待了一段时间。在克格勃（KGB）的压力下，她揭发了创作刊载违禁诗

作小册子的一切。当时 21 岁的她还以为自己是好公民，是青年先锋队，苏联共青团（Komsomol）的一员。但之后，她懊悔不已，一直没法原谅自己背叛朋友的行为。获释后，她恢复写作生活，现在，她主要写地下出版物。起初，她手抄自己的诗，分享给朋友。但在为写论文花 45 卢布买了一台旧奥林匹亚打字机后，她开始把自己的诗打出来。她用复写纸打印，一次可以打出四份。她把同一份诗集打了四遍，“出版”了第一本印数为 32 册的地下出版物。然后，她这些关于异化和孤独的诗作，随着读者自行复制传播出去。在 1964 年“出版”的第一本地下出版物的一首诗中，她写道，“我像飞机盘旋一样进入我的存在”，那一一年，她开始汇编每年的“出版”目录。在另一首诗中，她“不是火焰，不是蜡烛，而是一束光，是潮湿、杂乱草丛中的一只萤火虫”。地下出版物逐渐把娜塔莎吸引进一个异见人士的共同体。1960 年代初，她帮忙组织了两个地下出版的诗歌杂志——《句法》（Syntax）和《凤凰》（Phoenix），触怒当局，其编辑被逮捕，被控犯罪，送进监狱。娜塔莎没有停止写作。1962 年，她在一个朋友的引荐下，见了本国异见诗人的教母——安娜·阿赫玛托娃。当时，围绕阿赫玛托娃形成的青年诗人圈子也包括约瑟夫·布罗茨基，后者不久后因为所谓“色情和反苏”诗作被谴责和审判。70 岁的阿赫玛托娃高贵、不妥协的姿态给娜塔莎留下深刻印象，她下定决心要做一位诗人，迎接随之而来的一切困难。

如果说，一开始地下出版物对她来说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这时的娜塔莎也开始看到地下出版物的联合作用：它把当时日益受到攻击的异见艺术家和作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它把他们融合到一起，在文化的常规渠道都关闭的情况下，地下出版物提供了一种通货。但是，直到允许微弱光线照亮他们创作生活的那道隙缝开始闭合时，地下出版物的另一个作用才变得明朗起来。它给了他们不断高涨的反对一个清晰目标，帮助他们日复一日地冲击同一个不可撼动的国家势力。

*

对娜塔莎和她的朋友们来说，解冻期在 1965 年 9 月，安德烈·西尼阿夫斯基和尤里·丹尼尔被捕那天就结束了。这两位都是受人尊重的成名作家。以前，当局几乎总是通过捏造或栽赃的方式，起诉地下出版物的传播者。但这一次，西尼阿夫斯基和丹尼尔是因言获罪。当局依照新的刑法第 70 条起诉他们，该法律规定“反苏宣传和煽动”非法，应处以徒刑。

1965 年 12 月 5 日，庆祝苏维埃宪法法定假日那天，异见人士在莫斯科中心的普希金广场聚众抗议，考虑到斯大林去世才十几年，这是一个骇人景象。抗议者展开的旗帜表明他们的策略：不是呼吁革命或推翻政权，只是要求苏维埃政权遵守自己的法律——被写进国家指导宪章的公民权与人权原则。他们呼吁“尊重宪法，苏联的基本法”，强调“我们要求公开对西尼阿夫斯基和丹尼尔的审判”。几个月后，西尼阿夫斯基和丹尼尔分别被判 7 年和 5 年徒刑，被送进臭名昭著的莫尔多维亚劳改营。诗仅仅因为主题不够欢快就被视为反动的日子过去了。如今，他们正在和政权开战，而他们唯一真实的武器，是洋葱纸。

1968 年 2 月，娜塔莎亮出自己在这场战斗中的身份，她在一封写给当时治理国家、指导镇压的三巨头（尼古拉·波德戈尔内、阿列克谢·柯西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信上署了名。这封信要求按法律规定公开审判她因生产地下出版物被捕的朋友——西尼阿夫斯基和丹尼尔。“除非这种专横行为受到谴责，否则没人会觉得安全。”娜塔莎知道，她在冒巨大风险，在把自己置于特别容易受到迫害的境地。

她与母亲、儿子亚西克一起住在一间吵闹、昏暗公共公寓的单元房，共用卫生间和厨房。1943 年，娜塔莎的父亲在前线阵亡，她在单亲家庭长大。现在，她也决定自己抚养孩子，当然，是在母亲的帮助下。这个决定自愿，却也不寻常。娜塔莎浑身透露着古怪。在 1968 年的一张照片中，32 岁的她穿着宽松裤子、不成形的深色针织毛衣和网球鞋。蓬乱的头发垂到下巴，脸上带着一幅巨大的猫眼眼镜。当时她又怀孕了，再一次，孩子的父亲没有参与进来。

在寄出抗议信两天后，她觉得政权以最奇怪、最令人不安的方式扇了她一巴掌。孕期还剩最后三个月时，有一天，她醒来时感到身体不适。她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出问题，于是到一家妇产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贫血。就像在恐怖故事中那样，入院后，她不被允许出院。在她成功夹带出来的一系列笔记中，她实时描述这场磨难。“为什么他们要把我关在这里？”她写道，“在每次听到‘明天再说’后，我都会像空麻袋一样崩溃。”几天后，一位精神科医生对她进行检查，认为她坚持出院是精神分裂的症状。然后，在被强行脱衣搜查后，她被塞进救护车，送到莫斯科著名的卡申科精神病院。这就是克格勃惩罚她的方式。她被送到这里而非监狱，只是因为在怀孕。她试着坚强。在最后的笔记中，她写道，“如果他们真想吓我，让我失去理智，给我留下创伤，那么，他们没有成功。我相当平静地等待我的孩子出生，我的怀孕和他的出生都不会妨碍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参加每一次反对一切暴政行为的抗议。将近两周后，院方突然不加解释地送她回家。

获释后，再次与朋友团聚的那些日子里（她依然有孕在身），她开始想象进一步发挥地下出版物的作用，拓展它的记录功能，创造一个中心场所，汇总苏联施行的不义详细清单。现在，娜塔莎有的是时间。她的预产期很快就到了，她因假停在了在莫斯科实验设计和技术研究学院的翻译工作。在异见人士中，还有其他更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认为汇总和重新打印的工作过于琐碎。不过，娜塔莎不怕工作，她有编辑的本事，打字速度也快。她渴望做点什么。于是，1968 年春天，娜塔莎把一页复写纸塞进她的奥林匹亚打字机，开始打字。打字之前，她花钱在黑市请人换了打字机的按键，以免当局把她的政治地下出版物和诗歌地下出版物联系起来。

*

在第 1 期的顶部，娜塔莎给刊物起了一个半讽刺半认真的刊名，《苏联人权年》。20 年前，苏联签署《世界人权宣言》（但在苏联，确切来说，人们并不会纪念这件事）。为安全起见，她还把《宣言》的第 19 条当作序言给加了进去：“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不受干涉的自由，通过任

何媒介和国界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后来保留的刊名是她原本用作副标题的那个，即仿照 BBC 俄语新闻综述节目起的《时事纪事》（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这个刊物后来被简称为《纪事》（Chronicle）。

娜塔莎和她的朋友用《纪事》卸下她们承受所有伤害的重负。起初，《纪事》描述的所有事件都和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小圈子有关，打头的，就是他们中那四个因为制作地下出版物而被起诉的人的审判记录。甚至娜塔莎最近遭遇的磨难，也被写进了去：“2月15日，在没有事先警告、亲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戈尔波涅夫斯卡娅被人从27号妇产诊所（之前院方以可能流产为由把她关在这里）转移到卡申科医院的27号病房。”

4月末时，她完成《纪事》的第一期，并把发行时间定为1968年4月30日。《纪事》共20页，排版很密，一共打了7份。其中6份在朋友间传阅，以便读者自行重打，1份给了以为西方记者。包含形成这一期《纪事》所有信息的潦草笔记则被立即焚毁。后来，在打印《纪事》上出力最多的异见人士之一的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如此描述它的风格：“它不提供任何评论，不写漂亮文字，也不说花哨语言，只提供基本信息。”娜塔莎觉得，不加修饰像是一种创作。娜塔莎觉得，不加修饰地记录像是一种创作。娜塔莎常说，在她看来，写诗和呼吸一样自然而必要。但和写诗的体验不同，这种创作是一种对情感的有意雕琢。它以不同的方式让人满足，使人更加专注。

第2期时，娜塔莎开始创新，给刊物增加更多栏目，其中最重要的“新闻简报”（News in Brief），有点像是各种侵权行为、各种案件和囚犯的最新情况汇总。比如说，第2期的第1条内容是：“在莫尔多维亚的第11营，瓦迪姆·加恩科被车床切掉一根手指。来自列宁格勒的加恩科，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70条和第72条，因为参与非法马克思主义圈子，发行《钟声》（Bell）期刊而在那里服刑4年。”她还加了一个“法外政治压迫”（extrajudicial political repression）的长清单，上面列出91个因为签署抗议信或教授非法书籍，被工作单位或党开除的人的名字。

大多数材料来自朋友，他们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写在纸条上或用脑子记下来，然后告诉娜塔莎，后者的编辑身份已是公开秘密。随着第2期“出版”，娜塔莎也走出城市中心。《纪事》的第2期刊发了一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来信，信中描述了斯大林时代强行、野蛮的驱逐。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土地，留下挥之不去的精神痛苦。《纪事》要令人信服地起到受害苏联公民的案情摘要作用，要聚焦于异见，就不能只关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知识界关心的问题。

8月21日，苏联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娜塔莎还在为匈牙利革命后出卖自己的朋友感到愧疚。这是她自我救赎的机会。她必须声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该国新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自由化举措。

娜塔莎和她的一群朋友（包括帕维尔·利维诺夫、被监禁的作家尤里·丹尼尔的妻子拉里莎·波哥拉兹）决定在红场静坐抗议。从未有人尝试在这个离列宁木乃伊化的遗体仅一步之遥、本质上神圣的地方，如此公然地表达异见。在为抗议准备时，她们制作了一些捷克国旗和写有像“为了你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For Your Freedom and Ours）那样口号的横幅，然后娜塔莎把这些国旗和横幅折起来，塞到她三个月大的儿子的婴儿车垫子下面。

就在8月25日正午约定的时间前，娜塔莎推着熟睡的婴儿奥西亚走向红场，她还在儿子的脚边多备了一条布尿布和裤子。她们在罗波诺耶梅斯托平台会合，这是圣巴西尔大教堂前像舞台一样升起的圆形石台，据说伊凡雷帝曾在这里砍犯人的头。正午钟声敲响时，七个朋友拿出横幅和旗帜，沉默地坐在热闹的广场中央。没过几分钟，她们就被抓了起来。

克格勃为激怒路人（路人大对他们的行为感到迷惑），组织一群人对抗议者大喊，“他们都是犹太人！”、“打死反苏佬！”。同时，克格勃的座驾黑色伏尔加汽车快速开进广场，警察跳出来，粗暴地把抗议者从地上拉起来，塞进车里。娜塔莎因为还在哺育婴儿，几乎立即被释放。

几天后，她写了一封信，发表在《纽约时报》等出版物。作为唯一“尚还自由”的参与者，娜塔莎描述了红场上发生的事，表达自豪之情，就像她写的那样，“我们成功——哪怕是短暂地——冲破肆无忌惮的谎言和懦弱沉默的淤泥，证明并非我国所有公民都认可以苏联人民名义施行暴力。”但随着她最亲密的合作者利维诺夫和波哥拉兹被关进监狱，不久之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娜塔莎感到越来越孤独。不过，在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的情况下，娜塔莎还是再次投入地下出版物的工作。



《纪事》

*

1968年底，《纪事》成为苏联的一个固定节目，一个定期“出版”的地下出版物，持续、极为详细地诉说着压迫故事。娜塔莎不认为《纪事》是非法事业。它的整个运作模式都是透明的——用俄语来说，是“开放的”（гласность, glasnost）——为警醒的公民揭露苏联的内部运作。列宁本人在革命前办的宣传机关报，在国外印刷，然后偷运到沙皇俄国，在本土需要隐藏起来保持低调的《火星报》，本身就包含地

下报刊概念的一大原型。驱动《纪事》的是另一种冲动，不是要建立一支影子革命军，而是要逐一曝光苏联政权的侵权行为，揭露其压迫性。娜塔莎和她的作家同伴们想打破那种苏联特有的，有两个自我的感觉：一个在私下里低声说真话，另一个则经常被要求大声否认现实。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到1969年都还在接力打印《纪事》，为《纪事》提供她从自己在乌克兰的联系人那里获取的信息。她把《纪事》的工作描述为“忠于真相”。

《纪事》要求娜塔莎做出的牺牲越来越大，但这也是因为，它变得更重要了。在一名政治犯的母亲探望儿子后，刚下火车就跑来和她秘密会面，好把自己得知的一切告诉她时，她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点。娜塔莎会记下在劳改营里，谁的食物配给被克扣了，谁最近在搬运木材时受了伤，谁生病了却没得到医疗护理。这一切都会被收入下一期的“劳改营”（from the camps）新闻部分。

《纪事》的读者每增加一位，娜塔莎本人被捕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在出了10期后，克格勃和它的头头尤里·安德罗波夫提高了该刊物的威胁评级。然后还有BBC和美国之音的问题，它们会整期播放《纪事》的内容。在这些电台看来，这个刊物的报道是可靠的新闻来源，其内容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呈现的波将金天堂（译注，指刻意搭建、自欺欺人的政治门面工程）形成鲜明对比。当局干扰了这些电台的频段，使之无法向苏联境内播送节目，但机智的苏联公民还是能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它们。1969年10月底，公寓遭到搜查后，娜塔莎知道，必须把编辑工作交给别人，而且，动作要快。但还没等她处理掉所有可能留下把柄的材料，12月，克格勃又来敲门了，这次是为了逮捕她。她有一个塞满手写笔记的信封放在桌子中间的抽屉里没处理，还有几页皱巴巴的纸塞在挂在门边的大衣口袋里。克格勃咬住笔迹不放，试图追踪提供信息的人。她看着特工们把书抖开，用拳头敲打地板和墙壁寻找夹层，把垫子剪开，从抽屉里倒出她的厨房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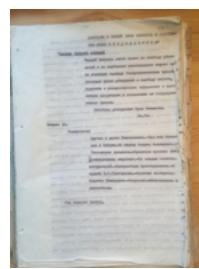
搜查结束时，特工们收集到一沓一英尺厚的纸和几十本书。直到这时，他们才告诉娜塔莎，她被捕了。搜查期间，有三个朋友来访。她仍然担心留下可被当作把柄的纸张，不确定克格勃有没有发现。在被带走前，她小声对朋友说，“去翻翻桌子”。出门前，她抓起一件薄外套，把那件口袋里可能还装着废纸的大衣留了下来。虽然她一走到外面，脸上就感受到了12月的痛苦寒意。接着，她被塞进那辆在门口等待的黑色伏尔加汽车。

克格勃官员把她带到布蒂尔卡监狱，在那里，依照刑法第190-1条，她被指控诽谤苏联体制。次年4月，在监狱里待了3个月后，她又被送进塞布斯基研究所，她担心的事情又发生了。在那里，一个精神病专家委员会对她进行检查。因随意诊断异见人士患有“迟缓性精神分裂症”（一种苏联医生新发明的精神疾病）而臭名昭著的丹尼尔·伦茨教授也在其中。在检查结果中，伦茨认为，娜塔莎也患上这种“缓慢发作”的精神分裂症。

7月7日，当局对娜塔莎进行缺席审判（精神病人一般不被允许出庭）。娜塔莎的母亲获准在证人席上发言。她哭泣着，疲惫不堪地提出一个请求：“如果我的女儿犯了罪，给她判多重的刑都可以，但不要把一个绝对健康的人放进精神病院。”辩方律师唯一的论点是，《纪事》是完全匿名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娜塔莎或任何人和该刊物的创作与传播有关。

法庭立刻做出判决，认定娜塔莎有罪，但因“精神不健全”，她将被安置到一家“特殊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治疗”期限不定。

随后几个月里，娜塔莎被安置在布蒂尔卡监狱的医院侧翼，等待被移交至她最终的监禁场所——喀山的特殊精神病院。她知道会发生什么：仅在一年前，在《纪事》的第10期上，她就汇编过一个关于该机构的报告，像之前的囚犯告诉她的那样，不加修饰地列举它的恐怖：“如果病人有违抗行为——拒绝服药、与医生争执或打架——他们就会被绑在床上三天，有时还会更久。在这种形式的惩罚下，基本的卫生规则也遭到无视：院方不允许病人去上厕所，也不给他们提供便盆。”



《纪事》记录了纳塔莉亚的审判

此时，她想起她曾为自己的朋友尤里·加兰斯科夫写的一首诗。1966年，加兰斯科夫同样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被下药。那首诗是这样写的：“在病人院里／挥手，／把你苍白的额头贴在墙上／像一张脸没入雪堆。”在喀山，贴在墙上消失的将是她的脸。人权记者现在反过来成了被报道的人，成了《纪事》第18期记录的一条新闻：“1971年1月9日，纳塔莉亚·戈尔波涅夫斯卡娅从布蒂尔卡监狱被移送至喀山谢切诺夫街的特殊精神病院（邮政地址：喀山-82，UE邮箱，6街区，148幢），那里的医生为她开了一个氟哌丁苯疗程。”

*

娜塔莎在喀山被关了一年多，后于1972年2月获释。三年后，1975年，她永远离开苏联，搬到巴黎，在那里度过余生。

不过，《纪事》还在继续。新的编辑前仆后继，直到1980年代初，严厉的镇压终于

扼杀这个刊物。然而，甚至在它脆弱的纸页不再流通之后，《纪事》的使命仍在延续：短短几年内，异见人士对“开放”的不懈关注，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所说的“公开进行的正义或治理过程”，将成为苏联新总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标志性政策，后者认为自己除贯彻这一朝透明方向的努力外，别无选择。

长期以来，《纪事》一直在汇总和集中异见人士的努力。该刊是整个过程的载体。在压迫环境禁止讨论和自由思考的情况下，他们从地下出版物建构出一个影子公民社会，使这些活动成为可能。通过干脆、朴素的语言，《纪事》对真相的坚持使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谎言。最终，事实证明，那不可否认的逻辑比超级大国更伟大：很快，它破坏了极权主义政权，使之内爆。

多年后，2013年，纳塔莉亚·戈尔波涅夫斯卡娅又回到莫斯科。这时她77岁，而在俄罗斯，普京的统治也超过10年。她来访的目的是和以前共事的异见人士一起，在红场重现1968年抗议，纪念其45周年。娜塔莎和九个朋友站在罗波诺耶梅斯托平台上的同一个位置，展开写着同一个口号“为了你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的横幅。他们立刻被警察逮捕。几个月后，娜塔莎于巴黎逝世。

本文改编自作者新书《平静之前：激进思想的意外起源》（*The Quiet Before: On the Unexpected Origins of Radical Ideas*）的一章，由美国皇冠（Crown）出版社于2022年2月15日出版。



盖尔·贝克尔曼

《大西洋月刊》图书版高级编辑、哥伦比亚大学媒体研究博士，著有《当他们来找我们时，我们会离开》（*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 2010）、《平静之前》（*The Quiet Before*, 2022）。此前，他是《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和作者。

译者：王立秋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原文来自 Gal Beckerman, “How Samizdat Chronicled 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13, 2022. 经《纽约书评》授权翻译，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pyright © 2022 Gal Beckerman.

小鸟文摘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非虚构 若有人兮山之阿

赵越胜 | 发现经典

如有美玉，日月孕育，山川滋养，
逾百千年而成，要毁灭亦不过一击。

上篇

建英兄如晤：

今年是肖邦诞辰二百周年，音乐界的“肖邦年”。我会去拉雪兹神父公墓肖邦墓前，为你，当然也为我们这些热爱肖邦的人献上一束鲜花。这些日子，法国古典音乐台从早到晚播送肖邦的音乐。昨天播放亚历山大·达武演奏升 c 小调夜曲，主持人介绍说达武的演奏极富诗意，一下引我想起一个人。五、六十年代，在我们故土，也有这么一位钢琴家，曾被称作“演奏肖邦的钢琴诗人”。她就是顾圣婴，你哥哥那一茬儿钢琴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还记得那年你来巴黎，在我家看过周广仁先生为她编的一册纪念集吗？这部书我反复读了几遍，当时我对你说你要为顾圣婴写点什么。今天你又偏偏提到她演奏过得彪西的《快乐岛》，勾起我心中隐痛。那就请耐心听我讲下去吧。

据顾育豹先生记载，1967 年 2 月 1 日，愚园路 749 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付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担架上的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人们认出那个年轻的女性是顾圣婴。她面容惨白，头发塌在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未存。另外两个死者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

就在头天下午，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先生在淮海路上见到顾，神色凄惶地蹒跚而行。李先生觉得她人全变了。李先生不知道，对顾圣婴的批判侮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而今天下午，在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厅中，她被勒令跪下认罪，随后一条精壮汉子扑上来，狠狠抽了她一记耳光。或许就是这一击促使顾圣婴下定必死的决心。顾圣婴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女子，资若兰芷，形如弱柳，自幼献身音乐，只在旋律与和声中生活。待人友善坦诚，工作兢兢业业，从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冲突，甚至努力向之靠拢。曾代表政府出国比赛，也有不俗的成绩，算是“为国争光”的人。却以二十九岁灿烂年华，与慈母爱弟毅然同殉，阖家玉碎，满门灭绝。岂惨烈二字所能尽言？以赤县之广，竟无一隅容顾圣婴藏身，以国人之稠，竟无只手援顾圣婴逃生。

在五、六十年代的钢琴家中，顾圣婴的教育背景有些特殊。她身出江南名门，其远祖可溯至东吴名相顾雍。史载顾曾受教于蔡邕，以善操琴、通音律著称于时。顾家书香门第，父亲顾高地先生博学儒雅之人，常抱幼小的圣婴入怀，指读家中壁上所悬字画，而小圣婴竟能听音辩字。这份对音韵的敏感似得真传于蔡伯喈，他曾辩灼木之声而制琴“焦尾”。顾家与傅雷先生系通家之好。傅先生曾辑古籍文献中百余篇适合儿童教育的文字，手抄为册，送圣婴阅读。这些立志扬节、主旨高远的文字，虽不同于当时显学，却熏陶了圣婴质若幽兰的心怀。

顾圣婴五岁开始学琴，她的启蒙老师住在江湾。每次上课，顾高地先生便领着圣婴坐上

叮咚作响的有轨电车，下车后再牵上小圣婴的手沿淞沪铁路缓行至老师家。随着顾圣婴音乐天才的迅速展露，她先后从杨嘉仁、李嘉禄先生学习钢琴，从马革顺先生学习音乐理论。1954 年，年仅十七岁的顾圣婴便被录取为上海交响乐团的独奏演员，她与乐团合作演奏的肖邦《f 小调钢琴协奏曲》好评如潮。至此，她可谓一帆风顺。然而，一块乌云飞至她的头顶，并笼罩了她短暂的一生。

1955 年 8 月 29 日，顾圣婴挚爱的父亲，她的音乐生涯的引路人顾高地先生，在家中，当着顾圣婴的面被逮捕了。原来顾先生在上海任职国际问题研究所时，帮助过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而潘又因与日伪情报机关有染而吃上官司。顾先生一心报国却命运多舛，陷入这深不见底的黑暗。据顾老先生回忆：“这天外飞来的横祸，把我们全家都吓呆了，……我对女儿圣婴说，你要好好练琴……爱国家，爱人民”。当时女儿沉坐在椅子上，一听完我的话，她站了起来，神情忧郁而悲愤地望着我，圣婴说‘爸爸，我爱国家，也爱爸爸’。可以想象，顾先生有警察挟持，不得不大言掩饰。而圣婴在此决绝时刻，全然不循当时通行的‘划清界限’的老套，而直言‘我也爱爸爸’，这鸣若金石的几个字，在当时的情形下，何止千钧。我以为，正是这几个字背后蕴藏的心灵力量，让顾先生能挺过二十多年的劳改营生活，但也正是这种力量，促使顾圣婴下定‘伏清白以死直’的决心。

囚车载走了顾先生。高墙之后，顾先生最掂念的是女儿四天之后的音乐会，她要演奏肖邦的《f 小调钢琴协奏曲》。顾圣婴那单纯、纤细的心可能承此大变？她还能从容演奏这份量不轻的曲子吗？这个疑问顾老先生竟存心中二十二年，直到 77 年从劳改营回到上海，李嘉禄先生才告他，顾圣婴的演出非常成功。顾先生自己解释道“圣婴能冷静对待事物，控制个人感情，是她出于对音乐的爱”。但顾先生为何不反过来想一下，正因为圣婴把个人感情，把对您的爱倾注在演奏上，她才可能成功吗？我几乎要感谢神的慈爱，让圣婴演奏这支曲子，使她可以借肖邦的音乐恸哭，宣泄她的失父之痛。

乐曲的第二乐章“小广板”，是肖邦倾注了挚爱的乐章。钢琴进入后，左手下键第一个音，直是一声深叹。人随之便卷入情感倾诉的波澜。颤抖的心灵，化为右手奏出的连续长颤音加琶音。二十五节开始，右手轻柔上行，连续颤音后又悲歌般缓缓下行，直至左手让呻吟化为呼喊。中段主题再现后，乐队烘托着缠绵的低诉，提琴齐奏，抖弓揉弦声中，定音鼓隐隐轰响。在肖邦标示 appassionato 处，钢琴昂然唱起。整个乐段，描画孤帆挣扎于滚雷怒涛之间。紧接着令人心碎的 dolciss，便是 abandono，借右手连续的八度和声跑动，演奏者有多少希望不能祈求？若非肖邦精魂之助，顾圣婴心中苦痛又凭谁诉？

后来，顾圣婴的成长要感谢她身边那些爱才的善良师长。经丁善德先生推荐，在洪士娃先生帮助下，顾圣婴北上师从苏联专家塔图良和克拉芙琴柯，开始了一段颇有收获的学习历程。56 年，她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获得金奖。58 年，又在柯拉芙琴柯指导下，参加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获得最高奖，与她并列获奖的，就是你最喜欢的 Pollini。而很少有人提及，前一年这个比赛的桂冠，戴在了阿格里齐头上。无疑，顾圣婴已跻身世界最有前途的新星之列。但她赴莫斯科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却铩羽而归。倪洪进先生回忆，在莫斯科准备比赛时，一天她和顾圣婴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小卖部吃早餐。顾收到一封信，读后便哭了。后来倪先生知道，顾圣婴从信中得知，她父亲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发青海劳改。顾因此情绪极度波动。倪先生说“试想，背上这样沉重的包袱，又如何能对付一场重大的国际比赛？”这“情绪的极度波动”，在殷承宗先生的回忆中得到证实。殷先生说“她这次比赛失利，主要是家庭不幸，她在莫斯科准备时，曾哭晕过”。

不难想象，自顾高地先生 55 年夏被捕，至 58 年被冤判，这三年间，顾圣婴每日心中怀着怎样的希望，但这希望终于破灭了。我以为，自此，顾圣婴的心灵生活和精神世界就变成双重的。她在心灵深处留一块净土，珍藏她的财富，这些财富只展现在她的演奏中，她只通过大师们的音符，特别是肖邦的“蓝色音符”(Note bleue) 诉说自己。顾圣婴的挚友刁蓓华先生说“我们平时与圣婴相处，总觉得她有心事，心里很矛盾，有话无法吐露出来”。刘诗昆先生也察觉到顾圣婴有苦难言的心境，他回忆道“我经常在她的琴声中感受到她的忧郁。我几次问她，顾圣婴，你是不是感觉很不开心？她总是对我忧郁地微微一笑，说‘我有什么开心的呢？’”人说“愤怒出诗人”，却不知忧郁更出诗人。顾圣婴演奏肖邦时那种忧伤是学不来的，它是静静流淌在自己心间的幽泉，呜咽鸣溅，只有自家心知。她在肖邦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我手中有顾圣婴演奏的两张 CD，其中一张是肖邦的作品。CD 上没有标明是哪一年的录音，但从所见材料推测，应该是六十年代早期的演奏录音。质量不太好，显然会丢失很多细节，但从中已能大致了解顾圣婴的天赋和达到的水平。她的师友们都盛赞顾圣婴的手指技巧。多年之后，好几位先生仍能回忆起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顾圣婴演奏的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中的谐谑曲。这支拉赫马尼诺夫改编的曲子，是考验密集音群手指快速跑动的经典。洪士娃先生说“顾圣婴弹得流利轻巧，犹如微风掠过树叶”。倪洪进先生竟从中感到“一种近似仙气的东西”。在这张唱片上，我们可以听到有类似技术特点的曲目，如前奏曲 Op 28 之 8 升 f 小调、之 24 d 小调，练习曲 Op 10 之 8 F 大调、之 4 升 c 小调。确实，顾圣婴的跑键技巧无可挑剔。但这并非最重要的。手指的灵巧与触键跑动的颗粒性可以通过苦练车尔尼做到，但要在快速跑动中表达诗意，表达出密集音列的色彩和亮度的明暗对比，却非心中有诗不可。

以索罗甫·卡夫称之为“短小史诗”的第 24 号 d 小调前奏曲为例，顾圣婴 2 分 28 秒的演奏充分显示了她既有控制密集音群快速跑动的高超技巧，又有表现作品悲剧性内涵的心力。跑动时风驰电掣，云飞浪卷，轻奏时如闪现蓝天一线，尽管稍纵即逝，也绝不含混放过。手指能放松到列文所说的那种“漂浮状态”，却不失弹性，乐句流畅贯通，如珠滚玉盘，一气呵成。全曲织体表达清晰，情绪跌宕起伏却不夸张，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精彩演奏。做到了乔治·桑所论“这些优雅而悲哀的音乐，在陶醉你耳朵的同时，破碎你的心”。同样，奏鸣曲 Op 58 第四乐章那些十六分音符的疾速行进，在左右手交替跑动中，顾圣婴始终保持弦律线连绵不断，如疾风掠草，风劲草伏，风缓草起，从容大气。完全不是奇夫劳那种炫技式的跑动，而是韵味十足，似乎每个音都有自己的性格。

顾圣婴在匈牙利演奏后，一个乐评人写道：“她演奏肖邦的作品，带有女性特有的细致缠绵，哀怨凄沉的情致，然而有时也强韧有力，显示着光明和希望”，可谓抓住了顾圣婴演奏的另一个特征：内在的深沉与韧性。一旦作品需要英雄气概，她能一扫柔弱，展示男性的悲哀与豪迈。这在她演奏的 Op 25 之 7 升 c 小调练习曲中有充分的表现。这支曲子是

肖邦匠心独运的作品，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泽林斯基甚至认为“这首练习曲从巴洛克的雄辩风格过渡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哦，朋友’宣叙调的回忆，再到极其庄严肃穆的挽歌般悲哀的和弦”。要想完美诠释它，不在技术，而在音乐。我以为它充分体现了肖邦音乐的核心特质——zal。

什么是zal？这个几乎找不到准确对译的波兰词，对肖邦是如此重要，以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当我思考我自己，我感觉到意识留给我的往往是zal”。从肖邦、李斯特、涅高兹等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试着把zal体会为一颗高贵的心灵，在野蛮强力的欺凌侮辱下，那种痛彻肺腑的耻辱感。他痛恨这种专横，渴望复仇，又明知反抗的结果必是毁灭，这种无力感使他更觉屈辱。zal就是这双重耻辱下的绝望与悲哀，同时又饱含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悲悯。看看波兰民族屡遭强权瓜分，沦为奴隶的历史，肖邦这种心理大致可以体会。如果要找一个形象来说明，我想举出《伊利亚特》第二十四卷为例，当老英雄普里亚摩斯向杀死儿子赫克托尔的阿基琉斯乞求，要他归还爱子的尸首时，他心中就充满zal：

“想想你的父亲，我比他更可怜，忍受了世上凡人没有忍受过的痛苦，把杀死我儿子的人的手举向唇边。”

肖邦音乐中这种zal的感觉是教不出来的。我们常人，可以通过体验人生百味，陶冶历史情怀，聆听大师演奏来领略一二，但对那些亲身经历过屈辱、恐惧、绝望的天才，zal就是神赐的礼物。我想顾圣婴能体会到zal，或许这就是她身上那种忧郁感的源头。她手下的升c小调练习曲，下键就展示出一个刚毅深沉的形象。随后主题展开，始终保持着庄严感。右手的伴奏音型惯被称作“大提琴般的”，而大提琴是最适于表现男性的温柔与深情的乐器，其带有淡淡忧伤的声音特点，如幽谷中风动松弦。顾圣婴把作品前段演奏得稳健沉静，又不拖、不粘，充满内在的激情。随后，左右手交替的力度变化，似乎是深情的临别告语，倾诉着“所思在远道”的惆怅。中段进入连续十六小节的宣叙，右手情绪凝重，左手却始终以低唱应和，真是肃穆庄严。让我想起大卫名画《贺拉斯的誓言》，三兄弟与父亲诀别赴死的悲壮。后段，顾圣婴在左手上的快速跑动中极合逻辑地加强力度，为后面葬礼般的尾声做好铺垫。自五十七小节之后的反复悲叹，让人联想起英雄已逝。终句沉重的smorzando、带延长符的休止、结尾轻回的和声，如寂静中落日西沉，惟余悲笳呜咽，清音辽远。

顾圣婴演奏肖邦作品所取得的成就，绝不仅止于我以上的分析。她演奏的Op 61《幻想波兰舞曲》，Op 39《谐谑曲》之3，和Op 58《第三奏鸣曲》，可圈可点处甚多，显示了她驾驭大型曲目的能力。这包括演奏的整体布局，声音力度的层次安排，合乎作品内在逻辑的准确分句。这些都关乎对作品思想主题的深刻理解与诠释。这是一封信所能尽述。好在这些作品都是你所熟悉的，我们有时间再切磋。

为什么顾圣婴能在演奏肖邦作品中取得突出成就？除了她的天才和演奏技巧之外，可能还需要把视野放宽，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在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肖邦的某些作品可以在社会政治的宏大叙事中找到解释。舒曼一句“隐藏在玫瑰花丛中的大炮”，几乎成了肖邦音乐革命性的标签。确实，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中，个人自由、爱国主义、民族情感都是主流文化的内涵。那时的文学、音乐、戏剧中，浪漫主义的浪潮总裹挟着反抗暴政的内容。肖邦爱波兰，痛恨俄国对波兰的奴役。他的密友是自由知识分子，像密茨凯维支那些常被肖邦带入乐思的诗歌，几乎是波兰自由的火炬。在肖邦的音乐中，萦绕着乡愁和反抗情绪的作品，反映着他内心深处的zal感。

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些宏大叙事所用的语汇被顺利的嫁接在苏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树上。在俄罗斯钢琴学派的教学中，这些内容被自然地用来诠释肖邦的作品。涅高兹在面对《A大调波罗乃兹》《c小调练习曲》时，也会谈及上述角度。但不要忘了，这种解释的源头可追溯至李斯特。涅高兹是从欧洲文化出发，以普遍人性为参照，以深厚的俄罗斯音乐传统为背景的。苏联几十年出了许多大钢琴家，这是俄罗斯沃野上结出的硕果，是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科萨可夫、安东·鲁宾斯坦的余脉未绝。涅高兹就是这一伟大传统的传人。49年之后，大陆的音乐教育体制照搬苏联，幸运的是在这“照搬”时，顺带来几缕俄罗斯音乐传统的残绪。不幸的是，这几缕残绪也很快烟消云散。顾圣婴所受教的老师柯拉芙琴科，是奥柏林的学生。在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准备阶段辅导过她的查克是涅高兹的学生。这使她有幸在这残照中一睹音乐圣殿的辉煌。在塔图良、克拉夫琴科的引领下，顾圣婴汲取了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养料，也因此，肖邦音乐中那些和宏大叙事背景相通的特质，渗入她的演奏。她在研习肖邦音乐时，是心无滞碍的。

你对她演奏的德彪西的《快乐岛》评价似乎不高，但我仔细听了她演奏的几首德彪西的作品，以为她应该能演奏得更好。以顾圣婴的气质和技术素养，印象派音乐本该是她的自家花园。德彪西钢琴作品纤细、飘逸的声响、变幻无定的光线、斑驳陆离的色彩，多么适合顾圣婴的天性啊。但她似乎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她演奏的《快乐岛》，整体上显得响了一些、有点硬。末段虽然谱子上标示très animé，但奇科里尼和桑松·方索的演奏却更显柔和。关键在于声响层次的适度，这点极难把握。想想德彪西灵感来源的华托名画《发舟爱之岛》，云影缥缈、光线摇曳、色彩过渡微妙，整个画面氛围是那样慵懒、散淡、温暖。顾圣婴的演奏就偏实了。当然，她所师承的俄罗斯学派有自己的诠释传统，他们弹印象派，重彩大墨，对比强、起伏大，其中自有妙处，但毕竟德彪西不是斯克里亚宾，地中海蔚蓝海岸沙滩上的棕榈同俄罗斯旷野上的白桦，风韵自是不同。像吉列尔斯、弹北欧的格里格抒情小品，听起来就觉入情入理，细致妥帖。可听他弹德彪西，总觉不大舒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真是强求不来。

在我看来，诠释印象派音乐（这里只谈钢琴音乐）的完美标准，是科尔托、吉塞金、桑松·方索、奇科里尼这一路。德彪西音乐的灵感大半来自马拉美、魏尔伦这些象征主义诗人。正是象征主义诗人对“音乐优先”的强调，吸引德彪西直接以他们的诗歌为题材谱曲。如马拉美的《牧神午后》《显现》，魏尔伦的《月光》《雨滴在我心上》。这些诗歌悦耳的音韵、舒展的节奏，仿佛是由旋律线穿起的一串串珍珠。德彪西用音符做一应和，用声响创造出色彩斑斓、光线迷离、意境朦胧、轮廓模糊的音乐。有一个细节不知你是否注意过，称德

彪西的音乐为印象派，是从结果而不是从源头上看，有点本末倒置。确实，他的作品的效果让人想起印象派大师莫奈等人的画作，但这只是结果而已。所以，苏瓦雷说德彪西完全是象征派音乐家。

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纯诗。梁宗岱先生说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伤感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号式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的感应……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纯诗的意境，正是德彪西的音乐理想。盈盈的老师是奇科里尼的嫡传弟子，她在教盈盈弹《月光》时，先要她去读魏尔伦的诗，甚至叫她背下来，说奇科里尼曾对她说，演奏德彪西的音乐不能只靠读谱子。要“闭上你的眼睛，在幻想中演奏，每一个琴键都是sensuel（感性的），要在幻想中抚摸它们”。其实，我们的先人从不缺幻想力，古有屈子“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今有戴望舒“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二十世纪上半叶，敏感的心灵，仍在求索于纯诗之境。梁宗岱先生曾与瓦勒里在“木叶始脱，朝寒彻骨，萧萧金雨中”漫步布洛涅森林，听他讲解《水仙辞》。而五十年代读书人被“洗澡”之后，梁先生便只能在家中培植中草药，以制作“绿素酊”打发时光。至此，象征主义草丰花繁的园地已被芟夷殆尽。在那个说梦话都怕遭人举报的时代，人或为觊觎权位而妄想，或为贪图钱财而痴想，或为独霸“真理”而狂想，惟独不为美而幻想，因为美是自由的形式。俄罗斯钢琴学派的风格固然会影响到顾圣婴的演奏，但更重要的还在演奏者自己的内心体会。要深入诠释一件作品，需要对产生作品的文化土壤，对作曲家的艺术诉求有所了解。了解的愈深愈透，愈能与作曲家心曲相通。顾圣婴对此很清楚，她对学生讲：“要学好一首作品，最主要的是要理解作品讲了些什么，然后用什么样的手段把它表达出来。首先你要有话讲才可以，不然就没意思”。可惜在顾圣婴研习德彪西音乐时，印象派音乐的文化背景在大陆几乎是一片空白，她很难“有话讲”。如果说当主流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苏俄时，通过俄罗斯钢琴学派的传承关系，我们和肖邦的音乐还多少沾点亲缘，那么，纯粹西方的印象主义音乐则是完全异质的。

这种“纯诗的”、“绝对自由的”、“诉诸感官的”音乐，不反映“阶级斗争”，甚至不理睬“爱国”和“民族解放”这种中性观念，又如何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只能变成姚文元这种文坛杀手锏驰骋的战场。1963年5月2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文批判德彪西的音乐论文集《克罗士先生》。姚根本不懂音乐，更不明白德彪西究竟说了些什么。为谋圣意，他才不管什么和弦结构变化，五声音阶的运用，只需拿起“阶级斗争”这根棍子横扫便是。由于他的文章错误百出，贺绿汀先生化名山谷撰文批驳，引起了一场论战。上海音院的几位教师化名郑焰如，站在姚文元一边参战。顾圣婴注意到了这场论争，在给刁才华先生的信中，她颇为惶惑地说：“姚、郑二文基本论点是一致的，我认为也是正确的”。但这显然不是她的定见，她接着又说：“但是逻辑上不够严密、充分，郑文涉书太少，泛论较多，不足以驳倒山谷与S二文。S那篇是写得相当出色的，音乐院的先生们认为异军突起，为之一惊。这位作者年方二十四，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生，现在戏剧学院搞文艺理论，对音乐有相当的爱好，我感觉（从他的语气、见解中）已经知颇深了”。从信中看，顾圣婴对驳斥姚文元的人是极为赞赏的，此中可见出她心中的倾向性。但她并不懂政治，不明白姚文元曲言媚上的阴毒下作，更不能想象这背后政治上的鬼魅伎俩。她对S文的赞赏只能出自她的音乐直觉。谁是S？他就是沙叶新先生。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挺身而出，批驳姚文元的惟贺老与沙先生两人而已。沙先生的文章论据充分，说理透彻，将姚文驳得体无完肤。后来却是姚文元掌了文化界的生杀大权。顾圣婴万想不到，姚文元的出场，会带来她的毁灭。在信的结尾，顾圣婴似有心为德彪西辩护，她辗转问道：“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有较好的愿望，但在实践中仍局限在阶级的框子里，而没有走对路？德彪西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随后，柯庆施就把这场争论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争论变成政治批判。顾圣婴这种真正演奏德彪西音乐的人再无发言权。

1962年一年之内，顾圣婴尚在国内演奏了七次德彪西，但自1963年2月21日，上海艺术剧场的音乐会之后，再未有她在国内舞台上表演德彪西的消息。

信写得长了，暂时打住。下一封信我想从更广一些的社会思想背景上分析一下顾圣婴的音乐道路和她的毁灭，再和你讨论。



顾圣婴

下篇

建英吾兄如晤：

春天来了，岸柳微吐鹅黄，晓雾中已见灰鹤戏水。但春温不临笔端，论及顾圣婴的毁灭，常掷笔徘徊。陈寅恪先生以为，笔涉人物，须有“了解之同情”，实为至言。

在周广仁先生编的纪念集中，收有一些顾圣婴的照片。看她颀长的身材、清秀的容颜，演奏时忧郁的目光，会想起杜甫诗句“日暮依修竹，天寒翠袖薄”。何以会有这种感觉？从她

朋友们的回忆中，知道她父亲远流，母亲无业，弟弟患病，顾以一人之力，支撑全家，更有作为为钢琴家的日常苦练。这些担子压在她瘦弱的身上，让人有不胜苦寒的感觉。鲍惠荞先生感叹道“圣婴活得太累，太苦了”，她还觉得顾圣婴是一个“把自己的痛苦藏在心底的人”。什么痛苦需要埋藏？

顾训中先生说：“顾高地被正式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从此顾圣婴的心被劈成了两半，一半仍在孜孜追求着艺术女神，一半留给了深陷冤狱的慈爱父亲”。不过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些，顾先生又说，顾高地“从家里每隔数月寄来的薄薄信纸中贪婪地吞噬着女儿的信息，他从农场仅能搜罗到的几种报纸的缝隙中寻觅着女儿的踪影”。“数月”而来的“薄薄的信纸”和“报纸的缝隙”，说明顾圣婴和父亲的联系交流并不充分。顾是笔头甚勤的人，纪念集中，没有她给父亲的只言片语，却收有给习培华先生的信件十三通。是顾先生“丢了”这些信吗？顾先生身陷高墙，女儿的片语只言都是救命甘泉，倘有亲人手泽，能不宝贵至深？有一点大致可以判断，即使顾圣婴有信给父亲，她也会把想说的话掩埋心底，因为她要依照当时社会的生存逻辑行事。

由于父亲被冤判，顾圣婴已沦为“杀关管子女”。这个符号标志着某些人，因上辈中有人被“杀掉、关押、管制”而身负“原罪”，沦为“贱民”。他们前途暗淡，举步维艰。当时，对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就是说，你若想摆脱“贱民”地位，则必须认同主流意识，并且格外努力表现。借用批判哲学的术语，肩负救赎任务的主体是 Establishment，在中国，恰当的译法就是“组织”，一种无个性却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个人再有才华，在组织面前也等于零。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顾圣婴的卓越才华和她的贱民地位强烈冲突，并决定了她今后的行为模式。她将积极靠拢组织，以努力成为一个革命者来洗刷她的原罪而葆有她的艺术。

在她和习先生的通信中，她批评别人“政治基本功太薄弱”，这会使“演奏停滞不前”。她真诚地赞成“改变思想感情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并称“没有人像雷锋那样使我激动和敬佩”。这种努力有些效果，她在日记中记下别人对她的肯定“知我是团干部，说我这几年特别卖力，某些地方赶过别人了”。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她又如何看待父亲入狱的性质？当年她目睹父亲被捕，说出“我爱爸爸”时，她刚刚十八岁。经过几年的“革命化”教育，顾圣婴的看法会有哪些改变？在不断的政治清洗中，我们眼见骨肉相残。但你以为，顾圣婴和父亲的关系绝非如此。在经验不到之处，自有启示之光将思考带入澄明。

顾圣婴 1958 年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随后，加入共青团，初步摆脱“贱民”地位。但前述冲突依然存在，只是变成了她个人的心理冲突。她已是“组织的人”，当然认可组织的正当性。但判父亲入狱的不也是“组织”吗？相信组织，就要相信父亲是有罪的，但自我却绝难认同。对父亲出于本能的爱，同组织的判定相冲突。用精神分析学的话说，这是一种双重的“对丧失爱的恐惧”。面对这种心理冲突，需建立一套防卫机制，来保持心理平衡。这种压抑——转移——升华的心理过程在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与拉康的著作中有详尽的分析。简而言之，她将把对父亲的思念逐入潜意识，再以革命的名义转移那些与当下现实冲突的欲念，而“升华入”音乐，“为革命演奏”使她找到心理冲突的平衡点。她暂时“得救”了。不过从纠缠顾圣婴一生的紧张、失眠、恶梦、焦虑诸症候看，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它是一种在“超我监督”下的“恐怖的平衡”。外部强权迫使“超我”顺从“有罪判定”，而本能却告诉“自我”，爱不是罪。冲突的结果，形成顾圣婴心理上的“伪原罪感”。这就是顾圣婴埋藏起来的痛苦。安提戈涅并不想抛下瞎眼的父亲俄狄浦斯，是国王克瑞翁把她拉走的。

在没有自由空间的全能社会中，顾圣婴的行为方式是合理且正当的。弱小的个人在强大的社会机制面前，正如拉康所论“镜像阶段”的幼儿。其自我认识是通过“它性”来完成的。组织才是给予顾圣婴自我的“它性”。它是力量的象征，价值的衡定和弱者的保护人。顾圣婴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她的钢琴艺术，而这也只在组织的关怀下方能存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社会活动杠杆的形势下，个人唯一的依靠就是“站好队”，尤其当你不是本阶级的人，这个阶级却宽宏地收容你，便自然会“感恩”了。我们谁不曾有过把自己交给“组织”后那种轻松的幸福感？这是一种为逃避的接受，我们接受外部威权，甚至不考虑它是否在侵害我们，以换取失去自由的安全感。因此，对顾圣婴而论，激昂的革命情绪，我们绝无责怪，惟有痛惜。由于顾圣婴要追随政治正确，她便经常处于艺术家本能与社会政治要求相冲突的境地。讨论一场音乐会的得失，她能一丝不苟地考虑技术问题与音乐处理，但又会认为“政治上的‘矫’导致了业务的‘矫’，……于是演奏也停滞不前”。她很真诚地同意“经常下乡下厂对我们搞洋、搞古、搞单干的十分必要”，又感到“党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这几天显然感觉调门又往高处走了，我不得不自问，究竟那个调门是我的”。她说服自己“最近再三的强调了总方向，严格审查作品，注意倾向性，我可也不应该在自己的舞台上去搬弄适于西洋的一套”，又抱怨“多少年了，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明显的‘提高’？固然政治觉悟的提高，思想认识的一致是大前提，但若是离开了乐队队员的技术、修养，离开了指挥艺术，又有什么可言呢？”我们甚至能感到这种矛盾冲突动摇着她赖以生存的艺术基石。她问道：“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能和可以对过去的作品有兴趣和喜好吗？”纪念集中，收有顾圣婴 64 年参加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的日记，可以看出艺术与政治的冲突怎样折磨着她。

当她知道参赛者的情况后，便断定“美苏选手是强敌”，命令自己“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应该记住，弹好就是我运用了我的武器，也就是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显然，顾圣婴并未把参加比赛当作深入钢琴艺术的机会，而把它当作一场国际政治斗争。

5 月 3 日，顾圣婴得空在樱花林中散步，自然唤醒了她被压抑的本能：“略闻草香泥土气，心情为之一爽，什么时候我能整天在这样的环境中轻松一下呢？……我太喜欢这样的天地了，我能不能怀着这样的心情上台比赛呢？”在自然怀抱中，她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轻松的心情上台。随后，因为一位负责接待她的比利时老太太“拥抱和吻了我，给我力量，我差点流泪了，的确心在那一刻发热了，我得到了力量”。这个力量并非来自“政治斗争、祖国荣誉”，而是来自人性之爱。第一轮比赛她弹得相当成功。

顾圣婴到比利时后，每天都记下身体的各种不适，头昏、抽筋、恶梦、手臂疼痛，这显然和心理压力有关。她为自己加压，竟认为“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这岂是她那脆弱的身体和心灵所能承担？第一轮赛后的清晨，她到林中散步：“晨间的阳光透过树丛，形成各种色调、气氛。林中各种虫声鸟鸣极悦耳，对 Ballade 有大启发。如老太太所说，我弹得不够诗意，不够 libre”。诗意图与自由，这是艺术的生命之源啊。但她多半时间却无暇

顾及。第二轮，她的表现不理想，她自评道：“很不满意，没有一首好的。”尽管如此，她也没有从艺术上反省，却想到，“现在局势是微妙的，这里还是有斗争，需手段的”。恰在这时，丁善德先生和她谈了一次话，“说到我的家庭问题，谈到我的工作，说到入党问题，我要回去也……说现在将吸收一些（丁院长的提法是较令人惊讶和感觉兴趣的）”。

丁先生的这次谈话似乎是想为第二轮比赛表现欠佳的顾圣婴鼓劲，所以竟隐约谈到尽管顾出身不好，却仍有可能入党。顾在记丁先生的话时很特殊地用了省略号，似是丁先生出语慎重，甚或曾“面授机宜”。总之，这隐约的许诺让顾圣婴“惊讶”，而且“感觉兴趣”。这使她更紧张动员起来，“应争取得奖，得高奖！”在五月十九日与乐队和乐之后，她感觉“白天头疼，精神不佳，手不舒服，如何工作呢？”却又告诫自己，“让所有的想念都变成练习效果吧！这是最好的献礼”。倘若能仅作此想倒罢了，她却又注意到“看看其他选手，都不像我这样紧张，是他们会安排，还是我过份？？深思！”两个问号加惊叹号，说明她实是不堪重负。是啊，其他选手只为自己，为艺术弹琴，而顾小姐却凭白要为六亿五千万人弹琴啊！

顾圣婴以总分排名的方式进入第三轮，需在隔离状态下练习昆特的协奏曲，背谱时心力交瘁，却仍不忘“我是一个革命者，来自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不在这件事上体现一下我们的革命风格呢？这时美国选手科尔蒂出现了，他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思路。顾圣婴记下了他的一些言论：“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有个人自己的想法，开展自己的艺术道路，言下还有艺术，不具体体现政治之意”。顾圣婴当然知道这和她信奉的意识形态大相径庭。她却未加批判，还直言：“我喜欢他”。两天之后，她又与科尔蒂散步聊天，具体谈了些什么，顾未曾记下，却记下了科尔蒂对劳动的看法：“他拥护我们的政策，认为劳动是‘good for health, mind, soul’，但顾圣婴却忽略了科尔蒂所谈的劳动和我们的‘劳动改造’之本质区别。这个忽略或许是无意为之，因为顾圣婴不可能忘记她的父亲正在从事着一种劳动，它可不是“good for health, mind, soul”。而不作这种忽略，她就不好接着记下“我还是很喜欢和他交往”。

最后顾圣婴获得第十名。应该说，在她那种心理压力和身体状况下，这已是不错的成绩。但她不满意，自己默默流了泪。可惜对这个结果，她给出了这样一个总结：“对比赛，我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可说，因为艺术不可能脱离政治，比赛无例外的也是一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争夺的所在。它既是艺术观上的交锋，也是政治上的交锋”。顾圣婴没有说明，在她的名次上，“敌对阶级”是如何行动的，倒是记下了英国评委的意见：“不要加太多东西进去，而应该去掉杂质废料，使作品的全貌呈现”。照当时的阵营划分，英国评委应属“敌对势力”，但顾圣婴却斩钉截铁地说“很好的道理”、“去掉杂质废料”，莫非英国评委听出了顾在演奏时心中所装的那些“党国、人民、阶级”，而顾自己也明白这点？

随后，她买到肯普夫弹的贝多芬的奏鸣曲，李帕蒂弹的格里格，听后极喜欢，甚至“觉得我能够弹好贝多芬”。就在第二天，她记下了观看电影《柯山红日》的感受：“《柯山红日》太差了，我受不了这种全无音乐逻辑的东西”。笔锋一转，她又写道：“突然非常喜欢 Beethoven 了，Kempff 的原因吧！只要稍微离开那些‘杂质废料’，顾小姐就立时恢复了纯正的艺术趣味。比赛结束后，顾圣婴在欧洲几国巡回。期间政治活动不少，听胡耀邦在团代会上的报告，“受到激励，一定要不负期望，努力革命化，彻底革命化，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一个共产党员”。日记中出现了“革命啊！永远革命”的呼喊。这种超常的革命表态，其实来自她的内疚感，似乎这次比赛没有取得理想成绩是她的“过错”，“唉，一种抱愧遗憾的心情总占据着我，只能从以后去弥补了”。这种抱愧内疚的感觉，根子还是那个“负罪感”。据习培华先生说，顾圣婴每次出国要经“特批”，时任文化部长的夏衍喜爱她的才华，每次为她作“政治担保”。顾小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曾帮助过她的人，心中总存一份感恩。说大了，是“党国、人民”，其实心中是具体的个人，没达到理想要求，竟深怀愧歉，长久不能释怀。帕斯卡尔说：“世上只有两种人，相信自己是罪人的义人和相信自己是义人的罪人”。顾小姐是前者。

回国前，她在莫斯科科记下最后一则日记，“一整天几乎都在唱片中消磨，听了两套歌剧，老柴浪漫曲和 Mendelssohn concerto, Chopin Grand Polonaise，都喜欢，但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要表达的太远了，多听有好处吗？不禁想到如果立足不稳的话，是会陷入沉入到那样一种境地，那样一种情感与精神世界中去的”。顾小姐已经意识到她所“信”的世界和她所“爱”的世界是根本分裂的，她真是面临深渊，彷徨无地了。鲍惠荞先生对此有所察觉：“在那些年里，她默默承受着命运的重压和痛苦，就像一个朝圣者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踟蹰前进。……我们都觉察到她的演奏风格渐渐有了些变化，原来的清新的诗意图和高贵的抒情少了些，代之而来的是躁动不安的戏剧性。初时，我们还以为她是想突破自己，寻求一些新的东西，但逐渐感到了那是源自于她内心的巨大痛苦似乎要挣破她单薄的身躯冲出来，那是她的心在哭泣、在挣扎、在呐喊……，我常常暗自担心她快要崩溃了”。顾圣婴 6 月 16 日在布鲁塞尔音乐会之后记到：“加奏了斯克里亚宾的左手夜曲，我近日特喜欢它，心情有关！”这条记载似在一片灿烂的背景上横抹一道灰痕。刚获比赛奖项的顾小姐何以会“特喜欢”这支悲伤透骨的曲子？它是斯克里亚宾右手练琴受伤，面临送演奏生涯的绝望之作，专门写给左手，似双翅损一仍欲振翅。在顾小姐“革命、革命啊”的意识底层，竟埋藏着如此深重的伤残感，又不小心通过乐曲透露出来，何以故？后来见到顾小姐遗物中，有一只肖邦左手模型，已被暴徒砸毁，仅余三指。我几乎相信这便是顾小姐那一刻“极喜欢”斯克里亚宾左手夜曲的理由。“白露警而鹤唳清，知霜雪之将至也”。顾小姐似已隐约听到“共和国新人”铿锵的铁踵。音为心声，顾小姐欲借斯氏左手向肖邦致最后的敬意。

阅读顾圣婴比赛归国后的演奏日记，可以看出形势变化，劫难的巨轮开始滚动。它将碾碎顾圣婴脆弱的生命。64 年下半年开始，顾圣婴愈来愈少演奏古典作品，音乐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时新作品，《翻身的日子》、《高举革命大旗》。65 年一年，她仅弹过一次肖邦的《升 f 小调谐谑曲》，而新曲目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随时准备战斗》……。她的演出场所也离开音乐厅，搬到上海重型机械厂铸造车间……。但顾圣婴对这些和音乐艺术无关的曲目也努力去弹，并记下笔记，分析得失，从中能感到她的焦躁。由于政治学习时间太多，她已无法练琴，她焦急地发问“演奏要不及格了，如何是好？”“该练琴呢？”“何时能练琴？”“在工厂中可练琴，但时间何在？”9 月 27 日上海重型机械厂演出结束后，她焦虑地发问：“以后演出用什么呢？是个大问题呢！”对顾圣婴而言，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六五年最后一则演出日记中，她明白大势已去，“总想学些新的，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她脚下的生存版块开始漂移。在纪念册中，找不到顾圣婴 66 年的消息。但我们知道，这是“共和国新人”大为风光的一年，有多少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铁踵下“消失”了。67 年 2 月 1 日，那个阴冷的凌晨，她走了。

顾圣婴的朋友们在回忆中痛惜她的绝然弃世，惋惜她未能咬牙熬下来。刘诗昆先生认为文革初期她所受的折磨毕竟还只是最粗浅的，甚至以为顾圣婴选择的自杀之路“也远未到非走不可”，似乎死活之间是可以计量的。我倒想为顾小姐一辩。

前面我已分析过，顾圣婴的心理平衡建立在由外在威权内化的“超我”与“自我”的妥协之上。在她的“超我”接受外在威权的价值形态时，也确立了“自我”的价值。先前这个由“超我”负责取舍的价值形态是稳定的，从而顾圣婴的“自我”价值结构也是稳定的。但突然，外在威权将“超我”的价值稳定自行打破，使那些将此价值内化于意识结构的弱小个体无所依附。他们的心理崩溃便在所难免。此其不得不死者一。

顾圣婴以为她的政治原罪在十几年的努力表现下已救赎在望，组织已和她谈及入党问题。她完全信赖那些代表组织出面和她打交道的个人。但转眼间他们亦被打翻在地。救赎者翻成罪人，救赎再无可能。此其不得不死者二。

钢琴演奏是顾圣婴安身立命之所。不说肖邦、德彪西，她甚至对《洪湖赤卫队》这类时新作品也倾注心力去演奏。但眼下连这类作品亦成需荡涤的“污泥浊水”。她无价的天才与技艺竟类同垃圾。此其不得不死者三。

顾圣婴冰清玉洁之身，竟被勒令下跪谢罪，又遭粗汉掌掴而肌肤相侵。餐英饮露之人堕入荤腥膻之筵，凶徒满目，狂器盈耳，亲人阻绝，友朋悉损，虎狼之地，不容圣婴。此其不得不死者四。

有此四端，义无再辱，有此四端，安能不死！

但并不仅于此。顾圣婴是自杀的。自杀与自然死亡性质不同。它是主体的自由意志先行到死，因而更是一精神性事件。哈姆雷特发问“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他已经把有关生存性质的询问掷在我们面前。一个人选择“不存在”（死）一定劣于“存在”（活）吗？帕斯卡尔说“人是能思想的芦苇”，以指明人在生物上的脆弱和精神上的尊贵。人惟在精神活动中呈现其为人的定性。精神活动创造意义，这种意义的价值衡量却要实现于社会系统。从而，个人的生死抉择便关涉对某种价值的否弃或认可。迪尔凯姆正是在此意义上指出：“我们缺少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我们能够珍视的唯一生命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价值，而仍然融合在现实的唯一生命，不再满足我们的需要”。他把这看作利己性自杀的重要原因，其关键在于，高贵的心灵中，生命的延续同价值、道德目标相关。顾圣婴选择自杀，正因为她生命的“已不再适应任何现实的价值”。此生死去就之择，岂能以多少较之？

对顾圣婴而言，还另有一层宿命。她是一位“钢琴诗人”，承担着为“另一维”“立法”的责任。虽然她并不自觉此一责任，但责任并不因此消失。海德格说：“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为此就需有入于深渊之人”。顾小姐被命运之手加上了“入于深渊”的责任。不过，我在此引海氏名言，却有着与他不同的用意。诗人之担“入于深渊”之责有两种情况，能为诗，则深入深渊，启明存在之光，不能为诗，则陷入深渊，“遮蔽”存在之光。海氏寄希望于前者，顾小姐却以后者出场。她在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钢琴比赛中所思之事，多与诗人之责无关。她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向音乐中寻求不属于音乐的东西。无论是谈论作品还是演奏，她几乎无一字涉及音乐本身。她已不能为诗，而身处晦暗不明的“遮蔽”状态。

艺术家作为艺术品展现其真理性的“途径”，本承有“葆其真”的使命，她却让那些“杂质废料”将此途径“遮蔽”起来，把艺术虚掷于“服务于所用”的荒野。她反复责怪自己“技术上的问题”，以为技术可以带来艺术的完满，却不知道技术性仍外在于作品的真理性。她本可以借技术之“用”来打开艺术品昭示真理之光，她却在技术上往返逡巡，痛失深入艺术品之本源的机会，即作品“凭何是其所是并如其所是”。艺术家无须深知“去蔽”之责，她只需面对作品如其所是地演奏就够了，真理自会在乐声的鸣响中显身。但她错把“阶级”、“国家”认作艺术的目的，把“去蔽”之责当作以“武器”制胜“强敌”，从而迷失在现实的癫狂中。但是，这并非顾小姐的过错，当整个民族都被鼓噪起来奔向深渊时，她不过替我们担当了迷途之责。

诗人的职责是在诗中经验那未曾说出的东西，她开启，她立法，她创造有别于“实存”的另一维度。如果时代的暗夜太浓重，诗人之思无力穿透黑暗去昭明存在的真理，诗人便已死去，无论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她是否还活着。却有诗人选择另一条路，以真实的死亡完成其最美艳深邃之诗。顾圣婴的先行者茨维塔耶娃，明了此点。她说，心灵的英勇是活，躯体的英勇是死。当她知道自己的心灵已无勇气承担诗人的职责时，她便选择了躯体的英勇。诗人之为民族的先知，象征着民族的命运。民族同个人一样，也存在精神的生死。因此荷尔德林敢于说“一个民族将死之际，精神选择一人，为它唱出生命的天鹅之歌”。

1977 年，顾高地先生自青海劳改营释放，满怀对家人的期盼回沪，等待他的竟是一个残酷的消息，他的亲人们早在十年前就撒手人寰。顾先生知此消息，一夜须发全白。后在蔡蓉曾女士陪同下，前往万安公墓寻找亲人遗骨无获，恸哭失声，哀动墓园。此后，老人收集爱女遗物，办成顾圣婴纪念室，每天晚上，老人都会来这间屋中一坐，在夜幕四垂，青灯如豆的岑冷孤寂中，和爱女交谈，听爱女演奏，直到 1990 年，老人也走了。

1979 年，顾圣婴辞世十二年后，举行了她的骨灰安放仪式。但摆放在灵堂中央的骨灰盒是空的，顾小姐竟是弱骨无存，埋香无处。

2009 年 6 月，Pollini 在巴黎普莱耶尔音乐厅，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这是肖邦当年在巴黎开音乐会的地方。看到他演出的海报，手捧鲜花，微笑着，便想起 1958 年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和他同登领奖台的顾小姐，一袭白裙，高贵典雅。五十年后，却一为巨擘，纵横琴坛，一为游魂，无枝可依。

九洲并非不产精灵，牛山濯濯只因持斧斤者众，纵天降英才瑰伟卓萃，天朝戕伐亦如割野草。如有美玉，日月孕育，山川滋养，逾百年而成，要毁灭亦不过一击。

历数顾圣婴的演奏日记，没有见到她演奏肖邦降 b 小调奏鸣曲的记录。似乎她不愿意为我们演奏《葬礼进行曲》，我想她是有道理的。这曲子不适合我们惯常的情感方式。在李斯特看来，“这样的情感只有在哀悼民族悲剧的全民族葬仪的行列中才会存在”。而我们

却不喜欢扶着受难者的灵柩，悲悼于时光的行进，倒乐于披上死者的尸衣，欢歌于横尸的荒原。我们只会为君王送葬，不会为生民哀哭，从而无法体会“广大的慈悲，那种珍视每座坟墓和每个摇篮的正义”。

马尔库塞说过：“遗忘过去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造就苦难的势力。思想的崇高任务就是对抗时间的流驶而恢复记忆的权利。记忆是获得自由的手段”。记忆，便是我们的持守。

（附：文中资料多取自周广仁先生编《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特向周先生及在书中留下顾圣婴一羽的诸位先生致谢。）

本文摘自《燃灯者》（牛津大学出版社）



赵越胜

现居法国。“赵越胜沙龙”创建人。1970 年在北京当工人。1978 年进社科院哲学所。1989 年，移居法国。著有《燃灯者》《精神漫游》《既见君子》等。《燃灯者》曾获中国最佳散文大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电影《春光奏鸣曲》(1991) 剧照

非虚构 沧海月明珠有泪 赵越胜 | 发现经典

读加沃蒂著《肖邦传》

贝里的春天来得迟，已近三月，寒意仍浓。驱车在贝里湿地的乡间公路上，道边浅塘中芦荻瑟瑟，三两只水鸟振翅掠过，又没入池塘。田间苗儿刚出土，薄雾如轻纱，在菖蒲淡绿上游荡。快到诺昂时，急雨突至，天幕铅灰，四野含愁，行人亦不免添几许凄凉。进诺昂村口，雨渐渐稀了，车就停在乔治·桑故居身后。沿沙石铺就的小路前往故居，寂静中听脚下细沙簌簌作响。1839年，自马略卡岛回到诺昂的桑与肖邦，走的是这同一条路吧？

路到尽头，右拐是道淡绿色大门。十九世纪中叶，领欧洲文化艺术风骚的那群人：李斯特、德拉克罗瓦、巴尔扎克、福楼拜、小仲马、屠格涅夫……都曾出入此门，跨进这个传奇庭院，心仿佛都跳得急。突然，薄雨中传来肖邦《G大调夜曲》，凄美的乐声似出自当院的那棵老菩提树，细雨洗得枝叶幽绿逼人，旋律也染着绿色飘然而来。琴声入耳，让人想起济慈听到夜莺的歌声：

今晚，我偶闻的歌声
也曾打动过远古的农夫与君王
这歌声令路德悲伤
她站在异国的麦田里
思念家乡，泪滴千行

乔治·桑记述过一个诺昂的夜晚：“这天晚上，弗朗兹演奏舒伯特最富幻想的乐曲。……月亮躲在高大的菩提树后，把一动不动的冷杉的黑色幽影勾画在浅蓝色的天空中。……高贵的乐器开始奏响和弦，夜莺还在与琴声争鸣，声音羞怯又痴狂。”

在热爱肖邦的人，这儿是一方圣地，肖邦在此度过了后半生最重要的八个夏天，创作了钢琴艺术最辉煌的篇章。但亦是伤心之所，一段极特殊的情感故事，肖邦与乔治·桑之恋，成熟于此，毁灭于此。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曾有过许多爱恨情仇，像夜间皓月透过纷披的枝权，光影迷离，明暗相交。这段姻缘中的是是非非，至今聚讼纷纭，但两位主角却以其辉煌的创作彪炳史册。

平日欣赏研习肖邦的作品，不免关注他生活的轨迹与他创作的关系。为此，常希望手边有部有分量的肖邦传。以前读过三、五种，都不甚满意，大多编排史料，就事论事，对深入理解肖邦的作品无甚裨益。桑的自传，洋洋十大册，关涉肖邦，自是提供了不少有趣的资料。而事关决裂仅一味指责肖邦，只能当作一面之词。莫洛阿的名著《乔治·桑传》则对桑多有维护。他是让桑的纵横才气镇住了。我隐约感觉，要想理解肖邦，需要跳出巴黎—诺昂一线，而换以更广阔的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文化、社会视角。这样才可能使论述别开生面。加沃蒂所著《肖邦传》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加沃蒂是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音乐科班出身，曾听过丹第的课，后出任荣军院的管风琴师，有过一段演奏家的经历，他的兴趣在音乐学，干脆作了乐评家，任《费加罗》报音乐专栏的主笔。他是科尔托的好友，极信服并推崇科尔托对肖邦作品的诠释，甚至为科氏

作了一部传记。他的肖邦传不仅材料翔实，细节清晰，而且文采斐扬。他极爱肖邦，所以走笔情感充沛。笔下人物血肉丰满，更能结合音乐分析，来观察人性，读起来引人入胜。加沃蒂写肖邦，却从波兰历史下笔，把我们径直带到肖邦音乐所由以生的根基处。波兰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百年来，它不断被周围列强蹂躏、瓜分，今天你挖走一块，明天我吞食一角。不夸张地说，波兰的历史是血与泪写就的，被奴役的耻辱，世世代代烙在波兰人心头。据说，波兰人的眼神中总透着忧郁，甚至他们的微笑都带着伤感，但波兰人作过奴隶，却从不是奴才。这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表面上看，他们都受屈辱、被压迫，但奴隶的屈辱是由暴力强加的，而奴才的屈辱是自愿寻求，并欣然乐在其中的。所以奴隶不下跪，像米开朗基罗“被缚的奴隶”，绳索加身仍挣扎挺立，因为他们记得住自己的耻辱，一有机会，这耻辱的记忆便化作抗争的行动。波兰人一次次起义，屡仆屡起，只为要成为一个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种忧伤其表、勇毅其里的精神，就是那个独特的波兰字 *zal* 所指称的东西，它是发自波兰民族历史深处的独特心理感受，也萦绕肖邦心头。加沃蒂对肖邦生平的描述和音乐分析，始终不忘这个视角。

加沃蒂花了相当篇幅论述了肖邦早年所受的音乐教育，充分肯定肖邦某些早期作品的成熟。他有意识地纠正人们的习惯看法，肖邦的音乐成熟于巴黎。他强调肖邦的启蒙老师齐夫尼对他的决定性影响。这位巴洛克式的老人极有洞见地认定小肖邦是个罕见的天才，他用来护持这个天才顺利成长的法宝是借助巴赫和莫扎特的神灵。齐夫尼禁止肖邦“去练那些时髦却糟糕透顶的东西”，只让他弹“莫扎特小奏鸣曲和令人生畏的巴赫平均律中那些容易弹的前奏曲和赋格”。让肖邦“感觉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自如”，让他知道他是巴赫和莫扎特这个艺术家庭的一分子。后来，肖邦在巴黎，在一位学生面前背奏《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前奏曲与赋格，对吃惊的学生说“这是忘不了的”。加沃蒂总结道：“是啊，人在幼时所学，那些滋养了最初萌发的想象力，让人在童年时就一见钟情的东西，会留在记忆里，直到生命终结。”他断言，肖邦的艺术风格来源于此，“即使在最富激情的时刻，他也从未忘记过这两个古典大师教给他的写作和思考原则。”

身处浪漫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肖邦通常被当作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但这种分类对肖邦本人毫无意义。据肖尔茨考证，肖邦本人甚至从来没提起过这个词。所以，加沃蒂以为，相比较而言，肖邦的精神气质更是古典主义的。他指出“他对同时代音乐家毫不感兴趣，门德尔松、舒曼、柏辽兹，甚至对李斯特本人，他都不予任何关注。在他看来有价值的，只有过去的杰作和他个人的作品，这位伟大的浪漫派人物，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古典主义者”。肖邦的沉默，表明他内心遗世而独立，他对同行的吝于夸赞，说明他心中另有标准。因为我们知道上述的几位浪漫派大师在一逞快意时，常常流为抒情无节制，耽迷于作品外表的华丽炫目，堆砌出怪诞夸张的音乐造型。



《肖邦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涅高兹以为，对天生富有创造性想象力的人来说，任何音乐都是标题性的。同理，对他们，一切真正好的音乐都是抒情的。抒情不是浪漫主义的特权。巴赫《意大利协奏曲》之行板《长笛与羽管键琴奏鸣曲》之西西里舞曲，《哥德堡变奏曲》之二十一变奏，《管风琴三重协奏曲》(BWV 530)之慢板，《管弦乐第二组曲》之G弦上的咏叹，更不要提莫扎特那些美不胜收的乐章，岂止是抒情，其婉转低回、一唱三叹真摧人心肝。只是那个“度”拿捏适宜，由理智主导激情，悲哀也带着高贵。作为一个音乐行家，加沃蒂始终在这个传统上考究肖邦的音乐。他举肖邦《前奏曲》Op 28为例，认为这组作品表现出肖邦“接续巴赫”的雄心。第一首C大调同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集第一首C大调，不仅在调性与音型上明显相关，甚至两首曲子的庄严与宁静也如此相像。我们知道，肖邦后期创作的玛祖卡更是巧妙使用对位技术的典范。可以说，肖邦一生的创作皆托庇于古典主义大师。

但谁能否认肖邦作品的梦幻性呢？冷月下摇荡波心的《船歌》，寒星里徘徊碧空的《夜曲》，逆旅中怀恋故土的《玛祖卡》……，对听者而言，它是多么不同于巴赫的作品。在巴赫吟诵的地方，肖邦歌唱，在巴赫把路德教的祷文写入音乐时，肖邦把音乐谱入诗行。肖邦的作品精致却不矫饰，抒情却不满情，忧伤却不清哭，绮丽却不风骚。听懂了肖邦的人都能感到他的音乐织体丰厚繁复又晶莹剔透。深灰色的悲哀衬着宝蓝的底色。即使泪水盈眶，泪珠也不落下。极合我们先人“哀而不伤”的审美要求。加沃蒂说得好，“没有哪一种音乐以如此纯净的手段来解说无尽梦幻，正在这点上，本性属于浪漫派的肖邦，从不对某种说不清的歇斯底里的幻觉让步，即使他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也持守一种古典的严谨”。1830年9月，肖邦给好友提图斯写信说“乐谱已放入行李，琴弦已在背包里，背包已扛在肩上，就等着上驿车了”。就在几天前，他告诉提图斯，他要离开波兰，并神奇地预感到，此一去便是与波兰永别。他说“我是去死，但不得不死在异地他乡，而不是死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那该多惨”。11月2日，一个悼念亡者的日子，肖邦离开了家乡，带着他的才华和一杯波兰的泥土。二十天后，华沙爆发了反抗俄国占领者的起义，十个月后，俄国人再次占领了华沙，华沙战败投降。加沃蒂指出“这是一次完全的耻辱，丢掉一切独立的前景，永无复仇的希望”。肖邦在斯图加特知道这一消息，他极度痛苦、愤怒，几乎陷入疯狂。他质问上帝：“哦，上帝，你存在吗？是的，你存在，你不为我们复仇！难道俄罗斯人的罪恶还不够吗？或者你自己也是俄罗斯人？”他记述了这段时间内他绝望的幻象，父母忍饥挨饿，姐妹和心爱的人遭俄国人蹂躏，朋友的坟墓……这一切化作狂风暴雨般的音符，不朽的

作品 Op 10 之十二诞生了，人们常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称呼它《革命练习曲》。

加沃蒂敏锐地注意到斯图加特悲剧对肖邦的影响，指出“斯图加特的创伤从未愈合，并永远不会痊愈。远离加剧了创痛，他怀念处于征服者铁蹄下的那个城市和一个不得不屈服的民族。这一切活在他心里，直接启发他的音乐。某晚一个学生在他面前演奏《c 小调第三练习曲》时，那一声伴随着哭泣脱口而出的呼喊，比什么都更好地描绘出这个高雅的流亡者的真情：哦，我的祖国！”是俄国人的占领使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流亡者。他再也不会回到他深心挚爱的地方。肖邦的朋友埃利诺拉·齐尔米卡曾在马里昂巴德与肖邦相遇，她在日记中记道：“出于爱国的原因，肖邦决定不回国，而是继续他自愿的流亡生涯。”这条记载极重要，肖邦是因为爱国才决定流亡的。他弃绝了那个“国家”，却把祖国带在心头。肖邦极爱波兰，真称得上魂牵梦萦，但他又确实再踏上波兰的土地。以至我们在谈及肖邦的爱国情怀时，必得辨析此国何谓，而他所爱为何。在古典时代‘爱国’的含义相对单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西塞罗诸先贤多把爱国当作公民的义务，甚至当作道德要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道出了他们心中的国家观：因为祖先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的国家传给我们”。那时，人们期望其所爱之国是个人自由和幸福的归宿之所。在那里有祖先荫庇，血脉绵延，有我们能剪烛西窗、共话巴山夜雨的记忆。人们称此为 motherland，母亲的应许之地。肖邦爱波兰，爱的就是它。

这种爱与忠诚相联，深思流亡问题的斯科拉说“一旦忠诚是选择的结果，它就是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发自情感，依托人格，而不出于利益计较和伦理信条。”肖邦忠于对波兰的爱，他化此忠诚为音乐，使被俄国灭亡了的波兰永生于美的天国。由俄国人操控傀儡政府，沙皇兼任波兰国王的那个波兰，不过是耗竭波兰精血的异质的、外在的存在。肖邦并不理会这个波兰，他的波兰在他的祖国卡里。他深知由俄国人扶植的那个国家不是他的祖国，而只是个占领形式，一套规章、一群官僚、一个君主，可能煊赫于今日，亦可能一朝灰飞烟灭。因而，当有人试图让他作沙皇宫廷第一钢琴家时，肖邦骄傲地回答：“即使我没有参加 1830 年的革命，我的心和那些参与者是相通的，因此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流亡者，鉴于此，我不能允许自己接受任何一个别的称号。”这种自觉的流亡，使一个异乡陌客百世流芳。另一方面，正像普鲁塔克所说，“缪斯似乎让流放帮助先人完成绝世杰作”。当肖邦自觉流亡到巴黎时，巴黎真正是个“文化首都”，甚至在音乐上，也取代维也纳，成了音乐家聚集的中心。此时，李斯特、门德尔松、柏辽兹、贝利尼、梅耶贝尔、帕格尼尼都在巴黎活动，亦都有名作传世。肖尔茨说“有这么多天才同时出现在一个时代，是史无前例的”。这个群英荟萃的盛景大约只有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堪可一比。这些天才从欧洲各地汇集巴黎，几乎每日见面、讨论、切磋、争吵，彼此赞赏或厌恶，在砥砺中成就一番文化伟业。

加沃蒂分析了巴黎的沙龙对音乐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岂止音乐生活，十九世纪的巴黎沙龙聚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艺术活动，甚至政治活动都是“性命攸关”的。十九世纪初，斯达尔夫人和她的情人本雅明·贡斯当的沙龙，一时引领政治思想、文学创造的走向。随后，更有雷加米埃夫人主持的沙龙，夏多布里昂是这个沙龙的主角，甚至他之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都有赖于这个沙龙的影响。年轻的乔治·桑曾在通信中兴奋地记下拉杜什将带她去雷加米埃夫人沙龙的事儿。诺迪耶被任命为兵器库图书馆管理员之后，他的家成了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汇集之所。马丁菲吉耶记录了周日在兵器库诺迪耶家中的聚会：“在场的诗人中会有人起来朗诵诗歌，可能是雨果、拉马丁或者维尼，也可能是一位怀着出版诗歌希望来到巴黎的年轻的外省人。在那个时候，没有被介绍到这个沙龙，几乎不可能在艺术界成功”。我们知道夏多布里昂曾在居斯廷伯爵的沙龙里听过肖邦演奏，圣伯夫是田园圣母街雨果文学沙龙的常客，而正是他断言“文学中的夏多布里昂和音乐中的肖邦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桥梁”。

肖邦和乔治·桑在奥尔良广场的沙龙则被称作“小雅典”。肖尔茨认为，肖邦和乔治·桑在这里“把最不可能组合到一起的客人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跨越了通常的政治、社会、金融、艺术的界限”。进出这个沙龙的既有左翼政治家皮埃尔勒鲁瓦、路易·布朗，又有文学巨擘雨果、巴尔扎克、拉马丁、圣伯夫，也有金融巨头罗斯柴尔德，甚至基佐这类保守主义的政治人物也会光顾。此外，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文人、艺术家，也聚集到肖邦和桑的沙龙里，例如海涅、密兹凯维奇和许多波兰流亡者。海涅后来成了肖邦的知己，对肖邦的音乐有极精辟的评论。而正是海涅把马克思介绍给乔治·桑。那时马克思正在巴黎流亡，又初识恩格斯，两人正商量着弄《共产党宣言》。我们没有马克思去过奥尔良广场的记录，但肖尔茨断定“无论肖邦是否真的见过马克思，他肯定，而且非常直接地见证了现代历史的创造”。

了解当时巴黎的沙龙生活，有助于我们理解肖邦的音乐，因为肖邦的许多作品是在三两密友的娓娓对谈中触发灵感，谱写下来的，又在朋友圈中演奏。肖邦不喜欢公开正式演出，除非不得已，他拒绝公开演奏。因为他生性疑虑公众，他常问：这些掌声是真听懂了音乐的赞赏，还是出于礼貌？而在朋友中，他放松、坦然，他知道这些人真心爱他，为他的音乐陶醉。在朋友中，他的演奏是交谈、倾诉，是宣泄、梦想，是以音乐构建的晶莹的纯净之邦。甚至那些充满 zai 的大波洛乃兹也是光焰明亮，唤起勇毅与高贵的情感。

加沃蒂在书中引用了一段乔治·桑的记载：

肖邦走近钢琴，未在意别人在听。他即兴弹奏，漫无目标。他停下来。
可是还没弹完呢！德拉克罗瓦喊道。

我并未开始。我什么都抓不到……只有倒影、阴影、起伏部分，无法以固定成形的乐思体现。我找颜色，可连线条都勾描不出来。

一个不来，您就找不到另一个。德拉克罗瓦接着说，而您会同时找到它们！

可是如果我只找到了月光呢？

您会找到一个倒影的映像，莫里斯接口。

这个说法让神样的艺术家感到高兴。他接着又弹，不像重新开始，因为他的线条很模糊，不确定。渐渐地，我们眼里充满了柔和的色调，与听觉捕捉到的甘美悦耳的抑扬声相吻合。然后蓝色音符出现了，把我们带入透明的蔚蓝夜色之中。

.....

一曲美妙的歌。

就这样，在与朋友们的交流中，肖邦捕捉住稍纵即逝的灵感，赋予它以完整的作品形式。

肖邦在他的朋友中创造他的音乐奇迹，但这个朋友圈子的核心是乔治·桑。肖邦创作最丰的时刻是在诺昂度过的八个夏天，一生创作的编号作品 68 件，有 30 件创作或完成于诺昂。这一段时间，他与乔治·桑相爱，桑照料、鼓励、呵护着他，他也向桑奉献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实实在在的爱，这爱却以悲剧收场。加沃蒂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这场爱情悲剧，不过我仍以为话犹未尽。加沃蒂是百分之百的肖邦派，尽管这是他力图避免的。无奈他太爱肖邦，下笔难免苛责乔治·桑。所举事实固然不错，但问题在于视角。

在肖邦与桑的恋爱中，桑是主动者，并始终主导着这场恋爱。因为事实上，若没有桑这么一位波兰勇士——萨克森元帅的直系后裔，这么一位宣称“当女人沉默之时，我让女人的声音振聋发聩”的女权先驱，以肖邦的性格，这段姻缘根本不可能存在。1836 年深秋，李斯特在他的住所法兰西旅馆邀请桑和肖邦做客，这是两人首次见面。见面之后各自对方的印象极有趣，肖邦问希勒：“这个桑，她真是个女人吗？”而桑却对马里亚尼夫人说：“这个肖邦先生，像个年轻的姑娘。”别放过这初次的印象，可以说这段姻缘一开始就是角色倒错。

初次见面，肖邦的反应相当冷漠，桑对他没有一点吸引力。因为在爱情问题上，肖邦与常人有着极大的区别。用加沃蒂的话来说，“如果以爱这个词的完整含义及其后果来衡量，肖邦不爱并不会去爱任何人。这是一个爱情的恋者，他培植情感，就像要刻意与其保持距离，并将其置于音乐之中，……他的爱情体验却化作协奏曲、叙事曲和梦幻般的圆舞曲”。事实如此，他的初恋情人康斯坦斯化作了 f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柔板，他唯一一次谈论婚姻的对象玛丽亚·沃德辛斯卡，也变作了降 A 大调圆舞曲。从音乐中我们知道，他心中的爱太美，绝非人间所能觅求。所以加沃蒂断言：“除了梦中所想，唯一一个让他有过性经历的女人是乔治·桑，他丝毫不觉得受她吸引，彼此的天性是如此对立，但他无力抗衡对方的愿望。”桑也很快明白了这点，她向朋友倾诉道：“他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要寻找的，并非情妇，而是充满爱的陪伴。”

显然，异性的吸引力绝非桑堕入爱河的主要原因。桑是被肖邦的音乐慑服了。她听了肖邦的演奏，以她敏锐的音乐感觉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一下子明白这个文弱的异国青年是个真正的瑰宝。李斯特记录道：“她将肖邦比作自然的低语，自然凭借他的音乐来引导那些才智之士进入某种神秘仪式。”她要把肖邦拉到身边来，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某种她曾在自己的小说中幻想过、描述过的东西：“在潺潺的流水声中，在和风的瑟瑟声中，汇合一个纯粹、甜润、迷人的嗓音，一个像双簧管似的年轻、颤抖的男子的歌声”（《瓦朗蒂娜》）。只有肖邦最具歌唱性的琴声能达于这种境界。为了这个合于自然的纯美之境，她要爱肖邦，这爱有着男女相爱的外表，但骨子里不是。这其中所深涵的东西至少有三个层次的交叠。首先，它是两人的艺术感在冥冥中的契合。这种契合是波德莱尔在《契合》一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感觉：

有如远方的漫长的回声
混成幽暗和深沉的一片
渺茫如黑夜，浩荡如白天
颜色、芳香与声音相呼应（梁宗岱译文）

正是这种艺术上的契合唤醒了肖邦：“我弹琴时，她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那音乐悲哀，是多瑙河的传奇，我的心和她在一起舞蹈……而她的眼睛，那忧郁的眼睛，独一无二的眼睛，它们在说些什么？她靠在钢琴旁，她热烈的目光淹没我……奥罗尔，多么迷人的名字。”这种艺术上的两心相知，使桑与肖邦的关系成为创造伟大作品的契机。

加沃蒂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

在诺昂的一个晚上，她在他面前大谈乡村的宁静和自然的奇迹。

“您说的这些多美啊。”

“您觉得吗？那么把它变成音乐吧。”

于是肖邦即兴演奏，乔治·桑站在他身边，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低语道：

“加油，多么柔美的、天鹅绒般的手指。”

乔治·桑自信地坦言：“他的钢琴向我揭示了他的思想，他的忧虑、困窘、胜利或痛苦，于是我理解他就像他理解自己一样。”这话大致可信。以至莫洛阿问：“谁知道，如果没有乔治·桑这只手扶在他的肩上，没有诺昂神奇的影响，肖邦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能否写出那么多杰作？”我们无法回答，只有神知道。

其次，桑与肖邦的关系还有一个特殊之处，自从桑与肖邦相恋，她就有意识地让自己处于保护者的地位，强调她对肖邦的“母爱”。她一直称肖邦为她的第三个孩子，甚至在给肖邦母亲的信中，她也以母亲对母亲的方式谈论肖邦。桑对肖邦的爱充满牺牲与奉献的冲动。这种情感特征来自乔治·桑少女时代在修道院的信仰经历。她最爱读《使徒行传》，“殉道者的勇气和坚忍精神，适应了她的某种神秘的感情”（莫洛阿）。深受圣·特蕾莎影响的桑，发誓要做个“累得要死的仆人，陵墓的清扫女工，搬运垃圾的女人”。在桑与肖邦共同生活的九年间，她确实无微不至地照顾肖邦，在日常生活中，像个保姆，在肖邦生病时，像个护士。爱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母爱的呵护。连苛责桑的加沃蒂也承认“在诺昂，一切都根据这种高级劳动所必需的便利妥帖安排。肖邦一定在那里处于最适宜于他的创作活动和静心冥思的境地”。

但是情人之间不会有真正的母爱。因为真正的母爱是无条件的，不掺杂任何其他欲念的纯粹之爱。一个照顾病孩子的母亲绝少会抱怨孩子不顺从她的意志，更不会因病孩子的行为不合自己的心意而弃绝孩子。这种无条件的奉献不要回报，一旦以母爱之名的奉献要求回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错觉，一种违背自然的情感关系。桑在她一生的诸多爱情冒险中，经常以奉献性的母爱开始，以移情别恋告终。与儒勒·桑多，与缪塞的恋爱就是例子。我们可以说桑在爱情生活中的母爱角色是精神分析学中所指出的升华(Sublimation)现象。尽管升华有时会表现为“伪装”，但这种心理机制在本能由潜意识进入意识的过程中，却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艺术家那里，它甚至会成为创造的原动力。这种升华给桑以创作的冲动，同时，“升华”夸大和固化了她的“自居”(Identification)，使她以

圣女 / 母亲的形象出现在与肖邦的情爱关系中。但这只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转化，并非现实中的自然关系。因而当肖邦公正仁慈地对待她的女儿索朗日时，她便觉得受到莫大的伤害，认为肖邦“背叛”，甚至不由自主地猜疑肖邦和索朗日的关系，产生疯狂的嫉妒心而与肖邦决裂。在这件事上，肖邦没有丝毫过错，只是他的磊落和善良遇到了混浊纷乱的心理纠缠。我宁愿从心理学而非道德的角度看待此一令人心痛的决裂。加沃蒂指责桑“虚伪”，却忽视了“升华”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与加沃蒂的分析稍有不同之处。

最后，我们回到情爱关系的本质。即加沃蒂所说的“爱这个词的完整含义和后果”。桑一生追求完整意义上的爱，即相爱的人在精神与肉体上的完美契合。她的这个理想在她的杰作《莱丽雅》中作了尽情表述。只是莫洛阿告诉我们，不要读后来桑自己修订的本子，而要读 1833 年的最初版本。桑在书里借莱丽雅之口说出了她对爱的要求。

我的身体被神秘主义的刻苦静修弄得衰弱……在我的精神和肉体之间，不知不觉出现了全面的分歧。

我觉得感受到了肉体的爱情带来的心绪不宁和肉体的欲望越来越大的骚动。我极想一下子把他唤醒，抱在怀里，要求他亲抚。这种亲抚我尚不善于受用。

我在一种说不出的感官快乐的波涛里游泳。

我感到焦虑不安和模糊无力的欲望在刺激我，我觉得我还能爱。

这些自白表达了女性主义先驱乔治·桑，勇敢地提出了女性肉体解放的问题。只是在现实中，在与肖邦的爱情中，她的这个愿望注定要受挫折。

在肖邦那里，爱情与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关系不大。加沃蒂对肖邦的这个特点作了很好的分析：“肖邦以什么方式爱康斯坦斯呢？不是把她当作一个女人，而是当作一个形象，或者干脆就是一种理念，一个唤起音乐和忧愁的由头”。“敬重妇人如偶像的诗人们，其内心深处并不真的渴望这些妇人，而是在想象中令她们栖身于无欲无望的涅槃之境。他们忘了这些有血有肉的尤物会嘲笑那些暧昧、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贯穿肖邦一生，这是潜隐在桑与肖邦关系中的病灶。桑终于明白，肖邦这个人“不能屈服于肉体的粗糙”，他甚至以为情人之间的性关系会“破坏那些美好的记忆”。这场看似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冲突与决裂，其深层原因可以从桑给朋友的信中发现蛛丝马迹：

八年来，我像一个圣女般生活。

我敢担保，他病得太重了，以致他的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

九年来，感觉着生命的充盈，我却被系于一具尸体上。

这压抑不住的抱怨，终于以索朗日的婚姻为导火索爆发出来。它很可以通过精神分析学加以解读。聪慧的乔治·桑也是一个病人，病得不比肖邦轻。

读加沃蒂所提供的肖邦身体状况的细节，我们可以断定，由于严重的肺病折磨，他的肉体不足以承担肉体的所有职责。他的生命如一支蜡烛点燃并照亮家园的命运和美幻的王国，他的肉体便是这融化、滴落的烛泪，流淌、耗竭。他深知生命短促，甚至在他少年时就不断被死亡的念头所追逐。他仿佛下意识地知道他的天职何在，从而冷静而高贵地接受命运的挑战，奉献自己微薄的肉体于艺术的祭坛，在耗竭中创造永恒。桑以她特有的睿智看出了这点，她说“这是个太纤细、太美好、太完美的造物，难以长久存在于我们这个粗笨而沉重的人间”。桑曾爱过这个不属于人间的造物，却不能呵护他到生命的尽头，而肖邦却较入泣珠般地把自己的天才化作珍珠，留给自己的家园，亦留给他流寓的异乡。正如诗人希普雷·诺维德斯说：“多亏他，散落在野地里的波兰人民的眼泪，才得以清澈晶莹地聚集在人性的冠冕上。”

本文所用资料参考了《肖邦在巴黎》，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新星出版社；《乔治·桑传》，安德烈·莫洛阿著，郎维忠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的生活》，安娜·马丁菲吉耶著，杭零译，山东画报出版社。



赵越胜

现居法国。“赵越胜沙龙”创建人。1970 年在北京当工人。1978 年进社科院哲学所。1989 年，移居法国。著有《燃灯者》《精神漫游》《既见君子》等。《燃灯者》曾获中国最佳散文大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Accentus music](#)

非虚构 圣殿在静穆中屹立

赵越胜 | 发现经典

她经历着一个没有过去和将来的混沌的现在。
但光却生自混沌。

建英：

晓玫在香榭丽舍剧院开音乐会了，这是我们一直期盼的。这些年来，我们眼见她在寂寞中持守自己的音乐理念和演奏风格，欣慰之余，便是思索。就像我们常说的，晓玫的演奏太值得一论。

我们早早赶到剧院，天阴阴的，傍晚几丝春雨飘飘，街旁残樱乱落，带着巴黎暮春的忧郁。时间还早，剧院门口却已人头攒动。今晚晓玫的曲目极单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节目单上简简单单印了这么一行，也无中场休息，一气弹全场。从前来听齐默尔曼和索科洛夫的音乐会，曲目都是满满对折两页，从巴赫到拉威尔，跨度极大。而晓玫的音乐会曲目简单到近乎苛刻，她凭什么吸引观众？我站在门厅打量听众，从十岁左右的孩子到坐轮椅的老人，从身着晚装的淑女到穿牛仔运动鞋的青年，各色人等齐全。一位妇人气喘吁吁地赶到售票处问票，票房小姐说已全满，让她等开场前的退票。看她失望又焦虑的样子，我对 Sherry 说，晓玫的“粉丝”真有“死忠”的。

香榭丽舍剧院是巴黎的头牌剧院。剧院每年寄来全年档期安排，念念演出者的名单，真是群星灿烂。这座剧院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举足轻重。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日，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就在这里首演《春祭》。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惊世骇俗，更有半裸的尼金斯基激情四射的天神之舞。那时巴黎还消受不了这种新潮玩意儿，结果这座高雅的剧院成了角斗场。乱阵中，悄悄坐着一位奇女子——可可·香奈儿，她刚在康朋街开了时装店，不用多久，世界上的时髦女士就要跟着她的裁剪刀转。更妙的是，十年之后，她资助了《春祭》的复演，并成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情人。

进剧场坐好，抬头看纳比派巨擘莫里斯·德尼手绘的天顶，光彩斑斓，透着几分异国情调，想一会儿有位东方女子要在此一展琴艺，觉得很合调。剧院三层楼，近两千座，竟是座无虚席。只为这场总长不过一个小时的《哥德堡变奏曲》音乐会，晓玫的号召力真惊人。灯光渐暗，剧场嘈杂的人声随之渐弱，瞬间便是一片寂静。台上一架斯坦威，台后一帘深棕色幕布，柔暗的灯光洒在黑白键上，舞台活脱德拉图尔画作的色调。人们屏息等待，时间仿佛凝滞。突然，晓玫静悄悄出现在舞台上。她穿的仍是那件深咖啡色中式丝质长衫。以前和她说过几次，让她置几件上台的行头，但挑来挑去最后还是这件。后来才明白，她着装有音乐上的考虑。人家女演奏家上台，谁个不袒胸露背，光彩夺目？唯独晓玫，演出服不仅款式简单，连色彩也选暗调子。她觉得，演奏者不要用外在的东西干扰听众。用她的话说，是“人要藏在音乐背后”。她一贯以为，演奏者不是主角，只是一个传递音乐的使者。明白她的意思后，我调侃她：“敢情您这大褂是上台战斗的迷彩服啊。”她大笑说：“就是这意思。”此时，掌声骤起，依稀听到有人呼喊。晓玫落座，低头凝思，其实不过片刻，我却觉好长。待她手落声扬，那主题咏叹便飘然而至。

一九九九年，Harmonia Mundi 唱片公司发行了晓玫的《哥德堡变奏曲》音碟，被各古典音乐杂志评为震惊 (Shock)，五音叉 (Diapason 5)，超强 (ffff)，十几年常卖不衰。美国

巴洛克音乐专家布雷德利·雷曼 (Bradley Lehman) 将这张碟和古尔德一九五九年的演奏录音称为“并峙的双峰”。雷曼先生曾在牛津大学《早期音乐》杂志上撰写专论“巴赫羽管键琴、管风琴、古钢琴中的律学”，自己亦是羽管键琴演奏家。他对晓玫的演奏有许多精辟的评论，待我慢慢说给你听。

多年听晓玫的录音，对她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今晚，琴声一起，我就感觉到变化。十年后的晓玫，烟口气全消，似是焚香顶礼而来。指下音乐如出自幽林老泉，一粒粒晶莹的水珠淌过键盘，呼吸分句沉着从容，织体表达疏朗有致。要找个色彩来形容晓玫指触音色，我取“青翠欲滴”。法国《费加罗报》著名乐评人波蒂 (Petit) 曾评价晓玫的音色“fragile”，倒与此意暗合。

巴赫称自己这部作品是“由各种变奏组成的抒情曲”。主题咏叹的旋律极优美抒情，其中蕴藏着由随后三十首变奏倾诉的情感。“咏叹”首先是歌唱用语，这部变奏的首要特征就是“歌唱性”。其实又何止这部变奏曲，巴赫的音乐本来就是基于他的众赞歌上。歌唱是巴赫音乐的灵魂。这并不奇怪，路德搅得欧洲翻天覆地之后，竟以创作圣咏为精神归宿，体悟出“为了领会灵奥的世界，耳朵胜过眼睛”。巴赫是位虔敬的路德教信徒，他漫淫在这一传统中。这位朴实笃信的人，把自己内心的虔敬化作朴素又炙热的歌咏。他的精神活动需要内心的歌唱。那些创作手法，赋格、主题扩展、倒影进入……不过是为了解释“宇宙之和声”（开普勒语）。所以它要求演奏者心怀敬畏，在心里和指下歌唱。

晓玫对此心领神会。听她诠释的主题咏叹，你会惊讶巴赫的抒情开始得如此典雅。相比之下，连古典时期的维也纳风格都略显卖弄风情。这是自内心唱出的典雅，深情又矜持。三分多钟的演奏，晓玫始终保持气脉的贯穿，分句恰如歌唱换气的“气口儿”，复调展示峰回路转。各声部的旋律线清晰分明，又和谐融洽，细腻的指触做出微妙的力度变化，调整着音色的明暗对比。相比浪漫主义的绚丽色彩，巴赫的音乐更像黑白照片，仔细体会能见出灰黑层次的深入浅出，虽不眩目，却经琢磨。晓玫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一幅层次丰富的黑白照片，留给我们无穷的想象空间。

当代演奏名家，无人不弹巴赫，但经得住考验的演奏并不多。原因之一恐怕是这些大家在演奏巴赫时，太多地表现了自己。他们技艺高超，自我超强，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老巴赫撂在一边，自说自话起来。他们什么都有，唯欠一点敬畏心。伟大的尤金娜弹奏的巴赫就是显例。其节奏之飘忽，分句之任意，速度之随便，整体结构之无章法，简直让人不忍卒听。涅高兹说她“有些任性”，实在是太客气。她岂止“任性”，简直就是恣意妄为。当然，这个批评并不稍减我对她的敬意。一个敢对暴君说“不”的人，该有多强大的精神力量。超常的坚韧难免伤及均衡，而诠释巴赫却需有强大的平衡感。结果，性格强，却可能成了弹好巴赫的障碍。

再看被雷曼博士誉为“双峰”的两个演奏，古尔德一九五九年和晓玫一九九九年的《哥德堡变奏曲》录音。古尔德的演奏汪洋恣肆，但不出大格。各变奏的处理匠心独具，整体上却均衡完整。主题咏叹中的那些装饰音急促轻灵，乍一听，不是巴赫的味道。但设想在巴赫时代的羽管键琴上弹奏这些装饰音，其效果很可能如此，便知古尔德的诠释虽显突兀，却有道理，有放纵，亦能控制。虽是“六经注我”的弹法，但“经”还在，只是句读、考订有别。晓玫的演奏却是另一番景象。她仔细考量每一变奏的结构和句法安排，特别是那些内分句 (inter-phrases)，清晰谨严，处理装饰音的手法也有说服力。像主题咏叹第十、十一小节左右手呼应的波音，做得有种说不出的圆润典雅，极打动人。她是“我注六经”的弹法，不求新奇怪异，只求自然会意。

在巴赫的音乐殿堂里，古尔德是排闼直入，坐下便弹，每有兴会，便手舞足蹈，就算老巴赫在旁也徒呼奈何，只能认这孩子天纵英才，即使骄纵亦由他去。晓玫却是三叩华门，袅袅升堂，焚香净手，澄心滤意，在珠帘四下的雍容静谧中唱给老巴赫听。老人家会心地微笑，带着慈爱与赞赏。我以为，古尔德弹得辉煌，晓玫却弹得庄严。古尔德的巴赫是“他之中我”，晓玫的巴赫是“我中之他”。古尔德天马行空，晓玫却执著地站在地上。古尔德和大师时有争执，晓玫却只向大师致敬。古尔德对自己的冒犯往往满不在乎，晓玫却时常谦逊地心存犹疑。

收束我奔逸的思绪，回到音乐厅里吧。

第三变奏在我心目中，是巴赫音乐建筑美的象征。从谱面上看，第二、三行低音谱表似用音符画出“檐牙高啄”。在录音中，晓玫弹了一分二十二秒。今晚她弹得稍慢，显得更从容自由。右手 non legato 与左手 staccato 配合得天衣无缝，断奏如飞石落键，每击力道饱满又清晰区分出轻重层次，声音通透，弹性十足。古尔德弹得琴键火星四溅之处，在晓玫手下却如汨汨山泉，欢快地流淌。古尔德手舞足蹈之处，晓玫却身形稳定，无任何多余的肢体动作。力量皆自内而发，手在键上动作极小，似与琴键连为一体，真如约瑟夫·迦特所言，琴键成了手臂的延伸。乐曲几经折冲回还，戛然而止在符点四分 B 音上，一座坚实恢宏的建筑霍然眼前。晓玫却并不收束，依然静坐，似演奏仍在继续。听众也在等待，瞬间静极，落针可闻。巴赫在终止处指示了一个自由休止，不在音符而在小节线上，似乎给你打开一扇门，要你进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珍宝。一切都妥帖、自然、均衡、理智。这种风格难道能用“巴洛克”这个名称一网打尽？它同贝尼尼的圣特蕾莎祭坛的迷狂，同维尔茨堡主教堂的奢华，同鲁本斯画作中的肉欲横飞竟归同一名下？

那天电话中曾和你谈起过这个问题，借这封信再多说几句。布克哈特用这个词的本意是概括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绘画与建筑风格中的某些趋向。而后，艺术史家将此词推而广之，用来标识一六〇〇年以来近二百年欧洲各种艺术形式的风格。这带来了时期划分上的方便，也带来具体艺术鉴赏活动的混乱。“巴洛克”一词，究其本意，是夸张、怪诞、奇异，是不平衡、重琐碎、尚极端。用这样一个标志某种特殊艺术风格的词，来概括一个漫长时期的艺术精神，这有陷我们于空疏的危险。我宁愿避开这个词，从整个艺术史的角度体会每一位艺术家的风格气质和精神归属。以巴赫为例，除了时代的吻合，其音乐的精神气质和“巴洛克”一词的所指很少相似。沃尔夫林曾就艺术的风格给出两组原则。其一，古典 / 文艺复兴，其特质为清晰、冷静、可控性、理智标准、和谐与平衡；其二，巴洛克 / 文艺复兴，其特质为明暗对比、戏剧化、运动感、色彩与激情。论及巴赫的音乐特质，显然更近前者。此外，巴洛克风格的兴起，是对宗教改革的反动，我们在研读巴赫音乐时不可不察它与路德新教的关系。

我更相信巴赫的音乐气质天生就是温克尔曼所定义的古典表现平静但打动人、表现静穆，

却并不冷漠。即使是那些极抒情的段落，亦有一种“高贵的单纯”和“肃穆的伟大”。我甚至猜想，假如巴赫以《拉奥孔》为题材谱一部清唱剧，一定会同那座希腊雕像一样，“痛苦却不哀号”。亨利·朗似乎也有此困惑。他以区分早、晚期巴洛克来摆脱这个矛盾，称巴赫时代的晚期巴洛克为“古典风格巴洛克”。其实，这是学问家作茧自缚，巴赫的广博深奥是一个概念所能尽括。论及巴赫，其质也诚，其器也广，其魄也雄，其情也柔，这“诚广雄柔”解说不尽，非在凝神聆听中体会不可。

谈及这些涉及艺术风格定性的话题，意在展开“深度诠释”的视野，把握更丰富的思考背景。图里克在讲述巴赫音乐的演奏原则时指出，如今的钢琴演奏者接受的大多是十九世纪以来钢琴技法的训练，是以现代钢琴的技术要求来“反弹”巴赫，但“巴赫的音乐是从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感和结构感中成长起来的”。她还说：“幼年时期训练而形成的下意识思维习惯会自然在演奏中表露出来。”听阿格里奇演奏的巴赫，便知她说的极有道理。要体会巴赫的风格，接近“本真”地演奏他的作品，倒真需要离现代钢琴演奏的“范儿”远一点。收束浪漫主义喜爱的个性张扬，以敬畏心去眺望远天。与其不知轻重地“自创一格”，不如深思熟虑地“循规蹈矩”，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亦不远矣。

晓玫停顿片刻，微微抬起头上视，能见出额上薄汗。后来她对我说，现场演奏的好处是能自由调整每一变奏的间歇时间，把停顿也化为音乐的一部分。而在录音棚里，间歇时间都由录音师掌控，切得整齐划一。所以听录音总感觉有点呆板。在音乐会上，一个变奏结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感觉，等到灵光来临的一刹那再下键。我想那天她在台上的等待就是为此。突然，第七变奏绝壁悬瀑般直泻而下，激流翻卷，飞沫掠岸。迅疾之下，却见出分句的妙处，快速跑动中同样有色彩光线的微妙变化和清晰的乐句轮廓。高手操琴，越在织体繁密处越能听出峰回路转的空间。这是极高的演奏要求，不下苦功断不能到此境。细听晓玫的指触，竟漾着几分古意，那些勾抹击弹的功夫早已化为无形。由于对位的精巧，巴赫的句法有时同旋律线并不一致，巴赫难弹也在此。你不能像演奏肖邦那样，凭追随旋律的起始而自然分句。同样是密集音群的快速跑动，巴赫与李斯特的韵味完全不同。我那天在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看羽管键琴、楔槌键琴和现代钢琴不同的机械构造，似乎对巴赫使用的键盘音响有所领悟。我猜想巴赫的键盘乐作品大部分是为双键盘羽管键琴所做，而羽管拨动琴弦的感觉不同于琴槌击弦，所以它的快速跑动的效果一定更近于嵇康所言：“轻行浮弹，疾而不速，留而不滞，翩绵飘逸，微音迅逝。”

几年前，晓玫接受法国《钢琴》杂志采访时，开玩笑说，她觉得巴赫的音乐与佛相通。我对此万不敢从，曾力驳其谬。后来再想，晓玫也有她的道理。她沉浸于巴赫音乐，感受其深邃正大，亦是感受“正观之心，湛然清净”的境界，在巴赫音乐自身的崇高感中，体悟“法相庄严”。这与康德的头顶星空，岂非异曲而同工？怀有宗教感的虔敬之心，会超出个人遭际而开敞慈爱的胸怀。在巴赫，这慈爱的胸怀表现为他的音乐，这音乐亦有“普度众生”的大慈悲。我以为，在《哥德堡变奏曲》中，这悲天悯人的情怀集中体现在第二十一变奏这支七度卡农之中。

晓玫抬起手，又深深吸气，然后下键。指下飘出轻柔的声音，像一支弱起的咏叹，辗转低回，几分仰望，几分祈求，以完美的 legato 奏出婉转的长乐句，飘飘摇摇。弱音如低首默祷，随后，适度渐强，似暗夜将退的天穹，残星闪烁，远山晨曦却已缓缓升起。如此深静内敛的诠释，靠内分句的曲纤起伏，编织着经纬分明的壁挂，仿佛勾勒着巴赫心中人子的圣容。这表达尊崇的音乐，无危苦之声，却有大哀之情，然大哀无怨有爱，巴赫倾泻出的人神之爱若汪洋大海。主题几次卡农式进入处理得精致妥帖，似要唤你跟上咏唱：“你降自苍穹 / 来抚慰人间的忧伤与创痛。”（歌德）一个诚挚、虔敬又高贵的演奏。郎吉努斯曾说：“崇高并不是激情而是伟大心灵的回声，人们赞赏崇高，而它往往朴实无华，引起我们对世间伟大事物的渴望，这才带来崇高感。”这正是晓玫对崇高的领会。她最欣赏卡萨尔斯的话，巴赫是把神圣和平凡完美结合的典范。她总强调“要让巴赫说话，而不是由我来替他说话”。她谦恭地仰望伟大，又把伟人当做自己心灵的朋友，与他们平等对话。她传递给我们源自巴赫音乐的崇高感。她在巨人庇护下，耕耘自己的心田。

还记得巴赫那张亡妻后的画像吗？一七二〇年，巴赫短期外出，归家时爱妻芭芭拉已经去世，天人永隔竟在转瞬之间，或许是“望庐思其人”，画像上的巴赫一脸愁容，满眼哀伤，似泪水流盈，这条硬汉，能拔剑与人格斗于暗巷，亦能一腔浪漫柔情。贝多芬说他是大海，还有什么比大海更能接纳一切希冀与绝望，收获与丧失？在这部展示巴赫心中一切欢乐与创痛的变奏曲中，第二十五变奏最体现巴赫的绕指柔肠。我曾私下称之为“恋人絮语”，不敢唐突大师，实在是闻其声而心所至。今晚晓玫真弹得让人心碎。

第一小节右手奏出的音声深婉摇曳，竟然带出舒伯特的味道，是 G·莫尔为费舍·迪斯考伴奏 Lieder 时的断肠之声，是《水上吟》《菩提树》忧伤的前奏。低音区若隐若现的三连音不正是肖邦降 D 大调前奏曲中滴落屋檐的雨声吗？涅高兹说，他每次弹肖邦都会想起巴赫，说肖邦根本就是个古典主义音乐家。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肖邦每日以巴赫为功课绝非徒费时光。这旋律忧伤凄美，在不同声部间交织缠绵，似诉不尽的柔情。第八节是谁欲言又止？右手两拍休止却换来左手无奈的推脱。十二节右手三十二分音符的急切是恋人的挽留，还是分手的绝决？晓玫指触的柔和细腻营造出氛围蕴藉，似勾描着红烛明灭，罗帷掩映中的慵懒。弱奏进入的反复，仍是絮语喁喁，左手不断的固定音型像极催人更漏。无奈一庭愁雨，半树梨花，断肠人终赴天涯。突然的宁静，一个延长的休止，跟着，以极弱奏处理主题倒影进入，似是最后的叮咛，凄清柔婉竟直逼美成名咏“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晓玫的演奏激起我诗意的联想，你大概会说我“恶习不改”。这是我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讨论的问题。这个题目要说的话还很多，信已太长，下封信我再给你讲我的道理。

建英：

还记得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读汉斯利克的《论音乐的美》吗？你颇喜他的形式主义立场，我却坚信作曲家的活动必再现某些“内容”。我对汉斯利克有种出自本能的反感，因为他要把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生生从我们怀里夺走，关入冰冷的理论牢笼。你反对“描述”音乐，可有什么办法？只要想表达我们听音乐的感受，就非“说”不可。而一切“说”都是

用“词儿”来“说”，一切“话”都是用“字眼儿”组成的“话”。正像一切文学 (Literature) 都来自文字 (letter)。

二〇〇七年夏，我自第纳尔乘船往圣马洛。船行海上，见水天空明，海鸥环翔，波浪轻柔，落霞满天。海天的瑰丽引我有心试着组织句子。正搜肠刮肚找词儿，《平均律》中的 C 大调前奏曲突然鸣响耳畔。声音真切，如从胸中涌出。刚刚组成的句子便音韵铿锵地散落在乐句行进间，这支前奏曲正是眼前景致的最好描述。不是我们想用文字解说音乐，是音乐带着文字撞进我们怀中。深解巴赫的施韦泽便是从音乐诗学的角度阐释巴赫的音乐。他用法文写就的《巴赫传》第一版，副题就是“诗人音乐家”。他把巴赫看做一位用音符做诗的诗人。其实若要从哲学角度思考音乐，最聪明的办法是避开本体论而从语言入手。维特根斯坦对音乐的思考比汉斯利克更深入，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你知道，《哥德堡变奏曲》是卡农手法的经典。卡农这个源自希腊的字，其本意就是“规则”。它以声部模仿为特征，依循严格的规则，表达丰富的乐思，是名副其实的“戴着镣铐跳舞”。以这种方式作曲，像我们先人依声律作诗填词。声韵有宽窄，格律有平仄，词牌有长短，但这些规则在诗人手中千变万化，表现无限丰富的人类情感。以严苛拘束的形式，表达自由无涯的想象，是诗人所为。同是五言律，可闲逸如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可悲凉如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是《贺新郎》，在辛稼轩笔下，能描摹“风前月下，水边幽影”的凄凉，也能长啸“试看手，补天裂”的豪放。巴赫一部《哥德堡变奏曲》，以卡农手法写尽人间悲欢离合，其丰满卓绝，化卡农的严格规则为抒摇九天的巨翼。

没有幕间休息的音乐会有点严酷，那些以音乐厅为社交场的淑女名媛无机会一展当季时装，因为无论你如何打扮，也只落得“锦衣夜行”。今天来这儿听晓玫的人多是纯粹的爱乐人。台下观众与台上的晓玫似乎有交流，随着晓玫的演奏进入了一种境界。第二十六变奏，晓玫又给我们展示了巴赫向奥林匹斯山的攀登。老巴赫转身之间抖落掉身上的缠绵，又英雄般地站立。这支变奏是高难度的曲子。因为巴赫当年是为双键盘羽管键琴所写，用现代钢琴演奏，需双臂交叉弹奏。身体要在不平衡中求平衡，以处理那些丰富的表情。巴赫似乎想要人们在这支恰空舞曲中酣歌劲舞，晓玫的演奏动态十足，结尾在她手下云飞海立，我真有些不相信是晓玫单薄的身体操控这撼人的声音。她俯身键盘，在黑白翻卷中左擎右擒，上收下纵，竟能见出《大叔于田》的身影“执辔如组，两骖如舞”。

第三十变奏集腋曲，晓玫又把巴赫从奥林匹斯山带回我们身边，给我们唱出市井叫卖声萝卜大白菜”和忧伤的德国骊歌“你远行已久”。巴赫赋予这曲调精美的音乐形式，而晓玫的演奏却“泄露”了巴赫严肃外表下暗藏的幽默。我不知晓玫此刻是什么感觉，但见她放松地加大了身体动作，像在逗孩子玩儿，又像和朋友开着玩笑，掩饰送别的感伤。而我却忍不住想起黄昏冷风中的老北京，胡同儿里有人推车吆喝，“心儿里美萝卜，又甜又脆赛鸭梨”，想起先人伤别的表白，“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且慢，这最后一支变奏还有更丰厚的内容。巴赫的日常是充满神性的日常，是上帝不离不弃的日常。在他的音乐中，人性洋溢饱满，神性亲切怡人。这正是晓玫最喜他之处。在我看来，巴赫心中的上帝，就像斯宾诺莎那个“具有一切或无限属性的存在物”。他低到尘土里，又遍布宇宙苍穹。晓玫以弱奏反复了前九小节，给前段一个对比鲜明的结构。随后却转入庄严的风格，仿佛市场上的人群在结束日常劳作后，又步入教堂，满怀感恩赞美上帝的慈爱。

这圣洁的情绪，在晓玫手下愈发浓郁，至第十三节，已汇成众人合唱的赞美诗。晓玫说过，每弹至此，她都会“浑身发紧，想流眼泪”。结尾处，一个饱满的自由延长，赞颂之声，翩然而上。晓玫似在这赞美声中，循圣母院钟楼旋梯，缓缓攀登，终达楼顶，推开窗，晚风扑面，钟楼下逝水悠悠，映着朗月繁星。随后，主题咏叹再现，已是“万物皆备于我”。

音乐会结束了，观众起立鼓掌十几分钟，晓玫无奈又回到台上加奏了两首小曲。晓玫退场后，激动的观众仍不肯散，聚在大厅等晓玫签名。长长的队伍绕大厅好几圈。我们稍等片刻，想晓玫一时半会儿抽不得身，便先走了。后来得知那晚签完名已十一点多钟，晓玫去音乐厅旁的餐厅吃饭，结果餐馆中多是音乐会的听众，见晓玫进来，又全体起立鼓掌致意，良久不歇。

我前面对你说过雷曼先生极推崇晓玫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他有一段极妙的比喻来比较佩雷亚和晓玫演奏的区别。他说：

你是一座城市中，懒散而舒适地靠在沙发上。世界坚实而牢靠，《哥德堡变奏曲》开始了……音乐美妙地进行。当下此时的体验是美妙的……在此寂静的冥想中，你美妙地听了一遍《哥德堡变奏曲》，这是佩雷亚的演奏。

你乘一叶扁舟荡漾在宁静的波心。《哥德堡变奏曲》开始了……但你注意到这个过程中多了些什么……由于小船带动你的身体，随水波微微摇荡。你自身处在这个不断的运动中。你可以设想音乐在分分秒秒中变动不居，给你展示出《哥德堡变奏曲》中那些微妙变化之外，远胜于在坚实干燥的陆地上你所能想象的。作品自身揭示出比你所熟知的更多维度。它不仅仅是完美，它自身带有某些美的非理性。那起伏跌宕的瞬间正像你的小舟，飘荡在波浪之间，倾听者在运动中……你更能感受到超脱控制的自然之力的影响，你的倾听因此而更丰富。这是朱晓玫的演奏。

听佩雷亚演奏，时间感是凝固静止的。听朱晓玫演奏，时间感是流动的。听佩雷亚，如果你走了神儿，则一切仍会循规而行，等你回过神来，一切原封未动，你自己回到了原处。听朱晓玫，如果你片刻迷失，时间自己会轻轻摇醒你。这丝毫不关乎演奏中的节奏的起伏，倒毋宁说是朱晓玫使听众感受时间的方式所至。

曾有听众对晓玫说，每次听你演奏，都让我落泪。是什么东西让一位东方女子演奏的西方古典引得西方听众落泪？非真情所至，不能让人魂销魄动。情由心生，而此“心”却是我们生死荣辱的家园，它是“经验”，历练，是历史，是“时间”。晓玫“迫使”西方观众感受到何种不同的“时间”？

人在历史中感受时间。而个体的历史不过是经历自己的生命。战后的西方人，在宁静和平的时间之流中，按部就班地出生、成长、求学、就业。所有的离乱和苦难在他们不过是传说中的历史。如果他们有才分成为一个音乐家，他们会拜师、考试、竞赛、演出，他们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上去感受音乐。他们习得的是文化中的音乐。在他们，时间是自然的流驶，

83

84

是外在的生存框架。晓玫感受的时间却是困惑着圣·奥古斯丁的时间，它不是平静的时间之流，而是“由心灵去度量的时间”。这时间会弯曲、塞滞、回返。当晓玫把一架钢琴搬到农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稍抚几曲时，时间便化作灵肉的一部分，成为纯粹“内在”的。如果海德格尔所说“生存性的本来意义就是将来”真有道理，那么，晓玫在那一刻因没有将来而失去了生存性。但这只能是外在的生存性。因为她在悄悄地读巴赫，这不是为了将来，而只是为在自己的心灵中测度和体味生命。这时间是内在于她的，她经历着一个没有过去和将来的混沌的现在。但光却生自混沌。她偷赏吉光片羽，因时间不再流动而积蓄愈丰，沉淀愈厚。她说那时偷弹一首巴赫的小前奏曲“觉着美得心颤”。这可不是那优雅的济慈告诉我们的，“美即是真”，这美是难，直教人生死相许。

听众听到晓玫演奏的巴赫会掉泪，因为晓玫的巴赫曾在苦难中浸泡，曾珍藏于渴慕着的心灵，曾在没有时间的黑洞中等待着天地诞生的刹那。在西方钢琴家随便给你一首三度卡农的地方，晓玫却让你体会一肩凉雾，满耳秋声。眼下时有灌水“教授”教导我们那个时代的“美妙”，但愚钝的我们却在他们看到鲜花的地方只看到鲜血，所以死活不肯回到那地方去。尽管悲凉苦难能玉成我们的人格，我们却更喜春花烂漫处的园柳鸣禽。

以自己的心灵度量时间的晓玫，练得苦，思得深，在演艺界这个名利场中，她极低调，只固守自己的标准，那美的召唤，只建筑自己心中的圣殿。她几乎本能地拒斥一切市场化的操作，对许多让她扬名立万的机会说“不”。我有时会翻阅各种媒体乐评人对她的演出和录音的评语。一次见《法兰西学院评论》的乐评人说她的演奏是里帕蒂·哈丝姬尔一类钢琴家“神奇的再现”(Le miracle se reproduit)。我想这个评价够高，告诉她，晓玫或许会“得意”一下。打过电话去却被她硬生生一口顶回来，“他太夸张了”，语气有点恼火。我问，你是不是就怕人夸。她想想说，“有点儿”。前些年，法国最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伯尔纳毕沃，在他的节目中采访晓玫。采访结束时，他依照常例，问晓玫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向上帝提一个要求，你会提什么？”晓玫冲口而出：“我要他介绍我认识巴赫。”全场观众绝倒。晓玫住处在新桥桥头，出门左拐百米，就是艺术桥。桥上终日喧闹，常有酷儿即兴表演。摇滚、饶舌、街舞，各显其能，围观者彩声不断。晓玫推开窗便市声震耳，关上窗烦嚣顿失，岑寂袭人。通常，晓玫独与巴赫对话，倒是一幅陶潜诗意：“斯晨斯夕，言息其庐，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晓玫不善饮，但巴赫赋格声起，自是春醪满堂。日复一日的练习，也够苦，会有烦躁不舒，肩酸手硬之时。晓玫会下楼，沿塞纳河左岸过艺术桥，进卢浮宫。她爱去北方画派馆，在丢勒、布鲁盖尔、维米尔的画作前静坐，沉浸在这些大师画作单纯质朴的宁静中。她爱北方画派，因为巴赫是一直往北走，从阿恩斯塔特往吕贝克，步行近四百公里，为了听布克斯胡德演奏管风琴。在深秋的凄风苦雨中穿越哈尔茨山谷的巴赫，绝想不到三百多年后，有一位中国女子，会献身于他的音乐。

二〇〇五年，晓玫要去录《平均律键盘曲集》，这是她多年的心愿，她开玩笑说“录完《平均律》，可以去死了”，颇有“朝闻道，夕可死矣”的古人遗风。临行前她有点紧张，因为录音地点是徐亚英先生用明希家族的一座大谷仓改建而成的音乐厅。晓玫不熟悉它的音响效果，租来的琴也不顺手，但却语气低沉地说“反正拼了”，那坚韧果绝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先录好第二册，听后她不满意。这很正常，晓玫对自己要求苛刻是一贯的，我几乎想不起来她对自己录制的哪张唱片比较满意。待听了样带，确实，最后几首赋格弹得不够从容，不是她的最好水平。她不说话，又投入第一册的准备，而这次录得极成功，总体把握游刃有余，人琴似乎融为一体。我个人以为是《平均律》最好的录音之一。待她录制的海顿问世，好评如潮。晓玫送给我们的片子，我没急着听，先寄给了你。待夜阑人静时，我到听音室独赏。以我阅片之多，如晓玫这样典雅、精巧、抒情的演奏，竟想不出有第二人。第三十八号F大调奏鸣曲的广板乐章美得让人心醉，那略带忧郁的深歌慢吟令我想起维吉尔《牧歌》的诗行：“啊，在什么辽远的将来才能回到故乡／再看见茅草堆在我村舍的屋顶上。”

我常想，吾辈何德何能，竟蒙上天垂爱，能在这个不太平的，甚或暗夜将临的时代一窥天光，听到竞马的歌唱，晓玫的琴声？恐怕老天就可怜我们这点“痴”。再想，竞马之歌唱，晓玫之弹琴岂不也痴？痴痴相遇亦是幸事。那位远在美国密歇根的雷曼先生曾为晓玫引用过詹姆斯·泰勒的诗：“谁知我们如何攀至山顶／但只要我们攀登／便能享受旅途的迢遥。”我想他也是一“痴人”，而痴不就是因“知”而“病”吗？

几天以后，我们去给晓玫送新烤的面包。她喜欢，说比面包房烤的好。滨河大道无法停车，便坐在车中等她下楼。见她匆匆跑过来，宽袍飘飘，知她又在练琴。台下的晓玫素面朝天，憨憨笑着，温和的像邻家大姐。河风荏苒，吹乱她的短发，霞落晚树，映在她的肩头。她接过面包连声道谢，转身回返，不停回头招手，见她常年伏琴的腰背微曲，缓缓消失在人流中，心中漾上感动。正如巴赫的神圣不离俗常，美与高贵亦藏身于日常操持。生命中所求不多，但执著的那点儿东西却一定是至高的境界。卡夫卡对此亦悟得深：“我们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中心去，然而我们要在地球上爬着找到一块清洁的地方，有时阳光会照耀那块地方，我们便可得一丝温暖。”

巴赫埋骨于他服务多年的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没有雕琢的装饰，只一块黄铜牌平铺地上，注明他的生卒年月。你如不经意，会踩着它走过去。巴赫的胸像安置在瓦尔哈拉圣殿，德意志民族的先贤祠，基座七十七号。这座圣殿隐匿在巴伐利亚多瑙镇的山丘上，周围松柏满谷。多瑙河在它脚下静静远去，它俯瞰多瑙平原的绿野良畴，天低树远，一派庄严。它远避尘嚣，远避煊赫的声名，屹立于静穆之中，因为那些伟大的灵魂知道，静穆才是永恒。

附注：

- 一、感谢美国布雷德利·雷曼先生慨允我自由引用他的文章。
- 二、文中所引里克，皆出自她著《巴赫演奏指南》，有盛原先生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
- 三、卡夫卡的话，引自他的《致父亲》一书，有张荣昌先生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四、文中所引歌德诗作，系梁宗岱先生译《流浪者之夜歌》。谨致谢意。



赵越胜

现居法国。“赵越胜沙龙”创建人。1970年在北京当工人。1978年进社科院哲学所。1989年，移居法国。著有《燃灯者》《精神漫游》《既见君子》等。《燃灯者》曾获中国最佳散文大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Giammarco on Unsplash](#)

非虚构 辅成先生 赵越胜 | 发现经典

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
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

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

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

——托马斯·阿奎那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四〇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师生缘分？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来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这事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冽，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〇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子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小姑娘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子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喊就是他，

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瞬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挟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手上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这下子事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八〇〇块，重伤一六〇〇，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盛夏时节，山中雨水充沛，林木绿色逼人，冬天干枯的溪流又喧腾起来。河道曲折处，水石相激，静夜远闻，隐隐若有歌吟。年轻时人不经事儿，心情苦闷便意志消沉，坚持多年的读书计划也停顿了，常与好友瓦宁携薯干酒半瓶、鱼皮豆一包、手风琴一架，倘佯林下溪畔，抚琴放歌。一次薄暮时分，俩人高卧青石之上唱得正酣，忽见一条两尺青蛇窜出密草，随琴声婀娜起舞。不知几次夜半扶醉而归，戴师傅严斥我放浪形骸。但我仍不知歧路而返。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损毁，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翠之间。登上山顶烽火台眺望，远天紫纱轻幔，若沧海浩淼。峰峦间雾霭纠缠，如群岛隐没波涛间。长城随之起伏，分割关山一线。

京畿一带本是古幽燕之地，想陈子昂登台“念天地之悠悠”处就在近旁。在这天地雄阔浑涵之间，我身心如经大涤，止不住鼻酸眼涩。前几日尚觉性命攸关的失败，今日看来，不过鸡零狗碎。世界何其美好，人生何其诱人，少年心事岂能囿于尺寸得失。于是，向群山顶礼，欣然下山归去。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轿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权争。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一次散步时，大谷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纯粹理性批判》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

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裁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清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颌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上来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迎接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急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有什么问题？我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个“基本上是文盲”

（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在我们这些心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动，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动。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动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那时我尚不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大半借用苏联党校的哲学教科书，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辩，纵接希腊，横贯东西的大哲学家。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即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

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屎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毛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患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跟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藉。我们很可能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摆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二〇四”。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三

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二〇四的门。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二〇四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匀称，头发梳得干爽，一付南方妇女精明干练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里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不用讲稿，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沙翁。便嗫嚅到，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

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莎士比亚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郊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得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 rich peasant，你是 poor 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 39 块 8 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 200 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 7 路无轨去动物园换 32 路回北大，我乘 5 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四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处——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轿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先生大约是因了这名声才约我去那里。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的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想拿到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毛耳边说周的坏话。先生以一介善良书生之心，猜度党内残酷内斗，显得有点天真迂阔。其实，从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毛对周的不满早就表面化了。在毛看来，周身边聚集着一群随时准备清算文革的人，而这群人早晚会清算到他头上。毛对周的防范打压已是党内公开的秘密。周去世之后，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多集中在毛周关系上。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也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贴。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说怎么会如此。如果毛这样认定，则国事糜烂更加不可收拾。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

生不似往日的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只是深知专制体制全无人性，从心里厌恶这种粗鄙野蛮的权争。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只是当局从苏俄学来的这套党国制度，让权争祸及百姓。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绒帽的耳护，再带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羞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鸣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到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讨论学习当局的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起哄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是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稽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

我翻看这本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后来我知道，它不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

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许是十载文革戾气上动天庭？许是朝冠夺鼎后千百万冤死的冤魂大放悲声？毕竟天地一怒无人能阻。只恨苍天不恤孤贫，又夺我中华无辜百姓几十万性命。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伊拉斯莫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学校工厂内存有角钢、木方等材料，机械班的老齐、老穆几个哥们儿就拿来又锯又焊，盖起了号称“抗十级地震”的棚子。其实学校早就没人了，盖好也少有人住。那天我和祖卫去看老齐盖的棚子，随后就溜进了教学楼。地震之后，近十天没进过楼。站在教室里，见景物依旧，只是人去楼空。课桌讲坛上积满了灰尘，没有了往日的笑语欢声，没有了先生讲课的川音。我默默看着，有点伤感。祖卫突然唱起歌来：“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满银色月光。寻找往日踪影，往日踪影已迷茫”。歌声优美悲伤，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突然，我极想去看一看先生，不知他的地震棚盖得如何。说走就走，从清河直奔成府。

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呆。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极达观潇洒的样子。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损毁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走，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点评。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稽康“七不堪”、“二不可”，推脱的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长起来的年轻人倒可能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伊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拚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伊拉斯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伊拉斯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伊拉斯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舒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又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送先生回家。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又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衰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帖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篇文章的。我竦然。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衰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在拉·波衰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象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衰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衰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绊，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衰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衰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放下拉·波衰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芽，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纯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五

七年底，社科院面向社会招收社科研究人员，经父执介绍，我递交了几篇论文，竟得哲学所领导首肯，过了年就去哲学所报到。先生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很高兴，说哲学所的专业图书在国内首屈一指，特别是有购书外汇，每年可以购国外书刊若干，能够随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新进展。先生说仅为此就应该好好庆贺一下，约我去他家吃饭。七八年，时值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校方给先生配了一套新房，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文革中先生在朗润园一直与别人同住，起居读书皆不方便。当时有人劝先生不要离开朗润园，说再坚持一下，别人总会搬走的。但先生太盼望能有一方自己读书的清净天地，故坚持要搬家。大约在三、四月间，我去了先生新居。当时楼刚建成，路都未整修好，楼前水泥管、钢筋、灰土烂泥，一片狼藉。先生新居在一楼，敲开门，先生神情愉悦地引我进屋。我祝贺先生乔迁之喜，先生笑答，不是乔迁，是被扫地出门。想想先生是无奈才离开居住了三十年的朗润园，我也有些伤感，毕竟那里才是我开启智性之航的港湾。回想与先生促膝窄室，四周典籍环绕，听先生谈古论今，那熟悉的氛围，甚至气味都如在身边。我本天生怀旧之人，在这陌生的新居里，有点不适应。真是新房子，屋里满是油漆、水泥、沙灰的味道，打搅了旧有的书香，往昔的静谧。幸亏那两把旧扶手椅还在，见之如遇故人。不过先生在这里，等几日，书香自会归来。

先生问我进哲学所后的工作，我告他正在随刘青华先生学做哲学期刊资料的主题分类。先生说你正可借机大量浏览。我告先生其实还难得见真学术，大量文章属拨乱反正之作，仍在清理四人帮的思想。先生自然又问我读书的事儿。自先生七五年底命我攻外文，七八年时我已能对英文原著粗通文意。先生说你能读原著，便要选几部耐读的名著来读。现在你还没有广泛浏览的时候，所以要读得少，读得精，像希腊哲学，伯奈特的《希腊哲学史》是要读透的。先生指点我说这部书哲学所图书馆一定有，但也许借的人

多，若你借不到，我从北大图书馆找来给你。遵先生嘱，我找来这本书读。这确是一部博大精深之作，特别是对苏格拉底的阐述独有所见。他强调苏氏提拔精神生活，集宽、智、勇于一身的求真精神。先生以为伯奈特讲哲学家从人格着眼，梳理精神气质与学理探求的关系，很高明。在先生的引领下，我常在所里图书馆留连，果见群书沓来，目不暇接，眼界为之大开。

七十年代末，解冻之始，玄冰渐融，开始有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外名著面世。也上映了一些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日本片子，它改编自日本女权主义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作品《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记述日本世纪初贫苦女性被迫漂流东南亚为娼的史实。这些被称作“南洋女”的底层民女，或被骗，或被卖往南洋为娼，受尽折磨凌辱，多数人死而归。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由于影片涉及到南洋女的卖春史，影片中有些妓院的场景和暧昧的镜头，所以上映后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那天我在所里资料室看资料，碰巧翻到几封有关《望乡》的群众来信，其中有些言辞激烈，大骂影片“诲淫诲盗”，“腐蚀青年”，声称毛主席他老人家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等等。用语极粗鄙，狂热、刻毒，能感觉文革阴影不消，余孽犹存。更可怕的是他们要求立刻禁演此片，并组织专门机构重新审查各类文艺作品，判定香花毒草。当时严家其先生在资料室，我把这些东西给他看，也谈了我的看法。严先生赞成我的观点，要我写篇文章来辩驳，说他会送给光明日报，因为当时光明日报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我连夜写完了文章，由于文章涉及到道德问题，题目就定作《〈望乡〉的伦理学》。第二天交严先生看，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便请他共同署名。我是新人，为尊重严先生，请他署名在先。严先生谦谦君子，说文章是你写的，我只是提了点意见，你当然是第一作者，说着拿笔把稿子上他的署名改到了后面，就拿着稿子走了。两天后文章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先生的信。

先生祝贺我发文于光明日报，说你这是第一次发文章于正式刊物，希望今后能多有议论文之于众，同时鼓励了我的文章，说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论题。先生感叹几十年来道德学说荡涤一空，人们只谈阶级而不谈伦理。虽说社会有阶级区分，但善恶标准却是不移的。善恶是人内在品质的表现，并不依人的社会地位来评定，更无涉于个人所操何业。先生引《礼记》中语“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联。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贫贱屈辱中不失善良与自尊，倒是那些高居人上的帝王领袖常常是大恶之人。在中国古有桀纣，今有四人帮，在外国古有尼禄、卡利古拉，今有希特勒、斯大林。先生说权力、地位并不带来善。权力只在弘扬和实现善时，才是有道德的。可惜世人常以地位、权势、金钱来衡量价值，判断善恶，结果把肆无忌惮的罪恶当作伟大来崇拜，实为大谬。那些大受崇拜之人正不知做了多少大恶，人们却依旧闭着眼睛崇拜。这实在是扬恶抑善的人世大悲剧。先生援引《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国家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国朝几十年的政治洗脑、思想管制、学术式微，让先生心有隐痛。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情。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是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的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 Ethics 与 Moral 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轮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六

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

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这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山川日月一身藏了。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冷落地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革中曾作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我们高贵的压寨夫人曾骑马园中徜徉逡巡，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这里是京城最美的一隅。惟靠中南海一侧，庄严华美的汉白玉桥栏已被二米余高，带倒钩的铁栅栏所替，给这柔美秀丽的景致平添几分狰狞。行在桥上，先生举手杖一指铁栅，说他们总要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想当年光绪帝幽禁瀛台时，这里也没装铁栅栏。共和百年之后，我们却只能透过铁栅栏眺望瀛台了，怎不让人掩涕叹息？

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五元一十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五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溢，初暝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ner 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 self）和卑下自我（lower self）。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 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归因于超我投射（pr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认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巢臼，后来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 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

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斐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杖就远去了。

七

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作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作”。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活了一阵，咖啡器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子，三两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而长考的时刻了。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能就有十种定义，给你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梳理各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正确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他在讨论审美艺术问题时，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证明在美与真、艺术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表明他要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提出的任务。他要在康德、黑格尔、席勒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建审美新秩序，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现实原则”。这个秩序正是诺瓦利斯“兰花幽谷”中的秩序。他要以“自由游戏”作为无压抑文明的标志，以卸载现代文明强加在人的心理上的“多余压抑”，使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统一于诗的王国。他要让古希腊的神祇，爱与美的象征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替后工业文明中的英雄：政治强人、商业大亨、运动明星、社会名流，使人成为独立的、审美的、有尊严的自由人，而不再是一群傻呼呼的、患有成长延缓症的追星族。

我列举了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述，有关浪漫主义专题的论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史实。先生认真地听着，当我谈到“自由游戏”概念时，我引席勒《美育书简》中的话“在美的国度里，人们彼此只作为自由游戏的对手显身，这里唯一法则是把自由供献给自由”。先生便问我，席勒的自由游戏概念出自何处，我答出自康德。先生很严肃地说，既有前因，你绝不该忽略，引征材料要尽量溯其源头，这是个方法，也是个原则。先生原则两字说得很重，让我脸红。先生随后说，我看你对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得不细，其中第九节专论游戏概念，你要回去再看看。我忙点头。

我接着谈到马尔库塞不仅极赞赏康德以审美活动为联接知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枢纽，更认为这种枢纽功能意味着提高感性地位以反对理性暴力，最终要摆脱理性压抑性的统治，使人通过审美活动开拓人与社会的另一维度。先生说这种讲法已经远离了康德。在康德那里，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各司其职而已。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最终目的就是人。在这个出发点上可以说马尔库塞仍在德国思想传统中。从他的论证方法、思想资源、价值评判上看，你说他是个浪漫主义者，我想是站得住的。特别是他总谈美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这和席勒是一致的。先生说席勒的理想除了写在他的美学论文里，更多的是写在他的诗里，你要去读他的诗，毕竟席勒作诗人比他作哲学家更有地位。遵先生嘱，回去读席勒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

诗引领漂泊的人
走出陌生的他乡

重寻天真单纯
重回幼时茅庐
摆脱冷酷的枷锁
在自然怀中温暖安眠

这简直就是马尔库塞的论文“审美之维”的诗意表达。真感谢先生指点迷津。先生又问我，你认为马尔库塞这一派对现实的意义在哪里。我答至多表示一种信念坚守罢了。我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根本就极悲观，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整合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绝不可能有启蒙时代的哲人那样大的号召力。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彩。我问先生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的浪漫主义骑士》，先生说论文题目你要听导师徐崇温先生的意见，我对论文不发表意见。又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先生说只要杜老和徐先生请他，他当然参加。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塞本人阐明了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晨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们共同守候”。

八三年读到贺麟先生的文章《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贺先生说：“周辅成先生在一九三二年写了《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哲学杂志》一卷六期），……周辅成先生是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周先生曾‘惋惜中国尚不曾有介绍康德的美学的文字’，自告奋勇写了这一篇文章。周先生的介绍相当详细，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一是批判力与悟性和理性关系，一是审美判断之批导。这是我国对康德美学思想最早较有研究水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先生是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的开山之人。我问先生为何从未向我提起，也未叫我读他论康德的文章，先生淡淡地说，那是五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不一定有价值。我坚持向先生要，他挺不情愿地从北图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仔细拜读先生的文章，虽然行文风格是五十年前的，但先生对康德美学梳理之清晰，解说之明确，总体把握之贯通，以我当时所见中文文献，尚无人能及。老一辈学人学风真淳厚。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不过是做过便完了。能与先哲对话，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大快，其余世间名利不过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惰。

八

八二年六月，我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先生应邀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先生早早就到了哲学所，在走廊里遇见先生，觉先生今天的样子有点特别。后来才意识到先生特意着了装，显得格外整洁肃穆。我趁前问候先生，他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就进了现外室，答辩就在这里举行。答辩过程中先生问我两个问题，记得有一个就是有关康德所论“无目的的目的性”。我回答得大致正确，其他先生也问了一些问题，所幸未出大错。随后我便出去等候。再进房间，见各位答辩委员面带微笑，就放了心。杜任之先生宣布我的论文通过，我向各位先生鞠躬表示感谢。所里派车送先生回北大。见先生上车，想起七五年底在清河小营机械学校送先生上车的情景，不由百感交集。

论文答辩结束不久，我便启程去武汉，为即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打前站，办自武汉至九江的船票。上山前在九江烟水亭旁的小酒馆与国平和苏国勋大哥喝酒，望窗外蒙蒙雨雾中兀立的点将台。相传赤壁之战前，周瑜曾在此演练水军。上庐山后，忙于会务，得暇与朋友们遍游庐山名胜，甚是快乐。一日，与北陵、友渔、国平、苏大哥，步行二十多里去访三叠泉。返回时已是暮色四合，山风渐起。向晚的天空蓝水晶般纯净，几颗早到的晚星倚着绮云，平添几痕绚丽。远山云雾缭绕，影影绰绰，几人正踏歌徐行。苏大哥突然指着远山说，那是五老峰，山下就是白鹿洞书院，明天我们会去参观。我心一动，想起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在此升坛开筵、门庭兴旺的情景，不免心往神追。接近庐林宾馆时，天已全黑，在黑黝黝的松林中行走竟看不清路，几人相呼着在林间小径上摸索。不经意间，眼前豁然一亮，庐林湖已飞临身旁。润玉般的湖水静卧秋夜，岚气幽幽，摩挲秋水。湖畔烟雾飘渺，修竹袅立，伴微风簌簌纤歌。凉夜已深，皎月破云，寒星数点，清辉散落。几人似闯入画中，皆收足敛声，不敢搅扰这人间仙境。待回到宾馆，躺在床上，仍未从刚才的梦境中回过神来。又想起一早起来要登五老峰，游白鹿洞，不免辗转反侧，很久未能入眠。

读史知道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的白鹿国学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书院者，读书、答辩、慎思、精进之处也。选一方山水清幽之地，奉一套求真悟道之理，聚一群心向大义之人，延几位德高饱学之师。行如朱子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所言，“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南宋淳熙六年，朱子任南康太守，踏勘书院旧址，以为“观其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踪迹著书之所”。便主持修复，招收门生，登坛讲学，白鹿洞遂成理学圣地。我读中哲史，对朱子一直有好感，觉他论道通明，平易晓畅，绝非道学面孔。不过读先生论戴东原的著作，却见他力斥理学，极赞戴震所言“人死于法犹有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实先生扬戴抑朱也有其不得已处，对朱子亦有回护。先生认戴震所反对的宋明理学基本上是指清代的统治阶级所了解的程朱哲学”，又痛诋清嘉文字狱之残酷，这其中的宛转，倒要向先生好好讨教。今天在白鹿洞拜朱子，要想好回去如何向先生“交代”。

书院的大门并不煊赫，上有李梦阳题匾。据说古时门外大道边曾立有石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我们的先人倒是重知识轻地位的，而今却尽入渔樵闲话了。进门便有清涼之气扑面，寻清风起处，是自后山奔流而下的一道清溪，溪边巨木参天，阴翳匝地。溪中

有巨石数块，其上有朱子手书“枕流”二字。向左拐，进一庑廊，皆石刻，中有朱子手泽，和李梦阳五言绝句。诗境清幽篤静。进朱子祠，向朱子顶礼。随后转入白鹿洞，有后人凿石鹿，殊粗糙。四面游逛，随意观赏各处楹联，大多陈词滥调，忽见明人周相所撰一联：“李读书看白鹿，书中得几分；三贤讲道对青山，道外无一事，青山外无一事”。觉得有趣，多看了几遍，暗记住了。进文会堂，见朱子手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想到底是朱子，出手就是不凡。出堂下阶，沿明溪缓行，听水声潺潺，似鸣素琴，真可一洗尘心。不知朱子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否得于此。跨过几块卵石，便站到“枕流”石上，想既为“枕流”，便当曲肱而卧，于是便横卧石上，仰望白云苍狗。

古希腊，柏拉图建立了雅典学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正是在这些学园中，希腊哲学蓬勃生长。这学园大抵便是我们古时的书院了。有趣的是，希腊哲人讲学论道也要寻个清幽怡人之处，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记下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谈话“在梧桐树的浓荫下，四肢舒展，躺在青草地上，夏日的凉风轻拂，把脚放入清泉，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用芳香的青草作枕，斐德若，来吧，我就躺在这儿，你来读你的文章吧，在这仲夏的温暖中”。再看朱子对白鹿洞的喜爱，中外大哲所思所感冥冥契合，在精神的至高处，何来畛域！

书院、学园中研习之道的优越处是讲辩结合，有讲有问，有答有辩，文意互发，疑义相析，攻防之中，道理渐明。因为只有自由辩论最能激发思维的活力。想自八一年西安会议，结识嘉映、正琳，相约每月一次的黑山沪讨论会，一年多来确觉思路大开，学力渐长。此次庐山聚会，他们未到，让我惋惜不已。见嘉映业师熊伟先生兴致勃勃地游览白鹿洞书院，心中忽发奇想，若辅成先生亦在此地升坛讲课，该多么有趣。那时我辈友朋、学子机锋相夺，义理相搏，如君子之射，“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个向往存我心中多年。八九年与正琳、嘉映、友渔、国平、阿坚、苏焯诸君筹划《精神》杂志，特设“学园”栏目，想收各家争辩于其中。不料虎貔之师直入京城，狼烟起处，精神遁走。九二年与力川去梵蒂冈博物馆，却见到这理想坚不可摧地存于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大师随心所欲地把他尊崇的哲人，不分门派，不论年代，一网打尽在他的巨作中。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联袂而下，宽袍飘飘，如天神下奥林匹斯山。再看学园中群贤尽至：放浪形骸的第欧根尼，思考流变的赫拉克利特，定“在”为“一”的巴门尼德，万“有”归“数”的毕达哥拉斯，色诺芬、普罗提诺、伊壁鸠鲁……，最后大师自己也跻身其中，聆听论辩。在拉斐尔心目中，人类的精神生活尽在雅典学园中了。学园、书院，思想者的家园。



《雅典学园》

下山回京，庐山带给我的激动尚未平静，急冲冲去看先生，要给他讲的故事正多。自八〇年起，先生开始主持新成立的北大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先生毕生致力于伦理学，但在几十年谀桀颂纣大合唱中，有谁听良心细弱的呼声。现在伦理学能登堂入室，先生很高兴，也极关心国内学界的各种动向，我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记得还带了几份会议论文、简报给他。在和他聊起白鹿洞书院时，我说先生虽不喜欢程朱，但白鹿洞书院实在是个好地方。先生马上严肃起来，说朱熹是真儒，儒家的好东西，朱熹挖掘光大了许多。南宋时外敌威胁，讲儒学的人都能体会到。讲理学也是讲心灵的力量。王守仁的心学是继承这点的。我说戴东原批理学，先生是赞成的。先生大笑起来，说你说的是我那本论戴震的小书吧。他的思想我确实很喜欢。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听说王国维可惜戴的哲学思想不受重视。其实那时我就很注意他。这本小书是我五六年前写的，那时候让我们学艾思奇的哲学，分唯心、唯物两条阵线。戴东原的哲学是朴素唯物论，所以就写了他。那种书容易写。先生又说，戴东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永远替老百姓说话，其实我在书里还是发了一点牢骚的。我说清代文字狱之残酷史无前例，想的就是共产党得天下后，各种批判就没停过。满人入关后对汉人中的读书人很警惕，像吕留良，死了还要掘墓剖棺，后人、学生都不放过。过后再细读先生的书，果然能见出先生运笔立论处处用心良苦。先生说“戴震生当文字狱最厉害的时期，他反抗现实的文字是表现得很曲折宛转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一读其文章，立刻就可以感到他对当时统治者有极沉痛的愤慨，比如他说‘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避而回通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乱之本，鲜不生于上，然后民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根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

话头一撂，我便把在白鹿洞记下的那副对子念给先生听，想请先生参详。先生说，朱熹讲道心人心两不分，天地人心两不分，陆九渊讲“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到王阳明哪里，更是心物一体。这副对子是明人所撰，看来是心学之徒。不过里面已经有些禅的味道。王阳明的心学本来就得益于佛学，我看这上联是说悟道不只在读书，青山白鹿都有道心。下联是说心中之道与身外青山本为一事。朱熹有个重要的思想，理在物与在身是一回事，这就是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于至理。这副对子写得不错，我觉先生解的好，便记了下来。先生自嘲说今生未去过白鹿洞书院，枉为读书人，又提起王阳明曾亲往白鹿洞格物致知。问现在可有王阳明的遗迹，我答似未见，只是书院大门上的匾

额是李梦阳所题，他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先生便说，明前七子是要搞“文艺复兴”的，文必秦汉，诗宗盛唐，一时左右文坛。我把记下的李梦阳的五言绝句呈先生看，诗云：“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先生看了片刻，便起身走到书架旁，翻检出一叠复印材料，说歌德有首诗和这意境有点相似。隨即便翻到一页递给我，是《游行者之夜歌》，宗白华先生译的：

一切山峰上
是寂静
一切树杪中
感不到
些微的风
森林中众鸟无音
等着你不久
也将得着安宁

这诗我曾读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他译作《流浪者之夜歌》，两公译文各有其妙。梁先生在诗后加有一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逝世日期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经先生提醒，再对读两诗，发现果有意境相通之处：皆是独登峰巅，寂静寥落，鸟声无闻，鹿影不现。惟歌德诗苍凉沉郁，梦阳诗空灵清缈，物色仿佛，而心境相异。

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痛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地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作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作“哲学王”呢！顾贞观、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遵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论经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再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仪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拱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高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

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九

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整。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完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八百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五十人，著作六十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道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迎面碰上了先生。他老人家正急冲冲下小石桥，向东校门方向走。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先生走得急，身上宽大的短袖老头衫几乎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额头上满是汗珠，从白发间淌落。我上前挡住先生，问他为何如此酷暑，先生见我似大松一口气，说已经三点了，见你仍未来，想前天有学生与校外孩子冲突，学校发通知，加紧门卫，不得让闲散人员随意入校。所以想你被拦在校外了，便下来看看。我真是羞愧难言，不过是自己睡着迟到，却害先生烈日下奔走。先生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万一中暑，我罪莫大焉。急忙扶先生回家，先生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对我，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整，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 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 s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时按下 record 和 play 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不带任何戒心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再没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九十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obbi 和 Schwatzkof 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

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马克白斯》送到先生手上，他才真满足了。当时我甚至对先生说，能唱出莎翁悲剧感的惟卡拉斯一人而已。先生将信将疑。我手里有一版 EMI 公司出品的卡拉斯演唱威尔弟悲剧唱段全集，建英对此评价极高，我便为先生翻制了一套。先生听后感叹说，卡拉斯就是当时的塔尔玛啊！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中，先生最爱《暴风雨》。在先生的文章《莎士比亚的人格》中，先生极推崇普罗斯彼罗深厚的宽容精神。以为自此，莎翁的人生哲学原理、行为的最高规范便是“直接诉诸于人”。但对贝多芬受此影响谱写的 d 小调钢琴奏鸣曲 (op 31 N° 2) 却觉听不出门道。先生自己分析说，许是对《暴风雨》一剧读得太熟，心里装了太多的定见，不自觉地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反而迷茫了。我便谈了自己的感想以献教于先生，说贝多芬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他读《暴风雨》的感受和思考，用音乐这种极具体又极抽象的形势表现出来，不太可能有具体的对应，例如哪个乐句表现了沉船，哪个乐句表现了爱情、复仇、宽恕。先生回应说听音乐也要心无定见，才好体会。其实，贝多芬在一八〇二年写下的《海利根镇遗书》中已经提到，他盼望在他死后，能与世界宽恕和解，与此同时，他创作了被称作《暴风雨》的 d 小调奏鸣曲。他对申得勒说，要理解这部作品，“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这绝不是巧合，先生从《暴风雨》中读出的“出自深心之中的诚恳之念”——宽恕和解之道，必敲击过贝多芬的心弦。在先生看来，莎翁在他的《暴风雨》中告诫我们“凡是一个人，都与我们同样，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有醒悟，我们都有义务来回报自己的充分宽容……”。他已从自然的幻想与对人的过分要求转变为对人类缺点的哀怜。我以为这正是贝多芬在 d 小调奏鸣曲中所要宣示给人们的。先生自然是懂贝多芬的。智慧与仁慈的心灵在此呼应着。

一次和先生谈歌剧，先生说威尔弟谱写的莎士比亚最能得其精髓，因为他也算是个农民，是从乡下进城的，他从龙科莱村去米兰，莎士比亚从斯特拉特福去伦敦。起初我不太明白先生的意思，后来反复读先生论莎翁，才明白为何卡莱尔会说“我们宁肯交出一百万个我们国家培养的英国人，也不愿意交出这个斯特拉特福的农民”。先生以为莎翁的人格来源“第一他是平民，因此能对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都体验过，都了解。第二，他是真实的平民，故不为世俗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所欺所蔽。虽为女王嘉许，虽结识贵族甚多，但毫不受其影响，能够独自超越。第三，他是自得的平民，故虽受苦，但不绝望，不激愤，依然冷静”。先生拈出“平民性”来标定莎翁的人格基础，因为先生一贯以为平民性是普遍人性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先生认定威尔弟和莎士比亚在人性上是相通的。事实上，威尔弟这个龙科莱村的农民，这个常独坐农舍、眺望荒野的天才，心中最尊崇莎士比亚，称莎翁为他的“教皇”。他不仅为莎翁戏剧谱写了《奥赛罗》《马克白斯》《福斯塔夫》，心中还酝酿着《哈姆雷特》《暴风雨》《李尔王》……。他的《利哥莱托》实际上是对未能谱写《李尔王》的一个伟大的补偿。

先生爱莎士比亚，把他当作知心朋友，甚而“总觉他是一位亲人，一个慈母，他不像父亲那般责我们的过失，却像母亲一样为我们的缺点原谅，还要亲切地问一声‘你这样怕过得不舒服罢’”。在先生面临人生低谷，想高蹈海外时，莎翁的人格抚慰了先生苦闷的心灵。先生看这个人格平易、深厚、丰饶，如同四季时序的幻化多姿。春时“在他的人格的召应下，又如人在树荫下，一望四野碧绿的田畴，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梦幻，产生自然爱，充满人间生活的喜悦，配以热情，加以幽默，如此整个宇宙都象在欢迎你”。“夏日，天空清朗，偶见薄薄浮云，远远传来断续的蛙鸣，不禁使我们心弦颤动。夜间明月下，再来一线萤火奔流，我们便不免梦幻人生”。“秋天来了，就象我们出了峡谷，任我们的生命如何奔放的人，到此也要稳打浆，慢慢摇了”。“冬天的雪，风一来，人类的什么情感、欲望都显得收缩了。生活没有昔日的活跃，差不多凝固起来，真象一个冰房”。与四时交替相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在世界大舞台上各逞其能。初春的凡伦丁、盛夏的福斯塔夫、霜秋的哈姆雷特。最后，在冬日的宁静中，斐迪南向米兰达唱出了热烈而凄婉的尾歌“只要在这牢房中能见到这女郎，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由的人去受用吧。这囚室已让我觉得宽广”。

在先生看来，莎翁对笔下的众生，只让其上台亮相，谢幕下场，任其喜怒哀乐，生死浮沉，却不做道德评判。但是他从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却是一无形的“最深刻的道德批评”。先生治伦理学，是把莎翁笔下的人物性格、道德行为、善恶分野当作了研究标本。如歌德所言：“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的竭尽余无了”。先生则认为“随着莎士比亚当学生走了一生。及到书本一丢，我们该说，我们了解了人”。记得我受教于先生之初，先生就教我读莎士比亚。先生要循着莎翁笔下的人物的踪迹，直探人性幽深的秘府。后来先生授我他的《自述》，先生说：“这时候，我在学哭，也在学笑。但哭笑都学得不好。我羡慕莎士比亚对福斯塔夫的笑，羡慕达文西所画《莫拉·里萨》的超善恶的笑。同时也向往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和读完法国波埃西的《自愿奴役论》后的哭。但我要学他的，怎么也学不到。不过我仍要哭笑”。这是先生剖心析骨之言啊！

十

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气候忽阴忽晴，盖因国朝始终上不了宪政国家的轨道。那些控制思想言论的老伎俩总不停地摆弄出来吓人。当局对知识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和憎恨，这是列宁式党国制度的遗传基因，不到这个机体灭亡是不会消失的。

八三年十月，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讲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思想理论界对当局的政治动向极为敏感，一闻风吹草动，立刻寻找此次谁是挨整对象，或扑过去咬几口，

或避之唯恐不及。没想到这次锋芒所向竟是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异化”，“异化”的背后是人道主义。而挨批的对象竟然是前“文化沙皇”周扬。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竟对他的老哥们儿痛下杀手，说精神污染是个现实政治问题，周扬关于异化问题的观点可以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纲领。周扬文革前害人无数，文革中坐了八年监狱，有点良心发现，想讲点人道，又不敢真讲普世人道，所以找到老祖宗年青时用过的词来说事儿。本来就是跪着造反，没想到当家的还不许。天良未泯的周扬一怒之下再不说话，生生气成脑软化去世。看来要想在这块地盘儿上混，脑软化就是心软化的代价。

八四年春节，我去给先生拜年，闲聊中说起理论界的动态。先生对人道主义理论的前景极关注。问社科院是不是要组织批判人道主义，他有点担心文革余孽卷土重来。临走时，先生给我一本书《马克思与人》，我说这可是当红的题目。先生说里面的文章是他前几年写的，也谈到异化问题。回家后翻看，才读到先生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人和人的解放》。读先生此文，感觉有点怪，他肯定通过异化问题研究人道主义、人性论是个“令人发生兴趣的学术趋向”，这是因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有人据此认为人性异化的问题，即要求人的复归或人性的复归就是人性化。人性论比阶级论更根本”。先生以为从阶级论回到人性论，最终还是要追求个人的尊严、自由、幸福。对此先生并无异议。但先生又认为，人性的复归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或生产者）的本来状态要复归。这是一种阶级论或阶级解放论的理论形式，最终是劳动人民的阶级解放”。据此，先生说“就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论，只怕阶级论有时就比人性论更重要”。对先生的这个结论，我有不同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阶级的解放是一切人的解放的手段。马克思是从普遍人性出发，经由阶级消亡而达于普遍人性的实现。在理论上，马克思《手稿》中的论述是恰当的。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大议题中的一个论题，从而人性论是更具根本性的命题。而当阶级论被夸大到绝对时，必然引发对人权和人性的肆意践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权力斗争的看家功夫。我给先生打了电话，明确告诉先生我不同意他的结论，希望能有时间向先生面呈我的看法。先生听后很高兴，说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觉得没想透。他只是担心普遍人性会淹没具体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法国大革命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说，先生关注的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先生在文章中也指明它的立足点在于“我们应该参加劳动人民的队伍，为‘大老粗’、‘土包子’讲几句公道话”。很快，我就去先生家向先生陈述了我的看法。先生仔细听了，说劳动人民在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利益时，普遍人性论就要让位于阶级论。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论比人性论更重要。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是讲普遍人性的，但大革命中看到的是各阶级代表在争自己的利益。我说那也要对结论严格限制。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史实也可算是一种限制。我强调阶级论的危险性，先生说他知道阶级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常被用作清除异己的工具，但阶级论本身是来自历史事实，不能忽略。我显然不能完全说服先生，便举出周扬的遭遇为例，以证明人性论如何成为阶级论的殉葬品。先生听后无语，长叹一声说，现在形势不好，连周扬都自身难保。六十年代先生曾为了伦理学科的设置问题和周见下面，那时他颐指气使，神气得很。文革中他吃了大苦头，看来是有所觉悟，想从阶级论返回人性论了。见先生谈及此，我便不再争辩。

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认为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本书中都有论述。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伦理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对他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篇文章受当时大气候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〇〇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家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尘世的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

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

“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

“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见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

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污七八糟的萎琐之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丛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供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八七年元旦，大雪弥漫京城，北大同学冒严寒去天安门示威，队伍中有好友约林，他从

天安门直接到我家中，情绪激动地讲了北大同学勇敢、坚毅、忘我的行动。那时候，青年学生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理想主义的激情尚未被犬儒的冰水淹没。但学生们不知道当局早已决定要痛击一切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并且决心要拿有象征意义的宾雁先生开刀祭旗。元旦过后，我和先生通过一个长长的电话，他讲述了北大学生上街的事，又说武汉友人告他，武汉也有学生上街。先生以为这是因为党内左派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学生，他亦得到消息，说胡赵不和，甚是惋惜两人不能联手抗击党内的保守势力。谁知形势急转直下，胡耀邦被迫辞职，一月底，宾雁被开除党籍。先生知我与宾雁曾在哲学所共事，平日往来较多，竟特意来电话，要我代他“向刘公致敬”。就在这一年，周先生“退休”了。据知情者说，先生退休是受了学生的牵连。这个学生想必说的是胡平。胡平是先生改革开放后招收的研究生，人极有才智，曾参加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他当选后，先生曾特地打电话告我消息。胡平自北大毕业后，因其一贯“自由化”，在北京找不着工作，先生欣赏胡平的才学，全然不顾及政治上常见的“避讳”，不辞辛苦，四处求人，为他这个“反动学生”联系工作。胡平出国后，又继续为他一贯秉持的自由理想奔走呼吁，惹国朝肉食者不快也属必然，倘因此牵连到先生也不足为奇。但先生却从来未道一字。那一段时间，先生确实有些郁闷，常读放翁诗消遣。书桌上放着一部《剑南诗稿》，还常常集放翁句，约有十几首。我去家里，他便拿给我看，多是愤懑伤时、悲凉沉郁之作。我怕先生郁闷伤身，便劝他多读陶、苏，可以任性散心，怡情养年。但先生笑笑说，其实陶、苏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记得先生曾说过，放翁是一奇人，既有“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雄阔，又有“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的恬淡。古人的心性真是伟大卓绝。最难忘先生曾手书陆游诗一页授我，中有一联“独吟古调谁听？聊与梅花分夜永”。回家后反复吟咏，能听到先生孤寂凄迷的心声。

十一

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汇报。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处，从不问我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回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哲学讲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观看世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天打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感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内，起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同情儒生的人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一声。甚至还要闭起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在战场上大有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验，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么不如意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友，这样怎能不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藏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事涉一个国家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先生借秦二世与赵高的对话，讽刺那些前不久还以秦王朝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红朝肉食者。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这么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再多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中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对国朝中事不必太放心上，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

好。象我这种人，关心国朝政治也不过是关心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家的眷恋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的象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儿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回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诉我，巴金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感”。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作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女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要照几张相留念。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女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顶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洛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的有些逼人，象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出法国绘画馆，左拐进“大画廊”，终于走到《蒙娜·丽莎》面前。那时还未给她修专馆，就和其他意大利绘画一起陈列在“大画廊”里。先生最赞她那“超善恶的微笑”，现在站在她面前，先生说原来想象画的尺寸要大一些，眼见才知并不大啊。我回先生说尺寸不大名气大，先生随口说这不是壮美，是柔美。看来说到艺术品，先生就想到了康德。尽管参观时间已不短，先生也有些累了，还是走到了斯芬克斯厅，让先生与柏拉图头像合了影。先生读了一辈子哲学，岂能和哲学巨人失之交臂。告别柏拉图，便劝先生结束参观，回去休息，若还想看其他内容，可以再来。先生点头，便缓缓走出卢浮宫。巴黎的夏季天很长，黄昏时分，天仍很亮。先生兴致不减，说这么美的风景，应该再走走。于是我提议去圣母院旁休息一下，再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是毕奇女士印《尤利西斯》的书店。在神所医院旁停下车，和先生慢慢走过圣母院正门，经过查理曼大帝骑像过双桥，过河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此时，夕阳的余晖正把圣母院的倒影投入塞纳河心，游船驶过，波浪起伏，摇荡一河碎金。我扶先生步上双桥，先生突然停步，凭栏而立，眺望河水，沉默不语。我待立一旁，不敢打搅先生，心里却好奇先生在想什么。许是想起夫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是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许是想起阿波利奈尔的《桥上吟》

“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不，先生此刻倒可能想的是身边这个顽劣小子，二十余年耳提面命，而今却遁身绮靡之乡，混迹孔方之场，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虽忝为弟子，却不窥门墙，年岁徒长，依旧废人一个。可以想见先生心中的无奈与失望。但先生大人大量，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至多是嘱我不要荒废学业，有时间还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先生的话我是谨记在心的。

先生到巴黎时，国平从德国过来，住在我这里。国平是先生喜爱的学生，能相逢异乡，先生极高兴，得空便谈天说地。正巧远在美国的胡平恰恰有事路经巴黎，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朋友家。这次师生邂逅巴黎，先生也称巧。胡平得空就来看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万公润南两次过来拜见先生，也谦称是先生的学生。因万先生在清华念的是给排水专业，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周先生只讲希腊，不讲给排水，你算哪门子的学生。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万公都是清华毕业，我们是校友啊！先生在巴黎和旧雨新知相聚，兴致极高。有时我要拉先生出去玩，他反会问我，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先生在巴黎去先贤祠拜谒了卢梭和伏尔泰，又去巴比松村参观了米勒的画室。先生在北京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挂着米勒的《钟声》，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我看到农田里的农民，总想到法国米勒的画《拾穗》和《钟声》，心里便豁然开朗起来”。拜谒卢梭，参观米勒画室是先生的夙愿，终得一了，先生心情极好。有邦洛大姐在旁精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食，先生说他在巴黎住一个月，人都胖了。我和雪能得机会侍奉晨昏，也觉心满意足。时间飞驰，不觉先生离法的日子就到了。虽说早知聚散无常，但偏偏“情之所钟，惟在吾辈”，终不能若无其事，心中怅怅是难免的。送先生返京的那天，托运好行李便与先生坐在咖啡吧闲聊。先生突然从包中拿出厚厚一叠纸张，一看是先生的全套医疗档案。心电图、化验单一应俱全。先生说我来前知道医生不愿我长途飞行，但我决心不理会，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份病例副本，省得万一需要看病让你们措手不及。听先生这样讲，我鼻子有点酸，急忙打岔，安慰先生，说知道先生身体无大碍，必有百岁高寿。先生大笑，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我可不愿当百岁老贼。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做一揖，便转身去了。我一下子忆起七六年初，寒冬雪夜，在鼓楼送先生上七路无轨的情景，一晃二十年了。此一别，与先生远隔重洋，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一下子眼泪夺眶，急拉住雪，掉头走了。

十二

先生回去了。随后几年常有信来，但多不长。新年春节必有贺卡，永远是殷殷的关切。我虽然忙于俗务，也不忘常给先生去电话。每次电话先生都会讲许多话，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熟悉的友人动向。常常说着说着便突然停住，问我长途话费是否很贵。我和先生开玩笑，说挣钱不就是为了打电话吗，否则我会游手好闲。先生说他知道，在国外生活不易啊。

九八年初，先生辗转托人带来他的书《论人和人的解放》，里面收了一些他早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人格》，也收先生近些年的新论。读先生的著作，观点或许有异同，但知先生发言皆出自肺腑，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先生晚年发言不多，但“米豆千粒，不如明珠一粒”，言论与思想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衡量的，先生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前景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先生何出此言？我想因为先生深深知道，正义论或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

该书中收有先生作于一九三八年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六十多年前的文章，竟似为今天而作。先生说：“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为的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对那些鼓吹吃饱肚子就是有了人权的国朝上师，不啻一痛击。在外寇入侵，国脉危殆之时，先生力扬中国文化深厚的生命力，因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中国的农民身上。……须知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深信中华民族之抗敌精神深藏于中华文化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该提起精神来，清楚地认识文化，并不只是指几箱古物，几本破书，几个团团圆圆的所谓学者之流，文化该是这一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文化，就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也能鼓舞我们的心灵”。先生沉痛而激昂地宣示：“我们眼见日本军士的野蛮，他们国内人士之轻浮，以及使得我们最会生活的人民妻离子散，女污男亡，生活艰苦，相对饮泣的种种事实，都是他们予我们的反面鼓励。我们的人民，将会知道这一次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争战，还带来了文化的危亡，理想价值的毁灭问题。我们受过几千年训练的文化活动，决不会坐看其价值理想受辱甚至灭亡的”。

六十年前，先生就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六十年后，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那些被权势集团欺压凌辱的细民呼喊：“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恳恩思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念及而今某些学界“新贵”，不能守观念之贞于片刻，不惜诋毁华夏文人所秉持的“清流”理想，为求“用世”而狼奔豕突于权势之门，更知何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二〇二年晚秋，竞马回国开独唱音乐会。我一时不能回去，雪带着盈盈回去了，知先生最喜欢歌剧，便嘱她一定请先生出席音乐会。那时先生已偶尔需轮椅代步，但上下楼仍坚持自己走。竞马在音乐会上献唱了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舍尼埃》。这位法国大革命

中泣血的夜莺唱道：

“我去近旁的教堂，
一位祈祷者伫立在圣母与圣徒的神龛旁。
他收敛着全部的施予，
却全不见颤抖的老人正徒劳地用哀求的双手，
乞讨微薄的垂怜。
我走过劳动者的茅舍，
听到他高声诅咒
脚下的土地、贵族和
他们的骄奢。
这苦难可使你高贵的心灵感觉歉疚？”

这正是先生熟悉的主题，也是先生常常垂念的问题。先生从头至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了演唱。音乐会结束后，北陵亲自驾车送先生回家。雪从北京回法，带来了先生的信。先生用大字写了“范竞马伟大”五个字，觉得出来他极高兴听竞马的音乐会。只是信的结尾有些伤感地说，我九十岁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听音乐会了。

二〇〇五年，先生又寄来打印成集的文稿，题字在上面，说是“老残留言”。这些文稿我大多已经拜读过，惟有附在文稿中的一封毛泽东论及先生文章的信令我好奇。毛泽东让刘少奇读先生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毛泽东就先生文章议论到：“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个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泽东的批语作于九月十五日，也就是说，先生文章一见报，毛就注意到了。几天之后，他就想到要让刘少奇读先生的文章。毛这位深谙权奸厚黑之学的枭雄，绝不会平白无故对希腊伦理学感兴趣。若不是有现实用意，这个问题对毛实在是太遥远、太抽象了，什么是其中玄机？

我给先生打电话讨教。先生说其实他一直不知道毛曾对他的文章有过批示，不久前北大李醒尘先生告他，并给了他一张复印件。这事让他也有点想不明白。只知道当年作文时曾着重谈了梭伦的调和妥协精神。先生还赶紧补充说，我是给文章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的，那时候在这顶大帽子底下谈几句调和中庸已经很不容易了。再问毛何以会对他的文章感兴趣并要批给刘读。先生说他在文章中谈了两点，第一，梭伦的折衷调和成为后来希腊奴隶主民主派的政治路线；第二，梭伦手拿大盾保护双方，所以他心中的公正内容就是“调整公理与强权，协和共处，人人各得其所”。先生说，六二年初，中共开了七千人大会，毛刘在政治上有冲突，毛想向刘发出调和的信号，大家不要再争斗了，同心协力挽回局面吧。或许毛看到我的文章讲中庸、调和，就让刘也读一下，不要再揪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了，讲点中庸和谐吧。我吃惊先生对这事的判断与历史事实相差太远。先生对毛的用意的分析只反映出自己的善良和天真。这真是无奈，宅心仁厚之人对党国权力斗争中，人心之凶残险恶，永远缺乏想象力。

事实上，在七千人大会前，刘已经准备了一个讲话提要，共有四点：一，要放开讲错误，重病用猛药；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三，批分散主义要讲事实，一个都不能少；四，党内斗争过火，民主不够，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这四条表明，刘已认定毛的路线是造成大灾难的原因。刘又在正式会议上讲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名言。毛这个猜忌心极重、整人术到了炉火纯青的人难道不明白刘这个“人祸”所指何人？六二年七月上旬，毛刘在中南海游泳池发生冲突，刘急不择言，竟说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狠批了毛的逆鳞，犯了毛的大忌，偏偏在这次冲突之后，八月一日，人民日报重发刘少奇论道德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九月份又出单行本，共产党员人手一册，发行量竟一时超过《毛选》。共产党高层诸公中，刘是唯一一个写著作涉及道德修养的人。虽说这部书早在红朝得鹿以前就发表了，而且毛早就赞赏过这部书。但在共产党的伦理中，对错的取舍永远系于最高独裁者的好恶需求。九月九日，先生的文章见报了。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先生的文章共分四节，一，伦理学来源于社会矛盾；二，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的特点；三，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四，争论的问题与流派。正像先生所说，他是给希腊伦理学的思想戴了“阶级斗争的大帽子”，但重点放在梭伦的中庸调和思想，这是先生想说的话。依我看，毛恰恰是看中了先生讲道德的阶级分野一题。因为“阶级斗争”正是他那时已经选定的整治刘和党内稍有异议者的致命武器。正因此，毛在给刘的批示中强调伦理学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还特别指出“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毛对先生文章的关注点，恰不在“调和”“中庸”，而在把伦理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用作“现实阶级斗争”，其实就是党内斗争的工具。这种文本误读真是有趣。不过，是先生误读了毛，而毛是绝对不会误读先生的。毛借先生文章中所谈的问题给刘下好了套儿，只等着“收网”呢。

在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的八天之后，毛就忍不住向熊向晖大发牢骚说“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六七年文革已起，刘已成毛的瓮中之鳖后，毛对巴卢库讲了实话，说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我们就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在党内占据高位，要推翻我们了。其实在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已经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且点明，“这种斗争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明明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却不明就里，在会上拼命迎合毛的阶级斗争路线，真是都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六七年，王力、关锋写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毛亲笔在文中加了一大段话。疾言厉色地说：“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的修养论，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这才是六二年毛将先生的文章批给刘少奇看时没明说出的心里话。毛的枕边人江青不小心说了大实话，“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受了气，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给毛主席出气”。六八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冲

毛撒娇发嗲，说彭真欺负了她，毛立时给娇妻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就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形同黑帮团伙。毛自己倒是说得坦白，“我们就是造反，和当年宋江差不多”。

我丝毫不想苛责先生对毛的误读。心底光明的人常常对那些内心黑暗纠缠的人缺乏体识，房龙何等聪慧之人，看纳粹在德国的种种恶行，竟以为是希特勒在搞小孩子的恶作剧”。罗斯福阅人，阅世不可谓不深广，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竟然“直觉他是个高尚的人，可以和他携手共建民主世界”。就在这时，希特勒正在制定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斯大林已下令在卡廷森林枪杀了二万余名波兰军官。善恶相较量时，恶总会在当下的争斗中占上风，这真是造化捉弄人。后来我几次向先生讲述我的看法，也举出许多确凿的史实来说明。先生有些同意我的分析，但又说他还有一个角度不可不涉及。毛本起于草莽，素称自己是“土包子”，骨子里是朱元璋一类的帝王，他亦喜欢魏武，外显壮阔雄大，内藏阴柔权诈。最不耐烦道德修养一路酸文假醋。而刘偏偏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印《修养》，搞得全国轰轰烈烈学习，让毛心里不舒服。我力争这绝非个人性格喜好问题，而是由一套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权力斗争方式使然。先生感叹说毛这个人一生待人处事，于公德私德都大有欠缺，对刘的斗争就太残酷，几乎搞到尸骨无存。我说，为保个人无上权位，而一逞狂想，陷亿万生民于水火，如此人物岂是公德私德有欠就可尽括？几十年来，国朝上下道德沦丧实自毛始。先生说“你讲的有些道理”。

二〇〇六年，突然接到先生自国内打来的电话，有点吃惊，平日都是我给先生去电话，先生有何急事找我？让先生挂下，我再拨打回去，先生在电话中语气沉重地问我，是否知道天予把国平告上了法庭。这事缘起于国平在《自传》中提到建英的哥哥郭世英文革前因X小组案被整肃的事，其中提到了天予，而天予认为所言不实，一定要讨个公道，便要与国平对簿公堂。先生为此事甚着急，从北京来电就是要我劝两造和解，说事已至此，怕只有你能劝说他们两人息讼。我告先生我完全无能为力。先生却不依，执意要我有所行动，说真打起官司来，必是亲痛仇快。先生说现在重要的是反省批判那个年代，在那时候，谁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先生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同学之间有什么账好算？谁和毛泽东算过账？谁和刘少奇算过账？那场把天予整成反动学生的运动是彭真直接领导的，谁和他算过账？如果不记取教训，对同学们受过的灾难不反省，将来悲剧要重演的。

我当然同意先生的看法，但比先生更了解此刻的国平和天予。人难免有一“执”，事关自身名誉时，便愈发“执”得厉害。天予、国平当然都是尊敬先生的，但年轻时结下的怨真不容易化解。人很难改变年轻时认定的事实。在先生看来，俩人仍旧都是他所喜爱的学生，老师说话总会起作用。在我看来两人皆囿于自身所执之事，以为原则所在不能退让。先生为此事几次催我有所动作，我想先生太高估了我的能力。我知道先生曾请国平到家中，表示由他亲自作东，请天予、国平吃饭息谈。先生幻想能把盏尽欢，前嫌冰释。尽管学生们仍敬重他老人家，但要他们尊师嘴行事已不可能，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平当时表态说只要天予撤诉，他愿作东请客与先生一聚，答谢先生的关心。先生也与天予谈过，天予说只要国平道歉，他也有息讼的意愿。但难就难在“只要”两字上。这是一死结，解执一方退让，而这一步实在难退，因为两人都有道理可说。天予是科学家，国平是诗人哲学家，看问题的方法、角度都不同，这样两造又如何调解？先生爱他的学生，以为必须呵护两人，谁也不该受委屈。我爱我的朋友，但知道男人间的事，该杀该打只能由他们去。这点难向先生言明，只好敷衍先生的嘱托。我对先生说，您就自当哥儿俩打架，家长两不相帮。让他们打个头破血流自有停手的时候。先生刚直纯正之人，总也搞不明白我在扯什么淡。最终先生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问题终在法庭解决。判决国平胜诉之后，我与先生再次通话，先生只是重复说不应该，不应该啊，都是受害者。在先生心中总觉得自己是有孩子受了委屈的家长，但先生不知，天下哪有听家长的孩子。〇六年底，去国十七年后，我终回故土。孤舟一系，当然首先去看先生。十二月二十六日，飞机落地正是中午，怕打搅先生午睡，便先到正琳家吃饭。与正琳八九年别过再未相见，此刻重逢，今夕何夕？兴奋难以言表。付大姐的牛肉粉真是天下第一。在正琳那里呆到三点钟，便去看先生。与先生自九五年巴黎分手，已逾十年，而告别朗润园十公寓已十七年了。楼前老白杨树仍在，而木叶尽脱，几株干枯的植物在寒风中萧瑟。走进楼道，见玄关更加破旧，似乎这这些年来没人维修过，楼梯已有数处剥落。寒风从楼门破损处吹进，寒意袭人。想昔日同学少年，谁个不宝马香车，华屋美舍，更见先生此处的清冷落寞。敲门，邦洛大姐开门，引我们进屋，先生已坐起等候。原本嘱邦洛不要早早惊动先生，但先生毕竟知道了，中午竟未午睡，一直坐在那里等候。先生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那张老书桌忠实地陪伴先生阅尽岁月沧桑。屋子里多摆了一张躺椅，愈显得局促。记得一位波斯国王曾往潘布罗克小屋拜会曾两任英国首相的约翰·罗素，罗素先生为房子的狭小向国王道歉，国王说：“屋子确实不大，却住着一位大人物”。先生能在这方寸之地亲炙中外先哲，又有何小可言？书房门上挂着先生手泽，为文天祥在元兵狱中所作：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先生在旁注道：

“为国尽忠，乃义之尽也
为民族尽孝，乃仁之至也”

南墙原来放置康德全集的小书架搬走了挂上了先生手书条幅殷鉴不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注明“二〇〇一年六月四日”。知先生心中仍牵挂着十七年前少年学子的喋血。那些曾经鲜活亮丽的青春之魂始终活跃在先生的记忆里。这悲哀如此深重，在已近百岁的先生身上，几是世纪之哀。与此相比，我更惊异于那些衣马轻肥的学界新贵，他们那样轻浮不屑地对这些模糊的血肉扮着鬼脸，尽管我亲见他们也曾在死者生前的行列中举起过

拳头。敬问先生起居，先生频频点头，说好，好，只是老了。先生确实老了，临近九十六岁的人了，能说不老吗？先生走路要人搀扶，或靠支架扶持行走。但先生的活力和精神又好得让人吃惊，尤其是谈吐问答之敏捷，头脑记事之清楚，几乎是一奇迹。我们也知道有近百岁的老人生命虽在，但灵魂已走。而先生，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只有能拿走我灵魂的人才能带走我的生命”。向先生呈上在香港出版的宾雁纪念文集，先生拿过左右端详，说书印得漂亮。又急忙让我读他前几个月在唐君毅先生纪念会上的发言。先生在这文稿的一句话下面重重画了道红线：“唐先生对人类，爱其生，悲其苦，一生依靠一只手，一支笔表达他的善意”。我想这正是先生夫子自道。先生曾在《论人和人的解放》一书后记中写道：“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响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正想着，突然耳边听不见了先生的声音，原来老人家已经聚精会神地读起了宾雁纪念文集，不再理会我们的闲谈。北国的冬日，天真短，只觉片刻，天竟黑了。打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先生的白发上，先生捧着那部厚厚的书，凑近眼睛，读着，读着……我们不再说话，静谧飘来，带我回到七五年的冬日，我初登先生门的日子。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间小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份。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见先生手录佛陀临终语置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知先生是勘破红尘后仍素怀持守。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希望人类终有一股正气来让人类能安静生活下去，可能这也只是希望，但比较合理一点，也许是可能的。狂风暴雨之后，将有晴朗的一天，这大约是气象学上的规律。我们过去已经等很久了，可能还要等候。今年我给朋友的贺年片上都写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话，看来天总归是要明的”。钱钟书先生曾拈出刘孝标注《辩命篇》一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故善人为善，岂有息哉”，来解山谷诗。先生引此语，亦恰是此意。九一年时，先生曾作文总结好友许思园先生的一生，先生说：“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我以为这段话再恰当不过地描述了先生的一生所求。

〇九年一月一日，给先生打电话恭贺新禧。先生那天谈兴极浓，说话滔滔不绝。谈到国内形势，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大人物做起这些小事情来卑鄙得很。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没有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没有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听先生这番话，我几无言，昔庄周大小之辩，辩在孰优孰劣，而今先生大小之辩，辩在黎民苍生啊！先生又讲起国内学术腐败问题，说已成痼疾，从前为士林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人在海外，对国内学术界的糗事常有所闻。年前回国，朋友们相聚也谈及此事。我却甚吃惊，本来自红朝得鹿，谀桀倾纣皆是文章，而今革命怒吼为市声喧嚣所代，焚琴煮鹤亦成雅玩，此事本一体两面，不足为奇。伤心惟是中华三千年衣冠文物，旷绝幽奇之事渺不可寻。先生纯然一读书人，痛心疾首也是当然。我们无能挽狂澜于既倒，只能寄希望于中华文化生命坚韧顽强，破土重生。

先生耳朵有些聋，说话怕我听不清便声高起来，话筒中竟觉得有些震耳。先生最后感叹说，过年我就 98 岁了还想去法国看你们啊，就是不知航空公司肯不肯卖票给我这个 98 病叟啊。说到病叟两字，先生有点自嘲地大笑起来。在先生的朗声大笑中，我却不由泪水涌出。怕先生察觉，匆匆挂断电话。

呆呆坐着，许久，许久……天渐渐暗了，几点细雪飘落，愔愔地洒在青竹赭瓦上。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的裹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腔：“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后记

今年元月二十八日先生起床穿衣时不慎跌倒。夜间便觉背痛，送医院检查，未见骨折，返回家中。二月四日，腰部见有小块红肿，又去医院查。医生仍说无大碍。那几日常与邦洛大姐通话，手边自一月份动手写的《辅成先生》已完成四章。想全文完再呈先生审阅。本来写先生就感绠短汲深，未成全璧的东西更不愿给先生看。还有一层私意在，盼先生能平安养好跌伤，成其百岁之寿，这样总能看到我的全文。但雪说，还是尽早把成文的东西呈先生寓目吧，让他知道你在写他。问邦洛大姐先生可有精力读文？大姐说先生每日仍能读两个多小时报刊文章。于是传文过去，大姐打印出来送先生过目了。先生一气读完，只说了一句：“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此是何意？先生知我往来素不过两三子，这“别人”是谁？莫不是先生想让我将此文公之于众？

二月十八日，再打电话，邦洛说先生正在电话旁边，今日精神不错，可以说几句话。等了片刻，话筒中传来先生的声音，大不似往日的洪亮，有些气促声微。只说身体不太好，又问我几时回来。我即告先生今年暑期放假即归探望先生，请他千万珍摄，耐心治疗，等我回来。先生说声好，便再无声音。这是和先生最后的接谈。放下电话，便告雪定下八月一日返京机票。

二月底，胡平自美来电，说听到先生病重的消息，心里很着急，问我可有新消息。我告诉他前几天还与先生说话，胡平似稍放心，嘱我有消息尽快告他。并说已请嘉映代他去看望先生。三月八日，胡绩伟先生亲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告之自己大病终愈的经验。先生闻后甚受鼓舞。三月十一日，嘉映往朗润园看望先生，回来后电话告我先生精神尚可，坐谈近两个小时，先生还忆及九五年在巴黎的日子。我听后稍安心，三月二十八日，家兄自美回国，与家姐共往探视先生。因我与家兄长相相像，先生竟以为是我归国，惊问“你几时回来的”。家兄竟一时未敢道明真相，许久后才说我不是越胜，是越胜的哥哥。先生即送家兄文稿一册，并坚持要签上名字。但四月一日，病情急转之下，送北医三院诊治，不料一月中竟四次转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期间因插胃管引起胃出血，又加肺部感染，一度入住重症监护抢救室。五月二十二日，是嘉映父亲的追思之日，家姐前往途中接邦洛大姐电话，告今晨因医生反复“洗胃”，造成先生血压陡降，然后上一系列抢救措施。先生始终神智清醒，平静注视医生们的忙乱。在医生最后挪动头部时，突然闭目辞世。先生平静而绝然地走了，始终保持着哲人的尊严。

五月二十六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先生生平介绍中说“一九八七年因故办理退休”，此话甚蹊跷。何谓“因故”？因何故？语焉不详。或许那些秘密档案终有大白天下的一日吧。北大校方无一人出席告别仪式。先生服务北大近六十年，育人无数，而校方竟吝于表达些微的谢意。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让我宽慰的是，我们哲学班的同学来了，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虽然离开先生已多年，仍知为先生执弟子礼。先生教过的孩子，仁义总是在的。

八月返京，往朗润园先生故居，已是人去屋空，只剩先生翻过的那些书卷默默地看着我。往老山谒先生灵，对先生说，我来晚了，未及送您老人家。我想先生等我，而您终等不及，先自去了。见先生遗容，雍容大度地微笑着，知先生不怨我。后将《大悲咒》一卷奉于先生灵前，作永久的祈福。先生一定知道小子的心愿。

此次回京，得空往故园祭扫先慈严墓。事毕随北陵及姐弟览观五台，寻古刹清凉。山路蜿蜒二十余里，见岚气出岫，虬松挂崖，青霭苍苍，层层染绿。山中阴晴不定，骤雨突至，一片迷蒙，忽又骄阳扫雾，满谷黄金。有孤寺高居梁上，隐约疏钟回响。转一急弯，素石碑楼兀然矗立，乃入清凉界。昔阮嗣宗遇大人先生于苏门山，即此太行余脉。大人先生与之畅论天地玄黄，大道存废，后长啸而隐。嗣宗归而传之曰：“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

清凉寺中庭有巨石如船，名“清涼石”，纵横十余尺，高丈余，重数十吨。石身苔藻斑驳，遍体纹理飞动，隐隐有灵气，似远古高士化身。其沉稳坚厚，古意萧远，寂然独在，不正如辅成先生吗？先生远行已近百日，谁知其所终极？依先生心性，必会寻此清幽之地以避嚣尘，托体崇山而岿然静卧。有天风流荡，万籁谐响，巨木俯仰，群鹤环翔，又有幽泉濯之，云霞蔚之，丰草绣其锦绸，冷梅献其芳馥，伴朝暾夕曛，夜月晚星，闻晨钟暮鼓、梵呗法音。于千山万壑中得大自在，历万世而不坠，同日月而永光。

呜呼先生！呜呼先生！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
十月六日改定于奥赛小城



赵越胜

现居法国。“赵越胜沙龙”创建人。1970年在北京当工人。1978年进社科院哲学所。1989年，移居法国。著有《燃灯者》《精神漫游》《既见君子》等。《燃灯者》曾获中国最佳散文大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Theodor Lundqvist](#) on Unsplash

档案

纪念沈从文：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汪曾祺 | 发现经典

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
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

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字是晋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词想必也是她拟的。只有四句：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贴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芜同志编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写得最好的一篇，我以为也应该是张充和写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历表时，“民族”一栏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选择。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狠劲，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个名堂。黄永玉就是这样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发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时是个顽童，爱游泳（他叫“游水”）。进城后好像就不游了。三姐（师母张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没有看到。我当然更没有看到过。他少年当兵，漂泊转徙，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吃的东西，最好的不过是切成四方的大块猪肉（煮在豆芽菜汤里）。行军、拉船，锻炼出一副极富耐力的体魄。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子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他在信里说了一些他刚到北京时的情形。——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他应当算是个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摊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我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鼻血痕迹的手稿。他后来还常流鼻血，不过不那么厉害了。他自己知道，并不惊慌。很奇怪，他连续感冒几天，

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

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边城》一共不到七万字，他告诉我，写了半年。他这篇小说是《国闻周报》上连载的，每期一章。小说共二十一章， $21 \times 7 = 147$ ，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这篇东西是他新婚之后写的，那时他住在达子营。巴金住在他那里。他们每天写，巴老在屋里写，沈先生搬个小桌子，在院子里树阴下写。巴老写了一个长篇，沈先生写了《边城》。他称他的小说为“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因此试验了各种方法。为了教学生写对话，有的小说通篇都用对话组成，如《若墨医生》；有的，一句对话也没有。《月下小景》确是为了履行许给张家小五的诺言“写故事给你看”而写的。同时，当然是为了试验一下“讲故事”的方法（这一组“故事”明显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谈》和《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试验一下把六朝译经和口语结合的文体。这种试验，后来形成一种他自己说是“文白夹杂”的独特的沈从文本，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烛虚》）中尤为成熟。他的亲戚，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你的语言是古英语”，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讲创作，不大爱说“结构”，他是“组织”。我也比较喜欢“组织”这个词。“结构”过于理智，“组织”更带感情，较多作者的主观。他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看看哪一种形式更为合适。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至三姐后来不许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个极其细心，极其认真的义务责任编辑）。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从文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他不大用稿纸写作。在昆明写东西，是用毛笔写在当地出产的竹纸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钢笔，蘸水钢笔。他抓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抓毛笔（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不是洋学堂出身）。《长河》就是用钢笔写的，写在一个硬面的练习簿上，直行，两面写。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写的是行书。不熟悉他的字体的排字工人是会感到困难的。他晚年写信写文章爱用秃笔淡墨。用秃笔写那样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顿挫有致，真是一个功夫。

他很爱他的家乡。他的《湘西》、《湘行散记》和许多篇小说可以作证。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是不是夹竹桃，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先生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八十岁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凤凰，领着她看了他小说中所写的各处，都还没有大变样。家乡人闻知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样招待才好。他说：“他们为我捉了一只锦鸡！”锦鸡毛羽很好看，他很爱那只锦鸡，还抱着它照了一张相，后来知道竟作了他的盘中餐，对三姐说“真煞风景！”锦鸡肉并不怎么好吃。沈先生说及时大笑，但也表现出对乡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乡听了傩戏，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旧范很不以为然。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沈先生八十岁生日，我曾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

端木蕻良看到这首诗，认为“犹及”二字很好。我写下来的时候就有点觉得这不大吉利，没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乡听一次了！他的家乡每年有人来看他。沈先生非常亲切地和他们谈话，一坐半天。每当同乡人来了，原来在座的朋友或学生就只有退避在一边，听他们谈话。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辈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们时充满感情。没有他们的提携，沈先生也许就会当了警察，或者在马路旁边“瘪了”。我认识他后，他经常来往的有杨振声、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杨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带信，让我到南锣鼓巷他的住处去，我以为有什么事。去了，只是他亲自给我煮一杯咖啡，让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册页。这册页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样大，横的，是山水，用极富金石味的墨线勾轮廓，设极重的青绿，真是妙品。杨先生对待我这个初露头角的学生如此，则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杨先生和沈先生夫妇曾在颐和园住过一个时期，想来也不过是清晨或黄昏到后山谐趣园一带走走，看看湖里的金丝莲，或写出一张得意的字来，互相欣赏欣赏，其余时间各自在屋里读书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对青年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自己出钱为一个诗人出了第一本诗集。一九四七年，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家中拉了一笔债，沈先生提出卖字来帮助他。《益世报》登出了沈从文卖字的启事，买字的可定出规格，而将价款直接寄给诗人。柯原一九八〇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记起有这回事。他对学生的作品细心修改，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这辈子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

字。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也不断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先生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脚页边都裁去，只留一个稿芯，这样分量轻一点。稿子发表了，稿费寄来，他必为亲自送去。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他的画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为出手的。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郑振铎、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可发表。稿子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的，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有一阵住在呈贡新街，后迁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课时进城住两三天。他进城时，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宝贝，借书。沈先生的书是为了自己看，也为了借给别人看的。“借书一痴，还书一痴”，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可不多。有些书借出去一去无踪。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我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虎虎，兄弟怡怡，他们都很高尚清白，无丝毫庸俗习气，无一句粗鄙言语，——他们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九千多元，大概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湘行散记 湘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沈从文的湘西

沈先生五十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偶然还写一点，笔下仍极活泼，如写纪念陈翔鹤文章，实写得极好），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实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对历史文物有很大兴趣。他写的关于展子虔游春图的文章，我以为是一篇重要文章，从人物服装颜色式样考订图画的年代的真伪，是别的鉴赏家所未注意的方法。他关于书法的文章，特别是对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见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逛街，总要看看市招，到裱画店看看字画。昆明市政府对面有一堵大照壁，写满了“一壁字”（内容已不记得，大概不外是总理遗训），字有七八寸见方大，用二爨掺一点北魏造像题记笔意，白墙蓝字，是一位无名书家写的，写得实在好。我们每次经过，都要去看看。昆明有一位书法家叫吴忠志，字写得极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画店都有他的刚刚裱好的字。字写得很熟练，行书，只是用笔枯扁，结体少变化。沈先生还去看过他，说“这位老先生写了一辈子字”！意思颇为他水平受到限制而惋惜。昆明碰撞撞都可见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联上钱南园的四方大颜字，也还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后即喜欢搜集瓷器。有一个时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只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他一度专门搜集青花瓷。买到手，过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对陶瓷赏鉴极精，一眼就知是什么朝代的。一个朋友送我一个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给他看，他说：“元朝东西，民间窑！”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至于茧纸、高丽发笺，那是凡品了（他搜集旧纸，但自己舍不得用来写字）。晚年写字用糊窗户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

在昆明，搜集了一阵耿马漆盒。这种漆盒昆明的地摊上很容易买到，且不贵。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则是“人弃我取”。其实这种竹胎的，涂红黑两色漆，刮出极繁复而奇异的花纹的圆盒是很美的。装点心，装花生米，装邮票杂物均合适，放在桌上也是个摆设。这种漆盒也都陆续送人了。客人来，坐一阵，临走时大都能带走一个漆盒。有一阵研究中国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各种颜色都有：宝蓝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纹也是各式各样。沈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中国丝绸图案》。有一阵研究刺绣，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镜盒、香袋。不知他是从哪里“寻摸”来的。这些绣品的针法真是多种多样。我只记得有一种绣法叫“打子”，是用一个一个丝线疙瘩缀出来的。他给我看一种绣品，叫“七色晕”，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看了真叫人发晕。他搜集、研究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消遣，是从发现、证实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越这个角度出发的，研究时充满感情。我在他八十岁生日写给他的诗里有一联：

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全是记实。沈先生提及某种文物时常是赞叹不已。马王堆那副不到一两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说起时非常感动。有一个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连

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红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一点不用修改）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由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儿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镇”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别捐给了几个博物馆、工艺美术院校和工艺美术工厂，连收条都不要一个。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从不讲究。他在《湘行散记》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这件长衫我可没见过。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后是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记得是从房东手里买的一件旧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线呢面），他穿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号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饭时总是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超不过两角五分。三姐是会做菜的，会做八宝糯米鸭，炖在一个大砂锅里，但不常做。他们住在中老胡同，有时张充和骑自行车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回来，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宾胡同，常吃的不过是炒四川的菜头，炒蘑菇。沈先生爱吃茨菰，说“这个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传》中说他很会炖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没见他炖过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亚蓉家去，先来看看我（王亚蓉住在我们家马路对面，——他七十多了，血压高到二百多，还常为了一点研究资料上的小事到处跑），我让他过一会来吃饭。他带来一卷画，是古代马戏图的摹本，实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问我女儿：“精彩吧？”那天我给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称道：“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

他的丧事十分简单。他凡事不喜张扬，最反对搞个人的纪念活动。反对“办生做寿”。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新华社消息的标题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
摘自《汪曾祺散文全编》



汪曾祺

江苏高邮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他从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他前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师从沈从文，后启寻根文学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潮。他的创作，小说、散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诸体兼备，皆取得很高艺术成就，堪称文体家；又兼及书画，多有题跋，以博雅名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代表作有《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等。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KJ Brix on Unsplash

档案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1 条动态。

目前来看, 11 月 24 日新疆乌鲁木齐一小区发生的火灾事件及后续反应, 成为中国防疫政策的转折点。经济数据的大幅下滑、防疫政策的次生灾害、人民群众的声音行动等因素积聚起来, 共同推动改变发生, 关于“放开”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一些文章通过数据和他国经验, 评估“放开”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比如经济学者陈沁通过对本国医疗资源供给能力推算, 并借助香港、新加坡此前经历新冠大流行的数据, 模拟新冠感染最高峰时中国病床和 ICU 的需求量, 试图回答《“第一次冲击”, 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缺口包括 80 岁以上老人的疫苗接种率不够、ICU 资源的不足, 等等。

科学媒体“知识分子”则从他国经验角度, 刊发了一篇《经历过奥密克戎大流行的国家现在怎样了?》。文章提到, 在建立了较完善的人群免疫水平后, 奥密克戎本身的疾病负担可以控制在流感等常见呼吸道传染病的水平。但和陈沁的数据呈现的担忧类似, “对于一个奥密克戎第一次暴发的地区而言, 我们毫无疑问依然会在短时间内遭遇感染病例无可遏制的激增。此时, 如何合理地分配医疗资源, 乃至维持社会正常运作都需要良好的预案”。

如果你记性比较好, 可能对今年 4 月的 newsletter《防疫的代价》有点印象。在那篇文章中, 我梳理了饶毅、杜骏飞、梁建章之间的争论。其中, 饶毅反驳了梁建章的观点, 称不存在每一种病原体都是“越流行, 致病力越下降、病人症状越减轻”的规律。有些是逐渐变弱, 有些不是, 有些会时好时坏。

最近, 金冬雁在题为《新冠病毒只会越变越弱, 最后变成感冒》的采访中称, “从冠状病毒在人类中传播的历史来看, 从来就没有过病毒在人与人之间长期传播后毒性急剧增加的情况。鼓吹这一套的这些人, 有一些是公卫的学者, 他们对于这个病毒不了解, 根本就是跨界, 所以说致病性会大大增加等猜测, 其实是拿来恐吓公众”。

这和上次梁饶争论的一个问题相同, 没想到公号“饶议科学”后面果然发了一篇商榷文章, 称金冬雁的一些说法与新冠病毒的事实不符。随后, 金冬雁又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前后对比来看, 金饶之间的分歧和梁饶一样, 并非根本性, 其实都赞同在疫苗和药物基础上的“放开”, 但在具体科学问题以及表述上, 持有不同看法。这实际上反映出学科角度和意识形态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比如关于病毒是否越来越弱, 饶毅是站在分子生物学理论角度, 称病毒突变没有方向性, 可能弱, 也可能强, 但金冬雁是站在病毒学家的经验角度, 诉诸理据是“我们从 2003 年开始研究冠状病毒, 搞到现在搞了 20 年,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病毒在自然界同一个宿主内广泛传播后, 会进化成此宿主的一个强毒株。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病毒最重要的一个进化动力, 就是要适应这个宿主”。

粗看起来, 这是理论和经验之别。但从后来金冬雁的回应看, 可能更大程度上是表述问题, 之前话说得太绝对。因为他在回应中也说:“奥密克戎的变异正趋于稳定, 向致病性更强变异是极小概率事件”。虽是极小概率事件, 但不代表不会发生, 而且医学上有句俗话, 极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在每一个病人身上那就是百分之百。类似的, 金说:“饶认为新冠疫苗不能防止感染, 口服抗新冠药物不是神药。口服抗新冠药物确实不是神药, 但有证据表明 65 岁感染者口服 Paxlovid 可减少 81% 的死亡。”

可能出于对当前防疫政策转变的急迫推动心理, 金之前在表述上没那么严谨, 而饶恰恰抓住了这些不是 100% 的模糊之处。须知, 科学有时也不存在完全的 100%, 尤其在我们并没有完全认知的新冠病毒上更是如此。虽然我们现有认知是基于有限经验的总结和推想, 争取未来做大概率正确的事情, 但学者理应告知公众, 在表达时既要考虑到传播, 也要尽量照顾严谨, 才能更加增进信任与说服。

不过, 两人的交锋和回应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已然珍贵。这就涉及病毒不讲政治, 但人讲政治。比如两人争论的一个未解之谜便是进口和国产疫苗的作用、副作用和引进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批准进口的 mRNA 疫苗, 本土的 mRNA 疫苗也迟迟没有研发成功上市, 只采用灭活疫苗。

除了科学和政治, 一群经济学家(姚洋、黄益平、张军、梁建章、管清友、任泽平)提出了《关于开放经济活动的建议》。文中的建议有七点, 包括近期把开放经济活动放在优先位置, 放开公共交通、写字楼、餐馆、酒店、物流、商场等场所的经济活动。统一全国防疫标准, 消除全国范围内出差和旅行的过严限制; 请医学界科学家研究优化方案的可行性, 比如, 减少封控范围, 不再进行全区、全市统一大规模核酸检测等。加强老年人的疫苗接种普及工作, 做好脆弱人群的医疗保障, 等等。

种种“放开”的讨论声音之外, 学者唐世平在新浪微博写道:“在我们庆祝封控逐渐弱化, 迟到的自由呼吸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忘记, 那位医生; 那些在疫情最开始的时候冲在前面的医护人员; 那些曾经给我们科普的科学家、医生、记者; 那些从 2020 年初就努力研发核酸检测、抗原检测、疫苗的科学家。让我们还不要忘记, 从 2022 年初开始, 给我们科普新的病毒株的科学家、医生、记者; 那些基于科学数据呼吁逐渐弱化封控的科学家、医生、记者; 那些为了国计民生呼吁的企业家、社会科学家、媒体人士(是的, 他们叫‘公知’”。最后, 我们最不该忘记的是, 那些疫情中离我们逝去的亲人, 特别是乌鲁木齐的同胞, 以及最后走上 xx 呼吁解封的年轻人和普通百姓。这三年,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最后, 我们希望, 我们的未来会好一些。”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继柯林斯词典公布 2022 年度词汇为“permacrisis”(长久危机)之后, 韦氏词典和牛津词典也公布了年度词汇。韦氏词典评选的是“Gaslighting”(煤气灯), 指心理操纵、严重误导、彻头彻尾欺骗。该词源于 1938 年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创作的戏剧《煤气灯》(Gas Light), 后在 1940 年代出现两部改编电影, 其中一部是英格丽·褒曼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煤气灯下》(Gaslight)。



《煤气灯下》剧照

词典方称, “Gaslighting”在英文使用中迅速上升, 过去四年尤为明显, 我们对此感到惊讶。但是, 如果想想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和信息环境, “煤气灯”一词的流行并不让人奇怪。它是一种令人发指的工具, 常被人际关系中的施虐者、政客以及其他新闻人物使用。它可以发生在亲密伴侣之间, 也可以发生在更广泛的家庭和朋友之间。它也可能是一种公司策略, 或者误导公众的一种方式。还有“医疗煤气灯”(medical gaslighting), 指医疗从业人员将患者的症状或疾病视为“全在你的臆想中”。

和往年不同, 今年牛津词典的年度词汇开放给公众投票产生, 词典方只给出了三个候选词汇“goblin mode”、“#IStandWith”、“metaverse”, 认为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捕捉到这一年的社会风气和氛围。

“goblin mode”(妖精模式, 也有中文媒体翻译为“咸鱼模式”、“摆烂”), 指拒绝社会强加的期望, 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它的流行和时代气候相关, 当我们带着对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恐惧进入大流行的第三个年头时, 许多人已经放弃改善自己的前景, 而是选择拥抱昏昏欲睡的舒适。

“#IStandWith”(# 我支持)源于社交媒体上的站队标签。它表明今年人们在一些议题上的激进与分裂, 包括俄乌战争、约翰·德普起诉前妻艾梅柏·希尔德诽谤案, 等等。词

典方称，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创造的词汇让你的观点与某项事业或某个人保持一致，但也往往进一步引发争议，有时甚至是仇恨言论，造成两极分化。“Metaverse”（元宇宙）源自作家尼尔·斯蒂芬森 1992 年的科幻小说《雪崩》，指一种虚拟现实环境。该词和扎克伯格宣布 Facebook 更名为 Meta，以及关于虚拟现实中工作、伦理和可行性的辩论等有关，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一种设想。

02

两个多月的抗议后，伊朗当局宣布暂停道德警察巡逻。伊朗总检察长蒙塔泽里称，道德警察与司法无关，并透露这一组织已被暂停。道德警察创立于 2005 年，是伊朗警察部队的一个分支，专门负责在公共场所执行伊斯兰教着装规范的法律。蒙塔泽里还说，伊朗议会和司法部门正在重新审查头巾法，以确认是否须要作任何修改，预计结果将在一两周内出炉。

不过，《联合早报》称，有观点呼吁对伊朗当局这些决定保持谨慎。政治分析人士霍洛维兹 (Michael A. Horowitz) 在 Twitter 发文说：“这可能是当局向抗议者让步，但改变不了总体形势。伊朗警察、巴斯基民兵 (Basiji) 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仍在杀害抗议者，道德警察的命运可能在几周前就已经注定。伊朗政权不会自我改革。”

03

在当代日本年轻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35 岁的东京大学副教授斋藤幸平是引领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在 2020 年出版的《人类世的“资本论”》(人新世の「資本論」)意外走红，销量超过 50 万册，并将在明年推出英文等多个语言版本，其新近作品《大洪水前：马克思与行星的新陈代谢》(大洪水の前に マルクスと惑星の物質代謝)也在日本卖得火爆。

《金融时报》编辑利奥·刘易斯 (Leo Lewis) 采访了斋藤幸平，称斋藤认为，面对不平等危机和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去增长是解救社会的唯一办法。增长没有让我们幸福，沮丧四处弥漫。《人类世的“资本论”》在引用马克思对自然世界的著述之外，呼吁在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斋藤表示，疫情自然而然引发了对去增长观念的认同，把日本从“正常生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大变化”的信念中摇醒。

“他无情抨击了日本经济中充斥着‘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的历史倾向，这些工作占用了日本越来越宝贵的劳动力，让他们做没有意义的事。他表示，应该对肉、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和跑车征收比现在多得多的税，来抵消它们造成的破坏。他还认为，由于广告在推广无穷无尽的不必要的消费方面效果太好，它们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在东京街头上方闪烁的那种巨型液晶显示屏，它们榨取了日本浪费不起的电力。他说，‘我们可以消灭社会上的广告，除了广告行业以外没有人会受打击。’”刘易斯写道。

关于为什么在日本年轻人中兴起这股思潮？斋藤分析称，这和代际有关。他出生于 1980 年代末的通胀时期，进入小学时，日本 30 年经济停滞刚刚开始。在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处于通缩，工资没有上涨，利率一直为零。日本已有两代人在进入成年时未能像前人一样经历增长，而他正属于其中一代。他猜测，自己的读者也是如此。他们或许在思考，自己提出的那种猛烈的系统性转变是否并非完全不可能。

04

去年 7 月，东京奥运会举办之际，我们和徐国琦教授聊了聊 [体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正如他说，体育和政治、外交关系历来是充满矛盾。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卡塔尔世界杯，类似[争议](#)也层出不穷，比如国际足联的贪腐、卡塔尔赢得举办权背后的问题、卡塔尔的人权记录（如外国劳工）和对待 LGBTQ 的方式、欧洲球队的“彩虹袖标”、球场内不得饮酒，等等。纵使争议纷纷，世界杯依然吸引数十亿人观看。不少媒体还推出[书单](#)，解释它的吸引力、历史和未来，其中有中文版的如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足球往事》、体育作家乔纳森·威尔逊的《倒转金字塔：足球战术史》等，还有未引进的包括《足球时代》(The Age of Football: Soccer and the 21st Century)、《国际足联大厦的倒塌》(Fall of the House of FIFA: The Multimillion-Dollar Corruption at the Heart of Global Soccer)、《梅西 vs. C 罗》(Messi vs. Ronaldo: One Rivalry, Two GOATs, and the Era That Remade the World's Game) 等。

除此之外，如果你对卡塔尔有兴趣，《纽约时报》推荐了《卡塔尔和海湾危机》(Qatar and the Gulf Crisis)、《变化中的卡塔尔》(Changing Qatar: Culture, Citizenship, and Rapid Modernization)、《红牌》(Red Card: FIFA and the Fall of the Most Powerful Men in Sports) 等[五本书](#)阅读。

05

11 月 30 日，江泽民 (1926—2022) 逝世，官方和民众表示哀悼。如何看待他的功过得失和政治遗产？许多人认为，他自己在 2009 年的一段发言总结得到位：“到了北京，我干了这十几年也没有什么别的，大概三件事：一个，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个，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第三个，就是‘三个代表’。如果说还有一点成绩，就是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这个对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后来又干了一年零八个月，等于我在部队干了 15 年军委主席。还有 1998 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主要的就是三件事情。”

不过，这主要是从内政角度，从外交角度，这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拥抱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他的多国语言外交智慧，外媒采访让人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多才多艺，以及那时的氛围，让不少普通民众怀念。评论人宋志标称其为“[常人政治家](#)”。

06

几条文化新闻可以一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建议，将[大堡礁](#)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提高保护意识，鼓励政府采取行动。另一边，[法棍](#)被该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法国，每年有超过 60 亿条法棍售出，但现在正受威胁。由于农村空心化，传

统法棍店正在乡村地区消失，与此同时，席卷欧洲的经济危机也将法棍价格推向新高。美国作家琼·狄迪恩的遗产被拍卖，包括 2.4 万美元的一摞书、2.7 万美元的标志性 Celine 大墨镜、6 万美元的书桌、3.5 万美元的闹钟、11 万美元的油画等，总计超 19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超 1300 万）。另一位 1960 年代成名的美国文化人[鲍勃·迪伦](#)，则陷入一场风波。他售价 599 美元的亲笔签名限量版 (900 本) 新书《现代歌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 被爆出是复制品签名，出版社随后致歉，接受退款。迪伦也发表了道歉声明，称多年来的签名都是亲笔，但“在 2019 年，我患上严重的眩晕症。疫情后的这几年，情况没有改善。签名时，我需要 5 名助手近身协助，而在疫情蔓延时，这么做不安全且行不通。所以在疫情期间我无法签任何东西，随着合同规定的时间临近，有人建议我使用自动笔，并告诉我在艺术以及文学圈，这么做‘很常见’。使用机器是个错误决定，我想立刻改正，正与出版社以及工作伙伴商讨具体方案”。美国五大出版商之一的[哈珀柯林斯](#)，其员工在 11 月举行罢工，希望公司提供更好的休假福利，将最低薪标准从 4.5 万美元提高到 5 万美元，并正视公司员工缺乏多样性的问题；神秘的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又现身了。这次他的作品出现在乌克兰的受损建筑上，包括一名酷似普京的男子与一名小男孩进行柔道比赛时被摔倒在地、一位女体操运动员在一座受损建筑的废墟上保持平衡、两个小孩在用坦克碎片制作的跷跷板上玩耍。



涂鸦

“千禧年系列小说迎来新作者。2004 年，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在完成千禧年三部曲《龙文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直捣蜂窝的女孩》后突然去世，无法实现十本序列的愿景。后来，拉森的遗产管理人宣布瑞典作家大卫·拉格朗兹续写，陆续出版了三本（《蜘蛛网中的女孩》《以眼还眼的女孩》《终结狩猎的女孩》）。出版方称，这六本在全球销售了超过 1 亿册。

最新的第七本，交给了瑞典作家[卡琳·斯米尔诺夫](#) (Karin Smirnoff) 完成，书名为《鹰爪中的女孩》(The Girl in the Eagle's Talons)。斯米尔诺夫也是“千禧年”系列的第一位女作家。新故事发生地从斯德哥尔摩转移到瑞典北部，处理了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和环境开发的影响。

07

几个奖项结果可以关注。[美国国家图书奖](#)揭晓，30 岁的泰丝·冈蒂 (Tess Gunty) 凭借讲述印第安纳州低收入居民区的处女作《兔笼》(The Rabbit Hutch) 获得最佳小说，伊玛尼·佩里 (Imani Perry) 探讨种族、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等问题的《到美国南部去》(South to America) 获得最佳非虚构。

以儿童读物闻名的凯瑟琳·伦德尔 (Katherine Rundell) 凭借描述诗人约翰·多恩生活和作品的著作[《超无限：约翰·多恩的转变》](#)(Super-Infinite: The Transformations of John Donne) 摘得巴美列·捷福奖。这是英国最具声望的非虚构奖项。伦德尔称，这本书花了她 10 年时间，三易其稿。多恩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法律学者、海上冒险家、议员、牧师等。

08

几部英文新书可以留意。诺奖得主、媒体人[玛丽亚·雷萨](#) (Maria Ressa) 出版回忆录《如何反抗独裁者：为我们的未来而战》(How to Stand Up to a Dictator: The Fight for Our Future)；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出版关于 1970 年代美国电影的新书[《电影推想》](#)(Cinema Speculation)；作家科尔姆·托宾出了回忆录《盛宴上的客人》(A Guest at the Feast)，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家庭、工作、爱情等；音乐人[帕蒂·史密斯](#)出了一本受自己 Instagram 启发的图文作品《岁月之书》(A Book of Days)；《大空头》作者[迈克尔·刘易斯](#)预计会写一本有关刚倒闭的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创始人萨姆·班克曼 - 弗里德的著作。

09

11 月 9 日，作家、学者[台静农](#)诞辰 120 周年，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与鲁迅同组未名社，倡新文学，后赴台湾任教，著有《静农论文集》《中国文学史》等；11 月 11 日，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诞辰百年，《小鸟文学》“发现经典”栏目刊发了四篇文章（《值得爱的一定不止死亡》《时震》《2004 年 11 月 11 日，我满八十二岁》《五号屠场》）

以表纪念；11月18日，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逝世百年，我们如何走进他的世界。

11月26日，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大饥荒90周年](#)纪念活动，以悼念在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中的死难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出席活动，称有400到800万乌克兰人死于那次大饥荒。“今天，我们正在做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事来阻止俄罗斯的新的种族灭绝政策。一个新的，但类似于在20世纪杀死数百万人民的政策。我们不仅仅是对抗侵略。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建立一个体制，以阻止侵略，拆除其后果，并保证长期安全。……我们申明，饥饿永远不应该再被用作武器。”泽连斯基说。

10

11月4日，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1933—2022）逝世，他倡导科学与人文融合；11月6日，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 1940—2022）逝世，他以对动态宏观经济学的贡献和芬恩·基德兰德共同获得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1月22日，思想史学者[林毓生](#)（1934—2022）逝世，他以对20世纪中国激进化反传统思潮、儒家传统乌托邦主义等的反思闻名，著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11月24日，作家、诗人[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1929—2022）逝世，他是当代德语文学的代表之一，著有《比空气轻》《将军和他的子女们》等。



曾梦龙

1993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Kévin et Laurianne Langlais](#) on Unsplash

档案

打开视野， 看看“榜单中的榜单”

黄璐 | Newsle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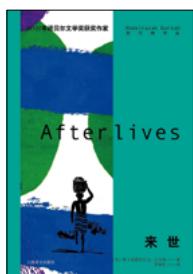
我们从 12 份知名媒体年度好书榜单中
提炼出了他们共同青睐的 10 本书。

新冠大流行的几年改变了全球社会生活，并见证了出版业的重大变化。

一个（我们认为是）好消息是，纸质书仍然坚挺，但是有声书越来越受读者青睐。此外，你能看到数字化对出版业的影响：自助出版平台越来越流行；TikTok 的图书社区 #Booktok 火爆无比；AI 有效地助力写作和出版社；作家们更多地投身于个人推广，在网络上和读者互动、销售图书；供应链和零售模式的变化；书本价格的攀升……

我们会在一月份的出版业年度总结里更多地谈到趋势性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两份榜单。站在年末，我们从各大年度最佳图书榜单中挑出了在多个榜单里同时出现的好书，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榜单中的榜单”。我们的内容源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纽约客》，《卫报》，《时代周刊》，《滚石杂志》，《出版人周刊》，《Vulture》，《Bookmarks》，《Kirkus 评论》，《Goop》，《华尔街日报》等等。

此外，10 月和 11 月的 Newsletter 中出现的很多作品也在这些榜单里。如梅根·欧鲁克的《看不见的国度》，李翊云的《鹅之书》，华·许韶洋 (Hua Hsu) 的《保持真实》，苔丝·甘蒂的《免屋》，盖尔·琼斯《捕鸟人》等等，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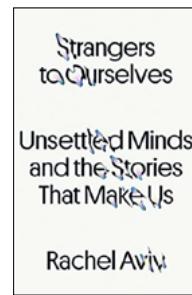
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来世》 (Afterlives)

这是 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的第十部小说，2020 年出版。

故事讲述了小男孩伊利亚斯在东非海岸被德国殖民军队挟持。多年后，当他与自己的国家作战时，他回到了在一个沿海小镇的家，却发现父母都已不在，妹妹阿菲娅也被遗弃，

成为了奴隶。哈姆扎也从战争中回到了家，他一无所有，身体和灵魂都伤痕累累——一直到他遇到了美丽无畏的阿菲娅。当这些年轻人生活、工作、相爱时，他们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另一个大陆上一场新的战争的阴影开始笼罩着、威胁着他们。法国精神病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 曾写道：“只有当原住民大声而清楚地承认白人价值观的至高无上时，移民者才会停下对原住民的毁灭。”这部小说则通过三个主人公相互交织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本书是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探索，叙述了经常重复的重大故事中所迷失的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古尔纳极其理解在政治和私人冲突中人类的缺点，以及这些缺点是如何造成国家和个人一代又一代地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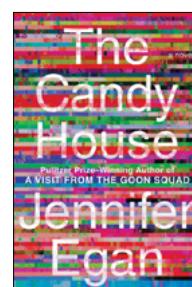
瑞秋·阿维夫 (Rachel Aviv)

《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不安的思想和造就我们的故事》 (Strangers to Ourselves: Unsettled Minds and the Stories That Make Us)

我们在危机和痛苦时期如何理解自己？我们讲述的关于精神疾病的故事，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通过深入、原创的报道，以及未出版的期刊和回忆录，阿维夫记录了一些人物，他们对自己的解释被精神病学所限制。一位印度女性被尊为圣人，住在喀拉拉邦的治疗寺庙里；一位被监禁的母亲在精神病康复后，努力争取孩子们的原谅；一位富裕的年轻女性，在经过十年的诊断后，决定停止用药，因为她不知道没有药的自己是谁；还有一个人，他毕生的目标就是报复他的精神分析学家。在一种深刻的共情的激励下，作者也讲述了自己小时候患“厌食症”的故事。

本书是对精神疾病的启示性叙事。阿维夫说，“精神病学的解释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它们假装中立，既能给人安慰，也能让人屈尊俯就。”她的叙述挑战了我们理解和谈论疾病的方式，证明了心灵的韧性。



珍妮弗·伊根 (Jennifer Egan)

《糖果屋》 (Candy House)

这部与《打手小队的来访》 (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 配套的小说，讲述了人们上传和分享记忆的故事，探讨了超连接带来的孤独感。

2010 年，极为成功、才华横溢的科技企业家比克斯已经四十岁了，还有四个孩子。他迫切需要一个新点子。当他与教授们交谈时，他总是坐立不安。其中一位正在尝试下载或外化”记忆。在十年内，比克斯的新技术“拥有你的潜意识”已经吸引了很多人。它使你可以访问曾拥有的每一段记忆，并通过分享来换取他人的记忆。

作者通过多个角色相互交叉的几十年的生活，讲述了“拥有你的潜意识”的后果。这些角色展开的方式多种多样——从全知到第一人称复数，再到二重唱，到书信体和推特。在这个幻想世界中，有追踪和利用欲望的“筹码”，也有“逃避者”，他们都明白吃一口“糖果屋”的代价。

《糖果屋》令人眼花缭乱，感人至深，它大胆地想象了一个离我们不远的世界，并聚焦于社交媒体、游戏和另类世界，你可以在角色扮演游戏中体验在不同维度间的移动。本书展现了人类对真正的连接、爱、家庭、隐私和救赎的渴望，以及这份渴望的坚韧和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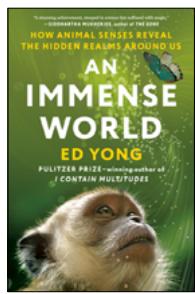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 (Douglas Stuart)
《青年芒戈》 (Young Mungo)

本书是作者的布克奖获奖作品《舒吉·贝恩》的续集，讲述了同性之恋和工人阶级家庭的故事。

在撒切尔执政后经济崩溃的格拉斯哥，芒戈和詹姆斯在一个住宅区长大，却活在不同的“星球”上——芒戈是新教徒，詹姆斯是天主教徒。如要被视为是男子汉，他们就应该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尽管困难重重，他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并坠入爱河。他们梦想着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而芒戈则竭力向周围的人，尤其是他作为黑帮头目的哥哥，隐藏真实的自己。

几个月后，芒戈的母亲送他去苏格兰西部的一个湖，和两个陌生男人一起钓鱼，他们醉醺醺的戏谑掩盖了阴暗的过去。芒戈需要召集自己内心所有的力量和勇气，试图回到一个安全的、他和詹姆斯可能还有未来的地方。

《少年芒戈》将人物的日常世界充满了丰富的抒情色彩，并充分表达了文学界很少被承认的人物的心声。这个扣人心弦、发人深见的故事，敏感地探索了一个温和的青少年试图理解他的性取向的困惑思想，讲述了男子气概的界限、宗派主义的分歧、酷儿群体所面临的暴力，以及过于爱一个人的危险。



埃德·扬 (Ed Y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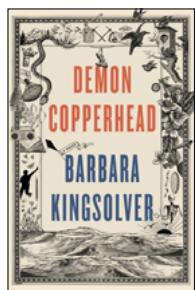
《一个巨大的世界：动物的感官如何揭示我们周围隐藏的领域》
(*An Immense World: How Animal Senses Reveal the Hidden Realms Around Us*)

人类是“如此无情地依靠视觉”，以至于光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安全、进步、知识、希望和美好的象征”——但他们是多么无知呀！

地球上充满了景观和纹理，声音和振动，气味和味道，电场和磁场。但每一种动物都被封闭在自己独特的感官泡泡里，只能感知广阔世界中的一小片。这本书引导我们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维度——其他动物所真实感知的世界。

我们遇到了被火吸引的甲虫，可以追踪地球磁场的海龟，用电子信息填满河流的鱼，还有像蝙蝠一样使用声纳的人类。我们发现鳄鱼长满鳞片的脸就像情人的指尖一样敏感，巨型乌贼的眼睛进化到能看到闪闪发光的鲸鱼，植物在求爱时发出听不见的歌声，甚至简单的扇贝也有复杂的视觉。我们了解蜜蜂在花朵中看到了、鸣禽在曲调中听到了、狗在街上闻到了什么。我们听一些关于人类历史上重大发现的故事。

在本书中，作家兼著名科学记者埃德·扬引导人们超越感官的限制，去感知周围的气味、电磁波和压力脉冲。为了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旅行，只需要从别的角度看问题。



芭芭拉·金索沃 (Barbara Kingsolver)
《恶魔铜头》 (Demon Copperhead)

这是一部改编自《大卫·科波菲尔》的作品。

故事发生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南部的山区，一个十几岁的单身母亲在拖车里生下了一个男孩。他没有任何遗产，除了死去的父亲英俊的外表和铜色的头发，刻薄的机智，和一种狂热的生存天赋。在紧凑无比的情节中，他勇敢地面对了现代的各种危险：寄养、童工、荒废的学校、体育的成功、成瘾、灾难性的爱情和毁灭性的损失。这一切使他意识到自己在大众文化中的透明，在这种文化中，甚至连超级英雄都抛弃了农村人，转而青睐城市。

几代人以前，查尔斯·狄更斯写了《大卫·科波菲尔》，讲述了作为制度贫困的幸存者经历，以及贫困对儿童造成的伤害。而芭芭拉将这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史诗小说进行改编，设在了当代美国南部，并借用了狄更斯的愤怒和同情，以及他对一个好故事所具有的变革力量的信念。《恶魔铜头》为新一代迷失的男孩发声，以及所有那些出生在美丽的、被诅咒的地方而无法离开的人。

看作者如何处理原始素材是阅读本书的趣味之一。这么多年过去了，社会道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物是如何改变的？英雄们的使命呢？

即使经历了 1920 年代的沸腾，每个纽约人都听说过本杰明和海伦·拉斯克。他是一位传奇的华尔街大亨；她是贵族的聪明女儿。他们一起登上了世界的顶端，这里的财富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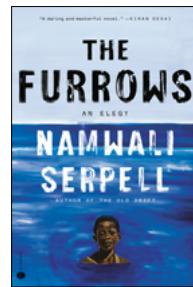


赫南·迪亚兹 (Hernan Diaz)
《信任》 (Trust)

似无穷无尽。但关于他们富裕的秘密却引发了流言蜚语。关于本杰明的财务操纵和海伦隐遁的谣言开始传播——与此同时，他们过去十年的过度投机也在接近尾声。他们获得巨额财富的代价是什么？

迪亚兹敏锐地把握了我们欺骗自己的方式，这支撑了小说罗生门式的结构，反过来又被这本书的核心困扰所加剧：小说世界和金融世界之间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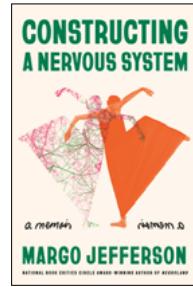
本书精彩地将角色们的故事进行了对话。读者在寻求真相的同时，面对着金钱扭曲现实的引力，看到权力如何经常操纵事实。它是一部优雅、多层面的史诗，找出了隐藏在神话之下的声音，为我们根本性的不平等而正名。



纳姆瓦利·塞佩尔 (Namwali Serpell)
《犁沟》 (The Furrows)

卡桑卓 12 岁；她的弟弟韦恩只有 7 岁。有一天，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意外发生了。韦恩失踪了，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失踪的男孩使这个家庭被疑虑所劈开。父亲离开了，在别处建立了新的家庭。但母亲没有放弃希望，成立了一个专门帮助失踪儿童的组织。在卡桑卓长大的过程中，她到处都能看到弟弟的影子，在小酒馆、飞机过道、地铁车厢发现他的脸和眼中的光芒。他似乎也认出了她，这真的可能吗？然后有一天在另一场意外中，卡桑卓遇到了一个既神秘又熟悉的人，他也在寻找一个人，和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他的名字叫韦恩。

这部非凡的小说对双重人格、分身、déjà vu（似曾相识）、平行存在、灵魂的轮回、乱伦的迹象、视角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它捕捉到了悲伤的神秘体验，过去的经历冲破现在，就像大海中的波浪。它是一部对记忆和哀悼的大胆探索，并出人意料地转变成一个关于身份错误、双重意识和一厢情愿地——有时是任性地渴望与逝去的亲人团聚的故事。



玛尔戈·杰弗森 (Margo Jefferson)
《构建神经系统》 (Constructing a Nervous System)

在这部回忆录里，杰弗森对该文学形式进行了惊人的实验。她用不同长度和音调的作品构建了一个神经系统，将艺术写作（诗歌、歌曲、表演）与生活写作（历史、心理学）结合起来。这本书的结构是由她生命中的标志性时刻决定的，那些让她烦恼的、激动的和治愈的时刻。在这个神经系统中：

——一张 20 世纪 50 年代爵士 LP 的黑色旋转光盘发出的声音，就像父母的声音一样亲切而富有启发。

——芭蕾舞演员的肌肉和动作与奥运选手的肌肉和运动拼接在一起：女性身体的模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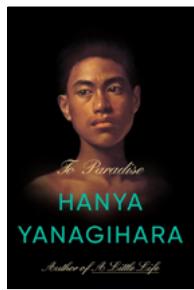
——宾·克罗斯比和艾克·特纳变成了另一个自我。

——W.E.B. 杜布瓦和乔治·艾略特不正当相遇，因为他从她的故事《隐藏的面纱》中挪用了一些台词，在《黑人的灵魂》中写下了他著名的“面纱背后”的段落。

——其他人（作家、歌手、电影角色、朋友、家人）的话语充当提示和对话。

——.....

本书也是一部对黑人女性身份深刻的个人叙述。杰弗森失望说，她“读了一辈子白人作家的书”。可是《卫报》评论者 Chakraborty 说，杰弗森“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那些无所不知的讲故事的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非白人，在虚构还是非虚构中，他们总是不能承认国境之外还有生命存在。”



柳原汉雅 (Hanya Yanagihara)
《到天堂去》(To Paradise)

在一个另类版的 1893 年的美国，纽约是“自由州”的一部分，那里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爱任何人（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脆弱的年轻人拒绝与一个相配的追求者订婚，却被一个迷人却贫穷的音乐老师吸引。1993 年，在艾滋病肆虐的曼哈顿，一名夏威夷年轻男子和比他年长得多的、更富有的伴侣住在一起，并隐瞒了自己不幸的童年和父亲的命运。2093 年，在一个瘟疫肆虐、极权统治的世界里，一位的科学家孙女在瘟疫中存活了下来，可是精神受损，她试图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生活，并解开她丈夫失踪的谜团。

这三个部分组成了一首迷人而巧妙的交响乐，反复出现的音符和主题相互加深、使对方更丰富：格林威治村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一栋联排别墅；疾病和昂贵的治疗；财富与肮脏弱者和强者；竞赛；家庭和国家的定义；当权者和革命者的危险的正义；渴望在尘世的天堂中找到一个地方，然后逐渐意识到它不可能存在。团结在一起的不只是人物，还是他们对命运的思考。

《到天堂去》是一部极具文学效果的十九世纪末式小说，更是一部在情感上才华横溢的作品。柳原对保护我们所爱的人的欲望，以及当不能做到时随之而来的痛苦——伴侣、爱人、孩子、朋友、家人，甚至我们的同胞——形成了这部杰出小说的巨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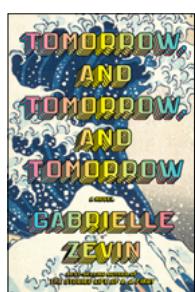
全球英文读者的年度选择

Goodreads 是一家图书分享型社交网站，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成立于 2007 年，在 2013 年由亚马逊收购。根据官网介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读者和书籍推荐网站，且 Goodreads 读者选择奖是唯一由读者决定的图书大奖 (major awards)，每年为 17 类文学作品颁奖，如虚构、奇幻、恐怖、科幻、历史小说、青年少年小说等。和上述的年度榜单不同，该奖完全由读者票选而出，因此说它是全球读者的共同选择并不为过。当然，主要是英语世界。这个语言到目前为止对全球文化的影响还是统治性的。如果注意的话你可以看到，大众的选择和媒体专业人士的选择彼此互有交叉。

你应该对很多该奖的获得者很熟悉：斯蒂芬·金 (9 次)、尼尔·盖曼 (4 次)、J.K. 罗琳 (3 次)——你可能不知道，哈利波特系列出了一部舞台剧，名为《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获得了 2016 年最佳奇幻奖)，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3 次)、科林·胡佛 (3 次)、村上春树 (1 次) (《Q84》) 等。

2022 年度获奖作品有：

最佳虚构



嘉布莉·丽文 (Gabrielle Zevin)
《明日传奇》(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90971 票)

本书同样也被众多榜单评为年度最佳。

12 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哈佛学生山姆从地铁车厢出来，在人群中看到了萨迪。有那么一会儿，她假装没听到他的声音，但接着她转过身来，一场游戏从此开始了：一场传奇的合作将让他们成为明星。在大学毕业之前，他们就奇迹般地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大片《一护》。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即使不到 25 岁，山姆和萨迪都是才华横溢、成功和富有的，但这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创作野心或内心背叛的伤害。

故事设定横跨三十年，从美国麻州的剑桥到加州的威尼斯海滩，以及在两者之间和更远的土地，是一部令人眼花缭乱、错综复杂的想象小说。本书审视了身份、残疾、失败、救赎的各种可能性，特别是我们对连接的需求：被爱和爱。是的，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不是你以前读过的那种。

最佳悬疑惊悚



妮塔·普洛斯 (Nita Prose)
《酒店女仆》(The Maid) (78403 票)

莫莉·格雷和其他人不一样。她的社交技能很差，会误解别人的意图。因此，奶奶曾把这个世界编撰成她可以遵守的简单规则。但自从奶奶去世后，25 岁的她一直独自应对生活的复杂。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酒店服务员的工作中。她独特的性格、对清洁和礼仪的痴迷，使她成为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她喜欢每天穿上整洁的制服，在推车里装满小肥皂和瓶子，让客房恢复完美的状态。

但在进入富有而臭名昭著的布莱克的套房的那一天，莫莉的生活被颠覆了——布莱克死在了床上。在她还一头雾水时，她不寻常的行为已经让警察把她作为头号嫌疑人。她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张骗局之网。幸运的是，她从不认识的朋友们和她一起寻找凶案的线索——但他们能在一切都太晚之前找到真正的凶手吗？

《少女》是一场密室之谜和温暖人心的精神之旅，探索了个体和其他人一样而又完全不同意味着什么，并揭示所有的谜团都可以通过与人心的连接来解决。

最佳历史小说

泰勒·詹金斯·里德 (Taylor Jenkins Reid)
《凯莉·索托回来了》(Carrie Soto Is Back) (100745 票)

当凯莉·索托从网球场上退役时，她已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了。她打破了所有的记录，获得了 20 个大满贯冠军。作为前冠军的父亲从她两岁起就开始训练她，在他的指导下，她几乎牺牲了一切，成为了最好的。

但在她退役六年后，凯莉在 1994 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看台上，见证了自己的纪录被一个名叫尼基·陈的选手打破。在 37 岁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从退役中回归，并在她父亲的指导下度过了最后一年，试图收回她的记录。即使体育媒体们不喜欢她，即使她的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即使这意味着她要放下自尊，和一个她曾经几乎要向他敞开心扉的男人，鲍·亨特利一起训练。和她一样，在永远放弃比赛之前，他也有一些事情要证明。

最佳奇幻

莎拉·J·马斯 (Sarah J. Maas)
《天空与呼吸之屋》(House of Sky and Breath) (105718 票)

布莱斯·昆兰和亨特·阿塔拉正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他们可能拯救了新月城，但最近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多的动荡，他们最想要的是一个放松的机会，慢下来，想想未来会怎样。

到目前为止，阿斯特里一直信守诺言，让他们俩独处。但随着叛军逐渐削弱阿斯特里的力量，统治者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当布莱斯、亨特和他们的朋友被卷入叛军的计划时，他们的选择变得清晰起来：在其他人受到压迫时，保持沉默，或者为正义而战。他们从不善于保持沉默。

最佳爱情

艾米丽·亨利 (Emily Henry)
《爱书人》(Book Lovers) (175875 票)

诺拉·斯蒂芬斯的生活就是书本——她全都读过了——并且她不是那种类型的女主角：不是胆大的那个，不是慵懒的完美女孩，更不是可爱的甜心。事实上，她是一个工作狂，一个生活在纽约的残酷的文学经纪人，她为客户签订了大量的合同。

于是，她被妹妹利比拉去风景如画的小镇“阳光瀑布”，做一个月的姐妹旅行。利比期待着小镇可以转变诺拉，让诺拉成为自己故事中的女主角。但诺拉没有在草地上野餐，也没有与英俊的乡村医生或肌肉发达的酒保偶遇，而是不断遇到查理·拉斯特拉，一个来自城市的书生、沉思的编辑。诺拉发现自己开始质疑自己生活的许多方面，并意识到她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走向何方。

最佳科幻

艾米丽·圣约翰·曼德尔 (Emily St. John Mandel)
《宁静之海》(Sea of Tranquility) (59920 票)

1912 年,十八岁的埃德温乘蒸汽船横渡大西洋,却在一次晚宴上被逐出了上流社会。进入加拿大的森林后,他被那荒野的美丽迷住了,然后突然听到一个飞艇里回荡着小提琴的音符,这一经历让他无比震惊。

两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奥丽芙·卢埃林的著名作家正在地球各地旅行,进行巡回售书活动。但她的家是月球上的第二个殖民地,一个由白色石头、尖塔和人造美景组成的地方。在她畅销的瘟疫小说中,有一段奇怪的文字:一个男人在飞艇终点站的回声走廊里拉着小提琴,周围是一片树木。

2401 年,当夜城的侦探加斯佩里 - 雅克·罗伯茨受雇调查北美荒野中的异常情况时,他发现了一系列被倾覆的生命:一个伯爵的被流放的儿子,一个因瘟疫肆虐地球而被困在这里的作家,还有一个来自夜城的童年朋友,他和加斯佩里一样,看到了做成一件大事的机会,这将扰乱宇宙的时间线。

最佳恐怖

詹森·雷库拉克 (*Jason Rekulak*) ,
插画师威尔·施塔勒 (*Will Staehle*) 、杜吉·霍纳 (*Doogie Horner*)
《被藏起来的画》(*Hidden Pictures*) (35457 票)

刚从戒毒所出来的马洛里·奎因,在新泽西州一个富裕的郊区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一对夫妻做保姆,照顾他们五岁的儿子泰迪。

她爱上了这份新工作。她住在泳池别墅里,晚上出去跑步,享受着稳定感。她真诚地与泰迪建立了联系,他是一个可爱、害羞的男孩,总是带着速写本和铅笔。他画的都是些平常的东西:树、兔子、气球。但有一天,他画了一个男人在森林里,拖着一个女人的尸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变得越来越邪恶,他的简笔画逐渐演变成更详细、复杂、逼真的草图,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五岁孩子的能力。马洛里开始怀疑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一桩未解的谋杀案的再现,也许来自在房子后面的森林里徘徊的超自然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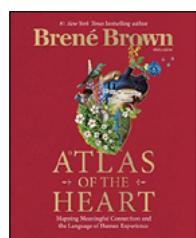
在一个英俊的庭园设计师和一个古怪邻居的帮助下,马洛里开始破译这些图像并拯救泰迪——同时,在一切都太晚之前,她也接受了自己过去的悲剧。

最佳幽默

珍娜·费舍尔 (*Jenna Fischer*) , 安吉拉·金赛 (*Angela Kinsey*)
《办公室密友:两个最好的朋友的办公室故事》(*The Office BFFs: Tales of The Office from Two Best Friends Who Were There*) (37551 票)

这是一本赞美连续剧《办公室》的主演,珍娜·费舍尔和安吉拉·金赛的友谊的书,讲述她们私密的、幕后的故事,配有丰富的插图,以及其他主演们的有趣视角。

最佳非虚构



布琳·布朗 (*Brené Brown*) , 插画师加文·昂·丹 (*Gavin Aung Than*)
《心之地图册: 绘制意义的连接和人类经验的语言》(*Atlas of the Heart: Mapping Meaningful Connection and the Language of Human Experience*) (34200 票)

在本书中,布朗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旅程,通过 87 种情绪和经历来定义人类的意义。她为建立有意义的连接描绘出了必要的技能和可行的框架,为我们提供了语言和工具,使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新选择、新机会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我们能以一种建立联系方式,与他人分享、管理我们最勇敢和最心碎的故事。

在过去的 20 年里,布朗对那些造就我们的经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项研究塑造了文化对话,并帮助定义了勇敢面对生活意味着什么。《心之地图册》借鉴了这项研究,并发挥了作者讲故事的能力,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结论:准确地命名一种经历并没有赋予经历更多的力量,而是赋予我们理解、意义和选择的力量。

布朗说:“我希望这本书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地图集,因为我相信,只要有一颗冒险的心和正确的地图,我们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旅行,永远不会害怕迷失自我。”

最佳回忆录与传记

詹妮特·麦柯迪 (*Jennette McCurdy*)
《我很高兴妈妈死了》(*I'm Glad My Mom Died*) (202606 票)

詹妮特·麦柯迪是一位美国女演员及歌手,本书是她令人又哭又笑的回忆录。第一次试镜时,她才六岁。她母亲的梦想是让她的女儿成为明星,于是詹妮特会做任何让她母亲高兴的事情。她遵循妈妈的“卡路里限制”,少吃,每天称五次体重。母亲在家里给她进行了大量的外观改造,还责备她:“你的睫毛没人看得见,懂吗?你以为达科塔·范宁不会染她的睫毛吗?”她甚至在 16 岁之前一直由妈妈给她洗澡,同时还必须展示她的日记、电子邮件和所有的收入。

在本书中,詹妮特毫不畏惧地详细叙述了这一切。连续剧《爱卡莉》(iCarly)让她一举成名,虽然妈妈欣喜若狂,她却充满了焦虑、羞耻和自我厌恶,这表现为饮食失调、成瘾和一系列不健康的关系。母亲就死于癌症后,这些问题变得更糟。最终,在接受治疗并退出演艺圈后,詹妮特开始康复,并此生第一次决定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最佳历史与自传

胡·雷米 (*Huw Lemmey*) , 本·米勒 (*Ben Miller*)
《那些坏同性恋们:一部同性恋史》(*Bad Gays: A Homosexual History*) (22711 票)

本书改编自热门播客,是对通俗历史常用方法的恶搞变体。这本书并没有专注于 LGBTQ 偶像和英雄,而是介绍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恶棍、流氓和坏人。研究仔细,并悄悄颠覆,这是本书对非典型生活的致敬。

最佳图画小说与漫画

艾莉丝·欧斯曼 (*Alice Oseman*)
《心跳漏一拍:第四卷》(*Heartstopper: Volume Four*) (138174 票)

该作品的第一、二卷被改编成了一部 Netflix 英国青少年浪漫喜剧《心跳漏一拍》,本书是第四卷。

查理以为尼克不会再喜欢他了,但现在他们正式成为男朋友了。查理觉得自己已经准备说出“我爱你”那三个字了。尼克也有同样的感觉,但他有很多心事——不仅仅是向他父亲出柜,还担心查理可能患有饮食失调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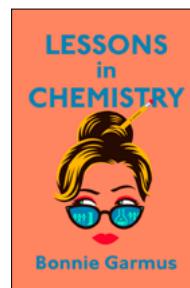
夏去秋来,新学年开始了,查理和尼克将会学到很多关于爱的意义。本书讲述了爱情、友谊、忠诚和精神疾病。它包含了尼克和查理生活中所有的小故事,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更大的故事,这和我们所有人都有联系。

最佳诗歌

阿曼达·戈尔曼 (*Amanda Gorman*)
《我们携带着什么,就称呼我们什么》(*Call Us What We Carry*) (44813 票)

作家、活动家和美国第一位青年桂冠诗人——阿曼达·戈尔曼在乔·拜登总统就职典礼上演唱了她的诗歌《我们攀登的山》,并赢得了全世界的追随者。这首诗歌充满音乐般的语言以及探索身份、悲伤和记忆的主题,关于希望和治愈的歌词抓住了美国国家意识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同时完全超越时间。本书是她的新诗集,除了同名作,还收录了其它 70 多篇她最优秀的诗歌,展示了美国诗歌界一份充满活力的、难忘的声音。这是戈尔曼继去年第二次获得该奖项。

最佳首作



邦妮·加默斯 (*Bonnie Garmus*)
《化学课》(*Lessons in Chemistry*) (64107 票)

化学家伊丽莎白·佐特可不是普通女人。事实上,她是第一个指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普通女性的人。但现在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她在黑斯廷斯研究所的全男性团队,对平等持一种非常不科学的观点。只有卡尔文·埃文斯是个例外,这个孤独、聪明、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的记仇者爱上了她的思想。

但就像科学一样,生活也是不可预测的。几年后,伊丽莎白发现自己不仅是一名单身母亲,还不情愿地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烹饪节目《六点钟晚餐》里的明星。她不寻常的烹饪方法(“将一汤匙醋酸和一小撮氯化钠混合”)是革命性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为她越来越多的粉丝数感到高兴。因为事实证明,她不仅仅在教女性做饭。她在鼓励她们改变现状。

最佳青少年小说

詹妮弗·林恩·巴恩斯 (*Jennifer Lynn Barnes*)
《最后的绝招》(*The Final Gambit*) (72606 票)

要继承数十亿美元,艾弗里只需要在霍桑宅邸多住几周。狗仔队在跟踪着她的每一步。经济压力正在积聚,唯一能让艾弗里熬过这一切的就是霍桑兄弟。他们的生活互相交织。她知道他们的秘密,他们也了解她。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艾弗里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青少年。麻烦来了,有一位需

要她帮助的访客，而他在庄园的出现可能会改变一切。很快，他们就明白了还有最后一个谜题需要解决，艾弗里和霍桑兄弟被卷入了一场危险的游戏，对抗一个未知的强大玩家。秘密包着秘密。谜语叠加谜语。在这场游戏中，人心和生命都危在旦夕。

最佳青少年奇幻与科幻

V.E. 施瓦布 (V.E. Schwab) , 插画师曼努埃尔·舒姆贝拉克 (Manuel Sumberac)
《英勇》(Gallant) (40467 票)

奥利维亚在梅里兰斯女子学校长大，她的过往记忆，都只在她母亲的日记上。然后，她收到一封信，邀请她回格兰特。然而，当奥利维亚到家时，没有人知道她要回来。但不管她的表弟马修是否怀有敌意，或者她是否看到半成形的食尸鬼在走廊里游荡，她并不打算离开人生中第一个感觉像家的地方。

奥利维亚知道格兰特藏着秘密，她决心要揭开它们。当她在正确的时刻穿过一堵废墙时，她发现自己在一个看起来是格兰特的地方：庄园在摇摇欲坠，食尸鬼坚不可摧，一个神秘的人物统治着一切。现在，奥利维亚意识到究竟是什么拆散了自己的家庭，以及她的父亲可能来自哪里。

最佳中学与儿童小说

安迪·鲍尔斯 (Andie Powers) , 插画师贝齐·彼得森 (Betsy Petersen)
《我很安静：一个关于人群中内向者的故事》(I Am Quiet: A Story for the Introvert in All of Us) (26266 票)

虽然大人甚至其他孩子可能认为，埃米尔是一个在课堂上不举手的害羞孩子，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想象。我们知道埃米尔实际上是一个远海冒险家，一个勇敢的探险家，也是野兽的朋友。这个故事鼓励我们认识自己的美好。埃米尔的世界告诉我们，一个安静的孩子的思想可以像其他（更外向的）孩子一样丰富、开阔和大胆。



黄璐

中英两语青年写作者，旧金山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在读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Claudio Schwarz](#) on Unsplash

档案

防疫工具退役了， 没有人怀念它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3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大学一个暑期的末尾，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一辆车久不使用，会变得无法启动。油箱是满的，但在漫长的瘫停中，电被耗尽了。这原不是问题，[发动机日常运行会供应电力](#)，使其源源不断。惯性打断，便带来意料之外的烦恼。我和朋友不得不向过路的车求助，一面打火，一面推车，步履维艰地向加油站进发。

这一年我常见到这样的车。乌鲁木齐居民镜头里，停了四个季节的车，火灾发生时，消防通道像积木一样围堵在一起的车，只是小区里、马路边也时常停着，沉默着，积攒了许多落叶与灰尘的车。再次试图上路，他们是否也会遭遇那样的窘境？我常常闪念。

过去三年，我们数次想象放开，数次失望，以至于“十年”这样的时间都被提上讨论。放开则来得突然，缺乏实感。对于许多人，意识到锤子真正落下，是当看到核酸亭被吊车抬走、地铁站[健康码被撕下、“通信行程卡”正式下线](#)的那一刻……这意味着，这一次，不再是用更强的管制来换取有条件的流动——人也不再因去过哪里、见过谁、核酸是否新鲜，而被认定是否危险、是否有罪。

回溯源头：[2020 年 2 月 7 日](#)，健康码的雏形余杭绿码正式上线；四天后，杭州版健康码启用，开启了“红、黄、绿”的区隔。由于寄生原本装机量就很高的软件（支付宝与微信），它的推广畅通无阻，之后半个月，健康码迅速被应用到全国 200 多座城市。

同年 5 月 7 日，中国最后一个县域降为低风险——那可能被视作过去三年的“数次清零”之一。但健康码并没有随之消失，同一时期，《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出台，14 天便完成立项到发布，以实现跨地区的数据共通和信息互认。那是人们第一次产生疑虑：这样一个综合了个人身份、敏感生物信息、精确行为轨迹的治理工具，会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如今，站在回望的视角，能够看到它确实至今存在，且衍生出“弹窗”、“灰码”、“场所码”等诸多项变化；期间，不时有欲将健康码扩展成为市民码、[“文明码”](#)的试点；今年六月，还发生了[郑州村镇银行储户维权被无故赋红码](#)的事件。

这番混乱是如何产生的？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一文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可引用了一句话：“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图像时，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

数据对于流行病研究和防治至关重要，但健康码的本质也是管控人的工具，个人“出行、复工复产的法定证明”。这时，他进一步解释：命令服从的权力运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优先的封闭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极端思维都可能在科技外壳下，进到健康码之中。“赋码”的行为正是体现，“赋”的权力成为方便的工具：维权被赋码、[入豫即赋码](#)、[全域人员临时赋码](#)……人因为不一的标准而受到限制。

通信行程卡则于同期出现，它通过电信基站判断个人位置，形成一个人 14 天内的行程

轨迹。它的变形是曾让许多人都寸步难行的“*”号。今年 6 月 29 日，工信部宣布摘“星”。12 月 13 日，行程卡正式下线，人们不禁提问，健康码是否会同样走入历史，以及这些数据将何去何从？

[12 月 12 日晚](#)，三大运营商先后表示，行程卡服务下线后，将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但更确切地说，[南都隐私护卫队的报道](#)如此解释，由于位置信息是通过基站计算出来的，这些数据其实一直都在产生，本就存在于运营商的数据库内，只是这次为了提供行程卡服务，才被针对性地整理出来。

哦，那便值得一提，小程序关停前，通信行程卡显示为“暂停服务”，而非永久下线。

另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借用网友的话：三年防疫过去了，疫情正式开始了。各国数据也能看出，随着防疫限制的取消，[免疫逃逸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大流行，许多地区都在今年出现了死亡人数远超前两年的情况。

疫苗接种、医疗资源这些核心要素之外，技术是不是有可能做得更好？技术手段是否可能剥离开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以公共卫生的角度去服务于疫情防控？

[许可举例](#)，同样是政府与企业合作，在欧洲，欧盟委员会与多家电信运营商达成合作，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匿名元数据，[了解人口的流动模式](#)。一方面，这些数据有助于判断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帮助定位更弱势的群体，以提供资源的倾斜；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对病毒传播进行追踪、建模和预测，尤其是针对二次爆发的预测，以实时进行政策的调整。

这些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是必要的。从减缓传播的角度看，早期，强力的封控的确卓有成效。它让中国处于一个与别的国家不同的时间表上，在原始毒株与 Delta 毒株的流行阶段并未经历大范围的感染和死亡。但面对不可能根除的病毒，回归正常生活之前，中国必然要经历数轮大规模的爆发——生活在北上广等城市的朋友们已经身处其中了。

如果说，防疫工具同时拥有防治和管控的逻辑，如今管控逻辑消失，工具应声下线，留下的却是一个信息空洞。并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新思路，来拉平感染曲线，帮助整个社会更平稳地过渡到“后疫情时代”。最显见的一点是，“新十条”颁布后，感染大面积铺开，北京每日公布的疫情数据却完全没有体现出这种变化，反而迅速下跌。

通过[《晚点 LatePost》的梳理能发现](#)，自去年下半年起，全世界各国就陆续启动了与病毒共存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往往不是一步到位的，而一直在不断判断趋势、调整政策。其中，新加坡足足用了一年，历经四个阶段，才进入大范围的放开。这个谨慎的步调下，它的超额死亡数得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科技 / 技术

[到底什么是端到端加密？](#)最新的 iOS 16.2/iPadOS 16.2 和 macOS 13.1 系统更新中，苹果推出了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功能，[iCloud 高级数据保护](#)。一旦启用，你将可以对自己的照片、云盘、备忘录等各项备份数据进行端对端加密保护(iCloud 邮件、通讯录、日历、共享文件除外)。

这有多安全？简单来说，连苹果都无法访问你的数据。这样一来，即使苹果遭到黑客攻击，或是遭遇执法部门的强制调取（只是去年，苹果就收到数千个[来自美国政府的此类请求](#)），这些数据也不会落到他人手中。

[端对端加密\(E2EE\)](#)是基于密码学。可以理解为，它先将你的信息打乱，变得无法被识别，再发送出去；抵达指定接收方的手里后，通过特定的密钥，[才能解密](#)出原始信息。因此，传输或储存过程中发生任何泄露，也只会泄露一堆乱七八糟、无可识别的东西。

当下，随着政府越来越多地获取公民数据，加密通讯正变得愈发有吸引力。12 月初，[谷歌也宣布](#)，将对安卓消息应用 Messages 的群聊内测 E2EE 功能。此前，它已经对私聊启动了这项服务。

执法与隐私之间的天平正在重新校准。系统更新的同时，[苹果宣布停止一款软件的开发计划](#)。这款软件通过扫描用户 iCloud 内图片的哈希值，匹配识别是否存在针对儿童的性虐待内容。尽管目的是出于儿童保护，它很快就招致隐私安全人员的指责，担忧这项技术会被执法部门滥用。

[什么是 ChatGPT？](#)如果你这样问它，它会回答：我是一个由 OpenAI 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我能够跟用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回答他们的问题并提供信息和解释。

自然语言，就是人的语言——你可以用平日正常交谈的方式，与这个聊天机器人对话，它也会十分自然地回应，很少出现“我好像不太明白”的情况（说的就是你，Siri）。但 ChatGPT 最让人吃惊的点在于，它很擅长处理具体任务，比如编故事、写文案、列教程、码代码……而且还免费公开，这让它显得比 GPT-3 亲民多了，一下子成为互联网在过去两周中最爱的玩具。

但一旦聊得深入，ChatGPT 的缺点也非常突出。它的回答往往重复冗余，充满废话，像一个只会三段式作文的学生。要命的是，由于表达自然人性，当提供的内容有错误时，也更难被发现。“ChatGPT 和它背后的技术，与其说是有说服力的写作，不如说是高超的扯淡技巧。”[《大西洋月刊》评论道](#)。

高超的扯淡技巧也不是谁都能拥有的，AI 却已经精通。不久前，[Meta 也发布了一项进展](#)，其开发的模型 CICERO（西塞罗）在战略棋盘游戏《外交》中表现优异，平均得分是人类玩家的两倍多。与国际象棋等“传统 AI 优势项目”不同，《外交》要求玩家表现出同理心，与人谈判、布设谎言、说服对方，并建立信任。能完成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博弈，迷惑人类显然不成问题。

更危险的是，这种扯淡往往包裹在一种自信满满和尽是客观之下。关于这点，李如一有个很棒的延伸应用：下次再有人说我只谈事实，大家可以自己形成观点，你就知道她只是一个劣质大型语言训练模型，不必继续交流。

[核，聚变了？](#)12 月 13 日，[美国能源部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进展](#)，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的“国家点火装置”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制造了一种可控核聚变。胜利的标志是，实验产生的能量超过了驱动能量，实现了能量正增长。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子融合为一个更大的原子时, [核聚变就发生了](#), 同时释放大量的能量。这种反应持续在太阳的内部发生, 为地球上的所有生灵提供生命的能量。因此, [核聚变也被称为“小太阳”](#), 能源领域的“圣杯”。

全面转向清洁能源的过程中, 稳定高效的核能显得十分重要。核电站内发生的核裂变, 能产生大量热能, 但也同样会产生核废料污染。核聚变则没有这个缺点, 因而被寄予厚望。但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实验产生的能源只够烧开几壶水, 距离真正使用核聚变能源, 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如 [MIT Tech Review](#) 指出, “国家点火装置”使用的激光设备, 目标并非追求人人可用的清洁核能, 且过于昂贵难以普及; 如今最接近商业化的能源路径是一种名为托卡马克的核聚变反应装置。这种长得像甜甜圈一样的设备在中国就有一个, [位于安徽合肥的科学岛](#)。

愤怒抗议下, 旧金山撤回“杀人机器人”。11月底, 旧金山政府的一个11人委员会投票决定, 允许机器人携带爆炸物, 并在“公众或官员生命受威胁, 且无任何其他武力手段可行”的情况下, 杀人。决议即刻引发强烈抵制, 在一封由44个社区团体签署的抗议信中, 批评人士表示, 该政策将“毫无必要地危及生命”。这也进一步激化了针对美国警方过度执法, 过失杀人的指责。

这项技术并非没有先例。[2016年在达拉斯](#), 警方曾使用拆弹机器人打死了一名开枪打死5名警察的人。随着自动化、遥感技术持续进步, 这种使用愈发让人担忧。[10月的newsletter中提到](#), 波士顿动力公司在内的六家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公司发布公开信, 承诺不建造、授权、支持或允许将武器附加到自己的机器人上。

12月6日, 旧金山监事会撤回一周前的决定, 投票(暂时)禁止杀人机器人的使用。

苹果预计将更多的生产线转移出中国。WSJ报道, 苹果正积极地在亚洲其他地方, 尤其是印度和越南, 落地生产组装, 减少对以富士康为首的制造厂商的依赖。数十年来, 苹果和中国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某些方面, 苹果既是一家美国公司, 也是一家中国公司。”康奈尔大学教授Eli Friedman表示。

但这种关系正在发生震动。[11月初, 苹果发布了一个罕见的延迟出货的通告](#), 原因是其位于郑州的组装工厂产能大幅下降——新冠爆发之前, 这里的工厂生产了85%的iPhone Pro。重组产业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完善的零部件供应商、像城市一样的大型工厂, 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因此这个变化并不会立刻发生, 但讨论已经发生,[Loup Ventures的分析师认为](#), “五年内, 35%的iPhone将在印度生产。”

Adobe将开始销售AI画作。Axios报道, Adobe宣布旗下照片服务Adobe Stock将允许艺术家提交并出售AI生成的图像。上传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艺术家必须拥有这张图像的版权, 必须作为绘画而非照片提交(有一些AI非常善于生成高度接近相片的写实图像), 以及需要打上“AI生成”的标签。

但实际上, 只是第一个条件就足够让整个艺术圈大吵一架。市面上的主流AI绘图平台目前都尚未完全公布自己的训练集, 大量作品被抓取时, 尚未经过作者的同意, 版权归属仍是一个争议重重的话题。今年九月, 盖蒂(Getty)图片社就表示, 出于对版权问题的担忧, 它将不会接受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

环境 / 气候

死海正在消亡。对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 死海就是一个充满盐分的大浴缸。如今, 这片水域正在消失。水位以每年近4英尺的速度下降, 比起半个世纪前, 它的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干涸的区域出现地表下陷, 道路开裂, 曾经的海滩和停车场变得凹凸不平。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水资源的不断汲取。长久以来, 死海周边的各国, 以色列、约旦和叙利亚都依赖于原本应流入死海的淡水资源; 同时, 一部分公司会蒸发死海水, 以获取其中丰富的矿物质资源。旅游活动也在加快水分的蒸发。气候变化带来间接影响, 越来越少的降水难以带来供应和补充。死海正在死去, 我们的有生之年, 它的景观将不复从前。

六月, 以色列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拯救死海的提案。解决方案之一是修建一条运河, 用红海的淡化海水来补充死海; 另一个建议是增加约旦河的流量, 以帮助补充死海。这都非常昂贵, 因而有提议认为, 应让矿业公司支付湖泊的修复费用。

研究人员从格陵兰岛提取出已知最古老的DNA。这项历史性发现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格陵兰岛最北端的永久冻土层中, 发现了埋藏在粘土和石英沉积物中, 来自200万年前的DNA。

研究揭示了冰川的变化。这些微小的基因片段显示, 这里曾是许多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古老家园, 其数量比现在多得多。茂盛的植被中, 奔走着野兔、旅鼠, 甚至还有驯鹿、乳齿象。那时的气候也更加温暖, 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1到19摄氏度。[有科学家认为](#), 由于这些植物和动物在气候剧烈变化的时期幸存了下来, 它们的DNA可以提供一个“基因路线图”, 帮助我们适应当前的变暖。

法国将限制短途航班以增加高速火车使用率。这意味着, 短于2.5小时的航班将被禁止, 除非出发和目的地之间不存在可行的铁路线路。航空业是碳排放的重点行业。而且由于起飞比巡航消耗更多的燃料, 飞行时间短且常常载量更小的短途航班、私人飞机就显得更为低效。[根据最近的航空数据](#), 法国拥有欧洲最多的私人飞机。

这项政策是法国2021年颁布的《气候法》的一部分, 近日获得EU批准, 并将于不久的将来正式投入实施。此外, 法国政府还推出了“自行车计划”(Le Plan Vélo), 鼓励公用电动单车取代汽车, 并向低排放区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最多4000欧元的补贴。

微塑料很危险, 而且它可能让别的污染物变得更加危险。此前的一些研究已经发现, 重金属很容易附着在微塑料上。这种附着, 除了会被生物吸入, 造成潜在的身体伤害,

是否还存在进一步的危险呢?

ACS(美国化学学会)的《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上发表的一份新报告发现, 当附着在微塑料上时, 某些金属会与其发生作用, 产生化学性质的改变。比如铬(Cr), 在微塑料表面时, 它可能呈现不同的氧化状态, 变得更具毒性, 进一步污染其所在的环境。

埋葬死去的树木, 让它不要进入大气。这是一种最新的碳清除技术, 开发这项技术的创业公司近日从盖茨基金会在内的投资人手中, 筹集了大约660万美金, 来研究和实施这个项目。

虽说新技术, 原理却格外简单, 可操作性是它的一大优势。整个碳循环中, 树木都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活着的时候, 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 死去后, 又会通过腐烂的过程将这些碳释放出来。研究人员希望, 通过生物质掩埋, 防止这部分温室气体再次进入循环, 来减少整个大气中的碳含量。

随着北极融化, 河狸穿越苔原, 向北行进。它们一路走, 一路筑坝, 造成小小的河水截断, 并在形成的小池塘中栖息。它们的足迹很容易测量: 2002年, 科策布附近的冻土地带还只有两座河狸大坝, 到2019年已经有了98座。

这是气候变化带来不确定性的又一典型案例。这种行为虽然听起来很有趣, 科学家们担心, 河狸的大批迁移将深刻地改变北极原本的生态。就像人类修筑的水坝一样, 截断可能会改变水位的高度和溪流的流向, 鱼类的溯游会收到干扰; 与此同时, 这些截断形成的池塘深度更深, 冬季可能不会完全冻结, 这将带来周边冻土层的融化, 进一步加剧气候变暖。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 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 “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 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 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Bahrudin Alifan](#) on Unsplash

档案

“这项刑法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通过”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3 条新闻。

印度尼西亚禁止婚外性行为，这对游客意味着什么？

本月初，印尼议会宣布禁止婚外性行为，违者最高可处一年监禁。人们开始担心这些法律可能会吓跑游客，影响投资。

根据新规定，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婚外性行为接下来将是非法的，诽谤总统也是非法的。它还将禁止侮辱国家机构，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反的观点，以及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举行抗议活动。婚外性犯罪也针对 LGBT 群体，因为同性婚姻在印尼是非法的。

更重要的是，新法规也适用于外国居民和游客。这让此次刑法的修改不仅震惊了人权倡导者，也震惊了旅游业代表们。美国驻印尼大使 Sung Kim 在一个投资峰会上说，这一消息可能会导致这个东南亚国家的外国投资、旅游业和旅游减少。印尼旅游业委员会副主席 Maulana Yusran 则谈到，在经济和旅游业开始从新冠大流行中复苏之际，新法规完全适得其反。“我们对政府闭上眼睛深感遗憾。我们已经向旅游部表达了我们对这项法律危害的担忧。”

旅游协会此前表示，到 2025 年，度假目的地巴厘岛的外国游客预计将达到新冠大流行前的 600 万人次。位于巴厘岛的印尼旅游和旅行社协会 (ASITA) 主席 Putu Winasta 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这些法律会让外国人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三思而行”。在他看来，这些法律不仅严格，而且麻烦，不知如何执行。而一旦认真执行，游客就有可能被关进监狱。“一起来旅游的情侣需要证明他们已经结婚了吗？”他问道。

在新闻发布会上，法律和人权部长 Yasonna Laoly 表示，对于一个多文化和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制定一个“容纳所有利益”的刑法并不容易。他希望印尼人明白，议员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满足“公众的愿望”，并邀请不满的党派向宪法法院提交司法审查。

但目前的情况是，这些法律得到了印尼所有政党的支持。事实上，本次改革酝酿已久。新法典是对 1918 年印尼是荷兰殖民地时的法典的全面修订，此前的草案原定于 2019 年通过，但在数千名抗议者（主要是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撤回该草案后，投票被推迟。而这一次，活动人士们对 [《纽约时报》](#) 表示，他们措手不及。

“我们正在目睹印尼在 1998 年革命后在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来之不易的进展遭遇重大挫折。这项刑法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通过”，大赦国际印度尼西亚执行主任 Usman Hamid 说。

过去的二十年里，印度尼西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较为广泛宽容的国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建立民主改革的前沿。今年四月，这个国家还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首次宣布强迫婚姻和性骚扰为非法，受到了活动人士的广泛欢迎。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发

现，近年来宗教保守主义在印尼有所抬头。严格的伊斯兰法律已经在该国部分地区实施，包括半自治的亚齐特区，在那里酒精和赌博是被禁止的。

2016 年，在印尼总统 Joko Widodo 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宣布向外国投资开放数十个行业，他称之为经济自由化的“大爆炸”。但现如今，新法引发了人们对雅加达培养商业环境的承诺的质疑。

到目前为止，印尼公众对新法规的反应并不强烈，只有首都举行了小规模抗议活动。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此仍抱以乐观态度。

“目前政府仍在执行新刑法。当然，有利有弊，但要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还需要三年的时间”，旅游公司总经理 Clement Gultom 告诉 [半岛电视台](#)。“因此，我更倾向于选择不积极对待新刑法”。他补充说，如果有必要，律师和活动人士可以通过最高法院申请对该法典进行司法审查。

ALSO IN THE NEWS

伊朗的抓捕行动仍在继续，人们要求释放曾获奥斯卡荣誉的女演员

尽管“道德警察”已被宣告废除，伊朗政府仍在不断抓捕异议人士。近期，他们一直试图将镇压范围扩大到文化和体育名人，这些人被认为太受欢迎，政府无法逮捕。

上周，伊朗最高法院接受了说唱歌手 Saman Yasin 对死刑判决提出的上诉。Saman Yasin 是一位著名的说唱歌手，在当前的动乱中，他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伊朗政权。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渠道上写下了支持抗议者的信息，还写了几首抗议歌曲。他被指控企图杀害安全部队，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纵火焚烧一个垃圾桶，并向空中开了三枪，他否认了这些指控。

与此同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明星、剧作家、小说家和导演正联合起来为伊朗演员 Taraneh Alidoosti 辩护，呼吁立即将她从德黑兰的监狱释放。这位奥斯卡获奖演员在家中被捕，她被要求解释她在 Instagram 上谴责伊朗政府对抗议者判处死刑的帖子。她发布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中她没有戴头巾，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女性、生命、自由”的纸——这是这场全国性抗议运动的重要口号。

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有各种形式的“道德警察”，但最新的版本——正式名称为指导巡逻队 (Gasht-e erhad)——是执行伊朗伊斯兰行为准则的主要机构。他们从 2006 年开始巡逻，以执行着装规定。目前，指导巡逻队已被停职。但伊朗司法部长对此含糊其词，他也没有透露在公共场合不戴头巾的女性将会如何处理，只表示法机构将继续“监督社区层面的行为行动”。

新加坡取消同性性禁令，但阻碍了同性婚姻

新加坡议会已经将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合法化。英国殖民时代的法律规定，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尽管该法规并未得到积极执行，但长期以来一直被批评为对 LGBTQ+ 社区的歧视和侮辱。此前，议会曾试图在法庭上废除该法案，但均以失败告终。现在，这项废除揭开了新加坡 LGBTQ+ 群体的新篇章。

然而与此同时，新加坡议会还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支持婚姻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现有定义，基本上上来了未来可能为 LGBTQ+ 人群建立平等婚姻权利的大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称赞这两项举措是“新加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在 Facebook 发帖赞扬各方表现出的克制。法律部长 K. Shanmugam 曾表示，现有的婚姻定义需要保护，如果改变将危及所有基于传统结构的政府政策，如住房和医疗政策。

LGBTQ+ 社区成员对宪法修正案感到失望，但仍对进一步的进展抱有希望。他们认为，至少废除将同性性行为定罪的法律让人们可以开始坦诚地谈论在新加坡的酷儿生活。

纽约反 LGBTQ+ 人士因“变装皇后故事”攻击议员

过去一个月，“变装皇后故事”活动在以包容著称的纽约引发了一系列紧张的示威和对峙。抗议者们甚至袭击了纽约市议会一名同性恋议员 Erik Bottcher 的家和办公室，并攻击他的一名邻居，原因是支持在当地图书馆举办的“变装故事一小时”活动。Bottcher 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这种破坏行为，他还分享了一段抗议者尖叫并敲打他办公室门的视频。最终，警方称有两名抗议者因非法侵入 Bottcher 的家而被捕。

几名抗议者说，“变装故事时间”不适合儿童，“三岁以上的孩子不应该接受成人教育”。“变装故事时间”是一项开始于 2015 年的阅读活动，由变装演员在图书馆、学校或书店与当地儿童分享阅读。随着这些活动越来越受欢迎，抗议活动不断。最近，批评人士加大了攻击的力度，将其描述为恋童癖者的猎场，其中一些演变成了暴力。[据《纽约时报》，LGBT 倡导组织 GLAAD 在 11 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美国至少发生了 141 起针对变装活动的抗议、攻击或“重大威胁”。](#)

“变装故事时间”的联合创始人 Jonathan hamilton 说，这些活动是为了帮助孩子们“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多样性”，反对这些活动的根源是对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恐惧。

苏格兰通过一项法案，使跨性别变得更容易

苏格兰议会上周四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改革，使跨性别者更容易改变他们的法定性别，包括取消对性别焦虑症的医学诊断，并将最低年龄从 18 岁降至 16 岁。性别认同改革(苏格兰)法案以 86 票对 39 票获得通过，得到了执政的苏格兰民族党和议会中除保守党以外的其他党派的支持，但遭到了一些女权运动人士的反对。活动人士认为，这些变化可能会对妇女和女孩的安全构成威胁。

苏格兰社会司法部长 Shona Robison 表示，其他国家通过的类似法律使跨性别者受益，导致针对他们的暴力显著减少，她希望苏格兰的跨性别者也能从这些积极的结果中受益。在伦敦，英国保守党政府表示，他们对该法案感到担忧，并将在必要时考虑阻止该法案。

97 岁的前纳粹秘书被判刑

自 1943 年到 1945 年，Irmgard Furchner 一直在纳粹占领的波兰格但斯克附近的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担任打字员兼秘书。上周，据德国北部伊策霍 (Itzehoe) 法院的一位

发言人说, Irmgard Furchner 已被判处两年缓刑, 罪名是 10505 起谋杀和 5 起谋杀未遂的从犯。

根据法庭发布的新闻稿, 她的辩护律师要求将她无罪释放, 理由是, 尽管数千人在施图特霍夫被杀害, 但证据并没有表明 Furchner 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系统性杀戮。在德国, 刑事责任要求提供意图证明。然而就在本月初, Furchner 打破沉默, 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她说她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 她后悔当时她在施图特霍夫, 她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近年来, 德国一直在努力将纳粹战争罪行的肇事者绳之以法, 以免为时过晚。但专家表示, 只有一小部分涉案人员上过法庭, 由于被指控的纳粹战犯年龄越来越大, 病情越来越重, 对 Furchner 的审判可能是此类审判的最后一次。

日本女性可以在离婚后 100 天内再婚

日本议会本月初通过了一项法律改革, 根据该修正案, 如果一位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已经再婚, 那么在母亲离婚后 300 天内出生的孩子可以在法律上被承认为其新丈夫的后代。此外, 它还废除了一项长期被认为具有歧视性的规定, 即禁止女性在离婚后 100 天内再婚。

修订后的法典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 这是日本对已有百年历史的《民法典》有关父权和婚姻条款的第一次修改, 旨在减少日本未登记儿童的数量。自 1898 年该法实施以来, 许多离婚妇女——尤其是那些陷入家庭暴力的妇女——选择不给孩子登记, 以避免前夫被承认为合法父亲。此前, 母亲离婚后 300 天内出生的孩子被推定属于她的前夫, 无论他与孩子的生理关系如何, 也不管母亲是否已经再婚。日本法务部过去的一项调查显示, 截至今年 8 月, 在 793 名未登记在户籍内的人中, 约有 70% 的人的母亲因法律父权规定而没有提交出生通知。

修正案还取消了父母惩罚儿童的权利, 同时明确规定不允许体罚以及伤害儿童健康发展的言语和身体行为。

25 名涉嫌阴谋推翻政府的极右翼极端分子在德国被捕

德国官员本月拘留了一个极右翼组织的 22 名成员和 3 名支持者。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该组织正在准备暴力推翻国家, 让一名曾寻求俄罗斯支持的王子担任国家领导人。

据路透社报道, 该组织的成员不承认现代德国是一个合法的国家。他们中的一些人致力于君主制下的德意志帝国, 而一些人是纳粹思想的追随者, 还有一些人认为德国处于军事占领之下。组织头目是 71 岁的海因里希十三世王子, 他的王子头衔来自曾统治德国东部部分地区的罗伊斯家族 (royal House of Reuss), 现在是一名房地产企业家。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 “帝国公民运动” (Reichsbuerger) 在去年大幅增长, 并呈现出高度危险性。执政党宣称, 右翼恐怖主义仍然是德国民主的最大威胁。

感恩节生效的《成人幸存者法案》帮助 5 名女性起诉性侵

本月, 包括情景喜剧《考斯比一家》(The Cosby Show) 两名前女演员在内的五名女性在纽约州法院对 Bill Cosby 提起诉讼, 指控他在几十年前性侵犯和性虐待。

这份 34 页的诉讼将 Bill Cosby 和 NBC 环球传媒等均列为被告, 这些媒体公司在 1984 年至 1992 年期间共同经营《考斯比一家》。上个世纪, 《考斯比一家》给 Bill Cosby 带来了巨大的名声和财富, 他还因其剧里正直的父亲形象而被称为“美国的父亲”。“每个原告都被被告 Bill Cosby 以相同或类似的方式性侵和殴打, 当时他利用自己的名誉和声望, 以如此邪恶、可怕的方式滥用他的巨大权力”, 诉讼称。Bill Cosby 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这起诉讼“无聊”, 并否认了这些指控。他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这与性侵害受害者的正义无关, 这完全是为了钱。”

这起诉讼是根据上个月通过的纽约《成人幸存者法案》(Adult Survivors Act) 提起的, 该法案赋予性侵的成年幸存者一年的时间窗口, 即使她们的诉讼时效已过, 也可以起诉施暴者。许多性侵受害者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公开讲述他们的创伤, 而这项法律意在给他们一个机会。

法国禁止短途国内航班以减少碳排放

欧盟委员会 (EC) 已经给法国官员开了绿灯, 可以禁止部分国内航班。该计划于 2021 年首次提出, 作为减少碳排放的一种手段。它最初呼吁禁止 8 个短途航班, 但欧盟委员会只同意禁止其中 3 个有快速、便捷铁路替代方案的航班。目前受禁令限制的三条航线包括巴黎奥利机场和波尔多、南特、里昂之间的航线。

尽管这项禁令最初遭到航空业的反对, 但欧盟委员会表示, 法国推出这项措施是合理的, 前提是该措施“不具有歧视性, 不会扭曲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 并且不会超过缓解问题所需的限制”。该法令将实施三年, 之后将由委员会进行评估。法国政府还在考虑对私人飞机征税, 以限制私人飞行的数量。欧洲运输环境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显示, 私人飞机每乘客英里造成的污染是商业航班的 14 倍, 是火车的 50 倍。

尼日利亚学生因涉嫌诽谤第一夫人被捕

尼日利亚释放了一名被控“刑事诽谤”的学生, 原因是他在推特上发布了暗示该国第一夫人滥用公共资金的帖子。11 月 18 日, 在第一夫人 Aisha Buhari 提出申诉后, 这位名为 Aminu Adamu Mohammed 的 24 岁大学生在学校被捕, 随后被还押候审至明年 1 月。

这名学生的被捕和随后的指控在尼日利亚引发了愤怒, 许多社交媒体用户和维权人士呼吁立即释放他。在当局以“同情”为由撤销指控后, 学生最终于本月初获释。

根据法庭文件, Adamu 在推特上评论了第一夫人的一张照片, 暗示她“盗用了本该属于穷人的钱, 自己也很满意”。他在出庭时否认传播“虚假”信息。但被释放后, 这位学生为最初的推文向第一夫人道歉, 并感谢她的原谅, 称她为“我们的母亲”。

他没有透露被拘留的细节, 但对那些支持他的人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并表示他的案件应该“给我们所有人上一课”。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表示, Adamu 被捕

后遭受了“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称这是“严重压制行为”, “显然是在试图让尼日利亚年轻人心中产生恐惧, 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向有权有势的人问责”。尼日利亚当局尚未对这些指控发表评论。

新加坡总统说, 50 岁或以上的强奸犯不应免于鞭刑

根据新加坡刑法, 被定罪的强奸犯最高可被监禁 20 年, 并处以罚款或鞭刑。但如果他们的年龄在 50 岁以上, 便可以用更长时间的监禁来代替体罚。

新加坡总统 Halimah Yacob 近期指出, 年长的强奸犯尽管对他造成了终生的严重创伤, 却能逃脱鞭刑的痛苦, 这“具有讽刺意味”。她表示最近发生了一系列“非常令人不安和恶心”的案件, 涉及儿童在自己家中被男性亲属强奸。就在本月, 当地媒体报道了一起案件, 一名 54 岁的男子因在女儿 10 岁时多次猥亵她而被判入狱。“在一些案件中, 强奸案发生得更早, 但在犯罪者年满 50 岁后才被报告, 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这项法律了。”总统补充道。

去年 9 月, 新加坡国会议员建议提高鞭刑的年龄限制, 人民行动党的 Murali Pillai 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议会要支持一个性侵犯的人, 认为他不适合被鞭刑。因为他显然足够健康, 可以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但也有活动人士认为, 围绕司法鞭刑年龄限制的讨论没有抓住重点。当地性别平等倡导组织 AWARE 在一份声明中提到, “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证据表明鞭刑实际上对性虐待具有威慑作用, 或者优于监禁、康复计划或其他非暴力惩罚。”声明还说, 对施暴者的严厉惩罚可能也会使一些性暴力的幸存者——比如那些对施暴者有情感依恋的人——不愿报告他们的经历。

英国警方提交计划, 将可卡因和大麻部分合法化

英国警方负责人首次寻求结束对携带少量娱乐性毒品者的起诉。据《每日电讯报》报道, 由国家警察局长委员会和警务学院制定的这项提案, 将基本上使拥有娱乐性毒品 (包括 A 类和 B 类毒品) 合法化。这意味着, 当警察抓到一个携带少量毒品 (包括大麻和可卡因) 的人时, 如果这个人寻求治疗或戒除毒品, 就不会留下任何犯罪记录。但与此同时警方也警告道, 毒贩、拒绝合作的人或再次被抓到持有毒品者, 将被起诉。目前, 英国 45 个警察部门中有 14 个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和策略。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内政大臣 Suella Braverman, 她在最近的保守党会议上表示, 她打算对毒品犯罪采取强硬措施。

上周, 爱尔兰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在爱尔兰实行类似政策, 建议将个人使用的非法毒品合法化并进行监管, 同时投资于减少伤害服务、成瘾治疗和社会干预。

意大利人走上街头, 抗议“反锐舞”法案

上周末, 来自罗马、都灵、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等城市的数千人走上街头, 抗议将于本月底生效的“反锐舞” (anti-rave) 法案。今年早些时候, 意大利新的极右翼政府制定了计划, 在无人居住的建筑物或场地举行无证狂欢会将被定罪, 组织者将面临最高 6 年的监禁。这项法规还允许监视涉嫌举行这些未经授权的活动的团体。组织者大多为意大利知名俱乐部的成员。他们表示, “重要的是要反对这项立法, 确保锐舞社区和所有其他地下音乐社区的声音被响亮而清晰地听到”, “我们想要回归正常, 让我们不用担心压迫就能过上夜生活”。该法令表面上是一项旨在防止政府所称的“非法狂欢”的公共卫生措施, 但人权组织警告称, 该法令可能被用来镇压抗议活动, 并将言论自由定为犯罪。



Snufkin

撰稿人, 做杂志也做新媒体, 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 喜欢阅读、观察, 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 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 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何雨珈的书房

专栏

“我确实不振奋”| 接力访问 001 何雨珈

杨樱 | 接力访问

但我看到了别人如何努力在生活。

在和何雨珈聊完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她当时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振奋的。我应该更早看到惊恐在她身上的余波，但因为她一贯的开朗嗓音和侃侃而谈，那种对生活的隐形忧虑被掩盖了起来。

何雨珈是一个会让你变得轻松的人，尤其是对朋友们来说，因为她自己就很松弛。在一个领取“年度最佳译者”奖项的大会上，她穿着盖到小腿的黑色羽绒服就上了台，以至于她妈妈埋怨她不修边幅，她一边转述妈妈的质问，“怎么样，你里面是光着的吗？！”，一边抱怨，“现场真的很冷啊！为什么要脱掉衣服！”

因为她近几年翻译的几本非虚构，她成了一个有名气的译者。比如说英国作家扶霞·邓洛普 (Fuchsia Dunlop) 的《鱼翅与花椒》。这本书写了一个成长于牛津的女士如何前往中国四川大学求学，随后被成都当地美食吸引，进入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进行专业厨师训练的故事。何雨珈把为这本书写了热情的带着乡音的译后记，还能在不抢扶霞风头的情况下在译文里渗透她对菜式的领悟。两者随后合作了另外三本书，《寻味东西》、《川菜》和《鱼米之乡》，但最出名的还是第一本书。人们出于喜爱，经常会热切地向何雨珈表白：“我特别喜欢你翻译的那本《辣椒和海参》！”或者诸如此类。

在遇到扶霞之前，何雨珈还翻译过 Michael Meyer《再会，老北京》，后者曾在香港大学教她特稿写作课程。这本书让何雨珈进入了非虚构作品的翻译阵营，此前她主要是在翻译女性小说。Michael Meyer 的第二本书《东北游记》也交给了她。差不多就在这些书的出版前后，中国国内非虚构热潮渐起，随着管制和流通的阻滞，人们更加希望增进对现实世界的了解。何雨珈说，她喜欢翻译非虚构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和作者沟通，并且可以从人物的遭遇还原具体的字句语境——毕竟她遇到的作者都还在世。她的豆瓣介绍是这样写的：八五后，生长于四川天府之国，求学北外与港大，文字与影像的狂热爱好者。其实这串描述还应该加上“资深美食爱好者和成都风土推广者”之类的，这些更能说明她给人的印象。她热情地把去成都的朋友们带进各种市井大院小巷，其中她热爱的一家，是和美国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总去的一家红油抄手。何伟曾在中国写下《寻路中国》和《江城》。他在 2020 年新冠流行时任教于四川大学，而后因为学校结束合约不得不离开。何雨珈在豆瓣上讲述最后一堂课和她对何伟的印象。她的另一位朋友接手了何伟的车。

我在 11 月初和何雨珈聊天的时候，新冠疫情的管控遍布全国，而成都刚刚经历过 9 月为时半个月的封控。我们谈及身边人的应激反应，流行的移民话题，也谈及自己的感受和变化。随后几周，她因为拒绝做核酸无法参加一场原定的公开活动，她在豆瓣上温柔地爆了粗口。

A: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B: 对我们团长感兴趣。

A: 她是谁？

B: 我们小区在（成都）封控之前，在疫情之前，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就已经有一个团长，她自己特别喜欢吃，然后就出去给大家找那种好吃的东西，然后就慢慢把我们小区的团购群做起来了。

她是一个会计，后来生完孩子就自己在家（创业），然后现在又开始做各种庞杂的东西，我每次看到她都在分货、送货，一个人把各种庞杂的东西都搞得清清楚楚，包括售后和别的什么，我就一直特别佩服他。

A: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B: 因为我自己肯定做不到……不讲理论，不讲那些东西，她是一个非常能代表……我认为她在实践，她是一个在自己允许的条件下实践女权的人。每次默默地看到她，我就觉得这种女性真棒。

A: 你已经跟她聊了吗？

B: 我就是因为没有聊过，但她人特别热情，然后每次遇到都会跟我聊几句，但不是聊这些。因为我不敢，我不能贸然跟别人聊这些东西。

A: 你对她感兴趣的地方具体是什么？

B: 我就觉得凭什么要觉得自己的圈子里面的人才是有趣的，有些人非常努力在生活，我不清楚他到底是对于世界大事是怎么看的，但是至少从他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守着自己的小小的生活，然后该怎么下去就怎么下去。

而且小区群里面我自己对邻居有天生的戒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你不敢在小区群里，当你自认为少数之后，你就不敢在小区群里面说，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那种东西”，你也不敢再说，你也不能再说，然后反正就变成沉默的一个人了。然后不管你在走出小区之后，你去参加各种活动，你在成都认识多少人，然后都是很有意思的人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回到小区，你永远就是一个透明的存在。你的生活全部都在小区之外。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让你在小区的生活变得具体了起来。

可能我们会关注自己周围的思想，心灵上很近的朋友，团长绝对不会（在），但是我觉得恰恰她代表了一种，你怎么说，就是苟活着的希望。

A: 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B: 科幻编辑兼作家戴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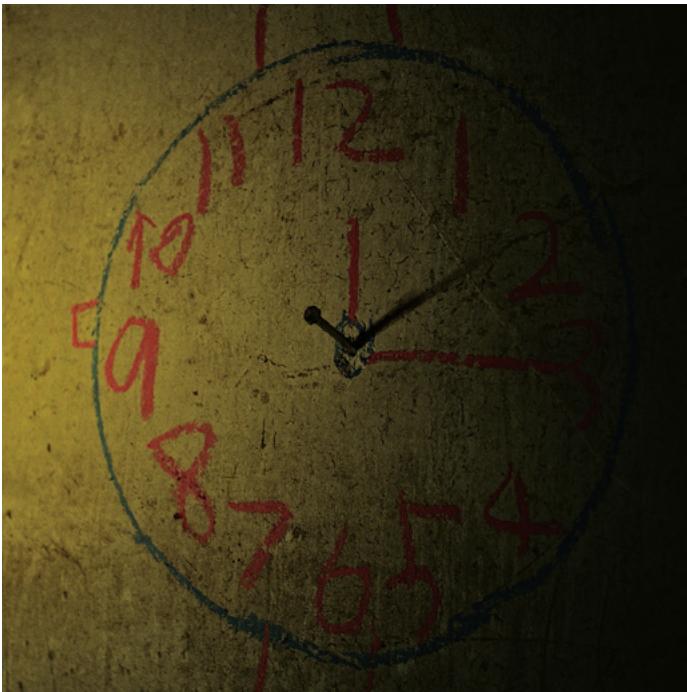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电影《路边野餐》(2016)剧照

专栏

“我希望更决绝地对准当下” 接力访问 002 杨潇

杨樱 | 接力访问

杨潇与陈思思联合执导的纪录短片
《窗台日志》将在法国克莱蒙费朗进行首映。

杨潇 33 岁,桂林人,豆瓣主页上挂着 9 部他创作或者参与创作的影片,其中最为大众所知的,应该是《南方车站的聚会》和《路边野餐》。

我们相识的时候是 2022 年 6 月,他正在计划离开上海。当时他和女朋友、也是创作搭档陈思思一起住在人民广场附近的一个老小区里,整个 2022 年上半年一共赚了 500 块钱。做电影这一行素来看才华,也要看机会,近期主要是看宏观。看杨潇的 9 部创作作品你就知道,他和目前的宏观关系不大。

和很多人一样,杨潇 2022 年的上半年过得很虚幻。他被封在家里的时候,连续不停地刷手机,网上不具名的各种小视频到处都是,全部是用手机前置摄像头拍的。其中一两个,他竟然能从互联网上搜到其他不同的视角,拼在一起剪辑播放,比街头黑帮电影更魔幻。这些来自底层的反抗让他兴奋,也清楚只不过是一时之事。这是上海为数不多让杨潇感到“公共性”的时刻。

这一年杨潇破碎感要强烈得多感觉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他所在的电影行业已经不复存在,但这只是杨潇这样的人的看法。他很难找到和自己感受接近的同行。“大家都想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他不会觉得,那个‘出人头地’的‘头’就是有问题的嘛……”

他还在用手里的摄像机思考。2021 年,杨潇和陈思思拍的短片《欢墟》入围西宁 FIRST 短片竞赛单元,也是唯一一部非虚构作品。它拍的是壮族对歌,一个被旅游观光业符号化的文化传统。在桂林靠拍片生存的人早晚要拍《刘三姐唱山歌》,杨潇也得到过类似的拍摄机会。这类宣传片里的人穿金戴银,载歌载舞,住在世外桃源,但这完全是迎合他人想象的虚假构建。于是杨潇决定记录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乡村已经被现代化挤压渗透的今天,真正的壮族对歌是什么样子,那些古老的歌词如何通过微信语音短信在人与人之间流动。哪怕你对这些一无所知,也会被那些对歌的日常场景触动——那些对歌的人从无眼神接触,声音也谈不上嘹亮,在长途汽车站歇脚的时候,在河里游泳的时候,在祭拜祖先的时候。

这些纪录片在国内罕有公开放映的机会,唯一走向公共的渠道就是国际影展。不过杨潇一直在寻找某些更贴近的小社群,或许连社群也不是,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分享对公共问题的看法,交换新知和共识。他有 8 年的时间待在上海,这样的相遇机会接近于无,因此多少是失望的。他认为上海生活的人过于务实自洽,因而显得疏离。但他们因此也有很强的市民意识,他和许多多人看到的那些匿名小视频和文字记录就是例证。“你觉得上海之外的人有多少人看过这一类的东西?”我们聊到这个,都认为数量不会太多。

再次见到杨潇是 11 月末他从横店来上海出差。本来下半年他计划去广州,但接下了某部官方考古纪录片中的拍摄工作。报酬可观,可以一直拿到来年春天。横店此时几乎没有剧组,像一座真正的空城,基地外的生活倒是看着如常。我们在奉贤路一家墨西哥馆子聊天,他说他现在是有钱的,抢着付了账。



《窗台日志》海报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用零碎空余时间完成了短片《窗台日志》。

Q: 关于什么的?

A: 在上海封控的那两多个月,我跟思思陆续地制作了一系列隔离影像日志,虽然是纪录的方式,但其实非常主观,杂糅了我们的惆怅、恐惧和期许。

Q: 你觉得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 这是一次很迫切的创作,就是那种不拍就会“死”的创作。当社会生活被彻底悬置起来,人们被迫关在家中,等待戈多的到来,然而人们打开窗户等来的却是具身化的政治演出。这还蛮奇观的,因为权力一般不在光天化日之下运行。

这种剧场结构(观众 / 舞台)颠倒了经典的观看逻辑。通常来说,权力需要统辖更辽阔的制高点,因为他需要看到的比“困兽”多。而封控则相反,困在高楼中的居民虽然可以随意观赏窗外的权力尽显扬威,然而舞台上的“演员”的任务却是主宰人们的生死,我能立刻联想到的与此相仿的竟然是德国的“水晶之夜”。俯瞰,从来没有这样无力过吧,这是属于 2022 年中国人的独一无二的姿势。

另一个我想要通过影片去解决的是与邻人的关系问题。隔离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附近,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跟身边的陌生人形成了一个坚固的聚落,尽管我们对“封控”和“自由”可能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但我还是迫切地觉得有责任为此刻的相聚说些什么。

对我来说这次创作最有趣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次未经任何谋划的 film-making,全凭生命体验单纯地将它托盘而出。这更像理想状态的“书写”,当电影像书写一样自由,它才能解放出足够多的作者性。

Q: 它和你以前拍的片子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A: 三年疫情注定会成为我们这代人的创伤。从疫情爆发至今,我常常自问,电影何为?电影有必要吗?有什么样的电影是我这几年实践的原点。2020 年拍摄《欢墟》时,我想要拥抱家园和古老记忆,那是我当时内心必要,再到《窗台日志》,我希望更决绝地对准当下。

Q: 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 漫画家丁伟。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电影《陆上行舟》(1982)剧照

有强烈、明确的诉求，却有清晰的态度：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进步”需要被质疑。丁韦研究生毕业之后真正“上班”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年左右，大部分时间他都靠打零工养活自己。其中最主要的是画漫画。他翻译一些作品，也自己创作。他定期参加艺术市集之类的活动，在现场摊位上出售自己的作品。按照丁韦的说法，这可以带来收入，并且要好过打零工。

我们在放映之后有简短的聊天，但他第二天就要离开上海，所以关于他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是在腾讯会议上聊的。时间是11月下旬。

A：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吗？

B：一会儿我要参加的那个事情就有一点。

A：是什么？

B：就等会儿要视频云喝酒，跟广州的朋友视频，和他们喝酒。

A：因为封控了？

B：也不一定跟他们封控有关。他们封了那么久了，都多少天了。之前我跟武汉的一群朋友去了海珠区的一个湖北村，走了这么一遭。然后广州封控，我们这群朋友就很关注当地的状况。想着或许可以聊一聊。

A：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你看来看是什么？

B：其实不单单是海珠区的状况，这些朋友就被困在那儿的话，从心理上面的的确需要一起聊一聊，喝个酒。对，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昨天晚上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喝了，其中有一个的名字就叫海珠，不是广州人，但她是广东的，她的名字就叫海珠，然后她说（当下）这个情况就让她很郁闷，她想换个名字，这就是换一种心情。

对，透气，换个名字透气，换一种心情，然后她昨天就在征集名字，我就就说要不我们就搞云喝酒，然后同时也是海珠女士更名仪式，就是凑在一起弄，就今天晚上一起大家电话聊一下，就这种。

A：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B：艺术家欧飞鸿。

专栏

生活是实验性的， 质疑是真的 | 接力访问 003 丁韦

杨樱 | 接力访问

意义就在行动中，
哪怕在开始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介绍一个人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即使对方心领神会地“噢”过，还是可能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是什么的呢？”

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希望挣脱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框架，扩展来看，也包括挣脱现代资本主义界定的以“工作”为核心的生存方式。如果一个人真的在当代社会将此付诸实践，毫无疑问需要极大勇气，包括对抗世俗目光和物质诱惑。因而一个人说自己是安那其主义者，其生活本身就可能可以称之为实验性的。

认识丁韦（应要求此处化名）是在上海徐家汇一幢居民楼里，一个大客厅，当晚被改成了放映室。这是客场，丁韦在这里放映自己的纪录片。去的时候阳台窗帘被取了下来，丁韦正在投影仪幕布上装窗帘夹，打算一会儿挂上去。阳台横梁中间放着“安”，大铁牌，似乎是某个工地丢弃的“安全生产”标语中的一块。它两边各有几盒莲花清瘟胶囊压阵，像肩章。

纪录片拍的是2022年年初，丁韦和朋友们扛着一条独木舟穿过武汉闹市——“路上行舟”，他们这么定义它。手机镜头拍摄，晃得厉害，中间插入了大量微信群的聊天记录，点击某个图片放大又缩小。一只黑猫站在其中一个人的肩膀上。独木舟被扛进了安踏旗舰店。纪录片不作阐释，只是呈现整个过程。大约有十几个观众看完了片子。在放映会后的提问环节，他们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对如何在闹市扛独木舟提出了建议，没人质疑这件事的意义。

在此之前，丁韦还在武汉发起过一场湖边真人RPG游戏；开过“湖星大旅店”；盖过一座蛟龙庙。和“路上行舟”一样，几乎所有丁韦做的事情都是象征性的，比如“蛟龙庙”只是一块雨布撑起的尖顶棚，地上竖着四块长石，中间两块覆盖红纸一张，曰“神龙在此”（但也真的有人上香）。而“湖星大旅店”实际上是一个仅存一天的棚屋，当时是环卫工休息处。丁韦加以利用，在里面放置了手电、睡袋、带蚊帐的吊床之类的物品，还有一份使用指南，意在为游览者提供一个亲近的歇脚场所。这是某个后来影响甚广的艺术计划的一部分，丁韦是参与者之一。该计划的背景是2010年华侨城在武汉填湖建起楼盘和欢乐谷，此后属于市民的日常景观不断被商业地产蚕食，引发诸多抗议，但都无果。丁韦和其他朋友诉诸艺术，用各种象征性的行动对抗资本对空间侵蚀。

关于丁韦的描述就是这样，你可以连续描述他做的一件又一件事，它们汇总在一起，没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Frank Zhang on Unsplash](#)

专栏

理解中国食物的时候， 我也在理解中国人和社会 | 接力访问 004 Chris St.Cavish

杨樱 | 接力访问

他们都劝我离开，我说我再想想”。

美国人 Chris St.Cavish 2000 年代初来上海的时候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做厨师，后来成了撰稿人，给一个德国人在上海办的网站报道上海日益蓬勃的餐饮和生活方式。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在 2014 年——带着游标卡尺和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勇气，评测了上海 22 家小笼包，并写出科学论文一般严谨的文章。此举引来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全球媒体的关注。他也因此开创了食物评测的写作风潮，日后有人在会议桌上一字排开 20 种薯片或者鸡胸肉，理论上都是在向 Chris 致敬。

他供职的那个叫做 SmartShanghai 的网站其实更接近旧金山那个 craigslist，附带媒体功能的生活平台，从租房到交友信息都有，最初只是为了满足不看 China Daily 的老外们获取信息的需求。不过很快上海餐饮娱乐信息越来越丰富，广告主从不断供，有一度 SmartShanghai 和很多中国同行一样，丰富、认真，全身心地投入五光十色的物质生活。

Chris 在那个阶段着实做了不少事：骑着一辆破摩托环游了中国，搬了好几次家，结了婚又离了婚，唯一不怎么变的爱好，是体验和观察中国菜。“我一边撰写美食评论，一边往我的大脑里尽可能地塞更多关于中国菜的知识。”鉴于他没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中餐教材，好像也从来没想过像《鱼翅与花椒》的作者那样去上个厨师学校什么的，吃和写作就成了 Chris 投身中餐的唯一方式。

到目前为止，他对两个结论是有信心的。一个是，“就像中国有那么多菜系种类，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很多种文化的超级复合体它是不能一概而论的第二个则是面条。Chris 说，面条是中餐里面最容易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品类，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面条做法，而其中很容易找到内在的烹饪联系。本着对面条本身以及文化的爱好，Chris 在中国各地寻找厉害的面馆和制作者，他吃面，也倾听每个人的故事。外国人的身份很有优势，他总能顺利见到知名的受访者，并让他们拿出中西交流最高级别的热情展示自己的技艺。

对人的兴趣是 Chris 写作的底色。他本来就没打算做一个替饭店写文章的人。在 SmartShanghai 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写的是在路边敲打铁皮锅子的老师傅，以及那些骆驼奶专营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记得他讳莫如深地说起兰州拉面兄弟时候的

表情，因为混杂了包括民族情感、地头纷争和私人恩怨等诸多因素，这个话题变得讳莫如深。这也是 Chris 在中国多年之后积累的某种资本：他知道简单的表象之下从来不容易简单，而且任何事情都和人有关，而非简单的事理逻辑。

大概也就两三年之前，他突然发现母亲的祖辈是住在北京的传教士，参与创办了燕京大学，盖的教堂到现在还在北京同仁医院旁边站着，甚至太外公创办的眼科也被继承了下来。家人从没有刻意对他说起这段历史，他自己偶然发现了它，就连当时来中国的决定，也与此毫无关系。他不过觉得当时的中国是一块巨大的磁铁，一个人应该往能量汇聚的地方移动。后来他把这段家族历史告诉朋友，别人都以为他在吹牛。他自己倒是认真真去教堂里看了好几回，内心还有点失落：和我的祖先相比我做了什么？！就是写写饭店！

将近 20 年的时间，Chris 都在上海。相比绝大多数 expats——他这么称呼在中国的外国暂居者，他站在了一个独立三角地带。这让他可以观察他的“同类”，也可以反观自己。在给“小鸟文学”写的专栏里，他细致入微地描绘形形色色 expats 生活的“泡泡”。上海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多样性成功地维持了这些泡泡，异域文化被视为点缀，而非压力。Chris 和大多数 expats 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那么在意这些“泡泡”，他当然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毕竟他的职业履历离“真空低温慢煮技术”或者“液体球化技术”很近，回到餐饮行业总是一项可以考虑的退路，但是他没有。他在张罗那本关于面条的书，给不同的媒体撰稿，以及给餐厅做私人顾问以维持生计。他还在 2021 年开了一个公众号，说“在不被有关部门请去喝茶和踢出微信的前提下，保持有趣，保证真实”。他写什么？还是各类食物、餐厅、游记和生活剪影。但他不得不带上自我审查的自觉，有的时候他会发来微信：这个你觉得能不能发？

2022 年，他在中国的处境变得更复杂了。上海封城的时候，一方面作为一个美国人，大家认为他永远“有得选”；另一方面，在听说种种状况之后，身处事外的朋友们问他，“你以为你之前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言外之意，如今发生的事情他不应该感到那么惊讶，也不必纠结，应该加速离开。类似这样的对话很难进行，因为 Chris 不能在简短的几句话里去为政府、社会和具体的个人做出一番解释，而他很明显对自己身处 20 年的地方无比眷恋。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在他脑子里盘旋。到了 2022 年 11 月底，他的妈妈频繁劝他回美国，至少得和很多别的朋友一样，去个什么别的地方。他还在犹豫。当一个人把人生最长的一段时间都付诸在某个地方，他就很难想象自己挪去另一个地方还可以拥有怎样的生活。他说，我再想想。

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恰好是 12 月 7 日，中国国务院公布放宽新冠病毒病 (COVID-19) 防疫措施“新十条”。Chris 作为密接刚刚解除居家隔离——这还是他跟居委会据理力争得来的，而我们相约的那家咖啡店还要求 48 小时核酸。我核酸过期了，于是买了咖啡坐在店门口的马扎上。Chris 在旁边的老山东水果店买了一只红柚，老板娘帮着划了刀，他一边掰着柚子，一边跟我说最近在做的事情。

Q：最近你在做什么？

A：做 workshop，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新的客户。

Q：具体讲讲？

A：很多外国人都离开了中国，以前那些专门做外国人生意的餐厅发现自己的客户变成了中国。可能以前也就是 15% 这样，现在（中国消费者）变成所有了！但是餐厅还不够了解他们的消费习惯，也不了解中国消费者都在用的大众点评。我跟那些大众点评博主有联系，我跟他们聊了以后，可以把我了解到的信息告诉餐厅……老实说，这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你真的要写？

Q：挺有意思的。这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A：大概 2020 年的时候，我开始做餐饮咨询服务。你知道吗，就好像那种“秘密顾客”，去吃饭，去喝酒，然后向餐馆老板提出哪些服务应该改进，还有各种意见。但是今年这样的客户都没有了，生意这么困难，这不是他们非付不可的费用。所以我得改进我的服务。

Q：这件事做得怎么样？

A：有两个潜在的客户在接洽。你知道我以前还有个合伙人……你知道卫生局之类的吗？他们会去餐馆检查，有一个长长的列表。只要有一两项不合格就会罚很多钱。我的合伙人就会先去做这种检查，这样真正的检查的人来了就不用罚那么多钱了。不过现在这个服务也做不下去了。

Q：为什么？

A：人们更愿意为好消息付费。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意思的人？

A：Jiro，她以前在酒店做前台，现在开了一个超朋克的餐馆。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图片来自 [OMK](#) on Unsplash

专栏

苏轼在这“意义完全被消解”的一年拉了我一把 | 接力访问 005 戴浩然

杨樱 | 接力访问

“绝望回避不了，但我会行动起来的”。

1991年出生的戴浩然在独立出版品牌“八光分文化”做科幻文学编辑。如果写作，他就叫“夏柔”。何雨珈在做接力推荐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人特别拧巴，有点好玩”。我们在微信上聊了聊今年惨淡的出版业，以及他是如何进入科幻出版这个行当的。为了方便，他的故事以口述形式整理如下：

为什么我读大学选择中文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想找一个“看书不会被当作异类”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天天和书打交道。我在读中学的时候，人家看你天天看闲书，成绩还不好，就觉得你整天没干正事儿。因此，选择大学专业本质上是想找到一个身份上的归属和认同。然而，当我读了中文系，身边看书的人也很少。我发现就是这样的，看书的人就不多。

我是（四川资阳）安岳县人，就是出柠檬和石刻的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初中开始看郭敬明和韩寒的书，是因为巨大的虚荣感，很难说他们的故事真正让我感受到了文学的美好，但他们塑造了一种青年才俊的感觉，让我很着迷。一个人写东西能赚很多钱，能扬名立万，这对于一个成绩不好、缺乏自我认同的小县城中学生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以说，我之所以开始阅读，就是因为虚荣，就因为一场存在主义危机。

到了高中我自己开始写东西，然后发现之前看的那些书帮不了我，我就开始看一些其他的书，现在看起来也是畅销书。真正让我产生文学自觉的是读大学。我读的是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一个三本，但老师非常好。我记得我的外国文学老师，从来不用教材，他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告诉我们文学的本质是对比史……我就发现原来文学是这样的。还有我的写作课老师，她对我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从那时开始，我觉得自己才真正意识到了文学的美好。不过那时候身边依然没什么人看书。

大学里我创过业，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游戏公司里做文案策划，之后还去过今日头条做广告审核。做得很顺利，但是很不开心。应该是2016年。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再挣钱也不行。正好我之前在《科幻世界》杂志社的领导杨枫女士离职，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我就到杨老师那边去做原创。

没有信心，我做的都不是基于理性的选择，如果真的理性我就应该留在游戏公司，或者留在今日头条，大公司，稳定，有可见的上升通道。但人本质上不是理性的动物，我一直觉得人是被一种巨大的无意识牵引的个体，他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都不是可以用理性计算出来的。我当时就是想做原创科幻。

太难了，我们刚做的时候，国内科幻创作还不强，整个科幻产业开发链条很薄弱，《流浪地球》

这种现象级电影也还没有出现。幸好我们八光分的原创产品线活了下来，公司和作者都能挣到钱，也熬到了市场慢慢变好的时候。现在市场环境还是有明显改善的，至少因为《三体》和《流浪地球》，科幻已经是一个国民话题了，受众的基本盘在增加。

谈不上有多少竞争对手，书这个行业都这么惨淡了，要说有什么竞争，那也是短视频或者碎片化阅读——说白了大家都是娱乐产业，为什么我要看你这个书，而不是15秒的视频开心一下？对吧，为什么？而且现在短视频也在精品化。书还是非常古老的媒介，我们都是期待文学和书能在当下重新找到自己位置的人，毕竟它的信息录入、释放、传播的特征，其实从来没有进化过，但我们相信它依然会鲜活的生命力。

哎，今年的出版简直是不能提。很多公司都一起做做活动，互相曝光，破个圈导个流什么的。今年确实很糟糕，我都不愿意回想。

首先就是意义感的巨大消解。比如不论是清零还是放开，都面临许多艰难的困境。你身处其中，就会感受到巨大的意义感的消解，感觉做什么都没有用。书也很难卖，哪怕我有些书在加印，但有些书从官宣到电商有现货甚至需要两个月，这不是开玩笑吗？读者预购买的，两个月没到手，留存还有多少？对吧？

然后，我今年特别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从纷扰的世界拉回到书上，从结果上来说，肯定就是全面失败。虽然很想承认，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必须面对它。其他文化市场也很难，你看《阿凡达2》现在就5亿票房，我都惊呆了，它再烂，中国怎么也是十几二十亿的市场啊。你还记得温子仁那版《速度与激情》上映时预售多少钱吗？

今年很多东西都让人觉得很无力，至少从情绪上你回避不了。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是一个行动上很积极的人。我还是会去做很多动作。比如我和小伙伴即将推出科幻作家格雷格·伊根的三卷本（如果你喜欢特德·姜，非常推荐你读一下），然后《三体漫画》也下厂印刷了，由我编辑的原创长篇《不动天坠山》也即将出版，我自己创作的科幻小说集《月海电台》也付梓了。我是不会放松的，虽然今年很艰难，但我相信明年还有奔头，还有继续往前走的理由。



《月海电台》

这一年里，杨枫老师是我们的稳定阀，我觉得我身边所有人都垮了她都不会，反正莫名其妙。真是这样，很多时候她的状态可以安抚我，让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做事情。我一直觉得她特别厉害，尤其是出来创业这件事，让我觉得振奋。她之前在《科幻世界》里是有编写的，但她就要出来做想做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她在杂志社的时候，在那么核心的部门管理那么多事，其实就算不核心，她也可以混下去，没问题的，现在大家二十几岁就想躺平了，但她还愿意出来，还愿意给我这种新人机会，你知道做原创有多冒险吗？印几千册，卖几百册的比比皆是，就是不赚钱的。但是她相信我，相信原创的力量。我现在的职位是产品总监负责一些书的制作市场渠道我每天的工作常常是打电话签合同，谈判。今年大家都很难，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对我而言还是有很多收获，我重读了许多对我有影响的作家的书，感觉他们在因缘巧合下，也算在这个时候拉了我一把。

Q：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看了一本书，我想要强烈安利给所有人，叫《苏轼十讲》。

Q：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A：很久没看文论和评传看得这么开心了，本是随便从书架上拿的，没想到那么好。读到《赤壁赋》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书房里哭。这是我从小就会背的文章，可我重读的时候，感觉这本书真的把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还有鲁迅，他们这三个绝对意义上的天问级别的思想家所构成的深渊里面领了出来。我觉得非常神奇，这是我自己做过最有趣的事情。

Q：展开讲讲？

A：我今年特别沉迷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也复习鲁迅，复习尼采。对，今年这个时候我反而要去读这样的作品，就是当现实变成一个巨大深渊的时候，我需要更加宏伟的深渊来跟它对冲，我需要用更大的绝望来与之对抗。然后，其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变得非常糟糕。你走不出来，就特别难受。

可当我读到《赤壁赋》的时候——就是前天晚上的事——我就好像完成了一次自我质问和自我解禁。我就感觉天问，不一定要叩问文明，你不是要去叩问一个巨大的集体，不需要去凝视集体的无意识，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也可以叩问自然和自己。自然、自我，还有文明或者说集体，三者原来是可以被剥离开的。那一刻我得到了巨大的放松，苏轼真的触摸到了永恒……他就告诉你，人生当然是渺小的，但是这个世界是无比丰富的……此时此刻他真的给我带来巨大的安慰。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人？

A：寻麓书馆的主人王淼淼。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四，2022.12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